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Yunnan Province (II)**

Zhou Ziren

Remembering Publishing

云南文革史稿
(下)

周孜仁 著

 美国华忆出版社
Remembering Publishing

Copyright © 2019 by Remembering Publishing

ISBN: 978-1-951135-16-4 (P- 平装本)

978-1-951135-17-1 (E- 电子本)

LCCN: 2020 900513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Yunnan Province (II)

Zhou Ziren

Remembering Publishing, LLC

9600 S IH-35, C600

Austin, TX 78748

RememPub@gmail.com

书名: **云南文革史稿 (下)**

作者: 周孜仁 著

出版: 美国华忆出版社 奥斯汀·得克萨斯州

版次: 2020 年 3 月第一版

字数: 280 千字

作品内容受国际知识产权公约保护,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此书由原北师大女附中
《远去的女附中》编委会捐助出版
特此致谢

目 录

卷三 谭甫仁时代：热昏岁月	001
卷首导读	003
第一章 加热仇恨	007
1.1. 省革委前六次全会的基本情况	007
1.2. 军方的态度	018
1.3. 北京的恶例	025
第二章 七次全会的会里会外	028
2.1. 高压与内讧	028
2.2. “划线站队”：云南社会的全员惨祸	039
第三章 边疆“新秩序”	051
3.1. “政治边防”	051
3.2. 歇斯底里的表“忠”闹剧	058
3.3. 围海造田和通海地震	066

第四章 暗流	077
4.1.九次全会	077
4.2.庐山闹剧的云南声部	084
第五章 “017凶杀案”	089
5.1.凶案现场回放	089
5.2.案破前后	093
卷四 周兴时代:破船负重泛中流	097
第一章 从“批陈”到“913”	099
1.1.谭甫仁的政治遗产和周兴面临的挑战	099
1.2.烂摊子 开门红	102
1.3.一路纠偏	107
1.4.“913事件”的云南折光	112
第二章 “批林整风”在云南	117
2.1.尴尬的“洗地”	117
2.2.以政治批判开路的计划工作会	118
2.3.边疆民族问题	123
2.4.林彪的“钉子”与周兴的两难	129
2.5.新干部	133
第三章 “批林批孔”:“66乱局”蹩脚的微缩版	139
3.1.“批林批孔”前的云南政局	139
3.2.戾风初起	144
3.3.大戏开锣	147

3.4.混战与闹剧	149
3.5.进退维谷的周兴	156
3.6.短命的喧嚣	162
第四章 云南民族关系的血色之殇（上）	172
4.1.“回乱”溯源	172
4.2.政治矛盾和民族矛盾的二重复调	178
第五章 “100天会议”和26号文件	185
5.1.“100天会议”前奏	185
5.2.精选版“北京学习班”	188
5.3.关于26号文件	191
5.4.扫清道路	195
5.5.老干部的节日和八派的梦魇	200
5.6.政治经济学	207
第六章 云南民族关系的血色之殇（下）	210
6.1.沙甸问题“政治解决已无可能”	210
6.2.沙甸的军事进剿	213
卷五 贾启允时代：难以维持的“维持会”	219
第一章 匆促的序章	221
1.1.临危受命	221
1.2.短暂的快感	224
1.3.毛泽东绝地反击	227

第二章 乱局3.0版	230
2.1.周恩来之殇和吊诡的“五一八事件”	230
2.2.变动不居的云南政治版图	234
2.3.地委书记会议与政治骚乱	237
2.4.北京的高压和贾启允的“投名状”	244
2.5.关于理论和理论讨论会	248
2.6.“40天会议”	254
第三章 绝 响	260
3.1. 忽然日落	260
3.2. 遥远的回声	261
卷六 后文革时代: 无法告别的“继续革命”	267
第一章 权力依旧傲慢	269
1.1. 错失的和解良机	269
1.2. 贾启允机会主义的终结	271
1.3. 安平生、陈丕显治滇	273
1.4. 官僚体系的重建	279
第二章 造反派的末日	285
2.1. 定点清除	285
2.2. 作为“行为艺术”的“两案”审理	291
2.3. 诸神陨落	296
第三章 最后的挽歌	302
3.1. 文革伴生物	302

3.2. 狂欢与苦役·····	304
3.3. 真相浮出水面·····	307
3.4. 自我救赎·····	309
3.5. 异域梦断·····	315
跋：亲历者的使命·····	323
下卷参考文献·····	327

卷三

谭甫仁时代：热昏岁月

（1968年8月13日—1970年12月17日）

卷首导读

1968年8月13日，新生红色政权正式成立。继此前4月10日全省第一个地州级革委会迪庆藏族自治州革委会成立，4月28日，临沧专区革委会成立，4月30日，怒江傈僳族自治州革委会成立，8月7日，丽江专区革委会成立，8月13日，昆明市革委会与省革委同日成立。此后地、州、市一级革委会陆续成立的有：楚雄彝族自治州（8月15日）、思茅专区（9月13日）、文山壮族自治州、大理白族自治州，保山专区（9月29日），曲靖专区、玉溪专区、昭通专区（9月30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10月1日）、东川市（10月5日）和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10月31日）。12月17日《云南日报》头版全版套红报道：“全省13个专区（自治州、市）128个县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昆明30万军民隆重举行集会，热烈欢呼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云南山河算是“一片红”了。文革两年多，老百姓在动荡不安的日子里备受灾难，小心翼翼地渴望和平，现在该安稳了吧？——不！

历史上每一个新王朝的建立，总会给百姓一段休养生息的时间，所谓“无为而治，与民休息”。但文革建立的“新生红色政权”算不得新王朝，它只不过是毛泽东的“乌托邦”的又一个阶段性试验。它带来的绝不是稳定与和平，而是一场以国家名义开始的新的规模暴力。因为毛泽东要的是“继续革命”——他要用暴力手段对全社会进行深度打靶：“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五一六”……政治运动还是接二连三。读者很快就会看到，本卷记录的故事，依旧和前面的同样残酷，同样歇斯底里。

其次，几千年的历史一再表明，新王朝草创之时，成功的雄主总会做出许多诱人的承诺，秀出不少善举，而一旦江山到手，事实马上就会证明这些承诺统统都是谎言，善举不过是一时权变而已。虽然公信力已经不再，但大权已然稳握，即便赤裸裸地胡来，谁也奈何不得——革委会成立后的云南就是如此。

谭甫仁初降云南，面临的本是整个社会严重的撕裂。两派群众势同水火、你死我活。稍有理性或政治头脑的政客都应该明白，要坐稳自己的虎头交椅，必须采取中立立场，高高在上，以仲裁者的身份左右周旋，确保政治主动，客观上亦可消弭仇恨，实现和平与和谐。可惜，谭甫仁偏偏一头栽进一派的怀抱，以保护人和代理人的身份，继续向另外一派穷追猛打，致使仇恨继续加剧。如此一来，他就不但失去了回旋余地，而且在云南文革破产后所有的官方叙事中，谭甫仁时代都被描写为人间地狱——冤、假、错案遍于三迤；而谭则是一个阎王，杀人如麻，草菅人命。

实事求是地说，谭甫仁主滇两年多，确实留下不少恶行。问题是，这难道都怪他吗？作为军人，他不过是服从了上司的命令罢了；作为政府高官，他不过执行了中央的指示而已。即使最受人诟病的“划线站队”，亦非谭甫仁个人的发明，它不过是毛泽东“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等系列指令的具体化，谭甫仁只是把毛的政治口号变为了更具有操作性的步骤，且更明朗、更简洁、更赤裸裸。

谭甫仁的执政为何拙笨若此？或曰，军人不懂政治。这种说法似乎有点说不通。共产党军队从来就以政治立军。毛泽东不是有“三队（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之说吗？几十年实践历练，耳濡目染，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风格和实施套路，他们是不陌生的。或曰，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当时，中央关于云南的文件写得清楚：“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云南的代理人”就是阎红彦和赵健民。阎在文革之初便自杀身亡，现在只剩一个赵健民。谭甫仁作为高级官员，身兼军人和党员这两种身份，注定不需要花时间再对此去做是非判断，只需要照办就行。再说，毛说了，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1]。既然还

[1]1968年4月10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芙蓉园里尽朝晖》发表了毛的“最新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

是共产党在对付国民党，那么，要求手握重权的谭甫仁做一个公允平和的仲裁者，显然是不可能的。他必然会驾着伟大领袖“阶级斗争”“继续革命”的战车，在三迤大地横冲直撞。以至于省革委二把手、老于政治场的周兴亦为此战战兢兢。周的秘书余显柏在回忆录中这样记载：“我记得在搞‘划线站队’时，全省各地出现了群众斗争升级的局面。周兴同志对此忧心忡忡。我常听到他说，不能用这种搞法。我党历史上的教训太深刻了”“现在的这种搞法面太宽，坏人真的有那么多吗？这很容易给真正的坏人钻空子，不符合毛主席说的绝大多数都是好人的指示，群众把群众斗得那么惨，将来还不得平反。接着他很有感触地说：这个屁股才难擦哩！”^[1]

需要谈一谈“执政理念”。毛泽东本崇尚“权力拜物教”，他的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经过林彪演化，干脆变为“政权就是镇压之权”。林彪此语是在为文革揭幕的“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俗称“518讲话”）中提到的，兹摘要如下：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生产关系固然是基础，但是靠夺取政权来改变，靠夺取政权来巩固，靠夺取政权来发展。无产阶级拿到了政权，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一下子就可以打倒。无产阶级就有了一切。所以，无论怎样千头万绪的事，不要忘记方向，失掉中心。永远不要忘了政权。要念念不忘政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虫，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怎样掉的。

一个“枪杆子里出政权”，一个“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完成了权力拜物教或曰暴力拜物教的完整表述。文革进行到第八个年头，毛泽东还搞了一个“批儒评法”运动，嘲笑御用文人郭沫若“孔丘名高实秕糠”“十批不是好文章”“劝君莫骂秦始皇，焚坑之事要商量”。诚如韩非、商鞅之流强调国家的镇压职能：“国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2]。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一场暴

[1] 余显柏：《云南风云》，见《怀念周兴》页53-54，北京，群众出版社，2000。

[2] 《商君书·慎法篇》。

力拜物教的大普及。通过几年来生死感受，芸芸众生几乎都懂得了只要有权便可万能，便可肆无忌惮，便可篡改历史和事实，胡说八道皆成真理，杀人越货理直气壮。当时笔者阅览过许多云南先进人物的事迹，几乎随处可见这类顺口溜：“权、权、权，命相连。没有权，苦黄连。有了权，蜜样甜。红色江山永不变，幸福生活万万年。”身处这样的社会大背景，把板子完全打在谭甫仁屁股上，似乎有失公允。

证伪主义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谈及种族主义（及法西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时提出：种族主义者以被（上帝）“选中”的优秀种族自诩，并确信将最终获取世界，而马克思历史哲学则以“选中”的阶级取代“选中”的民族，并确信自己注定获得世界。云南文革，如今其中一派群众既已被“选定”执行了“正确路线”，另一派必然需打入另册。

古语云：“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是中国几千年专制制度的一个通病。共产党内的路线斗争也未能脱此范式，只是到了全国建政，上层斗争往往又与所谓群众运动彼此嫁接，遂使迫害规模更大，手段更为残酷。毛发动文革，把与他一道出生入死打天下的革命战友，也通过群众造反抓的抓、斗的斗、关的关、残的残、死的死，连刘少奇这样的密友也落得个惨死囹圄。有了如此模板，谭甫仁焉能不对另一大派滥施捕杀？他不过照葫芦画瓢，学了领袖一点皮毛罢了。

云南故事与其他省不同的仅仅是，在无数生命遭遇荼毒的同时，施暴者谭甫仁个人的性命最后也搭了进去，以被人暗杀作为他的时代终结——谭甫仁成了共产党执政期被暗杀的最高级别的官员，为凡夫俗人饭后闲话演绎出不少离奇传说——足见事情之无奈与荒谬。

行笔前还需说明的是，笔者文革前3年在重庆大学度过，发配来滇，正好是1969年1月，云南“划线站队”运动疯狂发酵之时。2月，滞留边疆保山专区革委会从事宣传工作，11月初，因参加第一次“学代会”^[1]筹备之因，正式调昆明军区调研组（人称“谭甫仁办公室”）至两年后谭遇刺，又转入省委办公厅工作至1975年秋。本卷及下一卷所述历史事实，笔者多有亲历，在官方正式档案不能解密的情况下，不能不多处引用笔者当时的工作记录或日记，或有遗漏不全之处，只能留待读者和方家指正。

[1] “学代会”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简称。

第一章 加热仇恨

1.1. 省革委前六次全会的基本情况

叙述谭甫仁执政有一个关键词：“七次全会”（而叙述七次全会的关键词，又称“划线站队”），这次会议及相关政治行为奠定了以谭甫仁为代表的云南新生红色政权地位的最后巩固，以后云南发生的事情，如“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五一六”等，都是在“七次全会”“划线站队”的影子下走过的；即使谭死后发生的所谓“反潮流”“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沙甸事件”等，亦无不与之相关。七次全会之后演绎出来的，则是披着“政治边防”“学代会”一类戏装出演的荒唐闹剧。

巩固新政权。首先要做的，就是控制舆论和思想灌输，以确认政府权力的合法性。文革三年，文革运动的发动者毛泽东早已捧上圣坛，堪称神灵，因此地方政府必须从思想和舆论上，证明自己是毛泽东的忠实信徒和正宗代言人。其次，以此为基础实现“五统一”^[1]，同时，对“异端组织”和“异教徒”必须予以彻底整肃。最后，最要命的是各级政权组织——上面说到所谓“全省山河一片红”——即13个专区（自治州、市）及128个县^[2]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事实上情况参差不齐，有些基层政权甚至干脆就掌握在炮派手上，形成所谓的“马蜂窝”，如先于省革委成立的弥渡县革

[1]指“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2]此处指1968年的行政区划数，到2019年，云南共17个市级区划，128个县级区划。

委会（1968年4月3日成立），9名常委，炮派观点8人，八派观点仅1人^[1]。类似情况，如云南大学革委会（6月18日成立），因为学校本为“炮窝”，基本上没有八派势力，故而理所当然由炮派独掌大权。这些，都需要谭甫仁抓紧进行打理。

七次全会是1969年元旦开幕的，历时半月，于15日结束。此前开过的六次全委会则为此次会议进行了紧锣密鼓的预热。

省革委成立第二天，即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8月14—19日）学习中央《关于成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的庆祝社论。这是“新生红色政权”的合法性依据和行动总纲。据此，谭甫仁提出新政权当前的工作“主要是抓好两件大事，第一件是办学习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按：确认毛泽东正宗代言人的地位），解决云南的大是大非问题（按：确认谁是毛泽东的“选民”？谁是必须抛弃并加以整肃的“异教徒”）。第二件是掌握斗争大方向，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按：前二项铺垫结束，整肃命令于是紧接出焉）”。会议最后通过两项决议：一为《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更大规模地掀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运动，把云南建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的决议》。二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地、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向阶级敌人发动更猛烈的进攻的决议》。前一个《决议》称：“省革委成立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要继续大办、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军队办、地方办，省里办、专县办、各企业、各单位、各机关、学校、厂矿、农村，都要普遍办，由领导干部、革命小将和广大革命群众分期分批参加学习。通过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带动全省掀起一个更大规模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群众运动”。后一《决议》则称，要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按：指刘少奇）及其在云南的代理人（按：指阎红彦和赵健民，阎已于1967年初自戕，故此实指赵健民一人）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的“多中心论”的反动理论，批判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分裂主义，批判和反对无政府主义和“形左实右”的反动思想，批判各种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反动流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的世界观，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各种表现。同时强调把革命的大批判同

[1] 聂文澜主编《回眸文革——弥渡文革简史》页46。聂为该县八派领袖，唯一进入县革委常委的群众代表。1979年10月18日，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

清理阶级队伍、开展对敌斗争的工作结合起来。

一次全会后一周，旋即召开省革委第二次全体会议，时间为8月26、27两天。这次会议主要任务是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8月25日发布的《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以及同日《红旗》第2期发表的姚文元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传达的毛泽东最新指示：

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来，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山崩，学生正是毛泽东从山顶推下的第一块石头，如今要由“天下大乱”而“天下大治”，势必先得让“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把这些不安分的年轻人看管起来，尤其是对“新生红色政权”愤愤不平的炮派学生。11月7日，云南首批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云南大学、昆明工学院、云南中医学院三家大专院校。7天后（11月19日），第二批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又开进昆明农林学院、昆明师范学院、昆明医学院、云南农业大学和云南民族学院。至此，8所大专院校全部被工宣队“占领”。12日，《云南日报》发表社论《划时代的伟大进军开始了——热烈欢迎我省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大专院校》并作报道。其中，炮派“老窝”云南大学的工军宣队最为瞩目。虽然校革委会在6月18日就成立了，但依然必须派工军宣队进驻并取代校革委的领导权，以“打破学校里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把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11月7日，工宣队进校，当即发布通告“通字第一号”《关于建立革命新秩序的通告》和“通字第二号”《关于开展革命大批判，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通告》。《通告》除了宣布必须“用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人人必须参加早请示、晚汇报，搞好三忠于、四无限活动，每天上午八至九时坚持天天读……每晚读报，提高阶级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全校广大革命师生员工要进行必要的军训，按部队编制进行班、排、连、营编队……真正做到思想革命化，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之外，还杀气腾腾宣布，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严防阶级敌人破坏和捣乱”“对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

派及国民党残渣余孽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只准他们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对他们实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如发现有现行反革命的言行,要依法严办”“严禁在校内外搞派性活动。发现有搞派性的个人或集体,要进行严肃处理,对造谣生事者,必须追究,发现敌特活动,应立即报告宣传队和警司执勤部队。”

此外,《通告》还宣布:

在校内由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成“工人纠察队”,昼夜执勤巡逻……要百倍提高警惕,严防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1]。

派工作组是共产党掌权后搞政治运动的成熟战法。1966年6月文革伊始,刘少奇就循例派工作组去学校,对闹事的学生实施弹压,毛泽东则正好以“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为由号召造反学生驱赶工作组以倒刘。如今刘少奇已倒,历史兜一个大的圈子,毛为整肃学生而派出的“工、军宣队”,无非是工作组的招牌换记而已。这实在是历史绝妙的讽刺。事实上,除了学校,其他部门:文化、商业……甚至党政机关,凡需要打理的,全都派出宣传队。^[2]

三次全会在二次全会4天之后(9月1-2日)召开,根据现有资料记载,只知道谭在会上严厉批评近日炮派的“私下擅自活动”,要求彻底批判“右倾分裂主义”和“多中心即无中心论”。^[3]根据当时的语言表述习惯,此语显然说明工宣队之类的做法遭遇了抵抗。从云南大学工宣队在省革委会政工组召开的“云南省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首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经验交流会”上的发言,透出了一点让谭家班不安的异象。发言首先耸人听闻地定义:“云大是一个有46年历史的大学。解放前,是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在云南培养其孝子贤孙的‘最高学府’。解放

[1] 刘兴育,《历史的见证》页296-301,昆明,云南大学党史校史研究室编印,2007。

[2] 1969年7月21日《云南日报》发表的《坚持用毛主席继续革命的理论武装干部》一文,撰文者即署名驻原省级机关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文章称,原省级机关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最近连续解放了一批犯有错误又有了觉悟的干部,共宣布解放原省级机关处长以上干部245人,其中有原部、委、厅、局长一级干部62人,原处长一级干部183人。

[3] 《当代云南大事纪要》页366。

时是和平过渡全盘接收的。十几年来，由于刘、阎、赵之流推行一条又粗又长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云大仍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是‘牛鬼蛇神’‘社会渣滓’的防空洞，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黑样板……“文化大革命”初期，云大是阎王殿的桥头堡，是赫赫有名的‘保皇大学’。在阎红彦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以后，云大又成了赵健民之流执行国民党特务云南组计划的大本营，豢养出一批赵家店的铁杆死硬派。”然后指出：

我们一到云大，看到的是一种“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情景。社会上，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轰轰烈烈，热火朝天。而云大却没有什麼动静，听不见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死气沉沉；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看不见一张打倒赵健民之流的大字报和大标语，一片冷冷清清的景象。尤其奇怪的是，还有许多提不得：赵健民之流，提不得；反军乱军分子，提不得；“滇挺”，提不得。等等，等等，不一而足。马蜂们钻在窝里，虎视眈眈，蠢蠢欲动，触动不得。

一小撮阶级敌人十分害怕，十分仇视毛主席派来的工宣队。他们算尽机关，耍尽花招，千方百计抵制工宣队的领导……他们销毁、转移反革命罪证，组织应付工宣队的第二套班子，订立革命攻守同盟，以攻为守，软硬兼施，上下勾结，内外串通，阳奉阴违，诡计多端，大耍反革命两面派作风。当着面，他们拍你的肩，握你的手，背后，又在大肆从事阴谋活动……方向东、吕卫东、王××等赵氏黑干将，上蹿下跳，疯狂叫嚣说：“工宣队要搞我们，我们要和他干到底！”他们公然造省革委会负责同志的谣，胡说什么“再坚持三个月，云南的大人物就垮台了，云南的天地也可以翻过来了”。一时间，群魔乱舞，邪风阵阵……并大整工宣队的黑材料，如所谓工宣队反毛泽东思想一百例等等，甚至到省革委会告状……公然威逼解放军要回到他们所谓的“革命路线”上来……他们打着校革委会的金字招牌^[1]，一方面向我工宣队施加种种压力，实行刁难、拖延和利用、限制政策，妄图迫使我们按照他们的

[1] 云南大学革委会成立于1968年6月14日。炮派势力尚为校革委的主导力量，故有校革委与工宣队争权之说。

意图行事；另一方面，向我们争权夺权，梦想和工宣队平分秋色。在大会上他们与工宣队平坐平起，耀武扬威，拉大旗作虎皮，借以吓人，连工宣队的意见也可以不理不睬，对工宣队的决定也可以加以否定，甚至公开对抗工宣队的领导^[1]。

实在有点像文革之初造反派对抗工作组的行状，只是时间坐标已经挪到1968年了。这次可是毛泽东派的工作组呢，谁胆敢反抗，必须坚决镇压之。事实是，高压下的云南大学和其他院校炮派师生，最后统统都服服帖帖，乖乖就降，效果好极了。据次年2月7日的《云南日报》称，全省有近万名产业工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大军，登上了上层建筑”斗批改“的政治舞台，进驻了全省44个大专院校、文化、新闻、卫生，科研部门以及其他没有搞好”斗批改“的“老大难”单位。短短3个月时间内，便打破了知识分子一统天下的局面，捅开了一些“马蜂窝”，炸开了被阎红彦、赵健民之流长期盘踞的“老大难”单位的阶级斗争盖子，揪出了隐藏的一小撮阶级敌人，使许多单位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同日，《云南日报》配发了《用毛泽东思想改造上层建筑》的社论^[2]。

接下来就该打理其他系统和部门了。9月14至17日召开的第四次全会，重点强调了党、政、财、文大权必须集中于省革命委员会，“坚决粉碎一小撮阶级敌人或在台前，或在台后，大肆进行抢权、夺权，极力散布反动的‘多中心论’的阴谋”。《云南日报》与之配合，于9月19日、9月23日、9月29日和10月15日连续发表4篇社论《坚决打倒反动的“多中心论”》《一切权力归革命委员会——再论坚决打倒反动的“多中心论”》《必须保证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畅通无阻——三论坚决打倒反动的“多中心论”》《做捍卫红色政权的英勇战士——四论坚决打倒反动的“多中心论”》，指出省革委成立后，有些人继续蒙蔽和操纵一些人占山为王，“对外抵制，对内控制”“对上封锁，对下高压”“压制群众，打击报复，大搞武力统治，制造白色恐怖，大喊大叫以我为中心”等等，为各行业的整肃大力造势。

[1] 刘兴育，页334—343。

[2] 1969年2月7日《云南日报》关于省革委召开工军宣队“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搞好上层建筑斗、批、改的经验交流会”的报道。

最后轮到党内。

文革夺权虽然热闹，一再说群众代表、军人和革命干部“三结合”，其实，权力之核心仍然必须由共产党绝对把控，这一点任何时候都离开不得。四次全会后的9月23日，谭甫仁及周兴等省革委主要负责人便研究成立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并报请北京审批，同时开始行使职权^[1]，省革委从此实行了党政合一的领导体制。所谓“党的核心小组”，实则极权体制框架下的党委临时“代用版”。谭甫仁既为“核心小组组长”又为“省革委主任”，一身而二任，自然一切由他说了算。

云南省革委党的核心小组办公室（简称“核办”）设于省委一号大院24号，即人称“阎王殿”的原阎红彦宅邸。“谭办”（昆明军区调研组）则位于昆明军区八号，即涂晓雷在《触目惊心的五月兵变》中描写的神秘莫测的三层小楼。两处仅金碧路一街之隔，“核办”两员“大将”，周兴十几年的贴身秘书周永祺^[2]和后担任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的胡延观凡遇重大事情都要往“谭办”跑，一进八号院，远远就大声宣布：我们摸行情来啦！^[3]

“核办”主管是时任省革委副主任的周兴。周虽属“老一辈无产阶级家”，资格老过现任上司谭甫仁，可按照政治原则必须坚持紧跟一把手，必须得让“核办”的人经常来“谭办”摸行情。周、胡二人每到“谭办”总是直奔二楼那间椭圆形办公室找谭甫仁的贴身大秘甫汉密谈摸底。甫汉，河北平山人，魁伟一燕赵汉子，时年42岁，不苟言笑，脾气甚大，外人断难接近。谭甫仁从北京空降云南，随行就带来两个贴身大秘：甫汉和王克学。王任昆明军区党办主任，负责替主子打理军内事宜；甫汉负责地方，很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威严。总之，任何政权形式一旦有了“核心”，必然就有“核心的核心”，最后必然导致个人专权。谭甫仁是当时云南“核心的核心”，而甫汉则是“核心的核心”的代言人。

[1] 核心小组成立时有成员9人，其中组长1人，副组长3人。1969年11月增补成员3人。1970年3月，中央批准成立省革委会核心小组名单时，副组长为4人。至此，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共13人，其中，军队干部11人，地方干部2人。次年3月28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由谭甫仁、周兴、王必成、陈康、鲁瑞林、刘明辉、梁中玉、成泽民、雷远高、左奎元、朱刚、李德骏、武健13人组成，谭甫仁任组长，周兴、王必成、陈康、鲁瑞林任副组长。

[2] 周永祺自1950年周兴任西南公安部长时即任秘书，此后周兴调北京、山东、云南，周永祺一直跟随。

[3] 周孜仁：《云南文革笔记》卷二“谭甫仁办公室”，台湾，秀威，2015。

会期两天（10月17日-18日）的省革委第五次全会，主题是学习毛泽东关于“吐故纳新”的整党指示。会议继续认定，云南目前的中心工作是要狠抓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开展革命大批判，认真做好清理工作，以为下一步整党建党创造条件。具体做法，当然还是要进一步开展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并组织工人宣传队推动之，此外，还有干部下放劳动、抓革命，促生产诸问题。

接着，北京发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1968年10月13日至10月31日，中央召开了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作为“九大”做准备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会议荒唐之处首先是会期：1956年9月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5年一次，但是，自八大以来，已经时隔了整整12个年头。1968年9月，“全国山河一片红”了，“九大”说啥都不能再拖延了。其次是人员：97名八届中央委员除了10人逝世以外，能够参加这次会议的只有40人，其中有一些还是刚从被关押地放出来的，法定人数不够咋办？周恩来于是宣布“通过无产阶级司令部商定”，从候补中央委员中挑选出黄永胜、许世友、陈锡联等10人为中央委员。这样，出席会议的八届中委有了50位，占97人的51%，超过半数了，再加上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和各省、市、自治区革委员会和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都“扩大”进来，133人参加会议，凑凑合合算合法了；第三，最核心的是文革三年，通过民间的、官方的各种手段，终于用“莫须有”的罪名将刘少奇包装成了“叛徒”，于是大会足以用“决议”的形式将囚禁河南开封银行地下室的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其时，刘少奇已重病卧床，枯瘦如柴，身上长满了褥疮，为防自杀，还用绷带将其双腿紧紧捆绑于床头，无法动弹，其状惨极。另外，会议大批“二月逆流”，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员们：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等人，对“大闹怀仁堂的”的老师重臣指名道姓，狠揭猛批——既然蒙着神秘面纱的中央最高层会议已与民间乌合之众骂架起哄无异，那么，外省远地的会议自然更加荒诞，更无道理可说。

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1]次日，11月1日，云南省革委紧接发出《立即掀起大宣传、大学习、大落实〈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公报〉的高潮的通知》，3日，昆明地区25万军民在检阅台隆重举行“热烈庆祝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发表”大会。8日到30日，解放军驻云南部队团以上党委和云南

[1]中共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会期为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

省各专、州、市、县革委会党员代表大会在昆明召开，传达贯彻全会精神，并通过《党员代表大会决议》，提出并部署云南“斗批改”各阶段的任务，再次强调在“革命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中，必须彻底揭发批判阎红彦、赵健民之流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滔天罪行”，深入开展对“二月逆流”和“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的批判等。一些专，州、县也召开了类似会议。北京不讲规矩，地方省市还需要讲什么规矩？德宏州党史办编写的《中共德宏州历史》这样记录了当时自治州所属各县（镇）召开党代会的情况：

（这些会议）严重违反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名为“党员代表会议”，不是由党的一级委员会召开，而是由政权机关召开。代表不是由党员选举，而是以“派”产生代表。大多数所谓的“代表”是非党群众。盈江县党代会参会代表1303名，其中非党代表就有832名，占了64%，而党员代表仅471名。

1969年1月18日，潞西县^[1]召开党代会，按照日程当天开展“革命大批判”。上午，出席党代会的少数人冲进州政府和州政协，把民族上层人物统统赶出家门，进行大抄家。下午，召开3000多人参加的批斗大会，把州、县党政领导和民族上层人物61人捆绑上台，跪地挂牌，在批斗中大打出手，横施暴行，之后又拖去架“喷气式”游街示众。副州长、省人大代表多永安（原陇土司）^[2]当天被活活打死；副州长、全国人大代表龚绥（原梁河土司），

[1] 潞西县为德宏自治州首府所在地，又称芒市。

[2] 多永安(1911.2—1969.1)，傣族，陇川县人。世袭陇川宣抚司第28代宣抚使。1950年5月，人民解放军进驻陇川，多永安率司署及设治局全体成员在南伞河边迎接。8月，多永安到芒市参加土司会议，和勐卯等地土司发表了一篇反帝爱国的联合声明。11月，陇川召开各族各界人士代表大会，他被选为陇川各民族行政委员会主任。1951年初，境外李弥委任他为“陇川反共救国军总司令”，后通过学习，他交出了委任状。10月，由省民委组织他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等国家领导的接见，12月出任陇川县县长，1953年7月，当选为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及省人大代表。1954年，德宏地区进行和平协商土地改革，多永安开始时有抵触情绪，后经做了思想工作，他表示拥护党和人民政府关于土地改革的政策。文化大革命中，多永安身心受到严重摧残，1969年1月在芒市批斗会上被迫害致死。1979年7月，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引自《云南省志》卷80，页479）。思鸿升等人介绍见下面“政治边防”一章。

州政协副主席、省政协委员多英培（原遮放土司）被打伤残后又遭毒打致死；副州长思鸿升（原莲山土司）被打残后又逮捕入狱，在狱中致死。这么多爱国民族上层人士被残酷迫害致死，引起境内外极大震动。这次批斗大会，开创了潞西县以至德宏州公开残酷批斗、捆绑吊打州、县领导干部和民族上层的先例，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会后，德宏州、县（镇）、区、乡对领导干部、民族上层的批斗、抄家、捆绑吊打逐步升级，越演越烈。^[1]

有上述背景铺垫，云南省革委召开的第六次全体会议就更加有声有色了。时间是12月14日至20日。任务是向驻滇部队团以上党委和各专、州、市、县革委会党员传达贯彻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同时讨论云南的文革形势。会议确定继续深入开展两条路线斗争史的学习运动，掀起“斗批改”新高潮。既然中央关于成立云南省革委的“批示”明确“刘少奇在云南的代理人”是阎红彦、赵健民之流，那么联系实际批刘少奇，顺理成章就变成了对赵健民，从而对炮派的大批判。会议认为：“当前摆在全省军民面前的任务是，乘胜前进，继续深入开展学习两条路线斗争史的群众运动，掀起“斗批改”的新高潮，把云南省两条路线的斗争进行到底”。而云南两条路线的斗争，集中突出的，就是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彪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战斗号令指挥下“全省广大革命群众同刘少奇在云南的代理人阎红彦、赵健民之流的斗争”。会议明确要求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分清两条路线斗争的是非，对于破坏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挑动武斗，搅乱革命阵线，转移斗争大方向的坏人，要坚决批判斗争”“继续深入地把刘少奇及其在云南的代理人阎红彦、赵健民之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深批透，从组织上把一切暗藏的阶级敌人统统挖出来，彻底摧毁他们的社会基础。”一口一个“阎红彦、赵健民之流”，下一步的打击目标已再清晰不过了。

如此气氛之下，对事情的判断注定越来越夸张与离谱。头脑本已经严重发胀，会议还继续加温：“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对敌情估计不足，思想右倾，求稳怕乱，妨碍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深入开展”。于是“省革委一些负责人在会议上的讲话中，大肆渲染、夸大所谓‘敌情’的严重性，如说什么：‘省级机关原来的厅、局、委，办以上领导干部不到300人，历史复杂，有各种严重问题，大体看来是坏人

[1]《中共德宏州历史第一卷》页286。

的不下50人。昆明市没有解放的原有的十几个书记、市长级干部中，很难找到政治上干净的人，可以说是一个黑窝子’。谭甫仁为强调‘云南的情况非常复杂’，还编造了所谓‘五多’，即：‘一是解放得晚，残渣余孽最多；二是地下党混进的叛徒、特务、坏人多；三是民族地区，封建土司、头人、军阀多；四是地处边疆，内部的反革命和国外帝、修、反联系多；五是阎红彦、赵健民之流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路线，招降纳叛的多’”。^[1]1969年1月3日，《云南日报》配发社论《把两条路线斗争进行到底》，并报道了会议消息：

当前云南全省形势空前大好，但也有一些人抱着另一种看法，认为“不大好”，或者“大不好”，甚至是“一片白色恐怖”，说“大方向错了”。社论说，持这种看法的有三种人，一是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和隐藏的反革命分子，二是被“派利”迷住心窍的人，三是思想严重右倾的人。不同看法实际反映了两条路线的斗争。斗争的焦点，集中在要不要彻底揭开云南省阶级斗争盖子，要不要彻底挖掉阎红彦、赵健民之流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根子，要不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或者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或者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拼命捂住阶级斗争盖子，充当赵健民之流的辩护士，二者必居其一，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会议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一切革命的同志，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行动，把云南两条路线斗争进行到底。

省革委第六次全会为即将开始的“划线站队”敲响了开台锣鼓。六次全会结束，谭甫仁即刻亲自到文革中派斗严重的红河州调研并发表讲话，实则即将开始的大批判抓点树立“样板”。12月25日到边境小县河口，12月26日旋即返回个旧，28日再到蒙自，可谓马不停蹄。

《河口县志》载：

12月25日，省革委会主任谭甫仁到河口，批评“清队”工作按兵不动。30日晚在城区灯光球场召开批斗大会，当场抓捕90余人，至1969年2月7日，全县抓捕了80余人。

[1]《当代云南大事纪要》1968年卷。

与此同时农垦系统亦非法拘捕批斗职工12804人（占全县人口的37.24%），造成非正常死亡40余人，失踪5人。

云南省委党史办编写的《云南“文化大革命”运动大事纪实》介绍，谭甫仁“在个旧讲了一次话，一夜之间就揪出了990多个坏人，有人问可不可以拉出去游街？游街后能否把这些人下放劳动？我说游街也可以，下放劳动、戴白袖套也可以，让群众识别。^[1]

《蒙自县志》载：

12月28日，谭甫仁到蒙自，在接见军队排以上干部和县革委会委员时又给“划线站队”加油打气，“有一千抓一千，有一万抓一万，决不心慈手软”。于是全县范围内抓人、打人、批斗、挂黑牌、戴高帽子、“驾飞机”、压杠子等成风，造成严重后果。1969年1月22日，一天内揪斗204人，大部打伤，20人打残。1月30日为纪念“1.30事件”^[2]，又打伤百余人，打残93人。据不完全统计，在“划线站队”中，划为站错队的干部、职工共7833人，其中被捆绑批斗的2524人，打伤385人，打残103人，非正常死亡67人，受株连的亲属子女万余人。

用一种正式的、公开的形式将上述这些思路和做法加以肯定，并向全省推而广之，时机已经成熟。云南省革委七次全会的召开水到渠成。

1.2. 军方的态度

革委会成立前云南两派的生死劫，实际上反映的是他们背后军队内部的矛盾。省革委成立情况后则完全不一样了：军内的“支炮”势力彻底落败，张力雄、朱家璧被抓起来，以他们为代表的地方军区失势而昆明军区的“山西系”绝对控制了局面。虽然陈康尚在，但已被边缘化，孤掌难鸣。野战军13军、14军作为左派，声势如

[1] 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云南“文化大革命”运动大事纪实》页157。称此语为谭甫仁从个旧回到昆明后对黄兆其、刘殷农等人所说。

[2] 1968年1月30日，个旧炮派“一二八炮兵团”组织在鸡街伏击由个旧调开远的人民解放军部队，时称“130事件”。

日中天，有谭甫仁支持，这些正经八百的国家暴力足可在云南边疆纵横捭阖。

从军管开始一直负责具体工作的昆明军区副司令鲁瑞林的态度很能代表当时军方的态度：

“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表现在云南就是一派完全错了，执行了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后台黑手就是赵健民、陈康。

云南的炮派组织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中期大方向是对的，后期由于赵健民、张力雄、朱家璧、LL、HLF等人的操纵，在全省掀起大规模武斗，大方向错了。炮派执行了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八派是武卫，炮派是武斗。

“二月逆流”在云南的表现，就是赵健民、张力雄、朱家璧之流。他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破坏军队稳定，破坏国防建设，破坏战备，使全省的军管和军事机关瘫痪，他们是一批特务，本来就是坏人^[1]。

处于两派争斗第一线的14军——本书第二卷谈及“滇挺”事件，可以看到当时在炮派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他们的枪杆子曾显得何等窝囊和无奈——现在，既然炮派“路线全错”，他们当然要进行报复了。1968年9月26日，中央军委命令3个陆军调防^[2]。驻防滇西的14军换防滇南，行前，军长梁中玉派人到八派的“烈士墓”^[3]举行悼念告别仪式，邀请地方机关单位参加。还有人开着推土机，把炮派“烈士”的坟墓推平，尸体刨出，用钢钎捅戳。州、市、县级机关被划为“走资派”“叛徒”“特务”“滇挺分子”的干部群众，则被戴以高帽，抹以黑脸，穿以孝衣，罚跪“烈士墓”前遭受毒打。“八派”死者按“烈士”身份给予抚恤，“炮派”死者则按“反革命”论处，并组织八派“死难家属”控诉“滇挺罪行”。部队换防离开大理当日，州、市、县级机关干部在公路两侧列队欢送，党

[1]《云南“文化大革命”大事纪实》页151。

[2]1968年9月26日，中央军委命令3个陆军调防。陆军第13军由滇南调四川，接替陆军第54军防务；第54军由四川调滇西，接替陆军第14军防务；第14军由滇西调滇南及贵州，接替陆军第13军和陆军第49师防务。

[3]按文革中的惯例，“滇挺”被清剿后，两派的死者都被本派封为“烈士”，普遍建墓立碑。

政机关“站错队”的各级领导干部则五花大绑、挂“黑牌”于路旁下跪受辱。据官史记载，称14军临走时梁中玉还专嘱将人民币1.04万元、粮票3.18万斤留下作支持“八派”的活动经费之用。官史又载，说梁到滇南后，除继续遥控指挥大理地区帮派活动之外，“还在红河、文山等地州积极推行‘划线站队’。1968年11月27日，梁在红河州把两派武斗事件宣布为‘炮派制造的反革命事件’，作为全州‘划线站队’突破口，对其中一派群众实施打击，1020人‘被列为重点审查人员’，‘制造冤假错案550起，受牵连人数2.48万人，被打伤致残3693人，打死2192人’。”“1969年1月，梁中玉到文山州8个县作了9场报告，每到一个县都召开群众大会推行‘划线站队’，煽动打人。每次报告会都宣布文山地区‘炮派’群众组织‘大联合指挥部’为‘反动组织’，‘要彻底砸烂’。每次讲话都点一大批人的名字，从昆明军区副司令员、省军区政委、副司令员、省委副书记、军分区领导、地方的州、县领导，直到县、公社武装部长、公社干部，他都‘横扫’一大片，号召对这些人‘要狠狠地批斗’。1月12日，他在文山万人大会上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最危险的敌人到底是什么？是军分区的司令员、政委，他们不是老革命，是老反革命’‘我们在中央首长的支持下，把‘滇西挺进纵队’消灭了，我就是消灭‘滇挺’的头头。在社会上有人骂鲁副司令员是鲁屠夫，骂我是刽子手，我说我就是杀反革命的刽子手”。^[1]

梁军长夫人、中学教师王邦随军调来滇南，政治上的全胜亦将其刺激得活跃非常。据分配到卧龙谷军垦农场的重庆大学学生王詮^[2]向笔者说，当时农场每次开大会，都奏八派派歌《葵花向太阳》。某日，王邦应邀前去做报告，大会组织者宣布在该农村劳动锻炼的云大“炮派”学生一律跪去台下听训，还命令王詮等重大学生用绳索捆绑，遭王詮等人拒绝，于是将王詮等人抓起来代云大学生受跪听训。

原驻滇南的13军，根据9月26日中央军委命令调防重庆，原驻重庆的第54军则调至滇西大理接防。54军调离前后，笔者尚在重庆^[3]，当时即听闻两军高层在调防前进行过对等的“政治意见交换”。13军初到重庆，果然在市中区门户“山城宽银幕电影院”大

[1]《云南“文化大革命”大事纪实》页165。

[2]王系重庆大学机械系1968年毕业生。后担任开远光明啤酒厂厂长，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其时分配卧龙谷军垦农场的重大学生共5人，均被罚跪听训。

[3]笔者系重庆大学1966年毕业生，因文革滞留学校。后又因参与文革并主编《八一五战报》受审查，1969年始得发配云南。

墙上贴出了标语：“54军支持我支持！54军反对我反对！”同样，据昆明前去杨方凹（昆明火车站）列队欢迎54军。来滇的朋友告诉笔者，当昆明市民高呼“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时，54军官兵回答的口号果然为“兄弟部队支持我支持，兄弟部队反对我反对！”与赴渝的13军完全等价。

54军来滇后的12月19日，谭甫仁对该军团以上干部发表讲话，明确交底：“我来时，林副主席说，去（云南）要搞‘划线站队’，不搞我们站不住脚。黄总长（指黄永胜）也再三强调了这件事”“那些家伙搞邱会作同志，林副主席保了他，换了李作鹏同志到总后去搞划线站队，你看，现在形势大好。”“林副主席、黄总长都交代过，要依靠一派，不依靠一派，连脚都站不住”。^[1]

1969年1月下旬笔者初到昆明，当天即拜访了54军政治部主任（后任昆明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刘润泉。重庆时期，刘曾任八一五派“一月夺权”后成立的市“革联会”^[2]主任，笔者任小报主编，素多交道。他乡遇故知，自有说不完的心里话。当时，刘非常自豪地告诉笔者，说：“谭政委是我们54军的老首长^[3]，对我们工作非常信任，非常支持！在云南工作，心情很畅快啊！”说到谭甫仁的政治方略，他一口一个全力拥戴。刘作为54军的高级将领，他的表白代表了整支部队的共识。

两支野战军如此协同一致，谭甫仁的施政不会有任何障碍了。

首先从部队动手。12月10日，昆明军区司、政、后机关学习班开学，谭甫仁做动员报告：“这次学习班是要分清军内的是非，谁对了，谁错了，要分清楚。”还说，他是当年5月21日接到来云南的命令的，原想把云南的所谓“是非问题”暂时挂一挂，先成立革委会再说，黄永胜等人找他谈话说：“你怎么挂起来？是非问题不搞清楚怎么挂得起来？怎么解决问题？”这样，他才“猛醒过来了”。所谓“分清是非”，也就是要开展“划线站队”。从此，云南在部队中开始了“划线站队”。

派军队到地方捅所谓“马蜂窝”，试点则是从滇南一个名叫“沙甸”的村寨开始的。这个生产大队隶属蒙自县鸡街公社（后划归个旧市管辖），是一有近8000人口的回民聚居村，此村7年后因遭遇大规模军事进剿而为世人所知。文革前的“四清”运动，该村寨便

[1]《云南“文化大革命”运动大事纪实》页157。

[2]当时重庆造反派尚未分裂，统称“八一五”派。因革联会的成立而由反革联会的几个大组织提出异议而分裂出后来的“反到底”派。

[3]54军由44军和45军合并而成。谭甫仁曾为44军政委。刘润泉故有此说。

是政府清理重点，清真寺被工作组强行关闭，正常的宗教活动受到限制，回民群众极为不满。文革接踵而至，回民于是趁机造反，口号是“捍卫党的宗教民族政策”。待到后来社会上分为两派，沙甸80%以上的干部、群众便投靠了个旧地区势力占优的“炮派”。1968年11月，云南形势大明朗，炮派败局铁定，于是个旧、开远、建水、蒙自等地一些“站错队”的回族干部、群众（亦包括部分汉族干部、群众）纷纷来此躲避抓捕，至11月20日，到沙甸避难人数的已达500多，沙甸遂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反革命基地”。1968年12月28日，一个加强营的“支左”军人被派进沙甸^[1]。这次的名字不叫“工作组”，而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虽然沙甸回民心存侥幸地对部队夹道欢迎，“宣传队”还是一进村就旗帜鲜明地宣布，要对沙甸的阶级队伍进行清理，并宣布：“信教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反对共产党领导”^[2]“一小撮阶级敌人”“牛鬼蛇神”“野心家”“阴谋家”受国民党军统特务指使，煽阴风，点鬼火，蒙蔽群众，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必将碰得头破血流”“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没有好下场”。军人直接驻扎进沙甸大清真寺——更糟的是，他们在清真寺里吃猪肉，把猪骨头丢去清真寺的水井。^[3]

这个支左军队区分的善恶的标准非常简单：除了“以派划线”，看你属“八”还是属“炮”之外，还有一条更荒唐的标准：“以教划线”。凡企图继续礼拜、把斋者，一经发现，立即批斗，游街，捆绑吊打、酷刑折磨。小小沙甸村，竟然被揪出了“反军乱军黑干将”“宗教复辟急先锋”“赵（健民）氏小爬虫”200多人，其中84人被扣上“反军乱军黑干将”^[4]的帽子。折磨他们的办法包括在他们的脖子上挂猪头，强迫用舌头舔。在1969年1月30日的一次大型批斗会上，60位回民被挂上“宗教复辟的急先锋”的黑牌游街示众，还将他们集体押到一厕所旁，逼他们学猪用嘴拱厕墙、学猪爬、学猪叫，戏之为“猪拱长城”（“长城”喻指人民解放军）。还有一次，强迫50多位回民作猪滚状，从10多米的高坡上横身下滚，致使一位已

[1] 官方史料称“工作队”进村时间为12月8月13日，本文摘自沙甸大队亲历者马绍美的回忆文稿。1975年军事进剿时，马曾为回民领袖第三号人物，事件平反后，任大队党支部书记。

[2] 参看《沙甸回族史料》（中共红河州委宣传部1989年审定版），未注明出版社，1989年印刷。

[3] 同上。

[4] 《云南“文化大革命”运动大事纪实》页319。

怀身孕的妇女当天流产。接着，还有所谓的“第二次土改”，评“政治工分”等等。凡在划线站队中“犯错误”者，都扣减工分，造成受迫害者不仅政治上受压，经济上也受到盘剥。最后，甚至还让其他民族的民兵对沙甸140多户地富及其子女家庭进行查抄，并把其中的40多户强迫赶出，迁移附近的苗族、彝族村子实行“包夹改造”^[1]。

文革的政治高压让穆斯林的尊严和安全丧尽。与此同时，仇恨也在暗中熔炼，并如涌动的潜流继续冲击被文革搞得千疮百孔的政治冰层，最后的爆发只是等待一个历史的劫期而已。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官媒《云南日报》报道此事，俨然替天行道的仁义之师来此行一桩义举。文章称，0268部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带着两条路线斗争中的问题，帮助贫下中农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促进了人的思想革命化。沙甸大队西一队六十多岁的老贫农白荣昌双脚半瘫痪，有五六年没有出过家门了，这次他听说解放军到生产队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传达毛主席的声音，也拄着拐杖，每天晚上都要到队里去参加学习。他说：“只要是听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声音，不要说是拄着拐棍走，就是爬也要爬去。”七十五岁的贫农老大妈林芳田学了毛主席“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最新指示，热烈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参加了大队贫下中农学校管理委员会，领导学校的斗、批、改。^[2]

《云南日报》还专门发表了《捅开富民县和昆明西山区两个马蜂窝》的报道，并同时发表了《坚决捅掉一切马蜂窝》的本报评论员文章称：

这种阴暗角落，是阎红彦、赵健民之流抗拒革命人民清算的防空洞，是他们大刮反革命阴风的发源地，是他们保护现在生存，以利将来的发展，妄图有朝一日卷土重来的“根据地”、是一些“坏人当道、好人受气”的“马蜂窝”。

[1] 参看《沙甸回族史料》。

[2] 1969年1月30日《云南日报》3版。

解决这些地区的问题，关键的关键，就是发动群众，坚决地把领导权夺回来，夺回到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手中来。^[1]

笔者向时任西山区革委委员的杨寿^[2]求证，为何西山区成了“马蜂窝”？对方回答非常简洁：“就是炮派掌权嘛”，八派不服，于是集体到昆明军区上访。昆明已是54军主政，市革委主任为军政委蓝亦农。八派代表追问事情何时能解决？蓝亦农痛快表态：已经决定了，派146团到西山区来，“明确告诉你们，革委会主任就是徐宗启”。徐宗启系146团政委，文革中以倾“八”著称。

需要补充记载的是，谭甫仁没有想到，事情没过多久，54军就反了水，“划线站队”正式开展才3个月，在1969年4月召开的“九大”小组讨论会上，时任昆明市革委会主任的蓝亦农就“划线站队”问题向谭甫仁发难，认为扩大化了。参会的九大代表沈炳章回忆，说蓝的口气虽和缓，但观点尖刻，直接冲谭而来。谭甫仁没说话；同为出身54军的九大代表韦统泰^[3]不表态；其他代表也不吱声。只有作为群众代表、血气方刚的沈炳章针锋相对进行了反驳：“‘划线站队’虽然作法过头，但‘站队’一说是根据的，毛主席就说过，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4]

蓝亦农的观点绝非一时心血来潮，事实证明，他确是代表了54军的共识。半年前，54军和13军作川滇对调时确有过“君子协定”，加之谭甫仁本系54军老上司，来滇之初，54军确实和整个昆明军区及14军保持了一致，铁心支八。可是，九大之后的许多事实证明他们的政治观点开始暗中转向。当时笔者供职所在的保山专革委是个“联合政府”，领导班子以54军134师为主（主任为134师副政委朱志伟，副主任为该师政治部主任赵新华），以原属山西系领衔组建的“民族二支队”^[5]为辅（二支队副政委韩乃光^[6]任专革委副

[1] 1969年2月4日《云南日报》头版。

[2] 杨寿时为昆明西山区梁家河东风公社党委副书记。

[3] 韦统泰原为54军军长，时任昆明军区副司令。

[4] 2017年4月15日笔者与沈炳章访谈。

[5] 1964年初，为配合抗美援朝，中央决定在云南边防一线组建两支民族部队，要求民族部队的营、连、排干部至战士，要以少数民族为主，少数民族要占60%。根据这一要求，昆明军区陆续建立了云南民族一支队和二支队，一支队驻防西双版纳小勐养，二支队驻防保山专区昌宁县。该两部队于1969年前后撤销。

[6] 韩乃光，山西省临汾浮山县人，参加山西新军后转入14军南下云南，民族二支队成立后，任支队副政委。

主任)。“九大”后某日,韩副主任亲嘱笔者写一篇文章批驳右倾翻案活动(指方向东为首的炮派的“不轨言行”),赵副主任得闻消息,马上紧急召见笔者,追问韩交代何事?要笔者坚决“顶住”。

牟定县八派领袖杨忠义在回忆录中,对在该县“支左”的54军军代表130师某团副营长郑某大倾微词,称:“此人言行霸道,蛮横无理,军阀作风严重。”而且“54军来牟支左的其他干部大多与郑玉祥相差无几,很难相处。据称这支部队打仗很英勇,但在在我看来,搞政治、做地方工作他们不如14军。”“我们与14军的干部是鱼水关系,与54军的干部是油水关系。”“54军在滇西执行的是拉拢炮派,打压八派的方针”杨的观点,代表了滇西(或整个云南)八派的普遍共识。电力系统八头沈炳章亦证实,原住电力局支左的13军38师^[1]军代表从四川回滇省亲,听说54军改支了炮派,亦心有愤愤,说他们到四川支持815,他们倒好,到云南支炮来了,真是太不够意思。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省政工组组长成泽民在第一次学代会闭幕式讲话时,对54军的云南表现进行公开批判,以至于“谭办”的负责人之一、昆明军区教育科长曲弦回到办公室就憋不住向秘书们大发牢骚:“太过分了!54军是去北方打苏修,咋能人家前脚走,后面就照屁股踢一脚?”^[2]54军是1969年10月初紧急奉命调离云南的,其时,苏联在中国北方边境陈兵百万,准备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打击,54军奉命急赴河南安阳,拱卫京师。

54军走了,军内再无人乱发杂音。没有刹车的云南文革战车,终得在谭甫仁主持制定的既定路线上急驰狂奔。

1.3. 北京的恶例

1968年秋,文革乱了已经整整两年,当权派该“烧”的“烧”过了,该从肉体上消灭的,也消灭了。全国山河眼见已经一片红,毛泽东不允许社会再这样乱下去,需要恢复秩序了。于是在7月28日夜召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作一顿冷嘲热讽和严厉训斥,同时派

[1] 换防后驻军四川南充。

[2] 曲弦系昆明军区政治部教育科长。虽系八派观点,但性格平和深沉。1971年调北京《红旗》杂志任编辑。关于他的情况后面还有介绍。54军于1969年9月末,紧急调往河北安阳。云南首届学代会闭幕于12月,故有“前脚走,后面就踢一脚”之说。曲发牢骚时,笔者已调“谭办”,在办公室亲闻。

工人和军人组成“宣传队”强行进驻大专院校，把这些曾为他舍生忘死效命的大学生们统统管制起来加以“再教育”。热闹了3年的红卫兵运动从此落幕。而数量更多、成份更复杂、满社会造反闹腾的工人，也必须重新圈禁到车间里老老实实干活。这样，在“728”正式宣布红卫兵运动终极的18天后，当局在北京召开的“冶金工业抓革命促生产会议”和“国防工业部分工厂抓革命促生产会议”正式开锣。因为开幕时间为8月15日，故又简称“八一五会议”。

“八一五会议”堪称中共执政以来规模最大的工矿企业代表会议，诚如周恩来在9月16日的讲话中所说：“这次会议除六个机械工业部外，还有化工部的厂，一机部的厂”。也就是说，参加会议的除了一机部、化工部的配套协作厂外，属于国防工业系统的就有六个机械工业部，即第二（核工业）、第三（航空工业）、第四（电子工业）、第五（兵器工业）、第六（舰船工业）、第七（导弹及航天工业）六个部，连同一机部、化工部，共有八个部所属的大型国营企业。周恩来明确说“来了245个厂”（这还只是国防工业会议的数字），如果按一个厂到会10至20人计算，那么单是国防工业会议到会就有两千多到近五千人^[1]，足见规模之大。会议从1968年8月15日开始，到1969年1月下旬结束，长达近半年，几乎可算中共执政以来会期最长的一次所谓“会议”。其实，这是一次强行解散各重点工矿企业群众组织的大型“学习班”。北京计划赶在中共“九大”前把工人造反派这个“主力军”抓紧赶下文革舞台。

据文革史家何蜀在《八一五会议》一文的介绍：在“八一五会议”期间，各地各单位代表团强行解散群众组织（即所谓实行“大联合”），严厉追查文革中造反派的停产、武斗等罪责，揪“坏头头”，追“黑后台”，强行揭发、交代、请罪，有人被逼得自杀，有人被大会逮捕……“八一五会议”成了许多亲历者谈之色变的恐怖“集中营”。

为了有效治理这帮工厂造反的“乌合之众”，“八一五会议”组织者宣布会规“五不准”：不准写信、不准打电话、不准会客、不准外出、不准串联。会议先以“学习班”方式开道，搞人人过关、互相揭发；同时组织与会者对“首恶”分子进行残酷批判、无情

[1] 黄荣华回忆、何蜀整理《我怎么成了“江青的干女儿”——原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委员、“八一五”派代表黄荣华自述》页176，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黄荣华系重庆长江电工厂（枪弹厂）代表、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委员，曾参加“八一五会议”。黄称，重庆长江电工厂参会代表“八一五”和“反到底”两派群众组织各5人，军代表2人，干部代表2人，老工人代表2人。

斗争，甚至对重点人物大会现场逮捕。恐怖气氛之中，打伤、打残、打死或自杀者时有发生，最后，还组织反省者巡回讲演，现身说法，自我作践。

云南工业虽落后，亦有不少明星工厂参会，计有二九八厂、三五六厂、冶金系统14个厂矿的军代表、领导干部、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共计330人组成代表团出席会议。从军管时期便负责主管生产的省革委副主任鲁瑞林担任出席会议的云南代表团团长兼会议核心领导小组成员。鲁瑞林长期被炮派恶称为“鲁屠夫”，足见二者之间的仇恨之深，云南党史办的文稿称：“会议期间，鲁瑞林违背中共中央和周恩来总理对会议的指示，另搞一套，对参加会议的代表开展‘划线站队’，进行武斗，把一派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党史办的文稿还说：

连续召开3天批斗大会，批斗了被诬为一派“黑手”的昆钢、昆明冶炼厂、会泽铅锌矿的党委书记以及被称为“坏头头”的一派群众组织头头共7人。以后这些批斗活动连续不断，愈演愈烈，仅冶金系统被批斗的就有35人，有的被迫害致死（如昆明耐火材料厂副厂长沐家云跳楼身亡）。这位副主任还通知昆明警备司令部派武装人员来京，将一些领导干部和“站错队”的群众组织头头捆绑押送昆明，到昆后又被大会批斗，惨遭毒打，二九八厂厂长阎书田被打死在会场上，党委书记萧子明等6人被打成重伤致残。二九八、三五六两个国防工厂在“划线站队”中被迫害致死的干部、群众共22人，被打伤致残的仅二九八厂就有528人。^[1]

云南党史办编写《云南“文化大革命”运动大事纪实》称：

1969年1月15日，省革委七次全会最后一天，鲁瑞林乘飞机赶回昆明，在会上介绍了云南代表团参加北京“八一五”会议上搞“划线站队”的经验，为在全省广泛开展“划线站队”，残酷迫害广大干部群众起了非常恶劣的示范和推动作用。^[2]

[1]《云南“文化大革命”运动大事纪实》页152。

[2]同上，页152。

第二章 七次全会的会里会外

2.1. 高压与内讧

一切都铺垫好了。1969年1月1日，云南省革委会第七次全委扩大会议正式开锣，15日胜利结束。

1月25日《云南日报》的通稿对会议做了报道，题目：“省、市革命委员会联合召开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在毛泽东思想统帅下实现‘五个统一’”，兹将主要内容原文照录如下：

全会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在深入学习两报一刊元旦社论《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的基础上，紧密联系实际，对我省两年多来文化大革命斗争的大是大非和经验教训，进行了检查、讨论、分析和批判，大大提高了到会同志的阶级斗争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大家决心把省、市革委会建设成毛泽东思想统帅，切实做到“五个统一”的战斗指挥部。

到会同志紧密联系我省两年多来文化大革命的实际，大赞大颂毛泽东思想，狠揭狠批刘少奇极其在云南的代理人阎红彦、赵健民之流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思想。到会同志充分发扬民主，运用“团结——批评与自我批评——团结”的公式，以斗私批修为纲，有检查、有揭发、有批判，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批判各种错误思想，总结了我省两年多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弄清了我省“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界限，解决了长期

以来争论的问题，从而使革委会领导在许多重大问题上进一步做到了统一认识。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一元化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领导。两年多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深入人心，各族革命人民充分发动起来，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以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一个个被揪了出来，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妄图在我省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遭到彻底破产。

全会一致认为：两年多来，我省经历了十分尖锐、复杂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宣告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代理人阎红彦、赵健民之流在我省复辟资本主义、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罪恶阴谋的破产。阎红彦叛党自杀后，大叛徒赵健民继承阎红彦的反革命衣钵，疯狂地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制造革命群众组织的分裂，从欺骗蒙蔽、操纵控制，到一度窃踞了一派革命群众组织的领导大权。赵健民等一小撮阶级敌人，进一步制造两派革命群众组织的分裂，武装一派，消灭一派，直至组织反革命武装，镇压屠杀革命群众，严重地破坏了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行。赵健民等一小撮阶级敌人，把矛头直接指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

全会对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在云南的代理人阎红彦、赵健民之流的大揭发、大批判，使到会同志明确了事实真相，分清了大是大非，统一了思想认识。一致认识到：一切革命的同志，都应当分清是非，接受教训，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把一笔笔血账记在阎红彦、赵健民一小撮阶级敌人身上，狠狠地打击这一小撮阶级敌人。

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指出：“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遵照毛主席这一最新指示，全会分析了我省当前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的情况。全会指出，当前的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不但是全省二千三百万革命人民的斗争大方向，而且是一场极其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各级革命委员会要担负起领导这场斗争的繁重任务。

全会号召，各级革命委员会和全省各族革命人民，一定要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

英明领导下，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把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的群众运动引向深入，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以实际行动迎接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按照当时北京的指导精神，上面所有表述绝对政治正确，与中央口径高度一致。

26年后，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2005年编写的《云南“文化大革命”运动大事纪实》，对七次全会做了另一种的表述：

（这次会议）是在云南省全面开展“划线站队”的动员会、示范会。会议的主题是“划清两条路线的斗争”，“揭发赵健民、张力雄”等军地领导干部和“炮派”的所谓问题，抓“伸向‘炮派’的大黑手”，追查“‘滇西挺进纵队’土匪武装”。会议从始至终以审问、责令交代、检查贯穿整个过程，把“炮派”群众组织打成了反革命组织。为此，他们抓住：第一，“赵健民是伸进‘炮派’的大黑手。赵健民是叛徒、特务，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炮派’执行了特务组计划”，追查“特务组计划”；第二，“‘炮派’派出反革命土匪武装‘滇西挺进纵队’，到滇西一带抢劫杀人”；第三，“到处搞武斗，攻打云南汽车修配厂（八二三）11.30战斗兵团”。会议把“炮派”组织描绘成一个在所谓被“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操纵，坏头头控制，胡作非为、专干坏事、打砸抢抄抓、十恶不赦的坏组织，并且列出“十二件大事”，作为“炮派”组织的“罪行”进行追查。这“十二件大事”包括：“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炮派”派出“反革命匪帮滇西挺进纵队”，“滇东北游击军”，“‘炮派’在翠湖宾馆办的与省军管会抗衡的学习班”，组织“摧资兵团”，“关仓停粮，逼民造反”，“火烧建设公寓”，“抢新华山金库”，“抢劫公安厅出国护照”，“黑银行”，“袭击202次列车重大反革命事件”，“私设电台”等等。^[1]

为了更准确、更直观地触摸历史现场，笔者摘录一段会议亲历

[1]《云南“文化大革命”运动大事纪实》页158。

者、省革委委员张奎林^[1]先生的回忆录。张奎林是八派成员，作为当时的胜利者和文革破产后的阶下囚，文字不免轻描淡写，但却从一个角度真实记录了当时现场：

大会发言之前，谭甫仁讲了一段开场白：学习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非常必要，只有把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是与非、正确与错误搞清楚，才能更加自觉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云南“文化大革命”为什么那样乱？武斗那么厉害？就是由于坏人在里面捣乱，就是存在着激烈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执行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条就是以刘少奇、邓小平及其在云南的代理人阎红彦、赵建民之流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在北京虹山口学习班就讲过，我想把云南的问题放一放，先解决大联合三结合的问题。事实证明，放不下来，思想统一不起来。周总理同我谈话，一针见血地指出：“谭甫仁同志，你不把路线斗争的是非分清，团结就没有共同的思想基础。”我现在来抓这个问题，似乎晚了一点，但不要紧，只要我们全体委员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学习中央的精神，努力增强阶级斗争观念，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做到“五个统一”是大有希望的。

谭甫仁的话音刚落，会场鸦雀无声。何正庭^[2]委员第一个站起来发言。他的发言慷慨激昂，铿锵有力，他列举了大量事实，揭露了赵健民、LL、HLF等人捣乱云南、挑动群众斗群众，制造了轰动全省的武斗事件，占领新华山，武力消灭黑林铺汽车配件厂11.30派，组织“滇挺”，打通西线，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何正庭委员的发言，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开了一个好头……准备大会发言的人，纷纷从座位上站起来，争相发言，有的直接走上主席台念稿子，越讲越放松，把稿子放在一边，口若悬河，讲个不停。有的直接走到主席台下，面对与会者侃侃而谈，有的血泪控诉，有的声泪俱下。

[1]张奎林系云南省建筑公司技术员，著有数万字回忆录，尚未整理成稿即于2009年病逝。

[2]云南省人委省统计局干部，炮派代表，后为云南省民委处长。

在大会发言的人，有20余位。有何正庭、方向东、沈参雄、杨继铭^[1]、黎明、丁大勇……他们都是炮派推举进入省革委当上常委、委员的大派头头。他们揭露赵健民等人的问题十分广泛，内幕清楚，本质深刻。八派观点的委员，只有黄兆其在个别问题上插过话，其余八派观点的委员没有一个在大会上发过言，不是不想发言，而是苦于不知内幕啊！

杨继铭等委员为了让到会的委员听得懂，看得明、理得清，边听揭发，边在自己的座位上勾画了一幅赵健民等人如何控制炮派核心领导班子和工作班子的联络图。画面以赵健民为核心，伙同LL、HLF等人，形成几只黑手，伸到炮派的核心常委会、炮派的“作战部”“后勤部”“干部部”“宣传部”。画得惟妙惟肖。全会还没有结束，这幅联络图就被捅到社会上，社会上有的人迅速把联络图放大、着上颜色，传遍昆明地区和云南省各地州县城，张贴到大街小巷……

谭甫仁在主席台上边听发言边点头，插话说，毛主席早就说过，“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毛主席还说过，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有什么要紧，过去干错了，改过来就好了，不要背包袱，要轻装前进，好好工作”谭甫仁的一席话，使会场的气氛轻松了许多。省革委委员、干部代表、老红军李文进^[2]听了谭甫仁的插话，若有所思，悄悄地从炮派观点一边的座位移到了八派观点一边的座位上。两个年轻的女委员、中学生代表看到了老红军移动座位，她们也跟着从炮派观点一边座位上移到了八派一边。坐在后排的八派委员看到此情此景，感慨毛主席的指示真灵啊！

1970年代，笔者在省委办公厅政策调研处任秘书，曾有机会接触全会有关文档并作了摘录，其中包括炮派委员在会上洗白自己并互相攻讦的发言，也即通稿所说的“运用‘团结——批评与自我批评——团结’的公式……有检查、有揭发、有批判，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弄清了我省“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

[1] 云南省建5公司炮头，七次全会后被关押，“四人帮”倒台后释放。

[2] 原林业厅厅长，“摧资兵团”成员，文革后曾任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非界限”，这些发言记录从侧面佐证了张奎林先生的回忆，亦可说明七次全会绝非谭甫仁一人的独角戏，也绝非仅仅八派的推波助澜。某种程度上，失败的一方在面临灾难时为求自保，被动或主动地相互揭短，共同演绎了这场悲剧。

笔者摘抄的七次全会发言记录共7300余字，几乎涉及了两派争斗的所有事件，计有：一、“反军乱军”“肃薄肃李”问题；二、赵健民、LL、HLF等人插手炮派核心常委改组及参与各项决策的问题；三、干部联络站（“摧资兵团”）及翠湖学习班^[1]的问题；四、武斗及抢枪问题；五、“滇挺”的派出及1968年初为“滇挺”翻案问题；六、（炮派）私设电台问题；七、“十一人来电”问题；^[2]八、（炮派）打倒周兴的问题；九、北京学习班及进革委会人选争议问题；十、五华山金库和炮派内部财政支付问题。

笔者对发言记录做了统计，其中炮派委员发言共17人，八派委员发言6人，军代表发言3人（其中2人系参会工作人员，非委员）。

八派委员的发言基本上属于插话性质，对个别问题做补充介绍，诚如张奎林回忆称“八派观点的委员……不是不想发言，而是苦于不知内幕”，实际情况大抵如此。其中杨树先发言1次，170字，只说“滇挺到下关后，42师把枪埋了。他们（指炮派武斗人员）一下子就冲进去了”；汽车厂委员何吉昌插话1次，84字，介绍炮派攻打“11.30”时，工人如何保护军代表夏排长尸体的情况；200号委员刘志宏1次，141字，是谈及电台问题时插话；黄兆其1次，53字，内容为：“1967年3月，赵（健民）打电话给我说，他要站出来，要我们给他机会亮相。后有人告诉我说赵在北京与康老辩论，就作罢。”；刘殷农1次，19字：“八工总是1968年6月3日以后成立的。”八派武斗干将陈文才1次，78字，承认去37师抢枪未遂，于是抢了电话机和军用地图。

炮派委员的发言人数、次数和内容包罗万象，也实质得多。其中以李毅和沈参雄为最，二人的发言和对他人诘问的回答涉及了上述10方面问题的所有情节。其中李毅发言14次，共1945字；沈参雄8次，共1302字。

方向东虽为著名炮头，但发言和答问仅3次，220字，内容也很简单，就是关于私设电台问题，记录如下：“武斗开始后，（炮派）

[1]1967年8月，炮派举办干部学习班几乎同时，军管会在翠湖宾馆亦举办了一期官办干部学习班，双方显然都在争取干部。

[2]指1967年12月19日中央将昆明军区及云南军区主要领导11人全部令赴北京集中。所有从北京发回的电令指示都以11人的名义签发。参看卷二。

舆论造不上去，有人提出用模型飞机撒传单，经云大试验，不行。后来我到物理系动员，说原子弹都能造出来，这个办法想不出吗？”于是提出安小型电台。“我要求3天之内安好电台。频率1380，动力22瓦。”

广播局军代表李戈力追问（记录共148字）指责炮派电台频率与云南台外宣广播频率^[1]相同，是有意为之，妨碍了宣传毛泽东思想：“任何一个电台选择频率，绝不是偶然的。先经过若干试验，选定了，再绕线圈。”认定炮派选择1380频率“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方向东回答：“我们电台的频率同云南台对外广播频率相同是巧合。我们没有经过多少计算，线圈绕到哪里就停在哪里。”仅此罢了。

炮派干部发言的有阎罗^[2]，发言1次，46字：“11.30”打下以后，从翠湖学习班抽了70个干部去做审问工作”。刘鑫发言2次，110字。主要揭发“张恩璞^[3]在学习班造谣，说军代表在240多名各厅局长中，打了80多名三反分子。名单已被拿住”。张恩璞发言1次，38字。承认“我讲过几条线，刘少奇和阎红彦是一条线，罗瑞卿和周兴、薄一波、李成芳是一条线。”周力发言1次，48字。亦揭发翠湖学习班如何分析局势选择投靠对象的情况。参与干部工作的委员鲁大州^[4]发言2次，479字。说张恩璞称郭青从北京打电话来，要他千方百计把王腾波（阎红彦夫人）弄来，说“王了解李成芳的问题，叫我们想办法把王搞到贵阳去揭。我们找到王，她说：我身份不同，我要到军管会的学习班去。揭李成芳可以，但要有中央文革介绍信，至少要有军管会的介绍信”等等。

还有反水最积极的何正庭发言2次，268字。主要揭发两个问题：1.炮派举办翠湖学习班如何做干部工作；2.炮派决策打滇西时他所知道的情况：“1967年12月派里集中搞李成芳死党，要军内军外配合，说李的黑窝是14军。加之滇西物产丰富，所以决定打滇西。HLF是14军踢出来的，对14军不满，所以最积极。”另一积极分子杨继铭发言2次，229字。重点介绍炮派支持楚雄打紫金山的听闻，还有就是攻击“杨凯为什么要管这些东西？一是想捞油水，一是想树自己的权威，好像人人都得求他。”看来何、杨二人陷得不深，故揭发最为积极。陷得不深的似乎还有薛根禄发言1次，66字。主要

[1]云南广播电台本身设有对东南亚宣传的频道，还有为东南亚国家共产党专门设置的广播电台。

[2]阎罗，文革前为云南省监狱管理局局长，文革中参加“摧资兵团”，为骨干人员。

[3]张恩璞，山东人，1940年8月参加革命。文革前为云南省经委副主任。

[4]鲁大州，云南省人委机关干部。

介绍他所知道的“滇挺”情况。

女委员付国英发言1次，21字。王云仙发言1次，150字。主要说五华山金库保管和接管东风商场后财务转移问题。医学院女委员黎明发言1次，42字。主要检讨“围坐军区，我们组织医疗队到军区服务。95攻占附一院，我拿爱人的军装给他们（炮派武斗人员）化妆看地形。”张建文发言1次，25字。揭发“528、529事件”后围坐军区，花了280元去烟厂请一个老妇前去“哭丧”。

发言最简短的要算陈康（8个字）。14军副政委、省革委政工组组长成泽民在会上追问：“在北京开会，任何外人不能参加，处理‘滇挺’问题很保密。中央叫我们用党籍保证，可是当天晚上，李国桢便带着二三十个人离开了下关，究竟是谁搞的鬼？”陈康回答：“我不知道，我没有搞”。军代表、政工组宣传组负责人（非委员）李长明亦向陈康开火（83字），谈“88批示”形成过程：“军区给中央的报告，第一稿无支持赵健民出来揭发问题（的内容），后按王力的意思加了。第二稿，我们认为要写就把周兴也写上，不写都不写，结果把赵健民去掉了。后来发稿时，陈康亲自加上的。”陈康不表态。王琳、郭茂兴等人揭发的问题无关痛痒，兹不赘述。

相比上述发言，李毅、沈参雄的就丰富得多，也实质得多。下面小作摘录：

沈参雄：（1967年）8月21日，李明用车把我接到了荣昌家。我一看，夏明富、蔡宗庆在那里，因为我同他们有矛盾，就借口走了。到李毅家，李毅说：“他们要改组炮派领导，你去听听”我又回去了。李明正在讲：“你们炮派就是软，学生当家，没有气派，处处吃亏，看人家八二三多有力，分一、二、三线。”李提出焦云力、夏明富、蔡宗庆。还说：“李毅有名气，没有他也不行。你也算一个”。

824的晚上，夏明富拿了一张仓库的地图，说枪在什么地方我知道。只要把人集合起来，就能拿到……后来，来了两个解放军催我们。我们说：“要帮就帮到底吧，带我们去”，他答应了，半路上，他摘了帽徽领章，到了以后，他待在办公室里。我们和警卫团参谋长正在联系，焦云力穿着军装来了，说已同云南省军区联系好了……826事件^[1]后，赵健民说：打了就打了。打误会过去作战也是经常有的。

[1]指1967年8月26日，在云南军区门口，炮派武斗人员自摆乌龙，死伤10余人事件，见本书卷二。

事后军心混乱，赵健民说要做舆论去封锁，为了安定人心，也研究要打下三个地方：新建设、东风^[1]、博物馆。

赵健民67年10月2日上北京，实际是到北京对第二次武斗作遥控指挥。10月1日，我到翠湖宾馆找郭青。赵健民、周超在场。郭说：“找你商量一件事，能不能帮忙？”说她要到开远去，要借一辆性能好一点的吉普车。我说行，开了一个条子给他。原来他们是要上北京。以后的武斗事件都是赵在北京指挥的。LL讲过，打11.30，北京同意用炮。……打11.30前，10月25日，LL、张兴华等还带着望远镜去查看地形，画了地图，L还说他身经百战……12月27日晚天冷未进攻，好多人撤了。LL打电话问还打不打？说组织一次战斗不容易，又决定打。

李毅：我们提打李成芳，赵健民对我们说，（注意要）从省委书记的职务角度提打倒，要提军内职务……“肃薄肃李”来电以后，乱得很凶。炮派很得意，HLF、LL在会上说：“保也保对了，打也打对了。我们要和解放战争时一样，点一批战犯的名”，于是对干部进行了排队。

1967年7月26日 张力雄在会上讲“你们炮派在那里受压、挨打，我们暗自为你们流泪，你们取得的每一个胜利，我们都为你们拍手称快。我们和你们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正说着新华社记者来了。张把讲话稿藏起来。张的秘书对我说：“这是李成芳的密探”。

张恩璞策划叫干部给前线送开水，参加抢枪，叫老头子们都下水。……

（李毅、阎罗、LL三人1968年元月22日化妆军人，取道成都上北京。李毅解释）：在成都，LL说，张国华是他的老战友，要张接见。张把我们接到金牛坝。L问张：中央接见云南问题有何打算？张说不清楚。我说815^[2]有2000人在昆明武斗，希望做工作。后来张说梁、刘^[3]等他开会，就走了……赵健民叛徒问题发现后，赵笑说八派造谣。要专案组把这个问题驳回去。在北大的草地上专门研究过一次。

[1] 新建设，指新建设电影院。东风，指东风百货大楼。此二处与博物馆均在昆明东西干道东风路及延长线上连为一线。

[2] 指重庆八一五派，此说不确。

[3] 指四川省革筹组副组长梁兴初、刘结挺。

封静（陈康的秘书）曾给我一个电话：“你们知不知道工八团在下关杀人？工八团是不是属于你们炮派指挥？如果是，你们要表态，中央好采取措施”这实际上是向我们通风报信。

去年1-4月，是想全部解决革委会问题。LL讲：战场北移，武斗转为谈判。组织了大批干部造反派上北京。赵被抓，LL被点，把我们原来拼凑的班子打乱，这时高治国就钻出来，要参加黑班底，还想把HLF也拉进来。

（郭茂兴说8月12日省委成立前夕炮派开了一个串连会）李毅说：812我们一下飞机，你们就组织《红交兵》来炮轰“右倾头头”，还说，“谁去机场接我们就打断狗腿”。在翠湖宾馆围了我六个小时。（李毅对郭茂兴）：你要交代813（省革委成立当日）晚上，你伙同林非怎样绑架我？你们从国防剧院把我拖出来，后来，解放军战士把我抢回去了……

没有必要用中国传统中饱受诟病的“明哲保身”“好汉不吃眼前亏”之类人性弱点来责备这些失败者。因为他们都是以政治人物的身份参与游戏的。政治法则与道德伦理本身就是两回事，有时甚至南辕北辙。诚如近代政治学鼻祖马基雅维里所言：“一个人如果在一切事情上都想发誓以善良自持，那么，他厕身于许多不善良的人当中定会遭到毁灭。”^[1]与会的八派诸委员虽然皆非“不善良的人”，但不少心怀仇讎、至少有点幸灾乐祸，加之谭甫仁泰山压顶，炮派领袖们要在大会上自我矮化，把“屎盆子”往朋友头上扣，只不过按照政治原则做了这类人在这种处境下惯常该做的事。比如“杨继铭等委员为了让到会的委员听得懂、看得明、理得清，边听揭发边在自己的座位上勾画了一幅赵健民等人如何控制炮派核心领导班子和工作班子的联络图。”“这幅联络图就被捅到社会上，社会上有的人迅速把联络图放大、上色，传遍昆明地区和云南省各地州县城，张贴到大街小巷……”之类，笔者以为，将这些人和这些事放到政治场去加以理解，均可了然。

总之，会议还在进行中，整个昆明就炸开锅了。张奎林回忆：“尤其是贴满大街小巷那张《赵健民联络图》，引起了一些单位部分群众将对赵健民的愤恨，错误地发泄到了部分炮派头头身上，把本

[1] 马基雅维里：《君主论》页73，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单位部分炮派头头挂黑牌游街。谭甫仁听到汇报后，立即暂停大会，把八派观点的委员找到礼堂训话，明确指出，挂黑牌游街的做法是错误的，一定要制止。要求八派观点的委员连夜赶回本单位做好群众思想工作，制止违法政策的做法。”张还记录了谭甫仁的总结讲话，说“我刚才讲的这些问题^[1]，都是大会、小会大家揭发的事实，我只是归纳梳理一下。这是我们全会学习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联系云南“文化大革命”的实际取得的成果。这个成果，原炮派的同志功不可没。云南“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的大是大非已经分清，我们就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所谓基础上紧密团结起来，不要再分什么八派炮派，我们就是一派，无产阶级革命派。

笔者采访相关与会委员，对张奎林的回忆录进行了评估，以为谭甫仁这些表态和讲话基本属实，其态度应该说是平和与宽容的，但事实上，两派间两年多来的生死厮杀和血海深仇，谭甫仁的几句高姿态表态已经毫无意义。事实上，谭来滇几个月的种种行事，对本已沸腾的仇恨反复加温，事情注定只会不可抑止地出现悲剧性失控。同样，张奎林行文采用了那么多个“一些单位”“部分群众”“部分炮派头头”之类限制词，也仅仅是胜利者理论上的宽容罢了。

与此相反，文革破产后另一派（首先是该派观点的官僚体系）翻盘完胜，官方对七次全会的表述^[2]则毫无掩饰自己对当年施政者的极端敌意：“谭甫仁在会上先后讲话（包括重要插话）11次”，对会议导向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以至于“省革委会副主任周兴也在会上说：炮派的指挥部、后勤部、宣传、干部等八大部门，是八大反动组织，要一一清查”，“这出戏是谭政委导演，我来执行”，“凡是阎红彦、赵红彦（指赵健民）、黑红彦（指陈康）掌握的权，都要夺回来，不管是哪个单位、哪个部门、哪个工厂。”“赵健民、陈康搞武装夺权，什么‘东游’、‘西挺’，它的规模很大，有计划、有纲领等。因此，要挖重要的敌人，跟踪追击，一窝一窝地挖，

[1] 指如下三个问题：第一是“滇挺”问题。谭甫仁说中央下令围剿，是因为“滇挺”的“性质变了”。“工八团的同志们大多数是好同志，就是赵健民等人把他们其中一些人引入了歧途”。第二还是赵健民问题，说他“当了炮派的顾问，LL、HLF当了炮派核心常委后，出了不少坏点子，企图武装一派、消灭一派。武斗为什么一个接着一个？越制止，越升级，这次全会把这个怪现象的源头找到了。大家更清楚认识赵健民的真实面目”。第三个问题说LL、HLF，“北京开办学习班，两派头头、昆明本地领导都到了云南班，昆明还有的专区武斗继续升级，LL、HLF还在前线指挥，两万多人包围袭击云南汽车配件厂及中建省建，死了那么多人”云云。

[2] 参看《云南“文化大革命”运动大事纪实》。

挖幕后的敌人。”鲁瑞林则介绍了他在“八一五”会议上捅“马蜂窝”、揭“阶级斗争盖子”、抓“反革命”的所谓“经验”，并把参加过“八一五”会议的部分“站错队”的代表，武装押解到会场上进行批斗。会后，为了宣扬谭甫仁“划线站队”的思想观点，省革委会还把他的讲话印发到全省各专、州、市、县机关和军队团以上各部队及相当于县团级以上的各厂矿企事业单位，进行广泛的学习和宣传。”^[1]

古希腊哲人普罗塔哥拉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其意盖云，由于人本身的不完美，故而对客观事物的认知注定千差万别，甚至形成错觉和偏见——这都是非常自然的。问题在于：政府作为整个社会的调节器，应当化解各阶级、各阶层之间的偏见、矛盾和冲突，而共产党人偏偏认定政权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即便没有敌人也得制造敌人来进行专政，从而证明自己执政的合理性和正义性。而群众，从来都是最容易轻信而带上偏见的，文革动乱，仇恨已被点燃，情绪已被煽动，任何一点微不足道的刺激便可使他们做出可怖的行动。如果说，因为官方档案和知情者记忆的缺失，对上述对七次全会的两种判断，我们一时无法进行公允的道德评价，至少已知的资料已经足以让我们看到，云南的群情激愤已置于陡坡之上，在偏见的疯狂驱动下，已经无法刹车了。

2.2. “划线站队”：云南社会的全员惨祸

几十年后，笔者查阅了当年的官方报纸，确实没有发现“划线站队”的字样；经历漫长牢狱之灾、如今垂垂老耄的“八二三”领袖们，至今亦多否认云南曾经搞过“划线站队”；而“新时期”的官方记载，则毫不动摇地宣布：“‘划线站队’是云南省革命委员会这一红色政权成立以后，以‘划清两年多来云南文化大革命的大是大非问题’，和‘清理阶级队伍’等各项政治运动为名，在云南制造的一场长达七八年，后果极为严重的政治灾难。”据笔者查阅的资料，当时所谓“划线站队”，确实是在“清理阶级队伍”这个口号下进行的。所谓“划线”（即按照“毛主席革命路线”划分）“站队”（是否站在“赵健民的阵线”一边），谭甫仁不过是把毛泽东的政治口号变为更简单明晰、更具操作性罢了。滥觞于1969年初的、所

[1] 同上。

有云南人都亲历过的大灾难，叫什么名字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场政治瘟疫确实实在全云南发生。笔者要说的是：正是上层的高压、胜利者的复仇和失败者内部的反水，几股力量合成，造就了全社会空前疯狂的邪恶之举。美国“码头工人哲学家”埃里克·霍弗指出：“所有群众运动都会助长狂热、激情、热望、仇恨和不宽容；所有群众运动都能够从生活的某些部分释放出强大的动能。”^[1]共产党正是搞“群众运动”的高手，文革正是群众运动的顶尖之作。而“划线站队”成了云南的邪恶顶峰。

笔者查过1969年的日记，我从重庆发配云南保山，路过昆明时是1月22日，正好是“划线站队”疯狂发酵之时，笔者在回忆录中这样记录了昆明“政治万圣节”“百鬼巡游”的残酷场面：

整个城市都感染了突如其来的政治瘟疫，投入了丧失理智的、以报仇雪恨为主题的大狂欢。拥挤道旁的看客也积极互动，发泄仇恨。

羞辱失败者的手段，“死不悔改”“走资派”“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黑干将”等名目自不在话下；下跪、戴高帽、喷气式、挂黑牌、阴阳头这些经典传统亦全部保留；“打倒”“批臭”“砸烂狗头”“××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之类标准口号也套用如流。最具云南本土特色的是，被羞辱者不光戴高帽、挂黑牌和带白袖套，还根据身份之不同而配备相应的道具游街示众。比如，打过机枪的，就得扛上道具机枪；扔过手榴弹，就得扛道具手榴弹；“煽阴风、点鬼火”者就得扛“芭蕉扇”——之所以用“扛”字，因为强加给他们的不是普通道具，而是用钢管、钢锭、钢板等金属材料焊接而成！挂在脖子上的黑牌也不是纸板，而是厚达10毫米的厚钢板，一块黑牌重量至少数十公斤。挂牌也不用普通麻绳，而是细铁丝，勒进肉里顿见鲜血长流！厚钢板制作的“芭蕉扇”、钢管制作的“机关枪”、钢锭制作的“手榴弹”重量之沉，可想而知！“小爬虫”情况好些，背上负重仅为竹篾编制的箩筐，上贴“小爬虫”三字。他们被棍棒驱赶，在地上爬行而前，群众情绪激烈时，憋不住怒展拳脚，踢上几家伙，用木棒砸上几家伙，演出些头颅崩裂、血溅通衢的恐怖剧。

[1]（美）埃里克·霍弗：《狂热分子：群众运动的圣经》页19，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11。

对“炮派”大规模的血腥批斗和笔者同时从昆明来到保山：

保山就两条纵横交叉的十字街和可有可无的窄街陋巷，游街实难满足胜利者的报复欲，更具本土特色的虐待模式应运而生。保岫路和正阳路交叉的“大十字”是绝佳眼球聚焦处。采用集中站街方式对“黑帮”进行惩处，效果好极了。各单位的“革命派”于是争相抢占有利地形，摆开方桌长凳，将“黑帮”纷纷押解到此，缚于高台，冠以尖帽，并将满脸涂黑示众。受辱者身上还套以装大米的粗麻布袋，袋上方及两侧各开小口以让受罚者头手伸出，如乌龟之伸缩头脚然。还有一绝，是施暴者将长竹竿捆绑于受辱者手臂，前面饰一巨爪，与手臂同时涂黑，整体便如寺庙之长臂罗汉，以示“反革命黑手”之长，之可憎……只是长杆捆在手上老举着，实在举不动了，押解英雄马上就上前一顿暴打……台上便有了阵阵惨叫，台下便响起了阵阵唏嘘。^[1]

1968年1月一位从重庆分来陆良县板桥参加“云南燃料一厂”修建的大学生，在他的回忆录里记录了类似的经历：

（昆明群众批斗的手段），我在重庆没有见过。后来，到厂后才知道这些都只算毛毛雨，小儿科，我们厂里批斗的手段那才真是“刺刀见红”。那时我厂还在建设中，没有搞生产。职工成天都在搞运动，也即搞“划线站队”。我刚到厂的第七天——1月27日，滇东北陆良片区小三线七家厂在燃料一厂召开“砸烂军工二分部誓师大会”，就是七家军工厂的八派集体批斗各厂炮派头目的大会。燃料一厂有一块很大的草地，具备几千人开会的会场条件，所以得此殊荣……但见临时搭建的主席台前的地上，跪着一大片批斗对象，有七八十人，地位最高的是原国防工办的领导杨德讲、刘光华（都是老红军）。有各厂属于炮派的书记、厂长，有参加“武斗”、抢枪的“干将”等，统称为“牛鬼蛇神”。燃料一厂是东道主，挨批斗的人最多，有20多人。这些人跪在地上，双手在背后绑着，脖子上

[1] 周孜仁：《云南文革笔记》卷一“在边疆”。

挂着牌子，上写各人的“罪名”和姓名，如“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武斗黑干将”等等，姓名上无例外地打上红叉。牌子是用1厘米厚的钢板做的，有20来公斤重，往脖子上挂的不是绳子，是一根1毫米粗细的铁丝，勒进肉里很深，可以想见有多么遭罪。“武斗黑干将”更吃亏，还挂着用废钢铁焊成的机关枪、迫击炮等，又有几十公斤重。会上不停地有人在斗志昂扬地发言，到狂热处有人领着高呼口号：“打倒×××！”“砸烂×××的狗头！”“×××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这时下面就动手动脚，有打耳光的，有脚踢的，有用旗杆打的。最厉害的是用枪托打，一枪托下去，顿时就有血流出来。我看见那些人的脸上、身上、牌子上都有好多血，地上还有好多滩。担任押解“牛鬼蛇神”的是各厂八派的武装队伍，有转业军人，也有年轻的工人。打人的主要就是这些人。一两个月后，草地上的草棵根部都还有斑驳的血迹。

车间一级设有革命领导小组（简称革领导小组），负责行政工作。还有一个斗批改组，负责组织运动，并领导革领导小组。

我当时被分配在401（冲压）车间，斗批改组组长是李国华，副组长白正洪，革领导小组组长是罗兴良，副组长王化武，都是八派。每天运动的内容就是他们组织学习，搞大批判。只要站错了队，不管什么问题都要批判：陶仁杰家庭出身地主，被说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批判过几次，还挨过打。李文有原是武警，文革前刘少奇出国访问，归国途中在石林游览和休息，李参加过保卫工作，很偶然和刘少奇握过一下手——这就被批判是“刘少奇的黑爪牙”。晏晓留懂一点草药，他帮龙潭村的农民扯了点草药，人家请他吃甜白酒（醪糟），还给了一点钱。这是“投机倒把”。李玉林是抚顺474厂来的老工人，冲压技术非常好，他在老厂和老婆（不能生育）离了婚，来云南的目的是为年轻漂亮的新老婆找一个工作。说他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被多次连续地批判。有一天晚上，他被斗得站立不住，面色苍白，晕倒在会场的地上。耿兴隆在上下班的队列唱歌时唱了一句：“我们走在大路上，汽车来了都不让……”这是恶毒攻击社会主义，也要批判。

厂里的批斗，则叫被批斗者站或跪在台前，面对群众。有人高呼口号，有人揭发或批判，时不时有人发声喊：“×××不投降，怎么办？”就有人答：“捆起来！”于是马上就有人冲上去，在口号声中用绳子把被批判者五花大绑地捆个严严实实。捆人者多是转业军人，他们捆人的动作非常麻利，好像受过专业训练，我连看都没有看清楚，他们就把人捆好了，然后又有人上去拳打脚踢。

一天早上，刚上班，女青工小周去上厕所，突然哇哇叫着跑下来，说厕所里吊死了一个人。我和下放车间劳动的胡福信医生连忙去看。厕所建在工房背后的山坡上，我们到时，那人已被解下来，胡医生扳动了一下僵硬的尸体说：“不行了，看样子已经死去好长时间了。”这个50来岁的男人，穿着劳动布工作服。有人说是来厂搞建筑安装的省建安公司的技术员，后来听说这人有点“历史问题”，又站错了队，被斗被打得厉害，不得已选择了自行了断。^[1]

如果说上述两例仅仅是将边疆社会之船撞得破碎飘零的冰山一角。那么，我们有必要用全局表象和大数据对这场政治大瘟疫加以表述。

首先，这场运动以国家政权的名义进行动员，尤其在中共执政这个高度极权的国家，这种动员具有极大的号召力、权威性和影响的广泛性。1969年1月16日，即七次全会闭幕次日，谭甫仁旋于春城饭店召集省物资局、昆明医学院、昆明市公共汽车公司、云南交通汽车一团、七三二一工厂等5个单位^[2]开座谈会，说：“云南的敌情相当严重，绝不是几十、几百、几万”，“对敌人你不斗他，他就斗你”，“这个问题不是一个两个的，而是一窝一窝的，一条线一条线的。要防止右倾，要把隐藏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地富反坏右分子清理出来，把这些人通通挖出来”“抓出来就斗，大会斗、小会斗，白天斗、晚上斗”，“现在不是搞左了，也不是打击面宽了，而是有些束手束脚、怕乱、满足现状、差不多的右倾思想。我说还差得远呐！”

接见东川代表时谭甫仁强调：“当前是不是左了呢？不是，不

[1] 黄肇炎：《三线遗梦》页11，自印书，2016。黄后任军工系统“云南包装厂”总工程师。

[2] 均属于炮派势力较强的单位。

是左而是右。对群众运动不要去评头论足，而是要充分地、继续地发动群众，继续深入地挖出一小撮阶级敌人……现在是不是打击面太大了呢？没有打击面过大。”“我说清出来不是几千的问题，也不是几万的问题”。“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不能手软。你们革委会不能搞那么多清规戒律，束缚群众手脚，把政策交给群众，群众说是坏人，要揪就揪，要斗就斗，革委会要走在群众前头，不要当群众的尾巴，拉群众的后腿。放手发动群众斗坏人，揪出来就斗嘛！大会斗、中会斗、小会斗嘛！白天斗、晚上斗，要紧张地搞。”

1月17日，在滇东北片及玉溪、昆明几个地区基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座谈会上，谭甫仁再次强调：“对阶级敌人，我们不要手软，就是要硬一点，要狠一些。要克服右倾思想，不要怕犯错误。要打一场人民战争，可能误伤一些人。要看主流，不要看支流”，“只要我们掌握一条，不要把人打死，不要杀人。对这些人不要手软，心也不要软”。

在省革委会办公会议和接见滇东北、滇中地区的基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和代表时，谭甫仁还说：“我12月28日到个旧，运动搞得冷冷清清，群众起不来，我给个旧群众开了一个大会，一动员，两条路线斗争大是大非一划清，两天就抓了990多个，差几个就是1000人。他们说打人民战争，大厂小厂都干，到处都干起来了。现在据个旧报告，已抓了2200多人，好得很，确实群众运动正在起来。你们（指东川）才抓了10多个人，只有这么多？我才不相信呢！”“你们看看昆明市3天抓了1600多人。我们昆明市的阶级敌人只有1600多人吗？大大超过这个数字。可热闹呐！你们滇东北有点按兵不动啊！没勇气是不是？头几天这个街上（指昆明市）可热闹啊！百货大楼那个地方水泄不通，都是搞些游街的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好家伙，一天到晚水泄不通，都起来了……”

其次，这场运动以非常神圣的名义实施——即所谓“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所谓“粉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代理人阎红彦、赵健民之流在我省复辟资本主义、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阴谋”，所谓“赵健民执行的‘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等等。宏大的政治命题足以为编造和罗织罪名提供无限的空间。

既然滇西有一个“滇西挺进纵队（‘西挺’）”，那么，理应有一个“东游”（“滇东北游击军”），于是很快清理出一个“国民党云南特务组滇东北游击军政治土匪”，清查的范围从省、地、县、公社直至生产队。据统计，曲靖、昭通地区在组织上受牵连审查的军内外干部群众近60万人。其中，曲靖地区受牵连的干部群众达29.3

万人，被批斗20000多人，被关押2000多人，被打伤4000多人，打残2000多人，逼死打死300多人。仅巧家县前后被批斗干部群众达2438人，政治帽子有“民政党”“大同党”“青年党”等10余种，定案877件计1687人，打死逼死75人，打伤打残2.15万余人，开除公职510人，还有数万人被扣工资、工分、口粮，6400多人被抄家劫财，数万人逃到四川等地区避难。

滇南相应配套，重点清理“文山农民革命军”。本书第二卷曾介绍过，由于地方军区普遍支持炮派，而地方军区的基本盘就是农村的基干民兵，组织农民进城实施“农村包围城市”系炮派通用战法。要将此行为提升到政治高度轻而易举，需要提升多严重就可有多严重。文山州“划线站队”，顺理成章将1967年8月州内农民和基层干部16、7万人参加的“农革军（全称“农民革命造反军”）”宣布为“反动组织”，全州98%以上的党员干部、工人、农民划为“站错队”，捆绑毒打62568人，打伤致残5624人，打死逼死534人。

滇中玉溪两派斗争相对平和，亦编制了一个“滇挺游击军江川农民革命造反军”（简称“江川农革军”）的“反动组织”。称云南省军区副政委李明、玉溪军分区司令员彭合朋等策划了该组织，“李明早在1967年以前就两次到江川县^[1]，在江城、左卫一带视察、布置。当赵健民派出‘滇挺’时，彭合朋于1968年1月3日来江川，4日大量发枪，配合‘滇挺’行动”。6月，“县人民武装部副部长秦自奇、玉溪军分区政委徐树栋亲自在军分区密谋，并派人到昆明联系，加紧组织‘农革军’”。“农革军”“由秦自奇、徐树栋任军长和政委，下设作战部、参谋部、宣传部、后勤部；辖4个师，下辖团、营、连”。“农革军”“以‘联防’为名展开活动”云云。揪斗干部群众2.79万多人，打伤打残1700多人，打死逼死1089人；秦自奇遭遇刑讯逼供，屈打成招。玉溪地区新平县人民武装部部长华定周曾当过“边纵”^[2]副司令员朱家璧的警卫队长，朱家璧北京被扣，华定周遂成为“新平特务组”首恶，全县各级领导班子大多数干部和民兵都被打成“特务”“黑干将”“黑高参”“华定周分子”“华氏小爬虫”遭到残酷迫害……

边疆保山和德宏地区追查“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株连50多万人。2.2万余人惨遭捆绑吊打，打伤致残2000多人，打死逼死700多人。

[1] 江川为玉溪地区下属县。

[2] “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的简称。

中甸县“国民支部”假案。在“划线站队”中，金江公社制造了一起“国民支部”假案。因此假案被迫害致死270人，失踪9人，许多人被打伤残。这是全省基层在“划线站队”中死人最多的一个公社。

昆明市作为云南文革中心，冤假错案自然最多：1703件，株连人数达50多万，直接受害者3.16万余，打死逼死者1486。“炮窝”云南大学，90%的师生被诬为“追随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逼迫交代问题者600余人，被揪斗、捆绑、罚跪、戴高帽、挂黑牌游街者200多人，被关押审查160余人，被打伤致残42人，被诬为“特务”“国民党”“牛鬼蛇神”自杀身亡3人。云南大学党史校史研究室编印的《历史的见证——云大文革史料汇编》搜集了多幅揪斗“坏头头方向东”“被踩在脚下的反军乱军分子张必居”一类的老照片，足以让人直观感受即使自己人斗自己人，亦何等残酷无情：“方被关进‘牛棚’，受到了30多种刑罚的摧残迫害，捆绑吊打成了家常便饭。1月19日，被挂黑牌、戴高帽游街示众，遍游昆明大街小巷，一天批斗10多个小时，轮番批斗毒打，致使耳被打聋，全身多处打伤。”^[1]

最后，这场灾难最为无耻和可怖的特点，是以国家政权的名义合法发动，又偏偏采用所谓“群众专政”的形式进行。按谭甫仁的说法就是：

我不主张抓人，交给群众专政。除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外，其他一般的这个权就交给广大群众，由你们自己去专政就行了。

调防滇南的14军军长梁中玉在砚山县和西畴县的群众大会亦有类似动员：

各单位揪出来的不要上交，监督他劳动，然后进行斗争。可以打人，只要不打死。^[2]

群众运动的情绪性、无序性、随意性和仇恨放纵，使整个局势肆无忌惮地走向的歇斯底里，哪怕犯罪、甚至杀人，亦视之为理所

[1] 刘兴育，页384。

[2] 《西畴县志》“大事记卷”。

当然。全社会彻底失去了公正和保障，受害者成了受虐待杀的羔羊，不管面对的虐杀手段何等残忍，只能引颈受戮。

对于受难者，昆明很多单位分三班轮着搞，白天监督劳动，晚上开会斗争。“不能让敌人太舒服”“每天让他（指被抓者）睡几个钟头就可以了”“要斗，大中小会斗，几个人斗，白天斗，晚上斗，无产阶级睡不着觉，敌人也叫他睡不着，这种斗不要批准就斗了”^[1]。昆明市统计使用酷刑100多种，大搞逼、供、信，捆绑吊打、无所不用其极。曲靖师宗县追查“东游”中，刑罚多达220多种，昭通巧家县刑罚80多种。梁军长在西畴县群众大会上“可以打人，只要不打死。”的话音刚落，立即响起抓打声和受害者的惨叫，很多人当场被打翻在地，被打伤400多人，打残200多人，打死共产党员牟顺昌、民兵排长庞家寿、民兵营副营长钱应堂。打人动员报告发布，几个县的供销社捆绑打人的扁担绳索被抢购一空。

仅仅30多万人口的东川市，在“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人员一共546人，其中在“划线站队”中自杀身亡的184人，被打死的238人。

江川县委中的11名常委有6人被打成“反革命”，县委副书记被打残，5人被打伤；县级4名公、检、法负责人，12个公社、镇的公安特派员全部被打成“反革命”；全县12个公社、镇的人民武装部部长、64个民兵营营长全部被打成“农革军”的“副军长”“师长”“团长”“营长”；全县被打死逼死23人，被吓病后死4人，被吓精神失常3人，被打伤257人、打残117人，被划为“农革军分子”39234人，被列为“农革军骨干分子”1115人。其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757人、省管干部5人、地区管干部57人、县管干部112人、军队干部19人。还牵连了大量的亲属。

新平县追查“特务组”，“特务”杨荣芳遭毒打致死，县革委会虽以“服毒自杀”之名结案，入棺待葬时竟被抬去操场召开“斗尸、剖尸”大会，追查所谓的“特务发报机”；该县武装部副政委毕成之妻覃淑贞（县医院医生）被打死，死后同样被诬为“特务分子”，为追查“发报机”，又将覃尸剖开、连阴道也剖开查找。夏洒区副区长杨家发被诬陷为“华定周分子”遭致命毒打，当他的尸体在江面上被发现后，竟不准人用竹杠、木杠抬尸，而逼“站错队”的人

[1] 谭甫仁接见东川代表的讲话。见省委党史研究室：《云南“文化大革命”运动大事纪实》页162。

用绳子套住杨的脖子，将其尸体从戛洒江边的卵石江滩拖过江心又拖到江东山脚。拖尸1公里多，到达目的地，杨家发的头部、背部血肉模糊，尸体早被拖烂……

以上所涉，均摘自官方资料。所谓某地刑罚若干种，应该是一种粗略的统计。“划线站队”开展一年后，笔者从保山调云南上层机关参加政策调研工作，曾参加过多次相关落实政策的汇报会，只记得所有刑罚中最为血腥者出现在昭通，一为坐木驴，一为滚火轮，其残忍完全超出了现代人的想象力：木驴古已有之，就是用木棒捅女性阴道；所谓滚火轮则第一次听说，将受难者投入汽油铁皮桶，铲入烧红的焦炭，然后滚动铁桶，对受难者进行折磨。数年后笔者到云南汽车厂当工人，厂医院专事代人煨中药的女工某，1969年初，被倒挂在车间行车上反复起降批斗，头发完全掉光了。

作为边疆地区，笔者不能不说一下亲历的德宏见闻。德宏全称“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以傣族（住坝区）和景颇族（住山区）为主，傣族世奉小乘佛教，慈悲为怀，而景颇族笃信以爱和宽容为主旨的基督教。这是两个非常平和良善的民族。这儿是长满大青树、凤尾竹，飞翔着孔雀和白鹭鸶的平和之乡。文革几乎没有出现两派（个别汉族聚居之地短时闹过）。即使如此，也没有逃过“七次全会”清理阶级队伍的弥天凶网。尤为荒唐的是，当局首先预置出一个两派然后再斗争之。据《德宏州志》载：

根据省里“划线站队”的标准，保山地区革委会驻德宏工作组的军代表也给德宏地区的“划线站队”规定了7条标准，根据这7条标准，在德宏州范围内，从部队到地方，从城市到农村，从机关到学校，开展了大规模的“划线站队”。许多地方主要是对州军管会张志敏……以拥护正面教育还是反对正面教育作为标准。许多群众不承认自己参加过任何组织，但造反组织称：“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潞西县中山乡是一个偏僻的山区乡，那里的群众组织不知道“九八”“四二〇”^[1]为何物，干脆就在会场中间划一根线，让群众自己去站队，站在左边的为正确派，站在右边的为错误派。^[2]

[1]指以在边疆地区坚持正面教育，还是开展“四大”而形成观点分歧的两派组织。

[2]《德宏州志·政治卷》页226。

1969年1月18日，德宏州潞西县革委召开有非党员参加的“党代会”，与会代表冲进州人委大院便将所谓“走资派”“牛鬼蛇神”、实则已经归顺共产党的民族上层人士揪来会场批斗，并很快演变出一场拳脚交加的全武行施暴，在施暴者疯狂的呐喊与受难者绝望的惨叫声交响中，受难者死的死，残的残，抓捕的抓捕……整个儿一幅人间地狱^[1]。

两个月后，笔者随同保山专区革委会副主任韩乃光去德宏调研，正遇召开贫农代表会，会议期间在“芒市广场”举行批斗大会，笔者在回忆录里记录了如下一幕：

小卜少、小卜冒、老咪涛、老波涛^[2]……全都来凑热闹。广场热闹非凡。需要揪出来批斗的“阶级敌人”太多，只好临时用木板加搭了一台子。台面够大，仍然被风烛残年的老头儿和老奶奶跪得满满当当。“牛鬼蛇神”们一律作低头服罪状。必须说明，因为路途遥远，高帽和喷气式、尤其是昆明的钢板芭蕉扇、保山的黑手黑脸之类的惩戒手段还来不及传来，因此批斗会比内地文明许多。本土化的侮辱手段仅是在后面垫一排高凳，列队站着很有英雄气概的“小卜冒”，个个手执钓鱼长杆，非常敬业地监视前排跪者，老头老太稍有不逊，头眼乱动，马上便用竹竿击其头部，以示儆尤。

（作为上级派来的人员）我很快清楚了事情真相：傣族贫农在诉苦大会上的政治表现实在大成问题，绝非“样板戏”里小常宝，说起地主老财就“字字血，声声泪，激起我仇恨满腔”。诉苦的傣族贫农确实哭了，哭得还非常动容，可惜，他（她）们不是因为痛恨跪在台上挨斗的“阶级敌人”，恰恰相反，他们向我们哭诉：啊噢噢！大爹大妈跪在台子上好可怜！都老巴巴的了，还跪呢！还用钓鱼杆子打呢！那些小卜冒，良心太坏了些！^[3]

据官方不完全统计，在文化大革命中，全省冤假错案达1.51万件，被打成“九种人”的共有25.78万人，受批斗审查的138.7万人

[1] 参见本卷第一节“省革委前六次全会的基本情况”。

[2] 小卜少、小卜冒、老咪涛、老波涛均为傣语，即小姑娘、小伙子、老大爹、老大妈。

[3] 周孜仁：《云南文革笔记》“在边疆”卷。

（不包括受株连的直系亲属），其中打死逼死1.72万人，打伤致残6.17万人。

上述这些是多么可怕的数字！对于牵连其中每个案例的普通人而言，注定都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悲惨记忆。时间是最有效的稀释剂。随着岁月消融，这些都会被慢慢淡忘。如前面提到汽车厂厂医院那个专门替病员煨中药的女工，向笔者说起当初她被倒挂在车间行车上被反复起降批斗，头发全掉光了……脸上几乎看不出半点怨尤，像是讲述一个古老的、关于第三者的传说。

当权者就不一样了。“划线站队”中被重点整肃的“摧资兵团”，成员是多达万余的各级官员，而且都被整得够惨，等到几年后文革破产，他们再度上台，这些仇恨往往就会变为一种对等、甚至加倍的报复——这些，我们将在本书最后的章节看到。

第三章 边疆“新秩序”

3.1. “政治边防”

七次全会实现了两个目的：第一，通过划清路线，确认了“新生红色政权”省革委一元化”领导的绝对权威；第二，通过群众运动的血色恐怖，震慑了所有可能的反对力量。诚如文革伊始，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所规划的：通过“天下大乱”，达到了“天下大治”。现在，云南可以建立“新秩序”了。

先说边疆民族问题。^[1]

云南民族众多，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县县有少数民族，其中尤以边疆和山区最为集中。各民族有各自不同的语言、文字（有的没有文字）和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社会形态亦不相同。云南与缅甸、印度、老挝、越南陆地接壤4000余公里。建国初期，国民党军队残部流落边境内外，利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和民族上层人物对中共的疑虑，不断滋扰生事，甚至煽动、制造武装暴乱，力图建立反攻大陆的基地——这些，都给共产党在云南建政带来极大麻烦。

当时的共产党头脑清醒。下面不妨摘录几段进军西南时二野前委《关于少数民族工作指示（1949年9月20日）》中颁发的“进入少数民族区域内的一些注意事项”。“事项”对军规纪律制定得极其细致缜密、小心翼翼。如第五条：“他们要邀请参加他们的宴

[1] 本节所述史实，除加专注者外，均采自《云南“文化大革命”运动大事纪实》和《当代云南大事纪要》。

会的时候,不要过于拒绝,怕他们多心认为是看不起他们。他们(按:指民族上层人士)宴会中所吃的东西,也许是很难吃的,但为顾全主人的面子,得勉强尝一点”。第14条:“多带点针线一类的东西,可以换粮食,付工资”。第十五条,“多带点普通药品,如治疟疾的药,治疥疮的药,治火眼的药以及红药水、碘酒、十滴水、万金油等……赢得他们的信任”。第十六条:“云南的盐缺乏碘质,人吃久了,容易生瘰疬病,最好多带点海盐和紫菜海带一类的东西去”。^[1]……精细得近乎婆婆妈妈。古圣孟子曾对梁惠王说,对于实施仁政的人,“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更何况,尚处于人类童年期的云南少数民族,能不被共产党军队这般热心衷肠打动?正如《三国演义》中的孟获,面对了诸葛亮的精明算计,只好乖乖就降。

必须承认共产党建政之初的事事用心良苦。1950年秋,时任解放军14军41师师长的查玉升奉中共滇西工委之命,亲率10余战士驱车200余里,久滞芒市,谦谦恭恭邀土司代办方克光赴京参加国庆一周年庆典,其状可谓低三下四。护送土司途中,不惜舍命与半路设伏的国军残部100多人发生枪战^[2];1951年7月10日,已任职陇川副县长、景颇族基督教领袖司拉山,因怀疑共产党的宗教政策而从传教点拱山跑了缅甸,引得当地政府顿时一片惊慌,州工委迅速派工作队进驻了拱山,稳定群众,并最终将司拉山从境外接回^[3]……1951年元旦,普洱专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会议闭幕,共

[1]《老同志讲历史讲传统丛书》(第一卷《边疆晓歌》)页188。

[2]查玉升:《护卫土司进北京观礼》,见《老同志讲历史讲传统丛书》第一卷《边疆晓歌》页194。

[3]司拉山(1921—1980),景颇族。洗礼会传教士。他不仅是虔诚的基督徒,还具有相当的景颇文水平和宗教理论知识,在陇川及附近几县的景颇族社会中声名远播。中共建政后,司拉山于1950年12月出席保山专区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受到党政军领导的热情接待,后又随云南省少数民族参观团到内地参观。1951年12月政府安排他任陇川各族联合政府副县长、政协主任。但他也错误认为,解放以后各民族平等,陇川应成立“密瓦勒景颇文崩梗着荣”(中国景颇族联邦政府)。1952年举行“目脑纵歌”(景颇族民族节日)时仿效国外宗教做法,制发个人像章,受到政府制止后,心中惧怕而出走缅甸,后经政府一再派人争取、解释、挽救,受感召而回。1953年当选为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区副主席,1956年,司拉山任德宏自治州副州长。1969年1月18日批斗会后被投入大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任省政协副主席,1980年3月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逝世。见《云南省志》卷80,页484。

产党军政官员与全区15个县26个少数民族（含支系）头人、首领、酋长济济一堂，在宁洱县城广场剽牛、喝咒水，并勒石刻碑，在“民族团结誓词”碑上一一签名，以志永久^[1]……所有这些，一时传为佳话。

五十年代初，民族政策的制定因地制宜，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其时，云南各少数民族社会形态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据1956年统计，边境的傣族、哈尼族、藏族等民族地区（约160万人口）处于封建领主制（与西藏相邻的迪庆藏区约11万人口，属于僧侣专政的农奴社会）；与四川大凉山相连的小凉山地区的彝族约5万人，基本上属于奴隶制社会；而边境的景颇、独龙、佤等民族地区约70万人口，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阶级分化不明显。据此，省委上报中央批准，一些边疆民族地区实行“和平协商土改”（简称“和改区”）而另一些则不分土地、不划阶级，直接通过开展互助合作运动进入“社会主义”，这类地区称为“直接过渡区”（简称“直过区”）。驻军边疆的解放军以“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的名义，和内地组织的3000多汉族干部，通过做好事、交朋友、发放救济款，开展贸易和卫生工作，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的困难，使群众得到“看得见”的利益、“拿得到”的好处，真的个一片吉祥和瑞。

1950年代云南边疆的蔚然朝气造就了云南军旅文化的黄金岁月，一大批驻军边地的军旅作家：冯牧、白桦、公刘、彭荆风、公浦、季康……以他们引人入胜的作品《山间铃响马帮来》《芦笙恋歌》《五朵金花》《勐龙沙》……让全国读者、观众对云南的“神奇、美丽、丰富”心向往之。

可惜，到了1969年“云南山河一片红”，所有这些都一笔勾销。诚如本卷导读所言：一旦大权在手，一切面纱统统撕下。承诺变成谎言，善举不过权变。本节前面提到的那位陇川副县长、景颇族宗教领袖司拉山，一时听信他人游说跑了境外，吓得当时的边疆工委惶惶不宁，花了好大力气方将其劝说返回。如今文革取得伟大胜利，新生红色政权且管不了那多了，1969年1月，干脆将这个闹过别扭的景颇领袖抓起来投入监狱。彝区武定县高桥镇下长冲村的苗族牧师王志明遭遇更为惨烈，解放初，他曾作为滇北少数民族代表上京接受毛泽东亲切接见，到了1969年“九大”召开之时，王直接被捕，4年后枪决，行刑前为防他祈祷发声，军人用刺刀将其舌头绞碎，

[1] 召存信（傣族，原车里宣慰司议事庭庭长）：《我在民族团结誓词碑上第一个签名》。《老同志讲历史讲传统丛书》第一卷《边疆晓歌》页212。

满口鲜血横溢^[1]。其余“旧秩序”的幸存者命运可想而知。1969年2月26日，中央军委办事组召集昆明军区谭甫仁一行到北京汇报边防建设，正式部署开展“政治边防”运动，重建边疆秩序。

官方资料称，在那次汇报会上，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对“政治边防”的定义，就是“毛泽东思想光辉普照的边防，无产阶级专政的边防，军民联防、人民战争的边防，支援东南亚各国人民斗争的边防”。其次，明确了指出“政治边防”概念为林彪首创：

林副主席讲了多少次，要搞“政治边防”，而你们那里是礼貌边防，是修正主义边防，是和平过渡的边防。什么是“和平过渡”？一过渡就过渡到资本主义去了。

边疆光搞提高生产怎么行？就是要宣传毛泽东思想，发动群众，抓阶级斗争队伍，把坏人抓起来，在清理阶级队伍的基础上，组织民兵。

那些反动山官、土司、头人，要发动群众把他们批倒批臭，把他们搞到内地劳动改造，不要怕边疆跑人，坏人跑了没有什么了不起。^[2]

3月21日，军委办事组转发经毛泽东和林彪批准的《昆明军区关于加强昆明地区边防斗争的报告》。《报告》以文字形式明确宣布：昆明军区过去的“边防对敌斗争方针是错误的”，是“走上层路线，不搞对敌斗争，搞和平过渡，不发动群众，不抓‘政治边防’建设，所以，长期以来，群众未发动，阶级斗争盖子揭不开，反动封建土司、头人没有受到打击，阶级阵线不明，敌我不分，长期处于和平共处的状态”。《报告》指出，加强“政治边防”“首要的是充分发动群众，狠抓对敌斗争。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把清出来的坏人，迁送内地劳动改造。”中共执政之初对边境民族的郑重承诺和友善谦恭，至此荡然无存。

北京发话，云南马上照办。3月17日至4月3日，昆明军区党委和省革委召开“建设政治边防会议”紧急贯彻执行之。边防野战军、边防部队和沿边专、县革委会负责人共76人参加会议，会议提出狠抓几项任务：

[1] 文革结束20多年后，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中译名“西敏寺”）将王志明奉为“20世纪全球十大圣徒”之一，和马丁·路德·金等人一道塑像立碑，以志永久纪念之。

[2] 《云南“文化大革命”运动大事纪实》页233。

首先，是深入开展以“三忠于”为中心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持续批判刘少奇、阎红彦等人在边疆的一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彻底肃清其流毒；其次，要放手发动群众，狠抓阶级斗争，当前集中抓好清理阶级队伍，稳、准、狠打击“九种人”（包括反动的土司、头人）；结合“清队”解决划分阶级成分问题，搞清阶级阵线；基层政权严重不纯的，坚决进行调整；第三，“热情支持，积极领导”边疆各族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据形势需要和“边疆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办人民公社的步子可以迈大些；第四，认真贯彻落实军委办事组关于加强对敌斗争的方针、原则。最后，成立省“政治边防”领导小组具体负责此项工作。谭甫仁任组长，省革委副主任周兴和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徐其孝任副组长。

紧跟上述条款的是杀气腾腾的具体政策措施：

对封建土司、头人，要发动群众，从政治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原有的生活补贴一律取消。对进行现行破坏活动的反动土司、头人，应给予及时有力地打击。这些人在省、专、县集中的，要送回原地交群众批斗。

为搞清边疆阶级阵线，清理阶级队伍中须在150万人口的“和改区”及90万人口的“直过区”解决划成分问题，划分标准基本上按照内地土改的规定。

在划阶级中，地、富所有的大牲畜、大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收归集体所有。对隐藏在归侨、侨眷中的“九种人”应彻底清理，漏划的地主、富农要补划^[1]等等。

自此，边疆民族地区的“对敌斗争”火力全面开花。

各沿边专、县革委会和边防部队，均共同组成了边防斗争领导小组，派出工作队进驻边沿村寨，代替原有各类组织和当地民族干部，行使各项职权，为“扫除障碍”，滇南、滇西片还成立了“前指”（“前线指挥委员会”的简称），由野战军派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从内地抽调的学生组成“建设政治边防工作队”进驻边防分区，然后，家家户户派发“红宝书”（即《毛主席语录》）、送毛泽东标准像，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发动农民背《毛主席语录》、搞忆苦思甜教育。举办了大小不等的22.22万个班，23726万人次参加学习。搞

[1]《当代云南大事纪要》1969年卷。

“政治边防”“清理阶级队伍”、深挖“九种人”，首当其冲，自然是批斗土司、山官、头人，取消原有给他们的一切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批斗后送内地劳动改造或交当地农村监督管制，有些地方则于群众中查“同境外的联系”，查“同民族上层的联系”，有的地区则从内地动员汉族农民到边疆安家落户，代替当地少数民族农民搞“斗批改”，人为制造外农和土著农的矛盾；重新划分阶级成分或复查补漏，搞“二次土改”，搞“削尖运动”，把土改后生活好一些的农民称为“冒尖户”，没收其“冒尖部分的粮食和现金”；最后，全面推行人民公社制度，把内地“一大二公”的乌托邦模式强行搬到远山边地，从1969年4月至7月，边疆地区26个县全部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一些地方还强迫不同民族农民并队。

火力如此威猛。少数民族哪堪一击？作为生产发展从而文化发展水平远低于内地的族群，哪怕仅仅面对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词语，他们就已经不知所措了。德宏景颇族地区，与“阶级”对应的词汇只有“楼梯”、与“团结”对应的只有“不打架”，等等。如今“忠字化”“九种人”“削尖”……汹涌而来，他们只能傻眼。1969年3月，笔者被保山专区革委会派去瑞丽县^[1]姐东乡调研“政治边防”建设，正值“划成分”阶段，工作组长为傣族武装部长，汉名姓张，他在宣讲政策条款之后，农民们纷纷要求“参加”“高利贷”成分。听不懂傣语的笔者大惑不解，问张部长怎么回事？张的回答让人哭笑不得：他说，傣语里“高”是“我”的意思，“利”则为“好”，“高利贷”即“我是好傣人”。

曾担任思茅（今普洱）地委副书记的刘树生在回忆录《脚步的回声》里也记录过类似的故事：

有位（佤族）大队干部，只听得懂简单的汉语。在成立基层革命委员会时，他被选作“三结合”对象。县上一位领导登门找他谈话，告诉他：“你不是打倒对象，也不用炮轰，只要火烧一下。明天开群众大会，让群众烧一烧就行了。”第二天群众都到齐了，就是找不到他。派人到他家看，人去楼空，全家3人已没了踪影，接着又有10多户人随他跑出“国外”去了。

工作组只好通过他的亲友联系，约定刘树生与他国境线上的一

[1] 瑞丽县为德宏自治州下辖边疆县。现升格为县级市。

条小沟边进行“国际谈判”。那位佤族干部说明的出走原因让刘树生哭笑不得：

“打倒”我不怕，“炮轰”我也不怕，炮火一过我就爬起来，躲得脱。最怕就是“火烧”。火塘边炭火溅到脚上都疼不赢，叫那么多群众来火烧，还不把我活活烧死掉，怎么受得了！^[1]

所谓边民外逃，是边疆地区遭遇灾难时，人们最无奈的选择。云南边境线两侧多为同一民族，甚至许多亲属跨境而居，客观环境为“边民外逃”提供了极大方便。面对内地强加而来的不可理喻的疯狂叨扰，他们“惹不起躲得起”。共产党执政以来，云南边疆地区曾出现过两次大的“外逃”潮，第一次是1958年的“大跃进”，第二次就是1969年到1971年的“政治边防”建设。原德宏自治州委书记段华明在1972年4月27日的民族工作座谈会上介绍，瑞丽县1958年“外逃”近15000人，1969年到1971年外逃4500多人。全县民族干部206人，外逃33、自动离职52、自杀1人，共86人，占民族干部总数41%。弄岛公社搞“政治边防”，办重点人学习班，为时4个月，参加人15人，学习期间先后外逃4人，至收班结束，除1小学教师和1知青，其余9人全部跑光。姐勒大队重点人学习班55人，全部被批斗，被捆吊4人、自杀1人，其余全部外逃。^[2]据官方文献《当代云南大事纪要》统计，从1969年到1971年，全省共外逃30000余人。^[3]

由于缺乏官方档案佐证，笔者无法提供关于“政治边防”这一提法更精确的史料。据1969年2月26日中央军委办事组召集昆明军区领导布置“政治边防”建设的出席者和讲话判断^[4]，首倡者为“突出政治”而大得毛泽东赏识、并正式册封为“接班人”的林彪，此事当无疑问。1970年至1972年期间，笔者供职于云南省委办公

[1] 刘树生：《脚步的回声》页784-792，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

[2] 摘自笔者参加该汇报会的工作笔记。其时笔者就职于云南省委办公厅政策调研处。

[3] 《当代云南大事纪要》页374。

[4] 主持该汇报会并发表指示者，以黄永胜领衔，还有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正好是后来被称为“林彪集团”的“四员大将”。黄永胜讲话开宗明义称“林副主席讲了多少次，要搞政治边防”而未提毛泽东讲，显然当时暂无毛的指示在先。

厅调研组，曾参与相关会议的调研和写讲话稿之类工作，按当时为文规矩，必然大量引用“最高指示”（毛泽东语录）和“次高指示”（林彪指示），而直接论及“政治边防”，基本上只有“次高指示”可寻。非常具有喜剧意味的是：云南省最后一次全省“政治边防工作会议”于1971年9月12日召开，会议开幕才1天，林彪偏偏“于9月13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1]林彪外坠北漠的信息周恩来于14日凌晨即知会了主持边防会议的周兴（谭甫仁已在前一年被暗杀），中央文件尚未下发，担心犯错误的周兴于是心急火燎来到我们办公室看稿子，并直向主持撰稿的刘连清^[2]打哑谜，反复追问：“你们仔细核对核对，林副主席的指示如果不准确，就不要用了”（我们回答：反复核对过了。准确的。）“你们再数数，林副主席的指示条数千万不要超过主席指示！”（我们回答：反复核对过了。没超过）……秘书们一头雾水。事情拖到后来，林彪事件已正式传达之后的11月4日，昆明军区和云南省委正式下发会议文件，这才直接将会议名称改为“边防工作会议”，删除有关“政治边防”的全部内容。此后，“政治边防”这个词汇从云南文革历史上悄然消隐。

3.2. 歇斯底里的表“忠”闹剧

文革的第一个政治目标：搞掉了刘少奇及其官僚体系，以“九大”召开成为完胜标志。没承想林彪问题又冒出来，于是不得不马上开始为清洗林彪集团做舆论放风。1970年，毛泽东对美国友人斯诺如是说：“什么四个‘伟大’，讨嫌，统统辞去，只保留一个：导师”，表面上，这看似对林彪倡导的造神运动降温，但此语背后则大可读出毛对于当“大成至圣先师”级别的精神导师何等在意。纵观历史，顽固的宗教，或意识形态从来都是保持政权稳定的基石。尤其中国的几千年史，不管发生多少次朝代更替，强大的中央极权始终风雨不动，究其原因，正是宗教化的儒学已然生活化、风习化、仪式化，构成全社会心理深层的价值平台。毛泽东一再声称他要当“马克思+秦始皇”，说穿了，就是对当“大成至圣先师+秦始皇”梦寐以求。秦始皇版的极权政治构架他已经完成，要确保这个“红色江山”千

[1] 中共中央文件《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1971年9月18日）。

[2] 刘连清原任秦基伟秘书。文革后任昆明军区文化部长。

秋万代“不变色”，他还需要加冕共产党的“大成至圣先师”，将其思想宗教化。

林彪深谙毛心思，自1959年末在国防部长位上履职，对毛造神就成为部队工作最为关注的重点，大兴学毛思想之风，编印、派发《毛主席语录》……由军人带动的造神运动为文化大革命作好了充分的准备。文革造神第一波高潮始于1966年秋，以破“四旧”、红卫兵大串连为标志，第二波则于1968年“全国山河一片红”前后，群众中开展的所谓“一日生活毛泽东思想化”“忠字化”运动，等等。

权力重组已尘埃落定，既得利益者（首先是当官的）希图巩固权力并继续提升权力，必然要动用国家权力表忠心，处心积虑作政治秀。

修建“万岁馆”是各省通行做法。云南当然也得修。省革委成立时间也晚，因此必须加班加点动手。七次全会结束次日（1月16日），云南省革委和昆明军区党委旋即作出《关于修建“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和伟大领袖毛主席巨型塑像的决定》，宣布要用最快的速度、最高的质量、最短的时间完成修建工程，并成立了以谭甫仁为组长的领导小组，要求“各级革委会和有关部门全力支持，做到要人有人，要物有物”，馆址选择在昆明市检阅台隔路相对的工人文化宫。1月20日开始对文化宫实施拆除，先后调集劳动力7万多人次，为抢工期，建筑物的拆除干脆由工兵进行爆破，将露天剧场、电影院、溜冰场、大礼堂、美术馆、音乐厅及各种附属设备在内的18000平方米面积的建筑在一夜之间炸毁，30000平方米面积的绿化亦悉行破坏，损失折合人民币上千万元^[1]。时传有人告状汹汹，项目很快被北京叫停，好端端文化宫遂长期成了市中心一片文革废墟，直到1987年方由地方政府斥资重建。

“万岁馆”工程被停，具体内幕至今无人揭秘。其时社会大乱休停伊始，政府财政拮据，想必为原因之一。馆可不修，但各级新生红色政权“忠”心还得表下去，于是乎自筹资金、遍地开花，纷纷“敬建”毛主席塑像、“敬绘”毛主席巨像、“敬立”忠字牌坊……情趣各异，五花八门。边人艺术水准有限，更是“无知者无畏”，只要能表现“三忠于”“四无限”一片赤诚，放开胆子只管大干，这些“忠”字作品有金属的、有水泥的、有的干脆塑成泥菩萨，盖成土地庙，有的塑像鼻子太大，燕子在里面筑巢，黑乎乎一团，要

[1] 见《当代云南大事纪要》页372。

多恶心有多恶心……以至于毛泽东就此开玩笑对美国友人斯诺说：“看我站在那里受到风吹雨打。实在可怜”^[1]。“九大”两月后的6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批示“照办”的文件^[2]，正式通知：宣传毛主席形象，宣传毛泽东思想必须“实事求是”“要节约闹革命”“不要追求形式，要讲究实效”……其时，笔者参加了保山专区革委会宣传组对此事的普查，对满大街画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领袖像一律要求整改和覆盖。

极“左”思潮猖獗和个人崇拜浓厚的条件下，农村开展了“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活动。每天出工前，召集社员们搞“三忠于、四无限”。还要求各家各户早上起来必须向毛主席“早请示”，晚上收工回来时必须“晚汇报”，每次开会前要读“最高指示”，结束时要喊“万寿无疆，永远健康”。^[3]庆祝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全局城乡开展全民性地跳“忠字舞”、抬“忠字牌”和“早请示”“晚汇报”活动，出现一派个人崇拜狂热——《思茅地区志》记载的上述景象，全省亦然。

《中共德宏州历史（第一卷）》的记录亦可表征云南边疆的整体疯魔：

根据林彪在部队推行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一些办法，在全州范围内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热潮，开展了“三忠于”“四无限”的活动，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要求全州把实行“一日生活毛泽东思想化”定为雷打不动的制度，州、县、区三级干部每天要坚持用一个小时学习《毛主席语录》，要在全州3394个合作社组织学习小组，坚持休息时间学、逢会学、五天一晚上学。并提出人人热爱毛主席、热爱毛泽东思想，要把“多读一段毛主席的语录，就是对毛主席的忠心，就是射向赫鲁晓夫的一颗子弹，是对世界革命的支持”。要求把上述学习制度坚持下去，持之以恒，雷打不动。在全州大力推行“忠”字活动，大红“忠”字到处贴，村头、

[1] 转引自1971年周恩来五次接见美国著名作家韩丁的谈话纪要。

[2] 中发（69）33号文件：《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3] 中共洱源县委当时研究室：《洱源县“文化大革命”运动》，见《大理州“文化大革命”运动》页157。

路口、会议室、公共场所到处建起了“忠字台”，实行“早请示、晚汇报”。一切都要按照林彪提出的“三忠于”“四无限”办事，机关做完“三忠于”才上班，所发文件必须要有毛主席语录，商店做了“三忠于”才营业，工厂做了“三忠于”才开工，甚至走亲串寨也要唱完“三忠于”才上路。各族群众家家要有“请示台”（贴一张毛主席画像）“宝书台”（放毛主席著作）。还要求社员上工要“五到田”，即：毛主席画像到田、毛主席著作到田、五星红旗到田、革命大批判到田、毛主席语录到田。^[1]

“学代会”（全名“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若干地方又叫“积代会”，还有叫“讲用会”——“讲”“活学活用”毛思想经验大会），则是各地州县普遍推行的常态化、制度化的表“忠”政治秀。

云南省省级规模的“学代会”一共开过两次：1969年、1970年各一次。首届“学代会”1969年11月10日在昆明召开，会期1月，12月12日闭幕，出席代表共有5500多人。第二届“学代会”1970年11月15日在昆明召开，会期亦差不多一月（12月8日闭幕），人数翻了一番：近一万^[2]。已经普遍停课的云大、昆明师范学院、昆明医学院，还包括昆明第一中学等多所学校校舍皆征用为代表驻地兼会场，其规模应比首届大会大得多。皆因是年9月庐山会议，将毛思想捧为圣典的始作俑者林彪出事，还有，二届“学代会”闭幕9天后，谭甫仁即被暗杀，云南的“学代会”秀“忠”便无以为继了。

这些表忠活动，一则劳民伤财，二是严重败坏了社会作风。所谓“忠字化”环境建设如是，“学代会”则更有甚之。

先说劳民伤财。且不论省级学代会把数千人从边疆各地弄到一起吃喝瞎聊费用不菲，更大的问题在于，省级会议之前县和专区均得级级开会、层层选秀。以笔者供职的保山专区为例，准备首届会议县级大会是6月下旬开始筹备，8月开会；专区是7月下旬筹备，9月初开会，此前还有基层、农村公社、工厂——从组织写作班子去到各县参加县学代会搜集、遴选典型，到九月初开会，会期半月，

[1] 中共德宏州委党史办：《中共德宏党史》页278。

[2] 1970年10日《云南日报》头条消息报道会议闭幕消息反复称：“这次‘学代会’成为万人学习班，万人传经验，万人受教育”。

已经够受，而此前县一级的会议还得准备、还得开会（会期一般为一周至10天）……如此算来，从县到省，笔杆子和代表有半年时间基本上干不了别的活。

新生红色政权各级官员利用学代会大树典型，其政治功利目的非常明白。只要能在全省大会捧出一两个政治明星并一炮走红之——那么，发现并推出此明星的领导必然也会因政治眼光“敏锐”“独到”而升迁有望，大小官员谁愿放过如此表忠良机？于是纷纷投入弄虚作假大比拼。

首先是题材力求“新、奇、特”。比如，保山专区第一届学代会，出线报省的典型10余名，其中盲人便占了3席：陇川县景颇族盲人梅迪、潞西县景颇族盲人何米瓦和龙陵县盲人赤脚医生陈聪秀。梅迪乃朋生生产队社员，正好由笔者采写。为此，我在梅家“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周，当然知道老太太说汉语非常困难，说汉语如此困难却能用汉语熟练背诵毛语录，甚至能把毛泽东的“光辉著作”“老三篇”、甚至中共九大刚刚通过的“新党章”全文倒背如流，确实令人称奇。如此，公社就让她走村串寨，如表演特异功能一般到处表演背书功夫。让人奇怪的还有，同样一篇文章，她的诵文一忽儿昆明话，一忽儿四川话，一忽儿又来北京土话——原来，她的本领全是从来此插队的知青那儿学得：跟昆明知青学昆明话，跟北京知青学北京话，跟四川知青学四川话，至于雄文所言何事，她其实不甚了了——毕竟事情奇特，理当认定为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于树为典型，推荐上省城比拼。

没承想保山推送来昆的“新奇特”不过是“小儿科”。原来报到省革委宣传组的典型材料，别说盲人、聋哑人、缺胳膊少腿的早就选送了一大堆，且各有奇招。仅一个红河州，盲人典型就够坐两桌，有的本系算命先生，口齿利索，只用把算命语言稍加改变，马上就成了“闪光语言”。讲用会上的手势也基本沿用算命习惯动作：食指、无名指和小指曲如蓝花，大指中指掐个不停，口中念念有词曰：“‘私’字不断，必有后患；‘私’字不倒，江山难保”云云——那时毛泽东最著名的最高指示就是“要斗私批修”。各地各州上报的材料甚至题目均结构雷同，如为盲人，题目均为《没有双眼，也要读毛主席的书》；聋人则为《没有双耳，也要听毛主席的话》；瘸腿则是“没有双脚，也要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飞奔！”……负责总揽学代会材料全局的军代表、省革委政工组新闻组组长李长明，不免大为光火，发下话来反问：“健康人就学不好毛泽东思想吗？”接着下令残疾选手一律不得出线——各地州抢手笔杆在昆明拼杀多日，大败俱伤。

与此同时发生的喜剧是，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典型竟然轻而易举地拔了首届“学代会”的头筹。一个是玉溪烟厂（今“红塔集团”）选送的代表李莉，7岁；一个是江城县傣族老太太（傣语叫老咪涛），97岁。一老一小被记者们弄一块儿拍下一张“老少配”：年龄悬殊高达九十岁的俩代表共同学习伟大领袖著作合影相，登上了《人民画报》，于是筹备第二届“学代会”，各地便心知肚明了：用残疾人创奇迹已无可能，在代表年龄上“挖潜力”则还可能出新招，结果，“祖孙四代同堂讲用”的创意果然在第二届“学代会”成功登台。只是正式现场出了点洋相：最小一代“演员”（约莫四五岁）没见过大世面，一上台就尿急，忍无可忍，大会只好休息片刻——官媒《云南日报》对此典型煞有介事报道：

宾川县前卫公社古底大队干地生产队李正芳一家四代学哲学的先进事迹，在一矿^[1]二分矿老矿工谢家发、十四冶老工人侯玉邦以及这个公司的女代表潘根秀、昆明钢铁厂女工杨娣华、三矿纳西族女矿工纳玉香代表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他们深有体会地说，这一家人从小到老都是活学活用毛主席哲学的典型，是一个革命化的典型，这个家庭的事迹生动说明了有了毛泽东思想，就一有百有。他们表示，回去以后，一定要把学习毛主席光辉哲学思想的经验传播出去，推广开来，促进矿山建设有一个飞跃的发展。^[2]

其次，要想在“忠”字秀场出风头，必得发动笔杆子编造“闪光语言”“豪言壮语”。大会筹备时，全省各地州的秀才、“枪手”们云集省城，由省革委新闻组统一安排吃住，挑灯夜战。新闻组明确宣布：“我们只管比材料，事迹的真实性各自负责”。材料通不过回去是没好果子吃的，秀才们于是只管在昆明现场胡乱修改。长途电话采访成本太高，且不方便，一般就假话大话胡编一通，只要能通过就成。

作为云南首届“学代会”的全程参与者，笔者必须说明，在这些身怀功利目的的导演背后，广大的代表群众绝大多数是可爱的、

[1]一矿指“个旧锡矿”，下面的“三矿”指“东川铜矿”。

[2]《云南日报》1970年10月5日头版消息：“万人总结经验，革命要抓根本——省第二次学代会经验交流侧记”。

真诚的，虽然真诚得近于愚昧。他们的效忠情绪之中确有一种崇高的、让人感动之处。云南边地，山高地僻，长期处于封闭、孤独和环境之中，让他们平凡的、千篇一律的寂寞日子在“神灵”的启示中得到寄托，并融入县城、甚至省会的群体狂欢之中，他们不能不着魔一般亢奋。

比如首届“学代会”代表、瑞丽县水电工人段庆林一人独守山顶压力前池，数年一日，仅凭一本小学生字典，把《毛选》四卷悉数通读，还歪歪扭扭写了几大本笔记。（注：当时边疆小县多无电网，县城均由小水电供电。电站压力前池蓄水一日到夜间即可供电3、4小时。段师傅就是被电站派去孤寂山头值守水池并管理20多公里绕山沟渠），笔者在他日记看到的最精彩段落如下：某夜发电结束，段师傅梦中高卧，突然风雨大作。段惊醒，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暴雨若冲塌了水渠沟帮，蓄水不成，明日何能发电？发电不成，全县百姓如何看得主席著作？收音机无电不响，如何听得主席声音？想到此节，他翻身起床，急急出门查看水渠。途中遇到一件要命事：黑暗中，一庞然大物横卧山路，血盆大口吁吁有声：是豹子！段师傅的日记称，他立即驻足并开展思想斗争。他“想起了毛主席的伟大教导”——日记如是写道——“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日记继续写，想到此，他浑身充满力量，于是大摇大摆走过去。“豹子看见我耀武扬威的样子，便夹着尾巴跑掉了”。这段日记让笔者忍俊不禁，遂问：“你看见的明明是只真豹子，怎么会想起纸老虎呢？”段憨厚一笑，回答真诚而肯定：“当时我想到的就是这段语录。”

又比如第二次“学代会”，一位来自昭通山区的农业学大寨先进分子，一看昆明城“寨子”如此巨大，滇池“围海造田”工程如此宏伟，太激动，觉得“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以为自己成绩藐小，实在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党，这就疯了。他住在云南大学，出门就看见翠湖，冬天，翠湖波平如镜——事后精神医生分析，说他肯定以为是浩浩广场了，于是产生了英雄幻觉，于是像大无畏的革命战士一般，操着正步直行而去。结果淹死。还有一个住在昆明医学院的代表，开大会时错喊一句口号，虽然谁也没注意，可他觉得自己犯了弥天大罪，从此日日独躲私处，跪对领袖像悔罪——即使这样，他仍觉得不足以补罪于万一，只好以一死证明自己领袖之忠贞不贰——等他从医学院的楼头跳将下来，死了，会议组织大家开展分析，这才有人想起这些天该代表确实行动怪异，又想起他好像确在某次大会中喊错了口号，把“打倒刘少奇”喊成了“打

倒毛主席”，虽然谁都没有注意到。^[1]

云南为多民族省，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五彩缤纷，如傣族的泼水节、彝族的火把节、苗族的芦笙节、景颇族的“目瑙纵歌”、基诺族的“特懋克”节……文革扫“四旧”搞“忠字化”，这些统统被横扫一空。唯一成为奇迹的是，大理白族著名的“三月街”竟然打着“忠字化”活动的旗号，被保留了下来，而且办得空前成功。

大理历史上传统的“三月街”，是滇西规模最大，包罗各省至周边国家在内的物资交流盛会，具有广泛的群众性。文革期间，“为进一步掀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新高潮，1969年3月，大理县革委会作出决定：“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后的第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为‘忠’字大会的开幕日，连续集会7天”，并成立了大理县革委会“五一‘忠’字大会工作委员会。”悉心筹办。“忠”字大会从5月1日正式开幕，到8日闭幕。在“忠”字大会开幕以前，大理县城里为庆“九大”和举办“忠”字大会，赶建了“忠”字楼，有六幅大型的毛主席像。布置一个“忠”字化的会场，在会场人口处有一座毛主席的全身塑像，每个街头都有彩门、布标、语录，每个货棚都有“忠”字台。大理石厂、制帽社赶制毛主席石像3000面，机绣毛主席像1000幅，到外地购5000—10000个毛主席瓷像、塑像、玻璃相框，“红宝书”三万册，大理州革委会批给38毫米的毛主席像章20万个。“忠”字大会自始至终，通过各种形式宣传毛泽东思想，举办“伟大领袖毛主席丰功伟绩展览馆”“两条路线斗争展览馆”“忆苦思甜展览馆”。官方记载：

“忠”字大会，市场显得十分活跃，商品价格稳定。大牲畜上市8391头，成交3531头，交易款1966000多元，比上年增长18.1%；药材交易总额3万多元，比上年增长一倍多，收购量增长很大，共收购了半夏、木香、党参等中药材72个品种，计3655斤，收购金额11359元，改变了往年药材难于收购的现象。农副产品收购总额10849元，比上年增长167.3%。共计收购27个品种，其中棕片、棕衣、棕线、竹笋、狐皮和羊毛毡等，往年没有收购进来的，

[1] 云南举办第二届“学代会”时，笔者已从边疆调昆明军区调研组（谭甫仁办公室），“学代会”期间负责各地州代表的联络调研。上述的两件死人的事，因严重影响大会声誉，一直对外保密。

而当年都收购进来了。其他各种货物的交易都比往年大有增加。^[1]

在如此狂热的氛围之中还能保持如此经济头脑，实该为他们点一个赞。完全可以设想，这种地方领导如果遇到了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做生意一定会风生水起。

世界上有两种人力大无穷，都可能创造人间奇迹：一种依靠理性和知识的人，他们的力量和成就代表时代发展的方向。另一种是被神灵召唤的愚民，因为总是逆历史、逆科学而动，他们创造的奇迹，往往只是暂时的荣誉和长久的悲剧。云南在病态权力的指引下，注定该轮到愚民来继续上演荒唐剧。

3.3. 围海造田^[2]和通海地震

按老百姓说法，谭甫仁主政云南，概括起来就是“三板斧”：一曰“划线战队”，二曰“修‘万岁馆’”，三曰“围海造田”。第一板斧和第二板斧属于“抓革命”，第三板斧则属于“促生产”。

中国是农业国，云南更是农业省，“促生产”首先就是要大家种庄稼搞饭吃。文革破产后云南的官方资料有明确记录：

1969年9月24日，省革委会成立1月余，即召开了全省农业工作会议，“讨论和制定云南省1970～1974年农业全面跃进的规划：力争5年左右全省粮食产量翻一番。即由1969年的130.11亿市斤增至1974年的260亿市斤”。会议还特别提出，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必须“农业学大寨”；必须批判“三自一包”“边疆特殊”“民族落后”“爬行主义”等“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货”^[3]。

1969年1月11日，省革委生产指挥部发出《关于今春组织全省农村干部到大寨参观学习的通知》，根据这一《通知》要求，云南省由贫下中农和基层干部代表组成的大寨参观团，先后分两批到

[1]大理州党史办：《大理州“文化大革命”运动》页90。

[2]实为围湖。云南人将湖泊称为“海子”。此节所述“围海造田”，主要指昆明地区围滇池造田一事。

[3]《当代云南大事纪要》1969年卷。

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参观学习，2月22日已全部返回昆明，分别回到各自所在地区，宣传介绍大寨的先进经验。9月24日省革委召开全省农业工作会议，制定了1970年至1974年农业全面跃进规划，力争五年左右全省粮食产量翻一番，即由1969年的130.1亿市斤增至1974年的260亿市斤。^[1]

官方大事记紧接对谭甫仁的“促生产”做出如下结论：

由于提出这种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并把它作为“政治任务”硬性压下去，因此不少地区为了完成粮食增产指标，盲目围湖造田，大搞毁林开荒，“向湖山要粮”，造成了严重恶果。^[2]

这儿所指“不少地区”“盲目围湖造田”包括滇池周边，还有滇南石屏县异龙湖、通海县杞麓湖周边等地农村零敲碎打的围湖造地^[3]。谭甫仁三板斧之一“围海造田”，具体则是指以云南省及昆明市政府直接动员、全民参与的昆明“围海造田”，将人称“昆明‘母亲湖’”的滇池水域围出1.2万亩来种庄稼，“学大寨”。将农业生产当成仗来打，一则场面壮观，吸眼球；二则一战功成，大政绩顿然出焉；再说，军人掌权，他不懂得如此行事。官媒载：

1969年12月28日，昆明市革委会根据省革委会的指示，在东风广场（即检阅台）举行10万军民的誓师大会，提出口号：“移山填海，围海造田，战天斗地，向海要粮”。省、市革委会负责人宣布，此举是“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发展农业生产的教导，改天换地，对于发展农业生产，掀起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备战、备荒，培养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都具有重大的意义。”^[4]

从第二天开始，昆明地区的工人、农民、军人、机关干部、学校师生一体出动，整整4个月时间，停产半停产、停课半停课来参

[1] 同上。

[2] 同上。

[3] 同上。

[4] 《云南日报》1969年12月29日头版消息。

加这一愚蠢“壮举”。具体工程内容包括：在滇池草海^[1]横建一条底宽30米，高6米，长3公里的大坝，然后抽干坝内湖水；同时，从滇池西岸的山上炸石取土，用船运来东岸，在排干的大坝内填土厚度约一米，造出万亩农田。

填湖工地离城区20余公里，军民人等每天都需自带工具前去“干革命”。工人和军人早去晚回有卡车运送，还好。中小学的孩子们来去都得靠双脚步行，委实苦煞也矣！筑坝的石头和填湖的泥土都由农民从滇池对岸的西山船运过来。炸石、运石和运土都规定指标，完不成任务者不仅取消免费伙食，还得头戴白高帽，臂套白袖套挨批斗：罪名是破坏“抓革命，促生产”。据当事人回忆，挨批的“破坏分子”不少，几乎每三天都有一次小批斗，一周一次大批斗。

至1970年5月，“围海造田”终于完工。据统计，该工程共投工2400万个、耗资1300万元，排干湖水1700万立方，造田1.2万亩。项目完工后，为管理这些水田，政府又投资近600万元建成“海埂‘五七农场’”，从1971至1982年的12年间，国家补贴金额高达1075万元，而全部耕地生产的粮食累计只相当于“围海造田”时上阵劳动力耗用粮食的26%。“围湖造田”不仅浪费大量人力、财力、物力，对昆明的生态环境破坏尤为严重。原来计划的“以农业为主，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水利、化肥、机械、电气四化俱兴，亦工、亦农、亦兵的国营农场”成了泡影，被称为“五七农场”的水域，到处塌陷，到处水淹，只长杂草，不结果实，实际常年荒废。直到几十年后改革开放，这儿终于被地产开发商盯上，修起一片片时尚别墅区，塌陷出的水洼，正好点缀出一湾湾小桥流水——实在是对当年破坏性的壮怀激烈最好的讽刺。

1970年1月5日，即昆明人高歌猛进向大自然开战的第7天凌晨1时0分37秒，地球以其巨大的破坏力把突如其来的凶信传到云南。

这次被地球物理专业定义为“通海地震”的大地震，是中国灾难史上死亡人数和危害程度仅次于唐山大地震、与2008年5月12日发生在汶川大地震几乎等量的3大地震之一。后来证实的情况是：通海地震震级为里氏7.8级（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强地震），震中裂度达10度，共死亡15621人，受伤人员超过734231人，受灾面积达8800平方公里，震中通海全县死亡4426人，占当时总人口的2.64%^[2]。其烈度之大，以至于距通海两百里外的昆明百姓都在

[1] 滇池形如葫芦，“葫芦”小头称“草海”，“葫芦”颈部称“海埂”。

[2] 《当代云南大事纪要》1970年卷。

梦中被摇醒。笔者亲历了这一时刻：当我们在熟睡中被震醒，本能跳下床，同室而居的同事张德鸿^[1]第一反应是一声大叫：“苏修扔原子弹了！”

直到4天后，《云南日报》才刊发了一则经过严格审查的、轻描淡写、语焉不详的新华社通稿：

新华社昆明8日电：1970年1月5日凌晨1时，我国云南省昆明以南地区发生了一次7级地震。

同时播发的是“中共中央对地震灾区的慰问电”，电文共317字，全文如下：

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昆明部队并转地震灾区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广大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

一月五日，玉溪、通海、峨山、建水、华宁地区发生强烈地震，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受很大损失。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极为关怀，向遭受地震受害的广大革命群众致以亲切的慰问。

中央相信，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灾区广大革命群众，一定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云南省和当地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在国家的支援下，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重建家园。

中央号召，灾区的共产党员、广大革命群众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团结起来，向自然受害进行斗争。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中共中央 一九七〇年一月七日

紧接着，1月8日的《云南日报》发表社论：《亲切的关怀，巨大的鼓舞》称：

昆明以南地区一月五日凌晨发生强烈地震。在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在全国、全省的支援下，灾区各地人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1]原昆明师范中文系老师，其时调“谭甫仁办公室”任秘书。

正在胜利地开展着一场大规模的抗震救灾斗争。我们满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向灾区的阶级兄弟和战斗在抗灾斗争第一线的同志们致以最亲切的慰问！向热情支持我省灾区的兄弟省市革命人民，致以无产阶级革命的崇高敬礼！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对我省灾区人民和抗震救灾斗争极为关怀。特别是党中央一月七日的慰问电，极大地鼓舞了正在奋勇抗灾的全体军民。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的恩情大，河深海深不如毛主席的恩情深。毛主席是我们最亲最亲的亲人！毛主席永远同我们心连心！想起毛主席，浑身是力量！想起毛主席，前进有方向！让我们以坚决战胜灾害的实际行动，回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大关怀。让我们千遍万遍地纵情欢呼：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这次强烈地震所造成的损失是严重的。摆在灾区人民面前的暂时困难很大。但是，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在共产党与红军面前，一切普通所谓困难是不存在的，最严重的困难也能克服。”我们是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英雄人民，我们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斗锻炼的革命大军。我们坚信，有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领导，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引，有革命委员会的直接指挥，有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援，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任何人间困难都能克服。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响应党中央的伟大号召，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团结起来，向自然灾害进行斗争，把困难踩在脚下，奋发图强，自力更生，重建家园。

接下来几天便陆续有了灾区的、套话连篇的新闻消息：

千条万条，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灾区革命人民的头脑是第一条。地震发生后，省革命委员会派专车专人，星夜兼程把红色宝书《毛主席语录》、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章和毛主席画像送到了灾区群众手中。还组织了许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深入灾区宣传毛泽东思想，帮助灾区群众开展抗震救灾工作。灾区广大革命群众看到毛主席画像，得到红宝书和毛主席像章，迎来了省革委会派来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激动得热泪盈眶，千遍万遍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还配有照片，多是解放军和灾民一起学习毛泽东语录之类，解说词依旧套话连篇：

图1：“千支持，万支持，送去毛泽东想是最大的支持。战斗在抗震救灾第一线的昆明部队广大指员给受灾地区群众送去最强大的武器，用毛泽东思想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热情向群众宣传党中央的慰问电。”

图2：“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对我省灾区人民的亲切关怀，已经成为灾区广大群众战胜地震灾害的巨大动力。革命人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重建家园。整个受灾地区呈现一派蓬蓬勃勃的景象。”

图3：“力量的源泉，胜利的保障。受灾地区广大群众从毛主席语录中汲取无穷无尽的力量，争取更大的胜利。”

也有比较具体的内容，但还是套话挂帅：

在地震发生后，党中央立即向我省受灾地区的人民发来了慰问电，传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亲切关怀。灾区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开动各种宣传机器，最迅速地把党中央的慰问电传达给每个贫下中农和广大群众。连日来，慰问电传到峨山、通海、建水县时，灾区人民感动得热泪盈眶，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感谢毛主席和党中央对灾区人民的关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一月七日下午七点钟，建水县革委会接到党中央的慰问电以后，马上召开了电话会议，向全县十六个区级革委会、抗灾指挥组作了传达，并立即大量翻印，以最快的速度送到广大群众手中。玉溪县马桥公社贫下中农读了中央慰问电后，激动地说“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峨山县被抢救出来的受灾群众，无比激动地说：“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的恩情大。永远不忘毛主席的恩情，永远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城关大队七十二岁的贫农老大妈说：“毛主席他老人家是我们最亲最亲的亲人”。小街公社一个被砸伤了手的小孩听到北京亲人来到的消息，激动得连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建水县馆驿公社革委会主任，首届“学代会”代表

金桂仙同志^[1]，在县里听到地震消息以后，马上赶回公社，召集干部学习毛主席的伟大教导：“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鼓舞公社干部分头到第一线指挥群众进行战斗。金家庄公社的社员们揣着毛主席的红宝书，不顾个人安危，奋勇抗震救灾。民兵营长马庆昌、公社会计杨凤金等干部，受了轻伤不住院，连夜赶回公社，宣传毛泽东思想，带领群众抗灾……这个公社在县革委和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帮助下，开办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组织社员认真学习毛主席“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作自力更生”的伟大教导，学习党中央的慰问信，并广泛开展忆苦思甜活动……广大贫下中农说：“地震震不掉我们贫下中农忠于毛主席的红心，困难不倒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的钢铁意志，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自力更生，迅速恢复生产。”^[2]

翻来覆去地高呼“毛主席万岁！”翻来覆去地学习中共中央慰问信，翻来覆去地表忠心、忆苦思甜。人们完全读不出大地震后灾难现场的悲苦挣扎、奔走呼号，似乎是在政治训练营按部就班地进行的一场励志游戏。

官方新闻稿虚伪的掩饰丝毫无助于缓解地震现场的惨烈：许多自然村夷为平地，有的村子只剩下两三名妇孺，幸存者在极度惊恐和精神创痛中苟延残喘。与通海毗邻的峨山县城正好逢五赶集。四日下午，从四面八方汇集来、准备第二天赶集的人，将两层楼的大旅社挤得爆满，过道上还加了地铺。地震将这幢填满了山民的楼房夷为平地，当即砸死200余人。建水县曲溪中学168间校舍全部震毁。1月4日正是周日，留校师生147人，是夜54人被压死，31人重伤、58人轻伤。昆明工学院“五七干校”正好位于震中地带：峨山县小海洽大队小街村。是夜，在此下放劳动，接受“再教育”的160余教职员工安卧在一幢空置的仓库内，除正在室外厕所方便和坐夜车拉货在外的3人外，全部被倒塌的墙体和巨大的屋架訇然掩埋，90多名大学教师整整齐齐地砸死床上，住其他地方的40多名老师也

[1] 金桂仙正是以其在地震中的出色表现，再次当选第二次全省“学代会”代表，次年6月，中共云南省委第二届委员会成立，年仅18岁的金成为25常委之一。

[2] 《云南日报》1970年1月12日“特稿”。

全部罹难。其中，木工易荣一家老少5口，无一人幸免——死亡总数138人，其余伤残。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杨凯这样叙述了他的灾区经历：地震当天下午七点（第一次强震发生已过去19个小时！），电台领导突然通知他马上出发。如今最多两小时的车程那天整整走了一夜。卡车直接把他们送到了震中地区的建水县曲江镇，安顿在部队营区一钢结构的大棚里。领导交代的任务是，重点了解灾民如何在废墟中寻找毛主席的著作一类动人事迹。几十年后，他所记起的地震印象有两件事：一是到达目的地，眼目所见，完全一片废墟，老太太在废墟上望天长哭，十分凄惨；二是同行的新华社记者王某，睡眠时有磨牙习惯，死寂废墟之夜磨牙声尤其响亮，把大家全惊醒了。第二天一早哨兵就来专门查问，说晚上听见大棚里有锯片的扎扎声，是否有阶级敌人来锯大棚的钢柱？

下面是亲历者、昆明工学院革委会负责人之一、参加紧急抢救的汪首学回忆^[1]：

当卡车进入峨山县地震灾区时，我看到一个个村庄被夷为平地，几乎看不见几个人。偶尔看见一两个人拄着根棍子，在废墟里寻找着什么……路上不时遇到断裂的道路、震裂的桥梁。道路两边的一些田地、山坡，或下陷成一个大洞、或隆起成一个大土堆、或滑坡成一摊废土阻挡道路，有些地段的河道也被阻塞……汽车好不容易行完一百余公里的路程，终于到达昆明工学院五七干校。此时，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片废墟：由于小街村的住房几乎都是砖柱承重的砖墙结构或土墙结构及木架结构的房屋，一夜之间基本全部倒塌。连一两米高的开水锅炉，也被地震移动了十多米。一头老水牛被压死在墙边。附近山林里，听不见一只鸟叫。整个村子，死气沉沉，看不到几个活动的人……

我组织抢险救灾人员首先抢救一切发出呼救声的生存者。被挖出的受伤者，直接送往事先联系好的昆明军区43医院治疗；遇难者的尸体，则一排排地暂时停放在山坡上……

五、六级的余震接二连三发生，入睡在山脚下都会感到地面在波动，像漂在大海的水面上一样。但是，救援者

[1] 汪首学：《犛牛红卫兵》页35-36页。引文略有删减。

们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一个个用受伤的双手，吃力地抬着，抬着一具具布满尘埃的尸体，奋力抢救尚有一线希望的生存者。

当物理教研室的刘丹群被从倒塌的房屋门口的双人床下救出时，他竟然十分清醒，脖子上还挂着一个防毒面具。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地震时他以为是苏修发动了毒气战争、使用了原子弹，便赶快戴上自己早就准备好的防毒面具往外跑。可刚跑到门口抱住双人床腿时，房门便倒下来，人也出不去了。大家被他弄得哭笑不得。

虽然听说全国各地派出了大批医护人员和解放军指战员赶赴灾区救灾。可是，昆明工学院五七干校的受灾现场，始终不见一个外来的救护人员。由昆明军区副参谋长和省革委副主任黄兆其（注：黄当时兼任昆明工学院革委会主任）组成的省抗震救灾指挥部，也未派任何人到过昆明工学院五七干校的受灾现场，大概是受灾的面积太大，他们实在是分不开身的缘由吧。

1月7日，传来了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慰问电，号召灾区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

引文至此，笔者需要补充：中央为这次救灾提出上述“16字方针”，灾区人民立即“自觉”加码：“对于地震，我们就是不怕。一千个不怕！一万个不怕！”他们主动提出“三不要”的“响亮口号”：“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对于支援，他们的态度是：“千支持，万支持，送来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支持。”当地政府明确宣布：除了“红宝书”和慰问信，其他一律不收！

整村整村的人压在残垣断壁、土块瓦砾下等待救援，可是一卡车接一卡车运来的，竟然是《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慰问信和毛泽东像章！《云南日报》如是叙述：“……广大贫下中农说，地震震不掉我们贫下中农忠于毛主席的红心。”“震发后，省革命委员会派人，星夜兼程把红色宝书《毛主席语录》、金光闪闪的毛主席画像送到了灾区群众手中”。^[1]

还需要补充的是：中央及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发出了一道非常不近人情的指令：“地震死亡者的尸体一律就地分男女集体掩埋”。参加救灾的昆明工学院学生刘光华回忆，所谓就地掩埋，具体办

[1]《云南日报》1970年1月10日头版消息。

法是：用推土机推出宽两米左右的深沟，像加工沙丁鱼罐头一样，把尸体（不分大人和小孩）一具紧挨一具码放整齐，推埋几十厘米的土，上面又码第二排，然后再推土，再第三层，直到高度接近地面，最后用推土机推土盖上完事，刘光华对笔者介绍说：这样的做法让当地农民很难接受，于是有的当地农家便偷偷收尸，单独埋掉……

昆明工学院大张旗鼓将138具尸体运回学校，还计划举行追悼会“寄托哀思”，显然成了“对抗中央指示”的顶风作案之举。谭甫仁立即发出质问：“你们那些知识分子的命难道比贫下中农的命要金贵吗？贫下中农可以就地掩埋，你们那些知识分子的尸体为什么就不能就地掩埋”

汪首学如是说：

作为代表工学院革委会的现场领导，我对死者有情、对死者家属有情，如果把138位死者集体埋在这里，我于心不忍啊！我想到向上级请示，但结果可想而知。任何上级也承担不起对抗中央指示的责任……我横下一条心，“管他指令不指令”，不召开任何会议也不请示任何上级，由我一个人冒着政治风险，大不了被撤职、开除党籍、坐牢，但影响不了学院其他领导人。于是，我武断地决定：“把138具尸体全部运回学校，天垮下来我扛着！”^[1]

1月7日，在夜幕掩盖下，昆明工学院借来10余辆大卡车，成功将138具尸体从灾区“偷运”了回来。省抗震救灾指挥部负责人、昆明军区军代表在黄兆其陪同下，将汪首学破口大骂一顿：

你好大的胆子！谁给你的权力？竟敢不按中央和省抗震救灾指挥部的命令办……还要开什么追悼大会！你考虑过政治影响没有？作为一个造反派头头，不用我上纲上线，我只问你：偷运尸体，你到底和谁对着干？矛头究竟指向谁？你究竟要造谁的反：中共中央？国务院？还是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2]

[1] 汪首学，页35-36页。

[2] 同上，页38-39，引文略有删减。

汪首学承认：“我清楚‘好汉不吃眼前亏’和‘胳膊拧不过大腿’的道理。我只得认错，通知办公室，将我亲手书写的‘昆明工学院治丧委员会讣告’撕掉，取消召开追悼大会。”^[1]

[1] 同上。

第四章 暗 流

4.1. 九次全会

谭甫仁的几板斧砍得干脆利落，云南省革委会果然天下太平，成功实现了“五统一”“一元化”，特别“团结”“胜利”的“九大”召开以来，全省处处“忠字化”，一派“争取更大胜利”的热闹气氛。毛泽东有云：“人民大众开心之日，正是反动分子难受之时”。但是，当时云南难受的“反动分子”实在太多，整整一大派群众：云南人口2300万，几乎占一半！其中必然有勇敢分子要站出来抗争。

这个最先公开站出来的“反动分子”就是3年前云南大学最先起事的造反派头头、性格倔强的方向东。在云南大学党史校史研究室编印的《历史的见证——云大文革史料选编》上，读者可以看到方被人踩在脚下、扯着头发挨批斗的照片，但他没有认输。“九大”胜利闭会不久，他便开始了抗辩。几十年后，具体情况已无案可查，只知道在1969年8月底举行的省革委九次全会上，周兴讲话指名道姓对方进行了大张挞伐，说：“省革委对方向东早有觉察。谭政委在5月就对他进行了帮助”^[1]。谭甫仁的“帮助”显然没有奏效，6月，方向东便带领省革委两个炮派委员：李湘和杨安棋，及云大两位同学周秀茵、苏耀忠第一次上北京告状，“替受害人民申冤”：

控告谭甫仁搞“划线站队”的罪行。在昆明军区副司

[1] 云南省革委第九次全会（1969年8月27日至9月1日）上周兴的总结发言。

令员陈康夫人郭青帮助下，见到了周总理的秘书高振甫。据说“周总理看了云南划线站队材料和干部群众游街的照片后，心情十分沉重，派出4名“记者”到云南省调查云南划线站队问题，参加了省革委第九次全会。^[1]

事实上，对谭甫仁发起挑战的，不光是方向东这个刺头儿，前面已经述及，麻烦的是军方阵营内部：54军也在“划线站队”问题上反了水。

这儿需要探讨的是：54军为何反水？为何偏偏在“九大”之后反水？笔者曾试图向留滇的54军旧人面询，可惜他们或作古，或失联。为了在历史中找到逻辑性，便于叙述此后的事件，笔者不妨对个中缘由做如下推测：首先，军队内部山头林立，彼此发生认识和立场的分歧几乎是一普遍现象。其次，昆明军区原班底基本上系二野山头（指13、14军。同属于二野的15军入滇不久即领命入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2]）。文革时期林彪位居副统帅之尊，四野一家独大，54军调防来滇，本身便有“四野系”高层故意“掺沙子”之意。54军原军长韦统泰来滇不久即提为昆明军区副司令，政委蓝亦农提为昆明军区副政委，副政委雷远高提为云南省军区政委，副军长董占林提为重建的11军军长，即是证明。另，笔者在昆明军区调研组工作期间，在圈内各种场合多有听闻“要把昆明军区整顿成让林副主席放心的军区”“昆明军区不整顿好，林副主席睡不着觉”云云，此类说法，亦非空穴来风。第三，既然要整顿昆明军区，54军的政治态度必然需与原军区的山西系实行切割，在社会上不能继续支八而当转向支炮。最后，按官场惯例，凡地方高官晋京，都有找老上司、老熟人拉关系、摸政治行情之惯例。蓝亦农诸人作为“九大”代表上京，理当有此类“走动”之举。那么，已进入中国政治高层的四野系高官要乘机面授机宜，也就顺理成章，故而便有了“九大”后54军转向之举。54军系四野嫡系，两年后“913”事发，四野系随之大裁筋斗，54军留在云南任职省军区政委雷远高和十一军军长董占林被北京点名为林彪安插在云南的“钉子”^[3]，八派欢欣不置，1974年的云南

[1] 刘兴育，页386。

[2] 1950年3月，隶属二野四兵团指挥的15军，留下第43师组建云南省军区和昭通军分区。次月，即开拔赴朝。其时军长为秦基伟，政委为谷景生。

[3] 1972年7月，中央正式点名云南4人为林彪安插的“钉子”，分别是蔡顺礼、雷远高、马吉三和董占林。

“批林批孔”大戏，八派以此破题，大反炮派“右倾翻案”闹得一时风生水起，亦可证明上述判断。

总而言之，腹心肘腋发出了杂音，谭甫仁大刀阔斧的平西之政不再顺水顺风了。谭本刚愎固执之人，对方向东之流的“翻案”不得不马上采取行动。1969年8月27日，省革委召开第九次全体会议，会议正式号召全省掀起公开批判的高潮，称“方向东是搞右倾翻案的总代表”“右倾分裂的头面人物”“彭德怀、海瑞式的人物”云云。甚至提出口号“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阎红彦、赵健民，打倒方向东”。

关于这次云南文革史上的重要会议，官方文档介绍如下：

全会认为，从当前云南省特别是昆明地区的情况来看，在革命队伍内部各种错误倾向和错误思想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右倾分裂主义思潮”。全会指责右倾分裂主义的代表人物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搞反动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妄图破坏革命团结、分裂革命委员会、分裂人民解放军、分裂革命群众，把云南大好形势搞乱；指责他们破坏按系统、按行业、按部门、按单位的革命大联合，破坏革命委员会的一元化领导，非法另立山头，重拉队伍。这一“批判”的背景是：谭甫仁在云南大搞“划线站队”，被判为“站错队”、受压挨整的一派群众组织头头不服气，认为省革委是“一派掌权”“一碗水没有端平”，就重拉队伍，发表声明、讲话，大鸣不平，要求申冤^[1]

据笔者参会听传达的记录作补充和印证。这次会议结束时，周兴做总结发言，摘要如下：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抓紧革命大批判，批判右倾分裂主义思潮，进一步贯彻九大精神，争取更大的胜利。通过大批判，达到五个统一。会上，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批判了方向东同志搞右倾分裂主义，认识到思想领域内阶级斗争的长期性，敲起了警钟，对犯折中主义错误的同志有所提高，增强了团结，对会后形势的发展有推动。下面谈四个问题：

[1]《当代云南大事纪实》1969年卷。

1. 关于这场斗争的实质

方向东的言行，反映了这场思潮，反映了思想领域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方向东的活动是有准备、有计划的。今年4月，他就派人四处了解搞反复的经验，用实用主义的手法，散布小道消息。他伸手到昆明、各专县，对省市革委会摸底排队，煽动委员为落实政策而斗争，为云南人民申冤，在斗争中求解放，不能在沉默中死亡。六月下旬，方向东串联了两个省革委委员和云大二人，五人到北京上访。七月准备，八月串联，九月大干。以云大为基础搞两套黑班底。8月1日，贴出七条声明。8月28日，在省市革委会上做一长篇发言，九点建议，把右倾翻案的纲领抛了出来，斗争表面化，推到新的高峰。省革委对方向东早有觉察。谭政委在5月就对他进行了帮助。

思潮的出现是新形势下的必然反映。适应了阶级敌人的需要，适应了帝修反侵略的需要。把云南搞乱，为赵健民翻案。

林副主席说：“九大”划了一条线，划了新面貌的一条线。“九大”以后不能再乱，再乱就是乱了自己。云南不能再乱，可方向东说，其他地方可以乱，为何云南不能乱？可见，方向东是为了破坏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方向东有一句要害话：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云南的历史是中央“红九条”^[1]定了的。阎、赵是刘少奇的代理人，方的建议对此就是只字不提，不提大好形势，攻击我们以反军乱军、以赵健民划线……方向东从北京回来，说赵健民未定案。

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巩固政权。省革委是毛主席、党中央批准成立的，方向东却说是资产阶级政府，要斗争到底，充分暴露了他的这个思潮是反动的。

当然，目前方向东的问题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次会上有的同志起来揭发了，很好。方向东十分顽固，而且反攻。我们希望他不要再滑下去。

2. 省革委成立以来的大方向

一年来，按红九条，粉碎了阶级敌人抢权阴谋，成立了基层革委会。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斗、批、改”，开

[1] 指中央关于成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展了革命大批判、“清队”……敌人企图“一顶二拖三胜利”，在这种情况下，省革委召开了七次全会，分清了大是大非。七次全会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及时的。工宣队开进大专院校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打破了一统天下。极个别不愿意接受的知识分子进行了领导与反领导、占领与反占领的斗争。云大就是这样。去年云大出现了殴打工宣队的事件。

“九大”以后的大好形势：1.毛泽东思想大普及；2.斗批改蓬勃发展；3.政策更加落实，团结更加坚强。4.抓革命促生产。

总结经验教训：要深刻认清当前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新特点、新动向，狠抓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在政治思想战线上打进攻仗。1.维护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领导，维护革委会的一元化领导，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指导下实现“五个统一”；2.学会“一分为二”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去观察形势，分析问题，改造自己；3.要“斗私批修”，不断加强世界观的改造，继续革命，彻底革命。

周兴把话讲得很全面、很透了，因此谭甫仁的讲话就相对简单，笔者只记了几条提纲：

- 1.右倾分裂主义思潮必须批判；
- 2.谈几点经验教训：
 - (1)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步步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 (2)必须用毛泽东思想看待形势；
 - (3)必须破私立公，加强世界观的改造；
 - (4)要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加强无产阶级的组织纪律性；
 - (5)革命大批判。

《云南日报》及省广播电台亦对“批方”运动予以指导配合，各地工厂、农村、机关、学校更是轰轰烈烈声讨“右倾翻案风”，《云南日报》还连续发表了相关的社论和文章，称：

个别单位的几个头面人物，刮起一股右倾分裂主义妖风，否定我省大好形势，把矛头对准革命委员会……搞右

倾分裂活动的几个头面人物，自命为当今的海瑞，别有用心地说什么“要为云南受害人民申冤”，“要把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社论号召各族人民立即行动起来，彻底批判右倾分裂主义^[1]。署名文章进一步强调，这些头面人物是“要把云南搞乱”，他们进行右倾分裂活动的要害是“翻案”，和他们的斗争是“一场保卫红色政权同颠覆红色政权的斗争”^[2]

方被批斗后交一个排的持枪解放军和几十名工纠队员关押看守，隔离审查，方“绝食抗议”，并干脆与同学兼“战友”周秀茵在审查批判中举行了结婚仪式。次年5月，方、周二人被下放易门铜矿矿山当矿工“监督劳动改造三年”。

九次全会掀起的“批判右倾翻案”运动在全省进展并不平衡，滇西地区由54军支左的专县，普遍消极应付。九次全会会期两周，于9月10日结束——这个时间点很特别：苏联在中国北部边境陈兵百万，准备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云南“批‘方’”运动正酣，对谭甫仁“一边站”政策进行消极抵制的54军，于1969年10月初紧急奉命调赴河南安阳，拱卫京师。许多迹象说明，54军作为云南的集团性政治力量，虽然在整体政策方面和谭甫仁保持了一致，但至少在两派问题、“划线站队”问题上，他们是个“刹车手”。如今刹车手离去，谭甫仁的战车可以更加顺畅地高歌猛进。

作为近距离接触谭甫仁的秘书班子工作人员，笔者有必要替谭说句公道话：云南的事情发展到后来，谭确实已经感到了“一派倒”政策造成的某种被动甚至危机，并确实想加以纠正，笔者以如下亲历说明：

“谭办”二号笔杆曲弦（一号是从北京带来的贴身大秘甫汉^[3]），军区政治部教育科长，出身书香门第，乃父系著名的生物学家曲仲湘。大陆鼎革前夕，曲毕业于河南大学，遂随共产党猎猎军旗南下了边疆。曲虽身披戎装，仍一典型书生。“谭办”工作会上，曲弦

[1] 《云南日报》8月31日社论《彻底批判右倾分裂主义》。

[2] 《云南日报》9月9日署名“红战旗”文章《剥开右倾分裂主义者的画皮——评几个头面人物的“声明”“讲话”及其它》。

[3] 谭甫仁从北京来滇赴任，带了两个贴身大秘，一为王克学，任昆明军区党办主任，负责照看军内事宜；二为甫汉，任昆明军区调研组（即外间人称“谭办”者）主任，负责照看地方事宜。

每读一篇《人民日报》社论或听一则中央精神传达，总喜欢一个人在巨大的地毯上不停转着圈儿低回散步，接着便蹦出一串奇思妙想。在我这“小毛桃”眼中，那些社论全是些无关紧要的套话空话，一扫而过可也，曲科长却绝不放过，任何一则社论到他手里皆成经典，必得从中读出藏于纸后、常人无法领悟的奥秘。曲性格平和，不苟言笑，偶然发起怒来也会雷霆万钧——这符合他的身份：在人民解放军这个以劳动大众为主的群体之中，知识分子不能不夹着尾巴做人；而他的突然震怒，也完全因为书生耿介，按派性分，曲弦属于老八，路线正确，他有资格发怒。

谭将军每要做什么大会演讲了，任务总由甫汉安排下来，再由曲弦具体布置。中国官场——从伟大领袖到各层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事情总是如此：他们的意图像天机一般高深难测，像打哑谜。打哑谜的好处是永远占据主动：事情成了，属于伟大战略部署；事情栽了，责任可推与他人代为受过。运筹这类事体，谭将军的水平当然与毛泽东远不在一个档次上，但久入鱼肆，少不了也沾个满身荤腥，学些表面皮毛，即如对甫汉这样的心腹铁杆，谭的真实意图想必也滴水不漏，只是要发表演讲了，他就告诉甫汉，说你们起草一篇讲稿吧！至于写什么？怎么写？他不着一字。甫汉不敢深问，于是原样布置下来，也不着一字。曲弦深谙政治秘籍，接过招来，甫汉不具体说明，他也绝不深问。写什么？胡乱找一篇社论抄呗，交上去，你总得有个说法。“咱们先给个靶子让他打，让他批，”曲私下向我们面授机宜，“他总得漏出点想法，咱就继续猜！总能把他的心思摸出来！”

曲氏战法屡试不爽。近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发现了一个规律性的东西：某次开会，谭在我们的草稿某处批一句：“要注意克服资产阶级派性”——秘书们就知道了，这回是想要敲打敲打八派，于是马上搜集八派存在的“问题”，列出“资产阶级派性”若干表现形式、几大危害、几大克服派性之必要、如何克服……等等；下一次，谭在文稿某处批一句：“要警惕右倾翻案倾向”，我们马上明白：这次是要收拾“老炮”了，于是马上来个革命形势之如何大好，右倾翻案之如何影响安定团结，危害如何如何，必须怎样怎样……总而言之，秘书们明确感受到谭甫仁已不是完全“一边倒”，而总在两派之间走钢丝。

可以设想，如果谭甫仁继续执政云南，不排除他会慢慢学乖，甚至最后修成正果，让两派都皆大欢喜。可惜没有时间了，死神已张开双臂，悄悄等待他的到来。

4. 2. 庐山闹剧的云南声部

伟大的七十年代开局之年，对谭甫仁可谓大不吉。春天未到，通海地震便传来凶信，秋季上庐山，又让他闹了个“政治笑话”。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召开的庐山会议，是文革的一个重要拐点——虽然云南老百姓甚至高官当时都蒙在鼓里，直到26年后，1996年云南官方编印《当代云南大事纪实》，还是花了足够篇幅照葫芦画瓢地记载：“会上，林彪一伙发动突然袭击，不顾毛泽东多次反对，坚持设国家主席的主张，并以歌颂毛泽东为幌子，大讲‘天才’问题，他们按密谋的口径，分别在小组会上发言，宣读由陈伯达选编、林彪审定的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关于天才的几段语录，煽风点火，起哄呼应，制造了一场混乱。毛泽东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批判了陈伯达在全会所散布的一些谬论并责令他检讨。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提出‘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不要上号称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会议开展了对陈伯达的批判，挫败了林彪一伙夺取最高权力的阴谋，会后，中共中央决定首先在党的领导机关开展‘批陈整风’运动。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并印发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一文，要求各单位由主要负责同志亲自传达陈伯达反党的问题，组织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文件。”

作为云南边地文革历史的书写者，笔者以为有必要对官方“打哑谜”样式的表述，尽可能记录一点真实的故事加以诠释：

按照原计划，庐山会议是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进行的准备会议，此前，中央发了一个“53号文件”——据笔者工作笔记记录，云南正式启动此项工作的时间是1970年7月25日，是日，由“核办”秘书长、具体负责项目实施的李德俊正式向修宪专门班子进行布置。李德俊，北京人，大学学生，后参加中共随部队南下云南。他个子修长，戎装笔挺，高高鼻梁上还架一副金丝眼镜，极有派头，如果上电影饰演颇具教养的国民党高官，完全不必试妆。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很有磁性，每次省委高官开会，周兴都要确信不疑地宣布说：

德俊同志，你普通话说得好。文件就你念！

李秘书长布置的工作内容摘录如下：

做好这项工作，首先要认真学习贯彻53号文件。按照文件精神，修宪要强调三突出：一、突出毛主席、毛泽东思想的绝对领导地位；二、突出无产阶级专政；三、突出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次是七亿人民修改宪法。这是古今中外都没有的大事。最重要的，是进行一次毛主席关于国家学说的普及教育。

时间紧迫，第一阶段，组织群众讨论54年宪法，8月5日、15日分两次将情况搜集整理报中央；第二阶段，9月2日、9月10日，报两次。任务：一是修改宪法的意见；二是人大代表人选的意见；这件事由周兴同志挂帅，（目前周正住院），具体工作由我、张克（当时负责组织部门工作的地方老干部）、甫汉负责；

几项工作：通过讨论修宪和人选，进行一次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活动。

大量的组织工作，怎么及时准确地反集中起来，下面请示的问题，能回答的回答。宣传组织工作抓好。

随时和中央加强联系。

群众的意见要及时加以分析，分类整理交核心小组讨论。保证及时。点面结合。主要抓昆明和玉溪。抓几个点：重机厂、汽配厂、昆明纺织厂，还有郊区生产大队。

人大代表名额具体由张克负责。如果都通过了好办。就怕推翻，哪怕推翻一个都麻烦。如无大问题，能做工作可以通过的，一定要做工作；有重大问题实在不行的，换下来，最好在本地补。女的补女，男的补男，贫农换贫农，党员换党员，非党换非党。实在不行，可在大片内考虑。更换名额怎么办？本单位讨论的人数、同意人数、不同意人数、理由，都要说清楚。

这次举国一致的活动虽然纯属走过场，无非通过劳民伤财的行动来再一次向全国百姓灌输毛泽东思想，但所有基层的会议和讨论绝对都一本正经，煞有其事。工作笔记记录：

为了提高众人的阶级觉悟，除了让老工人××（九大代表）向众人宣讲，还专门从云溪公社请来一位叫龚蓝英的贫农老太太向工人师傅们忆苦思甜……通过新旧社会对比，革命群众的觉悟大大提高；克服了少数人“我们老百姓不懂什么根本大法，毛主席党中央制定好了，我们照

办就得了”的“糊涂思想”。广大工人表示说：“过去国民党要百姓休谈国事，现在共产党大张旗鼓要我们工人阶级讨论国家大事；过去国民党说什么立宪，实际是愚弄群众；现在共产党叫大家参加修宪，真是相信我们群众呀！毛主席、林副统帅真是伟大呀！”

文革中犯错误的人更是感动非常。他们说，让他们参加修宪，“这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给我们最高的政治待遇啊！”表示通过这次活动，一定要好好交代问题，悔过自新，重新做人。

还有“资本家”。通过“修宪”讨论，他们痛彻表示，说“只有认真接受改造，挖掉资产阶级思想，我们才能真正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呀！”（笔者按：据当时实地了解，这些工厂所谓的“资本家”，从1956年所谓“公私合营”开始，实际上早成了真正的最底层工人师傅。这些“资本家”，解放前有的就那么一台、两台车床、牛头刨，根本不值几文钱，共产党给他们的所谓“定息”，每个月也就块把钱：可惜就这块把钱“定息”，让他们头上“资本家”帽子成了套在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想用也甩不掉。好些人求爹爹告奶奶向领导表示自动放弃这份“剥削钱”，领导就是不予恩准——道理很简单，这个“定息”没人拿，岂不就没“资本家”了吗？没有资本家，阶级斗争还找谁搞？没有阶级斗争，咱党怎么能进行领导？反正花钱不多，养几个人随时拿来斗斗蛮好玩的——毛泽东不是最讲究“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嘛！）总而言之：

通过反复学习文件、忆苦思甜、大会宣讲、小会讨论，广大群众革命觉悟大大提高，他们纷纷表示要进一步抓革命，促生产，超额完成生产任务，报答党对人民的信任。

至于对于宪法的修改意见，群众主意倒是越来越多，比如：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领导地位一定得写进总纲；关于所有制，建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只允许社会主义公有制及全民所有制，其他什么集体所有制、农民土地所有权，统统不要”；“旧宪法”里写过的“和平过度”“三大政策”这些肯定也不能要；另外，文化大革命、继续革命、打倒走资派、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也得加上；还有，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阶级兄弟在受苦受难也要写上；新宪法“一定要写上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支持世界革命，解放

全人类”“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一定要改革”，等等。

有人还提出，不要什么序言、总纲，合并一起就可以了。还有，希望宪法最好改得和九大新党章一样，越短越好，最好能让广大工农兵都能够全文背下来；还有的意见就有点离谱了，不少群众提出迁都——首都定在北京好是好，就是离云南太远了！我们边疆各族人民最想念毛主席，可是路程太远，要见到毛主席实在不容易。“强烈要求把首都迁到昆明！”让边疆各族儿女经常能见到他老人家！

庐山会议会期是8月23日至9月6日。云南省委7月底才开始奉旨准备，时间实在太仓促。基层厂矿被迫得屁滚尿流。按照上面的布置，非生产单位、部门，一切工作让路；生产部门，不管生产任务多紧，开始时每天必须班后学习1小时，接着加到2.5小时，马上又加到3小时，骨干人员晚上还得继续加班学习；生病住院的，工厂车间必须派人到病床前去组织现场学习“补课”。笔者亲自参加了昆明铁路局的修宪大会，地点是杨方凹礼堂，完全就是一个万人表态大会，发言者一个个慷慨激昂，无非控诉旧社会如何糟糕透顶，歌颂新社会如何一枝花、刘少奇如何罪该万死；文革如何之“就是好！”“就是好！”……等等。后来同样也是越来越离谱的是，要求宪法写上“打倒美帝”“打倒苏修”“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阶级兄弟”云云，这些发言除了“表达无产阶级对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朴素阶级感情”，和“修宪”完全牛头不对马嘴，全是些空话、大话、废话。

即使基层积极性如此之高，负责整理上报资料的甫汉还是叫苦不迭，坚持要求各小组“每天一报”“书面意见整理好一个单位报一个单位，整理好一章报一章……以后再不断补充完善”。听说各单位争先恐后组织贫下中农、老工人、“妈妈工”忆苦思甜，时间挨得太多，甫汉又迫不及待以谭甫仁的名义发布指示：“谭政委指示了，做好修宪，主要吃透中央文件精神。基层搞阶级教育是好的，可以提高修宪的责任感，但不要离开主题，把时间拖延了。强调结合具体章节讨论。”“为了提高学习质量和效率，可以办学习班，把非生产人员集中起来。非生产人员少的，领导班子先集中学习。”

四届人大和修宪这两件事，搞得紧锣密鼓：该发动的群众发动了，该秀的都秀了，该给中央的报告报了……最后却了无下文。直到一年后才知道，正是庐山会议，毛泽东和林彪因是否“设立国家主席”的问题翻了脸。当时，国人只知道上面发下话来，要国人大学哲学，要国人警惕政治骗子，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再

后来，正式点名陈伯达^[1]，号召众人批判之。

庐山会议结束回昆某晚，谭甫仁召集省级若干头面人物来军区八号开会。会前，八派“消息灵通人士”涂晓雷、即写“触目惊心的五月兵变”的大笔杆（当时已调来“谭办”与笔者同事），已从有关方面听闻陈伯达在庐山落马的消息，为证实消息真伪，他故意搞来一本古旧发黄的小册子《论毛泽东思想》，恶作剧地放在会议桌上。该书正是陈伯达在延安时代的名作——旧书放好，涂拉我一起躲在会议厅外的阳台上观察。室内灯火辉煌，阳台夜色迷离，与会者发现不了我们。涂向我发誓，如果陈真出了事，在庐山闹了“政治笑话”的高官们一定会对该书说三道四。

会议室隔音效果很好，我和涂在窗外什么也听不见，但见高官们拿起该书，争相传阅，议论纷纷，气氛十分热烈，不时还露以无奈苦笑：这当是大人物们犯了初级错误，受了“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欺骗之后豁然醒悟的苦笑：谭甫仁亦在其间——他是林彪爱将，要跟着陈伯达、更准确说，要跟着权倾天下的林彪四员大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庐山上对江青、张春桥等文革派起哄，应是情理中事。按照逻辑发展，随着庐山会议之后“批陈整风”运动及紧随其后“批林整风”运动在全国大张旗鼓开展，谭甫仁的政治命运吉凶难料。

只是，历史以一种意外的方式让他躲过了可能的尴尬：他被暗杀了。

[1] 197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文件《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文件称“为了教育干部，让较多同志了解这个问题，中央决定将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一文印发给你们，请你们立即向党的地区级核心小组成员、部队师级党委委员和同组党员负责干部以及中央各专案组人员宣读和传达。传达内容主要以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为准。”1970年10月18日，陈伯达被正式拘押。

第五章 “017凶杀案”

5.1. 凶案现场回放

云南省第二届“学代会”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呼应庐山会议的号召：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会议热热闹闹历时约一月会期，于1970年12月8日闭幕。谭甫仁专程从外地赶回参加闭幕式并作总结报告，8天后谭甫仁即在自己家中被枪手击毙。全身计中三弹：颈部、肩颊部和胸部各一。其中胸部一弹从心脏旁边穿透，谭血流如注，立扑于地。暗杀发生在18日凌晨4时50分左右，周恩来随即亲自安排解放军总医院外科主任鲁维善教授急飞昆参加抢救，剖腹放积血，开胸做心脏按压，终因伤势过重而无力回天，午后4时谭救治无效而歿。谭甫仁1910年生，去世正好六十岁。同时被暗杀的，还有夫人王里岩：子弹正中额头，弹洞四周的皮肤被枪口喷出的高热气体灼焦。

惯称案发时间12月17日夜^[1]，按时钟表示法，“12·17”亦可理解为零点17分，故而当时正式的文档和会议，这个案件被标称为“017案件”。

这是中共建政以来被暗杀的级别最高的官员。当是时也，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无产阶级专政严密如大网弥天，且谭甫仁身边戒备森严，能对其成功地实施暗杀，常人推测，凶案定非普通人能所为，亦绝非个别人能所为，定该是一蓄谋已久、集团

[1] 准确地说，应当是18日凌晨。此按习惯说法，仍称17日夜。

策划的阴谋大案，故而引出了许多传闻，最流行亦最荒诞无稽的版本是：林彪密令谭甫仁何日何时将飞临昆明上空的某次飞机发炮击落——谭狐疑难决，遂试着将飞机迫降再行定夺，不料飞机着陆，舷梯处款款而下的竟然是周恩来，谭大惊失色——接下来的故事于是顺理成章：林彪为灭口，遂派人将谭秘密杀掉。此外，亦有称此案系当时被谭甫仁“划线站队”整得死去活来、对谭心怀仇恨的“炮众”所为。云云。

后来事实证明，这桩大案与所谓“集团”毫不沾边，与炮众亦毫不沾边，纯系个人行为——凶手甚至还是谭甫仁执政的受益者，因为他本人就是军队内部的八派人士——但是，此事既然作为云南特殊历史背景的产物，而且成为云南边疆文革中最受全国关注、甚至轰动的事件之一，笔者不能不稍费笔墨。

“017案件”被外间传得神秘莫测，皆因该案的发生有如下几个蹊跷之处：

蹊跷之一是发案时间。谭素喜下基层视察，第二届“学代会”闭幕式前他方才匆匆返昆，讲话稿由秘书事前拟好，12月8日去会上念过，计划18日左右还要外出。凶手不早不晚，恰恰准确地把暗杀选定在17日夜。

第二是警卫条件。谭甫仁宅第“解放新村（按：即昆明军区司令部大院）^[1]32号”共布设5名警卫员，前门2人，后边3人。时值“备战、备荒”，准备和苏联打仗，一个月前的11月24日，毛泽东对北京卫戍区《关于部队进行千里战备野营拉练的总结报告》作批示，要求全军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拉练，故此，昆明军区机关将警卫谭宅的士兵抽调了3名去参加“千里野营拉练”，这样，32号院的警卫员仅仅剩下了2人。

第三，环境条件。谭甫仁宅第围墙很高，一般人，即如凶手那般身高者搭上凳子是绝不可能爬进去的，除非梯子。事实上凶手就只搭了一张条凳。这张条凳是从食堂端来的。32号对过，隔着一条院区窄路，就是军区机关的中灶食堂。还需说明的是，与32号后墙相平行，是军区司令王必成住所，也是一幢别墅，俩院背靠背，两墙间距离约莫两三米。两堵高墙之间的夹道遂被谭的警卫员在两端砌起短墙，围一长条形小天地，开成菜畦，种些葱蒜豆苗之类作

[1] 解放新村位置所在，解放前系城郊富人别墅区。解放后悉数划归驻昆部队，四面高筑围墙，将其中若干别墅整个儿圈起来，取名“解放新村”，昆明军区司令部即主要首长住宅均在此院内。

物，并从32号的厨房专开一小门与菜地相通——问题便出于此：短墙高度低于别墅本身的围墙，这就留下了隐患——凶手正是由此短墙翻进去实施了凶杀。他从中灶食堂取来凳子，站上去很容易便进入了菜地，由菜地而厨房，再由厨房进入小院主楼，直接来到二楼主卧实施犯罪。破案者理出的第一条线索：凶手身高约一米七左右，理由就是这身高加上凳子的高度，正好能方便地爬墙而入。

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疑点，如：食堂原来养了一只狗，偏偏出事前失踪了……等等。这些应该是好解释的，这类作案的环境准备，哪怕单个人也完全能够实施。而前面说到的几个条件，外人、单人就很难办到了。

问题恰恰在于，凶手正是昆明军区前保卫部分管内保的副科长，对于军区内部情况，对首长住宅的情况，包括院落结构，甚至主卧、副卧的布置等等，均了若指掌。再有，军区保卫部保存枪械的保密室没有明锁，只要知道密码，就可以开柜取枪。凶手兼过多年枪械保管员，对密码熟稔于心——所有条件他都已具备——文化大革命中发生在中国西南边陲的惊天大案，顺理成章该由一个叫王自正的军人来实施，并且得手了。

王自正，河南省内黄县武拐村人，身高1米7左右，解放战争时期入伍，从中原到大西南的进军途中，多次立功受奖，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深得组织信任，曾先后任昆明军区后勤部枪械保管员、军区首长卫队长，1970年初，王在“划线站队”中被提升为军区保卫部保卫科副科长，未到职，又提调文山军分区任保卫科长。正值“清理阶级队伍”在全中国狂歌猛进，王升职任命下达不久，昆明军区政治部即收到王家乡发来公函，称老家“清队”查出，王自正原名王东政，富农出身，1946年参与了“还乡团”枪杀该村武委会主任，后改名外逃，混入我军内部。军区政治部据此举报将王自正实行隔离审查，并关押于距离军区大院约莫一公里处的西坝原战俘管理所。一隔离就七个多月，且渺无归期。

如果就事论事，这儿至少有两个问题存疑：一、该王如果真是当年凶犯负案外逃，为何仅将名字不改得更彻底？二、就算此王自正确系彼王东政，那么，既已隔离，就理当严加监管以防不测。问题是，案破后披露的大量证据表明，监管7个月，被监管者把监管人的活动规律摸得一清二楚，而被监管人回家过夜，甚至后来行凶归来安然高卧，监管人却浑然不知。从查获的王自正的笔记本中，可以看出他对军区将他隔离审查心怀不满。笔记本这样写道：“我不能这样死；我要死，也要杀几个人。”他在笔记本中列下了好几个要杀害的人的名字，包括军区副司令员陈康、鲁瑞林、田维扬等人。权

衡之后，他又写道：“不如杀谭甫仁，影响更大，发泄心头之恨。”^[1]唯一的结论只是：当时所谓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漏洞百出。下面，我们还会看到，正是这些漏洞帮助完成了这桩蹊跷的大案拼图。

1970年冬至是12月22日，17日离这个白昼最短的日子只有5天。早上4时许的昆明还在黑暗沉睡之乡。于是，从西坝俘管所潜出的王自正神不知鬼不觉地由昆明军区司令部大院32号的短墙爬入，进小院，非常熟悉地登上小楼，敲开了谭的卧室。那一晚，谭恰恰没住自己屋里，夫人王里岩拒绝说明将军所在。凶手逼问无果，于是开枪将夫人射杀。

据看过现场的人介绍，说夫人是被逼坐在沙发上击毙的。弹洞四周的皮肤已被枪口喷出的气体灼焦。凶手显然用枪口顶紧夫人额头扣动枪机，企图让声音更小一些。

12月17日凌晨五时许的军区司令部大院死一般安静，枪声绝对惊天动地，凶手接下来准备离开了——命中注定那一晚谭甫仁要死于非命：他从旁边的屋子披衣跑出。和谭同时跑出的，还有住一楼的姨妹王文莹，排行老六，人称六姨，在云南省革委政工组教育革命领导小组供职。她急呼：“姐夫，楼上出了什么事？”谭说“不知道”，只管疾奔楼后平房寻找警卫员——如是，王文莹以目击者的身份为破案提供了第二条线索：凶手身着军大衣，戴口罩，脸略胖圆，大眼睛，身高1米7左右。

警卫员十八岁，李姓，任谭敲门山响，他竟不开门。案发后对该李进行了提审，他说他当时确实已醒，而且确实听见了枪声——正因为听见枪响，他害怕了。他说这些年没仗打，当和平兵，听见动了真家伙就吓得全身发抖，两条腿只管往一只裤筒里塞……谭甫仁的心腹秘书、军旅生涯多年的甫汉某次工余闲话，曾在办公室对笔者一众谈说：现在给首长安排警卫员也不知怎么回事，全挑些小白脸，以后真遇到要命的事情，看他们怎么办？警卫员小李正是一翩翩美少年。

小白脸是否真的吓得全身发抖、不敢开门？案发5年后，邓小平复出主政的1975年，派刚从“牛棚”解放不久的“老公安”赵苍璧^[2]来滇重审此案，时过境迁，已被关得晕晕乎乎的警卫员才如

[1]《云南“文化大革命”运动大事纪实》页270。

[2]赵苍璧，陕西清涧人，1966年至1972年受迫害，被关押。1972年至1974年任四川省革委会政治部群工组组长、政治部副主任。1974年12月至1977年3月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1977年3月至1983年4月任公安部部长、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党组书记。

实招供：美少年原来正与谭宅保姆暗行苟且之事！房门砰砰山响，他只以为有人捉奸——那年月通奸可是大事呢——小伙子不敢开门。保姆乃孀妇一个，丈夫20年前随国民党去了台湾，按当时政治划线，属于“伪军官太太”，将政治上如此“可疑”的女人安排在共产党高官身边做饭起居——此不能不为无产阶级专政之又一大漏洞也。

总之，一切条件都为凶手准备停当。窄窄的小天井里，谭甫仁无处可逃，王自正非常从容地开始了对自己的猎物进行射击。

第一波暗杀成功得手之后，王又非常从容地出了32号院，出了司令部大院，走去与司令部一路之隔的政治部大院实施第二波暗杀行动。暗杀的第二个目标是政治部保卫科长、审查他的专案组负责人陈汉中。王不识陈家确切位置，胡乱敲开一道门，一小男孩开门出来，给他指出了陈家位置：幸好陈正出差上海，躲过一劫。王自正于是悄然回西坝俘虏管理所审查地安然入睡。

凶手不知道的是，正是不成功的第二波暗杀给侦查人员提供了第三条、也是最致命的破案线索：男孩马苏红。小马时年13岁，记忆力正好，最后由他准确指认出这个王姓冷面杀手。王自正的孩子和马苏红为小时玩伴，马苏红称王自正为“王东昆他爸”。

5.2. 案破前后

昆明军区副政委周兴在出事第一时间直接报告了周恩来。周指示：“要火速组织抢救，案子很可能是内部人干的，要抓紧时间破案，重点是军区机关内部；成立专案组，由周兴负责，公安部派人协助。”据此指示，云南方面迅速组成“谭甫仁、王里岩案侦破小组”（简称“〇一七”专案组），周兴为组长，蔡顺礼、王必成为副组长，成员有司令部副参谋长赵润溥、政治部副主任刘润泉、保卫部部长景儒林、组织部部长孟肖野、党办主任王克学。

早上6点，对司令部大院实施封锁。接着在大院内进行清查工作，凡是在大院居住的人员，不论是军人还是家属，都必须交代12月16日晚至17日晨人在何处？干什么？谁能证明？荷枪实弹的军人在昆明全城巡逻，进行拉网式搜查，火车停开、机场关闭，凡身高1.7米左右、脸微胖、大眼者均定为嫌疑人，甚至直接带走。拉网式搜捕毫无建树。到第九天，12月25日，保卫部一位副部长要用枪，方才发现保卫部保密柜中的2枝五九式军用手枪、20发子弹不翼而飞，而暗杀现场搜集的弹壳，型号正好与保卫部丢失的枪弹

完全一样。该新型号手枪当时仅仅在部队列装，警察亦不可得。嫌疑人在军内被再次坐实。

小男孩马苏红这条线索再次纳入视线。马的父亲是政治部干事，在组织机关干部回忆、提供侦破线索时，他突然想起了案发当天早上曾经有人敲门让他儿子去引路找人，于是向上级作了报告。侦破人员很快找来少年详细问过情况。军区人员都登记公共户口，经查阅，很快确认王东昆的父亲叫王自正。童言无欺，凶手被罩入法网了。

接着就带小马去了俘管所。破案人员让他站上当院小楼的二楼阳台，然后通知所有被审人员到院子当心去打扫清洁。马苏红没有犹豫，很快就把王自正认了出来。侦破人员问：确实吗？他说确实。接着通知所有被审人员在操场上集合排队，让马苏红从队首向队尾走过，对所有人员再过一遍——马又一次准确无误地把凶手辨认了出来。几十年后，马对笔者说起当时情景^[1]还记忆犹新。“那一刹那王自正的眼神我至今记得清楚：恐慌、惊讶、可怕、非常绝望！好像汗水都吓出来了。”他说。

这显然又是一个蠢笨的漏洞。凶手以这样的方式被指认，注定已打草惊蛇，后来抓捕凶手时出现重大失误，就毫不足怪了。12月31日晚10时，保卫科长陈汉中和干事李伯志来到王自正的隔离室，令王自正起来“到食堂来有事”。王趁系鞋带瞬间，从被窝里摸出手枪对准来人便射出两枪，李伯志被击中腹部倒地，陈汉中被击伤右手。王自正乘机跑出，警卫班听到枪声，已将现场包围，王自正无路可逃，开枪自杀。

杀手自戕，案情真相应该水落石出了。可是，作为全社会矛盾重重的文革云南，如此难得的大案，对各派政治力量，都具有极高的利用价值，焉能就此轻易了结？一出新剧拉开了大幕。

王自正自戕后不久，专案组成员之一、军区保卫部部长景儒林，在“学习班”床头用一尼龙网兜自杀。死前留下字条称：“保卫部原来就是个烂摊子，我来保卫部后，还在继续烂下去……保卫部出了这些事，叫我怎么说得清呀！”景的真实死因，或曰案情重大而破案不力，自觉压力山大，或曰，案出保卫部内部人员而唯恐涉嫌。总之，专案组有领导据此再次提出案子远没有破，“集团作案”之说再起，其理由是：第一，一个已经关押起来的人，如此容易地返

[1] 马苏红中学毕业后考入重庆大学。毕业回昆明，曾在省建设厅任城建处长，与笔者有校友之谊。

回关押地隐蔽起来，如果没有同伙，是很难办到的。第二，凶犯在笔记中所写的那些东西，会不会是玩弄“丢车保帅”的把戏？

事情又得回到前面提到的军内政治分歧：专案组负责人蔡顺礼、王必成、刘润泉三人都是“外来户”，其中刘是54军留下来的，蔡、王均在四野执政的背景下来到昆明，三人的政治观点都与山西系的老军区基本盘相左。景儒林自杀，保卫部的人自然说不清，于是专案组改组，将54军留滇参加组建11军的副军长赵泽莽调入专案组继续开台，主题变成了“017案”与老军区山西系有何关系？

孰料得“017案件”事发不到一年，1971年9月13日林彪外逃北漠坠机身亡，文革造就的“四野”天下顷刻瓦解，专案组组长蔡顺礼^[1]被隔离审查。赵泽莽停职反省，留京审查。“017专案组”于1974年第二次改组，风向再变，这一次需要查的主题，是本案与林彪反革命集团到底有何牵连？

事情又过一年，1975年邓小平执政，另派赵苍璧牵头，组成由公安专家刘刚、徐生和枪弹痕迹专家王广沂、指纹专家赵向欣、法医赵海波参加的专案组，入驻云南。

经过前后两套专案班子长达七年的缜密侦察和反复核查，直到1978年6月才对“017案件”做出结论，认定谭甫仁夫妇被害系王自正一人所为，既没有林彪反革命集团插手，也没有同伙配合。王自正伤人后自杀，是由于专案组缺乏经验，决策失误，措施不当所致；保卫部部长景儒林的自杀则是由于自愧自疚心理过重，思想压力过大所致；对因017案件被隔离审查的人员解除审查，恢复名誉。根据军区党委的指示，017专案组为军区党委和云南省起草了结案报告，并上报中央。其要点是：一、杀害谭甫仁及其夫人王里岩的凶手是王自正；二、本案的性质属阶级报复，系反革命分子王自正个人作案；保卫部部长景儒林的自杀，系他自感责任重大，“没脸见人”而采取的极端行动，与本案无涉；三、由于凶手自杀以及事过境迁，某些细节已无法查清，也没有必要去查了；四、鉴于本案已破，侦破任务已完成，“017”专案组予以撤销。^[2]

这一结论报告经昆明军区、云南省委批准后，上报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

事情的反复折腾，除了多伤害一些无辜者外，没有获得任何

[1] 蔡顺礼原任总政治部保卫部部长。1969年6月调昆明军区任副政治委员。1971年被隔离审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恢复了名誉。

[2] 《云南“文化大革命”运动大事纪实》页272。

一点线索和新材料。直到1978年6月“017专案组”撤销为止，其结论仍然是1971年初查到的那些情况。专案组工作了八年半，其间人事几经变动，只剩下林杰全、王祖鞭以及公安部派来的两位同志，还有一位管理材料的保密员。最后一任组长是军区副司令员徐其孝。^[1]

谭甫仁死后第5天，新华社发了一则323字的短消息称，谭1970年12月18日“不幸逝世。终年六十岁。”然后完全中性地介绍：

谭甫仁同志一贯忠于毛主席，忠于党，跟随毛主席干革命，几十年如一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党对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

接着说明：

二十三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部队和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举行了追悼会，追悼谭甫仁同志。昆明部队负责人王必成同志主持追悼会，云南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周兴同志致悼词。

现在剩下的仅仅有一个技术性问题，其时“批陈整风”和“批林整风”运动尚未开始，谭甫仁在庐山上的事情尚不分明，可谓政治名分不清，因此骨灰安放哪儿便成了问题。八宝山是暂时进不去的。死者不能入土为安，骨灰只能一直放在昆明国防剧场厅堂。直到“四人帮”倒台，才由子女悄然取走。这个显赫一时的人物和他的时代，还有轰动一时的凶杀案便一起随之而去，最后回归了广东故里。

[1] 本节参考陈人康：《新中国“云南王”谭甫仁之死》、“几曾回首”博文《35年前的惊天大案：解放军中将谭甫仁被刺之迷》，（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开国中将谭甫仁被杀时 警卫员正和保姆通奸”（2008年05月16日）等。

卷四

周兴时代：破船负重泛中流

（1970年12月18日—1975年10月3日）

第一章 从“批陈”到“913”

1.1. 谭甫仁的政治遗产和周兴面临的挑战

毛泽东挑动文革大乱，计划把政治接力棒交给林彪。林彪则企图利用新获得的地位，建立自己的军内体系。在云南，则企图从根本上改变昆明军区派系的单一组分，结果不但未能遂愿，特别是心腹爱将谭甫仁搞一个“划线站队”，反而把军队和地方都搞成了“山西系”的独家天下，虽然相继安插进一大堆外来人，如王必成、如蔡顺礼、如蓝亦农、如雷远高……等等，毕竟谭甫仁强势把控，军队本土帮和外来帮的矛盾，从而位于地方前台的八、炮两个生死冤家的矛盾，不过暂时掩盖下去罢了。仇恨岩浆已经炼成，只等时机从地下喷涌而出。此外，尚待结案的“017案件”，成了双方较量的绝好题材。

新掌门人周兴，面临的就是这个社会严重失衡的局面。

周兴，江西永丰人，原名刘旧帮，后革命造反需要，始改名刘维新，再改名周兴。周1905年出生于该县恩江镇一做烟花爆竹的小手工业者之家，从县立高小毕业，正值大革命风潮激荡赣西，于是被裹挟而入，开始接触《共产主义ABC》《共产党宣言》《新青年》《向导》《唯物史观》一类极富煽动性的书刊和手抄本——接下来的经历就顺理成章了：1925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年后转为中共党员。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周秘密奔赴南昌，加入朱德领导的公安局教导团参加“八一起义”，举事失利，败走浙桂山区打游击。1930年江西苏维埃政府成立，周任肃反委员会秘书长、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自此开始了漫长的共产党特工生涯；随红

军长征到达陕北，先后任西北政治保卫局局长，任中央西北局社会部部长兼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处长，被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称为“中共的特务头子”，俨然一大人物。后来成了毛泽东大内总管的汪东兴，当时均在他手下干活。1949年，解放军攻占民国首都南京，周兴组建“金陵支队”随军渡江，解放南京后即接管了民国首都警察厅，任中共获鹿后第一任南京市公安局局长。继而随刘邓进军大西南，任中共西南局常委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部长。1954年调至中央任公安部副部长，1958年再调全国最高检副检察长主持常务工作，1961年秋，周兴调山东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开始正式接手地方工作并分管农业。1965年初周兴再调西南边陲，出任云南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云南省省长。

按照习惯说法，周兴算得正宗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了，也毫无疑问具有这类人物的性格特点和精神气质——对最高领袖和上司绝对忠诚。对自己认定的信念极端执着甚至刚愎自用，加上长期从事特工，他对事多谋而不善断，于是便不免于急躁，凡遇讨论工作，动辄发脾气骂娘，甚至大会上也动粗口，常摔出“寡妇梦鸡巴，一场空”“冷水泡鸡巴，越泡越小”之类的粗话。只是脾气发过，他便百事皆无。知道他脾气的人，不再怕他，甚至敢当面顶撞，和他争个面红耳赤。贴身大秘周永琪从解放之初便跟他一路转徙，从重庆到北京再到山东，1962年春，周兴视察微山湖水利工程，周秘书在开会讨论时意见不合，周兴便与之对吵，情急之下，周省长大骂：“你这个秘书有什么了不起，混蛋！”周秘书亦不退让，立马上书毛泽东告周兴一状。毛批示中组部副部长谭启龙找周兴谈话。谭来济南，在山东省委书记处会议上当面问周兴道：“你这个秘书的品质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周兴痛快答：“我确实对他态度不好。这个人品质上没有什么问题。我们相处多年，我了解他。他只不过有时思想偏激，和我一样的毛病。”事后周永琪偶翻档案，看到这份山东省委书记处的《会议纪要》，对周兴之责己严、待人宽的品德不禁感佩涕零^[1]，以至从一而终，1964年再跟周兴到云南，直至1975年周兴抱恨而逝。^[2]

革命造反漫长岁月所积淀而固化的观念，让周兴对毛泽东、周恩来等高层人物的忠贞不贰，对毛周的吩咐都坚决照办不误；同样，他非常自信于毛周这些顶级人物对他的信任，从而底气十足。“九大”

[1]《怀念周兴》页47。

[2] 同上。

结束，周曾到昆明煤机厂传达会议精神，一些八派工人围上去和他套近乎，奉承道：“周政委，文革中我们可是保你的啊！”周兴顿时将脸一沉，训斥道：“我是靠毛主席保！我要哪个保？”

周兴的组织原则同样极为严格。大秘周永琪说，周兴从北京调山东工作，行前同僚多有善言相劝者，说他长期搞保卫、审干、肃反，得罪人不少（包括后来成为第一夫人的江青），下了地方，为人为事务必小心谨慎为要。山东的情况无资料佐证，但到了云南，他对阎红彦亦步亦趋，从不逾矩，这是毫无疑问的，文革中阎遇难躲藏，他亦鞍前马后，寸步不离，直到阎自杀身亡。谭甫仁入主云南搞“划线站队”，全省群体性的残酷戮杀疯狂升级，周兴曾忧心忡忡，多次私下对人暗言：“不能用这种搞法。我党历史上的教训太深刻了，大革命时期打‘AB团’，把一些忠于党的事业的革命同志无辜地整死，给我党造成极大的损失；还把一大批同志关了起来，连邓、毛、古、谢（即邓小平、毛泽覃、古柏、谢维俊）都当成‘AB团’分子打”“现在的这种搞法面太宽，坏人真的有那么多吗？这很容易给真正的坏人钻空子，不符合毛主席说的绝大多数都是好人的指示，群众把群众斗得那么惨，将来还不得平反？”^[1]话虽如此说，但出于共产党的组织原则，他执行谭甫仁路线依旧亦步亦趋、毫无含糊，只是在某些力所能及的小事情上洁身自好。1969年初，八二三如日中天之时，项兆斌将八派小报上关于“死难英雄”的“事迹”编成一册厚达400页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广为传播。周兴闻之大怒，当即召见八派领袖黄兆其、刘殷农诸人斥责：“你们是要我下台吗？要打倒我，就直接喊口号！”这本书被周兴下死命令收回销毁^[2]。必须说明的是，周兴在绝对执行毛泽东指示常常遇到的麻烦，偏偏是因毛素喜打哑谜，云里雾里地引经据典出难题，周兴难以悟出其中微言大义，便不免犯迷糊了。这些，读者都将在本卷看到。

谭甫仁大刀阔斧砍得欢，周兴暗中只能无奈地慨叹：“这个屁股才难擦哩！”^[3]没承想，1970年12月17日谭甫仁宅第里的暗杀枪声，偏偏让他来擦这个难擦的屁股了。谭死了，周兴确实恳请中央另派高人来云南当一把手，但中央偏偏就是要他当^[4]。云南这个烂摊子，他只能接手了。

[1] 同上，页54。

[2] 笔者与雷强访谈。雷系云南史学学者。《风流人物》一书因各单位收缴销毁而变得极为稀缺。

[3] 《怀念周兴》页54。

[4] 同上，页148。

1.2. 烂摊子 开门红

古往今来，所有已经大权在握的政治领袖和行政官员，第一要务定然是稳定社会，其次便是发展。虽然毛泽东别出心裁，主动把已经到手的江山搅得天下大乱再来重新收拾一遍。如今乱局已治，周兴作为新任封疆大吏，其首要追求者，当然还是一个“稳”字。

首先从“017案件”入手。从案发后紧锣密鼓的侦破到那一年除夕凶手自戕，老公安周兴以为案情真相已经清楚，可结案了。这时偏偏北京给昆明军区派来了一副政委蔡顺礼。蔡原乃总政保卫部部长，他坚持认定“017”案情复杂，还需继续侦破。蔡一到昆明，就向人亮出林彪赠亲自签名本“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四处宣称“我在延安抗大学习时，经常到林副主席家去玩，林对我很热情，很关怀，和我们打成一片，一点架子都没有，还请我吃饭。”“我们到你们这里来，不是别的，就是要讲林副主席的指示。我们有个思想，就是要按林副主席的指示干。”^[1]喜欢拍马屁的王必成也跟着起哄：“总长（指黄永胜）要由11军抽干部参加‘017专案组’工作，这是总长决定的，要坚决执行。我负责这个专案，我有困难，请老董^[2]支持我一下。”难怪周兴私下酸溜溜地对人说：“人家是上头派来的”。

谭甫仁案对各派政治集团都具有极高利用价值，军方高层趁机要对云南再插一手，周兴心里明白，只好让“017案件”任“人家”继续折腾下去^[3]。

周兴面前更大的麻烦，是社会群众的两派纷争。旧乱未了，“一打三反”、清“五一六”“整党建党”运动又开始加码。云南各级大权基本都掌在八派手上，这些运动也只是“划线站队”名头换记而已。照此老路搞下去，势必将群众的敌对情绪继续加剧：对周兴的政治智慧，实为一大挑战。

作为党、政、军一把手，生产、特别吃饭问题是最为头疼的头等大事。谭甫仁只管用打仗的办法大轰大喻，扬言要拿下200亿斤粮食，于是“围海造田”，于是下令“小春来个大革命”“要从思想上改变旧的观念，废除‘小春’这个名称，改为‘夏粮’，要坚决

[1] 《林彪死党与蔡雷马董》云南省委办公厅二处编印，1974年4月24日。

[2] 指董占林，由54军留下来组作为重新建的十一军军长。54军调离时，在昆明军区留下600左右干部，因派系原因，颇受排挤。

[3] 1月14日，昆明市还专门召开“深入开展对敌斗争动员大会”，继续动员侦破“017案件”。

扩大复种面积。全省4200万亩耕地，其中二三百万亩可以搞三季或两年搞五季”“1971年小春产量要翻一番”，实际执行结果，1971年粮食产量只达到134亿斤^[1]。滇池边上辛辛苦苦围出来的3万亩烂泥地，每年还得从省财政拿出500万元补贴方能维持生产，根本就不偿失。难怪周兴在多次会议上发牢骚，悻悻道：“哪儿来200亿斤？全是寡妇梦鸡巴，一场空！”还有边疆问题、民族问题，这几年都麻烦成堆。

更现实的是一个重大的政治课题：1970年庐山会议，谭甫仁是西南大组跳得最高者。周兴刚接手云南的1971年1月26日，中央便正式印发《反党分子陈伯达罪行材料》，2月21日又发出《关于扩大传达反党分子陈伯达的通知》，此后，党政领导机关的“批陈整风^[2]运动”便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庐山会议上幸好周兴沉得住气，没有跳，其他如陈康、鲁瑞林诸人，深知周兴是个“老滑头”^[3]，全看他脸色行事，也没跳。可是，全国的清算之火会不会烧来谭甫仁身上？1971年2月19日，毛泽东对“批陈整风运动”批示：“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指令加强对陈伯达牵连的人和事进行揭发批判。如果火真烧到谭甫仁并延及与谭相关的人，对云南政治大局的影响，很难说不是一个灾难。

出人意料的是，“批陈整风”给上任伊始的周兴来了个重大利好。情况如下：

3月4日至4月6日，昆明军区和云南省革委召开“批陈整风”大会，周兴在会上做长篇发言，该发言于4月10日整理后上报中央“请审阅。有错误的地方，请批评指示。”次月15日，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开幕，一到北京，周恩来就告诉周兴：你在云南批陈整风的一篇讲话，毛主席看后认为较好，亲自批转给这次中央“批陈整风”会议参阅。过了几天，邓颖超同志又找到周兴，说“你这篇讲话总的不错”^[4]。汇报会结束，中共中央果然将周兴的发言

[1] 《当代云南大事纪要》1970年卷。

[2] 对外公开报道则称“批修整风”。

[3] “老滑头”是云南高层对周兴私下的“昵称”，皆因凡遇大事，周都先通过老上司、老关系，如汪东兴、康生等人“摸行情”，然后以定行止。庐山会议周兴是否找谁摸过行情，至今尚无说法。

[4] 《怀念周兴》页160。

以《中发[1971]37号》^[1]文件转发全国，作为全国性的指导文件。纵观云南党史，这可是难得的殊荣！

利好消息让周兴激动不已。四月汇报会上，周兴在西南组又做一发言，内容直指军方实权在握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提出多个问题要四人在会上做答，其问盖云：陈伯达反党乱军的言行，为什么有些竟得到你们的支持？等等。西南组会议简报摘登了周兴这个发言。

孰料周总理即便找周兴做私下谈话——据贴身大秘周永祺回忆——周兴从总理那里回来后对他说：“我这个发言不讲策略，总理语重心长地批评我，说‘你这个人话多，声音大。你要当心隔墙有耳！’周兴还给秘书解释，说我这个人不懂斗争策略，这是我的老毛病。总理最了解我，所以才严肃地批评我。那天晚上，周兴睡得很晚，把总理对他的批评一字一字地写进日记之中，作为自己的座右铭。”^[2]

其实，周兴对周恩来提示稀里糊涂的理解才是他的“老毛病”。后面我们还会看到，在复杂政治问题上，他脑子常常短路。他根本不知道周恩来说他话多、声音大、“当心隔墙有耳”，其实是要他对军方大佬问题闭嘴——周恩来实际上在暗中支持军方对文革派进行抵制。

既然周兴对庐山大戏稀里糊涂，为何其讲话稿影响巨大，甚至得毛泽东如此赏识？作为参与该文件起草的亲历者，笔者有必要稍做解释。

谭甫仁被刺，“谭办”全体转入“核办”，后又转为办公厅二处（负责政策调研），为省委起草重要文件属于本处任务。周兴这篇讲话正是由处头曲弦先生领衔起草。该讲话共四部分：一是周兴本人根据统一口径结合自身回忆对庐山会议情况做介绍；二是按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对陈伯达“抛出”的所谓“反动纲领”，即“《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进行引经据典地批判；三是揭露陈这个“长期隐藏在党内、干尽了反革命勾当的可耻的叛徒”“货真价实的老牌反革命”，其“罄竹难书”罪行；四是学习问题。讲话牵扯陈伯达“反动纲领”列举过的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著作，用典多多，如《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如《马克思致库格曼书

[1]37号文件发布于5月12日。

[2]《怀念周兴》页159-163。

信集》，如列宁写的序言、“蒲鲁东派”、《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还有毛泽东引李白《梁甫吟》古诗“杞国无事忧天倾”等等，让本处的秀才们，也让周兴狠狠地卖弄了一把。

云南省级大佬们在讨论这个上报稿时发生了争议，并非因学术问题争议，而是集中在是否要如此大揭陈伯达老底一段（毛泽东正是要通过批陈把火引向林彪），而此问题恰恰反映了云南高层的斗争：一方是周兴和鲁瑞林代表的云南本土的地方和军方势力，另一方则是王必成代表的外来军方势力。王必成称：“军委座谈会开得很好，是九届二中全会后又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会议就要按军委座谈会的办法开。”54军留滇担任省军区政委的雷远高亦随之附和：“华北会议和军委座谈会是继九届二中全会以后的重要会议，有深远的意义，必须刻苦学习，紧跟照办。”^[1]所谓“华北会议”是指1970年12月22日批判陈伯达、改组北京军区的会议。这个会恰恰被毛泽东指责为“批陈不痛不痒”，同时召开军委座谈会亦被毛泽东批评“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

周兴也有他自己的“上线”。他多次在办公厅说起，每次去北京开会，他都要拜会康生夫人曹轶欧。延安时期，康生曾是周兴的直接上司。当然还找原来他在北京工作时的老哥儿们“摸行情”。这一回，他找谁摸的行情无史可考，但他固执坚持要秘书们保留“揭老底”这一段，于是文稿斩钉截铁地宣布了陈“三大罪状”“五大谎言”。“三大罪状”一为要“夺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权，夺党的权”；二为“打着马列主义招牌，欺骗新的中央委员，企图分裂中央”；三为“同‘二月逆流’个别人合起来，恶毒反对毛主席”。五大谎言：其一，陈伯达称“现在的宪法修改草案是他斗争的结果。这真是无耻，不害羞……完全是撒谎！”其二，陈伯达称“有人反对提毛主席是天才……是故意陷害人”；其三，陈称“有人要翻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的案。这是造谣”；其四，陈称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主席，贬低毛泽东思想，是绝对办不到的。’这也是谎言”；其五，陈伯达说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要翻历史的案，也是谎言。接下来，以红卫兵句式甩出四个排比：

陈伯达不是经常吹嘘他是“老革命”吗？其实，是个“老反革命”。他出身封建官僚家庭。本人早就是国民党反共分子，当过国民党汕头市党部秘书和国民党军阀张贞部

[1]《林彪死党和蔡雷马董》。

队的少校秘书，当过何应钦办的福州军官学校政治教官。混入党内后，一九三一年被捕叛变，出卖了组织，当了可耻的叛徒，是货真价实的老牌反革命。

陈伯达不是经常吹嘘他经过几十年的革命考验吗？其实，几十年来，他紧紧追随王明、彭德怀、刘少奇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正如毛主席说的：“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剥开画皮来看，他恰恰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他背着中央文革搞坏事。”“是肖华、杨、余、傅、王、关、戚、‘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黑后台。”他“反党乱军，阴谋篡权”“大搞资产阶级派性，支一军，压一军，支一派，压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是武斗的支持者和指挥者。”“同林副主席唱对台戏”。同中央抗衡。分裂中央，达到他篡党夺权的目的。

陈伯达不是还经常吹嘘自己是“小小老百姓”吗？！其实，是个“大大野心家”。陈在华北各地乱跑乱说，到处联络人，进行反党的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招降纳叛”“连他的老婆都说他‘官口很大，想当一、二号人物。’”“小小老百姓”是假，“大大野心家”是真。”

中共自建党以来，收拾“异教徒”的办法多多，帽子爱怎么戴就怎么戴。问题是，给陈伯达定罪本该北京的事，地方党委越俎代庖，是否恰当？再说，云南高层在“批陈整风”会议问题上，意见一直有分歧，比如，有人就提出要联系实际反派性，甚至有人说“云南军内外有一股反对林副主席的逆流”等等。为此，周兴“请示过中央一位领导同志，回答是：批陈！批陈！批陈！一连说了三次”^[1]周兴故而底气十足。讨论上报稿时，他坚持将该段全文保留。

办公厅二处素以政治头脑清醒著称的主笔曲弦亦坚持保留，终得让该文稿一炮走红。

几十年后，这件事应当非常清楚了。谁都知道，自延安以来，陈伯达就鞍前马后，为“君主”前驱。毛泽东对其亦恩宠有加，而

[1] 鲁瑞林：《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见《怀念周兴》页159。文中所言中央领导，当为汪东兴。

如今庐山会议陈只不过稀里糊涂跟毛钦定的接班人林彪走近了些，事情马上大翻盘，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断然宣布：“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实在是强词夺理。毛急需有人站出来，为保护伟大领袖的光环而“仗义执言”。周兴在不知不觉间当了一回护法童子。

值得补充的是，陈伯达原系中共理论喉舌《红旗》主编，该陈既遭整肃，立马改换了姚文元重组《红旗》，于是普天下遍寻笔杆。因了那个“37号文件”，曲弦先生很快被锁定，调北京成为该杂志三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曲上京后深感高层险恶，仅仅待了两年便“赖”回了云南，再二年，“四人帮”垮台，曲被作为“钉子”收审，郁郁而终。此为题外话。

总而言之，周兴大得毛泽东欢心。政治上旗开得胜，于是对治理千疮百孔的劫后云南，信心大增，高歌猛进。

1.3. 一路纠偏

北京“批陈整风”汇报会闭幕后的5月31日，中共云南省第二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周兴代表省革委党的核心小组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党的“九大”路线指引下奋勇前进》的工作报告，充分肯定省革委成立，特别“九大”以来云南的大好形势：“学毛著”运动高涨，“斗批改”“清队”“一打三反”、整党建党、抓革命促生产、“政治边防”建设等等，均成就巨大；当然还有狠批“刘少奇一类骗子（即陈伯达之流）贩卖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货”的斗争更是成果不菲。接着选举产生了中共云南省第二届委员会：委员89名、候补委员15名；经第一次全委会选出、中央批准，周兴任第一书记，王必成任第二书记，陈康、鲁瑞林任书记，加上七林旺丹、彭贵和、刘明辉、李克忠，梁中玉、展明、郭超、黎锡福、雷远高、左奎元、朱刚、李德骏、武健、金桂仙（女）共18人为常务委员。至此，一切名正言顺，三迤天下太平。北京专程派人颁来一枚重而硕的铜质大印。机要秘书很炫耀地把拿到办公厅来给秘书们开眼：喏！发现了吧？印章故意在某处弄了个瑕疵：用来识别真伪呢！笔者在场，莫名其妙想起古代宫廷小说的情节。

毛泽东处心积虑搞了个“天下大乱”，如今虽未达到想要的乌托邦“大治”，特别一个庐山会议还让他的文革心腹张春桥一干人等险遭重创，但无论如何，现在他需要暂时的稳定（核心是党委领

导下的稳定)，再图新计。天意高渺，云南的边陲大吏虽然不懂，但抓紧实现社会稳定，以周兴为首一干老干部们都很自觉和卖力。历史上任何朝代，恢复旧秩序需要的，是理性而不是激情，是精确的社会成本计算而不是蛊惑人心的口号，是技术官僚而不是造反者，如是，18名常委中虽增列了3位群众代表：七林旺丹、彭贵和和金桂仙，其实不过代表文革成果的花瓶而已。新省委成立后，9月24日，云南省委《关于省委常委实行集体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的通知》即决定：“七林旺丹、彭贵和、金桂仙主要在基层工作，不再分管省委的具体工作”，真正算是“老师归位，小兵回营”了。三人之中，旺丹为藏族民兵英雄、彭贵和为个旧矿洞马车夫，金桂仙则因通海地震而一夜爆红——关于他们的故事，后面有专门介绍。例外的是，昆明工学院研究生、“八二三”一号头目黄兆其已经“纳新”入党，虽非常委，周兴一干大佬还是决定让他参加常委工作，究其原因，当然是黄确有水平及能力，可当“壮丁”做点实事，正面说，此举对调整控制八派掌权的局面或有好处，但非常负面的恰恰是，在云南两派情绪长期对立难解之秋，此事成了最让人诟病的话题。

且看其时云南的各种通知、文件、会议，管窥1971年边疆社会秩序全面恢复之概貌：

农业位列第一。4月28日，省革委同时发出3份相关文件：一、《关于发展农村副业生产的指示》。强调“以农为主，以副养农，综合经营”；在保证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和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笔者注：极端的文革紧缩政策开始松动了）；二、《关于发展生猪生产的决定》。强调：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积极发展集体养猪，继续鼓励社员家庭养猪。肥猪收购对社员实行“购留各半，自愿多卖，积极收购”政策（笔者注：当时云南的副食品供应，尤其肉食供应实在太紧张！）；三、《关于发展经济作物的补充规定》。一般生产队应以发展粮食生产为主，同时积极发展经济作物生产；要确保经济作物产区社员的口粮不低于邻近粮区的标准及合理的购留比例。（笔者注：不再估吃霸除地大喊“以粮为纲”了）。8月23日，又花半个月召开全省农业会议，继续落实农村各项经济政策，要求各行各业支持农业，加速农村“四化”进程，再次强调学习毛主席主持制定的人民公社“六十条”，弄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界限，划清“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和“以钱为纲，重副轻农”、合理奖励和物质刺激、正当的家庭副业和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界限（笔者注：直接退回到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力争1972年粮食产量达到166亿斤（笔者注：谭甫仁200亿斤的豪言彻底泡汤）。

7月21日-8月7日，全省基本建设会议召开，讨论设计体制改革和基建财务管理问题。

8月16-20日，昆明军区国防工业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贯彻7月全国国防工业会议精神，讨论“三线建设”，决定集中人力、物力、财力，狠抓建设项目的收尾和续建配套，加快建设进度。会议特别指出：云南“三线建设”有些新建军工项目，受“（靠）山（分）散（进）洞”错误方针的影响，布局不合理，过于分散，远离城镇和交通沿线，给生产和职工生活带来极大困难。有些企业选址连地质、水文情况都没有弄清楚就仓促定点，必须停建或停产下马，另行搬迁。

“擦屁股”的事情还有：

6月10日，云南省委批转省革委政工组《关于进一步办好中央机关‘五七’干校的报告》。报告称，省革委1968年底和1969年初举办的4所干校和1个“公、检、法”学习班，参加“搞斗批改”和参加劳动的省级机关干部8790名、工勤人员676名、知青705名、家属3582名，共13762人，整党结束后，其中4000多名干部陆续已到新单位工作，3000多名分批到农村插队。现决定将4所干校合并为一所（蒙自草坝），以后的任务是分批分期轮训省级机关在职干部。现各干校和“公、检、法”学习班以及插队干部，根据需要逐步选调分配工作。

“清队”和“一打三反”作为云南“划线站队”的恶性延伸，麻烦事更多。8月10日，省委花近一月功夫开专题工作会进行分析检查，讨论案例，研究如何加强领导，落实政策，把运动“引向深入”，提出要按政策办事，重证据，重调查研究，“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在“准”字上下功夫。对揭出来的清理对象，要抓紧查证核实，及时定案、结论、处理工作；照例也提到“清查和深挖”子虚乌有的“五一六反革命集团”。

其余的就有鸡毛蒜皮了：

8月24日，省革委转发省文化局《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工作的报告》，坚决贯彻国务院1961年3月《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要求对文革初期遭受严重破坏的文物古迹进行保护，逐步进行必要维修，“要加强与当地冶炼厂、造纸厂、供销社废品收购站的联系，共同作好文物保护工作”。8月29日省委发文，要求认真开展“群防群治”运动，尽快改变农村卫生面貌，提高广大群众的健康水平，促进生产发展。还有体育：9月5日，省革委花半个月时间召开全省体育工作会议，会上学习毛泽东有关体育工作的指示，交流全省各地群众性体育运动的经验。会议认为：“凡是有利于增强人民体质、为群

众喜闻乐见的体育项目，都应大力提倡，坚决支持”。

高校也按省革委通知恢复办学了。不考试，由各级政府机关、人民公社、部队、工厂、矿山等单位选送优秀分子当学员。3月3日《云南日报》报道：昆明工学院、昆明师范学院、昆明医学院、云南中医学院等4所大学，分别于3月、4月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停课5年的大学校园好歹活了过来。

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也开起来了。时间不短，从9月10日到10月13日。这回是贯彻4月15日至7月31日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宣教领域是文革势力控制的基本盘。毛泽东批示同意的《会议纪要》再次明确认定，称“解放后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原有教师队伍中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云南省委批转的《全省教育工作会议报告》特别强调：“要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建立三结合的教师队伍。除有计划地增加新生力量外，应特别注意对原有教师队伍坚持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有点回到文革前的味道。紧接着，11月6日省革委又发出《关于归还被占用学校校舍和教学设备的通知》，要求“凡占用学校校舍的企业和单位，都要尽快腾出归还原学校”“凡借用学校的教学仪器、物资、设备，除已消耗、损坏者外，应全部归还原学校。”

作为边疆省，这些年被搞得乱糟糟的边防问题最让新班子头疼，相关会议一年开了两回：4月18日一回，9月12日又一回。虽然名头还是“政治边防建设”，实际内容则完全是纠偏。第一次叫“座谈会”，会开之时，正逢北京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5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召见与会的周兴、王必成、陈康、鲁瑞林一千大佬，不客气地一顿克。要点盖有：云南民族众多，尤其是傣族、壮族、苗族，对东南亚影响很大，一定要认真学习、坚决贯彻民族政策，帮助他们培养民族干部，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对内对外的大国沙文主义。周恩来特别批评云南省革委把西双版纳、德宏、怒江和迪庆4个自治州撤销，分别并入相邻的思茅地区、保山地区和丽江地区“是大国沙文主义的思想”，指出云南不是13个地州市，而是17个地州市^[1]。批评中还以腾冲县卫生工作为例，指责云南省委领导作风不扎实，经不起检查，把一个队的情况说成是一个县，

[1] 德宏州建制已于1969年1月被撤销，所属县划归保山地区革委会领导；西双版纳、迪庆、怒江3个自治州建制虽仍保留，但州革委已同所属县一样，分别划归思茅和丽江地区革委会领导，州制形同虚设。

甚至说成全省的典型——这些都给正在昆明召开的“座谈会”大大加了压。5月8日，省核心小组和昆明军区党委批准发出的《座谈会纪要》，着重提到“落实党的各项政策问题”“前两年划了阶级成分的地区，未宣布的暂时不要宣布，待中央批示后再定。对“外逃”的群众，要宣传党的政策，争取他们回归，他们的房屋、粮食、财产要妥予保护，待回归时全部归还，对回归群众要热情接待，政治上不能歧视，生活上要妥善安排。”“要克服大汉族主义，尊重少数民族的习惯，不准侵犯少数民族的利益。也要教育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防止地方民族主义”。

9月，以昆明军区党委和云南省委名义召开的“政治边防工作会议”规模更大。为开好此会，周兴事前做了大量功课，带着军区副政委王砚泉专程去到思茅、保山、临沧、文山……绕边疆一线认真调研检查，故此在会上提出的课题就特别细。骂人发牢骚是周兴演讲的惯有风格，加上事情都出在已经归天的前任谭甫仁，故说起边境问题严重，胆儿放得特别开：一是对敌斗争的被动状态未根本扭转；二是执行政策“纠了右的倾向以后，又发生了‘左’的倾向”；“清队”“一打三反”打击面过宽。他说某县批斗5308人，其中属于敌我矛盾的只有20人！逼供信严重：吊打、捆绑、剃阴阳头、搞假枪毙，个别单位还逼死人——其实，逃到境外的边民要求很低，有的捎信回来，说“只要不剪我的头发，我就回来”。划成分亦如此，孟连县委按1950年政务院关于划分阶级成分的补充规定（笔者注：明确按20多年前的规定！）对某公社1969年划阶级的情况进行复查，发现新划32户地主富农，划错的就达21户！错划主要原因，有的是标准不对，只看生活、房子好坏、“工作粗糙，材料不实，甚至张冠李戴，驻公社和大队的宣传队任意确定成分，并进行批斗抄家”……此外，有的领导和汉族干部存在大汉族主义倾向，不承认民族特点，不尊重兄弟民族风俗习惯，过去办的民族学校都撤销了，过去开设的中、小学少数民族语文课也被取消……三、边疆经济工作还相当落后，据边沿26县1镇^[1]统计，1970年的粮食单产，76%的县还在300斤以下！而近年公余粮任务却增加很猛，以思茅边7县为例，1970年粮食总产5.8亿斤，比1965年减少2000万斤；征购任务1.4亿斤，比文革前的1965年增加3400万斤！周兴痛心疾首“罪己”道：存在这些问题，不能怪下面，关键是“我们昆明军区和省里的领导，对存在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工作指导

[1] 指中缅边境的畹町镇，按县级规格对待。

一般化”“批判阎红彦借口‘边疆特殊’贩卖‘阶级斗争熄灭论’……但又忽视了边疆客观存在的一些特殊性”周兴提出，在边防建设中必须坚决排除“左”右干扰，反对两种倾向：“一是以特殊性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规律，从右的方面，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一是不承认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边疆和内地的区别，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区别，样样照搬内地的做法，搞‘一刀切’，违反民族政策，从极‘左’方面干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痛心疾首指出问题之后，周兴从专业角度对加强边防建设提出非常具体的意见，从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说到落实各项政策，从恢复中小学民族语文课说到组织边疆民族代表到内地参观，从扭转对敌斗争的被动状态说到发展生产、迅速改变边疆地区经济落后面貌，从“以粮为纲，全面发展”说到“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十二字全面安排，从各行各业都要面向边疆、支援边疆，说到文艺宣传队普及样板戏，丰富边疆文化生活^[1]……洋洋万言，如果抽去文革以来流行的新提法新词汇，周兴的意见和阎红彦当年的“反毛泽东思想黑话”，几无二致。

基层就是基层。边疆地方官每天面对的事情都很具体，甚至内容都相差不多。周兴面对的，无非是文革大乱制造出的新麻烦。不管北京高调倡导的理论如何玄妙，下面的问题都得老老实实面对，这儿无所谓路线和理论，也无所谓“政治”不“政治”，作为有责任的地方官儿，你都必须去解决问题，周兴这样做了。我们在周兴身上看到了1960年代阎红彦的影子。

政治边防会议9月12日开幕，孰料得第二天，一件标志文革破产的惊天大事发生了。

1.4. “913事件”的云南折光

权谋高手毛泽东要收拾某政治对手，总喜欢先唱隔壁戏，指桑骂槐，旁敲侧击，然后慢慢逼近目标，最后一剑封喉。庐山会议后的大戏，他的目标指向非常明确：就是他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树为接班人、写进党章的“太子”林彪，但是他先是假意“批陈”，让火慢慢烧过去。陈乃一介书生，专搞理论，毛戏要唱得像模像

[1]《当代云南大事纪要》1971年卷。

样，就得从理论入题。“批陈整风”的口号正是：“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增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为此，北京还煞有介事地推荐了的马、恩、列的六本书和毛泽东的五本著作^[1]。

周兴本是读书种子，纪念文章说他天资聪明，勤奋好学，从小被人称“小小相公”^[2]，到了延安，曾被毛泽东在抗大作报告时表扬：“爱学习的模范，我看眼前就两个，一个老干部，一个小干部，老干部就是保安处处长周兴，每天一大早洗个冷水澡就到宝塔山上去看书；小干部（指年龄）就是你们抗大的政治部主任胡耀邦，每天12点房间还点着灯，做吗子事？学习呢！这种精神好吗！我看值得提倡。”^[3]如今“批陈整风”得毛泽东首肯，周兴读书自然更来了劲。那段时间，除组织云南省常委们（包括省委机关干部）集体学习，不但读五本著作六本书，还请来云南大学老古董方国瑜^[4]给常委讲云南历史沿革。周本人学习理论劲头更大。某日午，下班时间早过，笔者正值班，周夫人杨玉英来办公厅寻夫回家吃饭，笔者陪她去办公室将夫君找到，小学文化的周兴正襟危坐，兴致勃勃研读《高等数学》、达朗贝尔公式。

8月15日，中共云南省委举办省委第一期读书班开班，前来学习的部分地、局级党委正副书记和常委、党的核心小组正副组长和成员、县级领导干部、宣传干部和辅导员共184人，要求按毛泽东对高中级干部学习要求和中央关于“批修整风”，进行思想政治路线教育的部署，选读《反杜林论》和毛五篇哲学著作，从思想上，理论上分清“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什么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什么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正是这一天下午1时，毛泽东突然乘专列离开北京到南方秘密视察，一路对各路诸侯暗示、打招呼，按吴法宪事后说法就是“他这次南巡，就是在组织上和舆论上为彻底拿掉我们做准备。”^[5]谈话火色越来越猛，对林从旁敲侧

[1] 六本书指《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法蓝西内战》《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和《国家与革命》；五本毛著是《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2] 《怀念周兴》页6。

[3] 《怀念周兴》页63。

[4] 方国瑜（1903～1983年），云南大学教授、民族史学大师。文革时作为“反动学术权威”长期关“牛棚”。

[5] 《吴法宪回忆录》页860。

击到公开点名，“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分裂”“不光明正大”“阴谋诡计”……什么露骨的话都摔了出来。9月12日毛泽东回到北京的当晚，被逼到死角的林彪在妻儿簇拥之下仓皇登机，乘夜逃遁，摔死外蒙北漠。

14日一早，周恩来即用保密电话亲自向各省最高长官通报了情况。周兴也接到了同样电话，总理通报了情况后直接下令：“从现在起，昆明军区部队，还有那里的空军、海军部队，归你统一指挥，有什么情况，直接向我报告。”

周兴向省委领导转行通报的情况是这样的：

总理劈头盖脸告诉他，说：“人跑了。”

周兴问：“谁跑了？”

总理答：“就是做报告那个人。”总理的潜台词是“九大”做政治报告那个人。

周兴的政治想象力一时短路，又问：“哪个做报告的人？”

总理继续提醒：“就是你批判那个人！”

周兴想起那一年他批判的最大名人，不就陈伯达吗？

周兴稀里糊涂回答，“喔，明白了明白了。”

其实他什么也不明白。周兴放下电话，只觉一头雾水。陈伯达一介书生，和军队全不沾边，和空军更不沾边，他跑了干吗要兴师动众调兵遣将，让陆军接管机场？

把事情联系到写进党章的“接班人”、副统帅”、毛泽东的“亲密战友”，他的想象力一时还没有那么丰富。

那时云南正开着两个全省性的重要会议，一个是军区的所谓“政治边防”工作会；一个是全省教育工作会，会议结束都需要周兴发表讲话。“政治边防”会议，办公厅二处派出刘连清为周的讲话主笔；教育工作会，则派我与会调研（想不起主笔为谁了）。这件事确实给周兴出了一大难题。那年月的讲话稿，动辄就毛主席怎么怎么指示，接着又林副主席怎么怎么指示，如果真是林彪出事，且总理还亲自打了招呼，你还在讲话里唠叨林彪怎么着怎么着，不是严重政治问题吗？尤其所谓“政治边防”，这正是林彪首倡的口号，开这样的专题会议，阐述林彪指示的重要性无论如何是绕不过去的，就像讲儒家而不提孔子，讲圣经不提耶稣一样。

时间是9月15日，“政治边防”工作会周兴的讲话需要定稿了。那天他来我们办公室，先是让刘连清秘书把草稿给他审看。他左看右看，什么意见没提，最后只一本正经提醒了：

“你们引用林副主席这些语录，都校对过了吗？如果拿不稳的，就省掉吧！”

“都反复校过了！没错。”刘回答非常肯定。

周兴犹豫出门去，片刻又推门进来。“那么——”他又交代：“你们再看看稿子。要注意：引用主席语录和林副主席语录，数量和比例一定要掌握好。林副主席的数量不能超过主席啊！”

“没超过。没超过的。”办事认真的刘回答永远肯定，“我们逐条计算过了。”

“那好，那好……”周兴终于退出门外了。

我们正狐疑，周兴第三次又推门进来，直截了当宣布：“这个稿子我看行了。只是——把林副主席的语录再稍微减少一点，就这样！”刘秘和我们都一头雾水。

大约20日前后，中央钦派的机要员终于来到省委一号大院，敲响了周兴的院门。那时全国禁航，机要员是坐火车来的。周兴正重病卧床，秘书问北京来人能否代收？中央机要员说不行。北京来人遂被直接领来病床前把文件交了周兴本人。这就是9月18日发出的中共中央1971（79）号文件。文件一开头就赫然一段：

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现已查明：林彪背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极其秘密地私自调动三叉戟运输机、直升飞机各一架，开枪打伤跟随多年的警卫人员，于9月13日凌晨爬上三叉戟飞机，向外蒙、苏联方向飞去。同上飞机的，有他的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及驾驶员潘景寅、死党刘沛丰等。在三叉戟飞机越出国境以后，未见敌机阻击，中央政治局遂命令我北京部队立即对直升飞机迫降。从直升飞机上查获林彪投敌时盗窃的我党我军大批绝密文件，胶卷、录音带，并有大量外币。在直升飞机迫降后，林彪死党周宇驰、于新野打死驾驶员，两人开枪自杀，其余被我活捉。

对林彪叛党叛国事件，中央正在审查。现有的种种物证人证业已充分证明：林彪出逃的罪恶目的，是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根据确实消息，出境的三叉戟飞机已于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全部烧死，成为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

从1959年林彪任国防部长，尤其是1966年文革开始长达整整五多个年头的造神狂热中，八亿国人每天用宗教仪式恭祝毛泽东万寿无疆，同时亦恭祝副统帅林彪“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如此显

赫的准神，突然制造出只该出现在侦探小说的惊悚故事，已经不能用匪夷所思来形容了。全知全能的毛泽东必须想办法给全中国做出一个交代。周兴的命运和云南边疆的形势，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第二章 “批林整风” 在云南

2.1. 尴尬的“洗地”

林彪出逃身死，对毛泽东的打击是致命的。这尊毛神在人们心中不再全知全能，不再洞察一切，他也会犯错误，甚至眼皮子底下把林彪这个马屁精看走眼，册封为接班人。毛泽东必须迅速自我洗地，对林彪事件做出解释以保全他的神圣形象，进而继续他的文革大业；其次，他还必须对与林案“有牵连的人和事”彻底加以清理，杜绝后患；最后，从策略计，他亦不得不在政策上做出调整和修正，缓解文革大乱造成社会生活的各种矛盾、各种困难，以平息暗中涌动的民怨……为实现这些，他都不得不在权力控制方面做出暂时退让，让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旧秩序派们进行纠偏平怨操作。这些构成了1972年整个中国的社会主题。

先说洗地。1971年“913事件”发生，为了避免社会震动，到9月18日方才通过正式文件在极小范围传达，让小道消息向社会悄悄漫漫，让众人有了思想准备，便公开宣布林彪的所谓“叛国”活动是共产党内的“第十次路线斗争”，并从10月24日开始至次年6月26日，经毛泽东批准，分三批公布了《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之二）（之三）》，“供各级党委组织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批判”。其间，1971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还发出“关于印发林彪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的通知”。翌年5月20日至6月下旬，在北京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又特别公布毛泽东于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还有会议简报专门刊登消息，由周恩来证明信件真实性及江青的解释，用以证明毛泽东

“早就看出林彪‘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向国人再次宣布毛泽东永远先知先觉。

所有这些，云南都按照要求，原原本本地照章办事。边疆人多“榆木脑袋”“一根筋”公开会议和私下交流都喜欢钻牛角尖，比如：“毛主席1966年7月8日给江青写信就说林彪‘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为何‘九大’还在党章中定他当接班人？”“信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有人干脆认定毛泽东立林彪为接班人是“放长线钓大鱼”，反方则诘问：“如果林立果火箭炮打火车成功，毛主席命都丢了，还有什么大鱼好钓？”还有人比较党内路线斗争的频次，认为：九次斗争和十次斗争间隔如此之短，以后是否会越来越密？何时是个尽头？……边疆人厚道，这些年对林彪一伙极端夸张的丑陋表演早厌恶于心，故对毛很容易给予谅解。相反，《571工程纪要》里面所说的高层权斗、经济凋敝、民生艰难等内幕，如“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干部敢怒不敢言。”“农民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机关干部“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这些反而暗中引得众人共鸣，心中深然之。再相反，因为众人对林立果一伙飞扬跋扈看不惯^[1]，又宁可相信毛依然正确的说辞；还有，边境人最讲实际，道理上说不通就说不通吧，能够趁此机会让政策放松放松，抓紧改善生活便好。文革几年，大家已早烦透了，巴望解决的具体问题实在太多——周兴一干地方干部，在此问题上与百姓要求保持了一致。

2.2. 以政治批判开路的计划工作会

1972年新年伊始，从1月5到15日召开的云南省革委14次全会，首先带上帽子：“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分清什么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和政策，什么是他们一伙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和政策，什么是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什么是唯心

[1] “913”前，曾传达林立果在空军学代会上的讲话，大谈石家庄精神病院用毛泽东思想治疗精神病大见奇效，又大肆鼓吹历史上从来是战争推动了经济发展等，俨然一军国主义狂人。而空军司令吴法宪则吹捧林立果为“天才”“全才”“栋梁之才”“超群之才”“我们对他认定了，跟定了，刮十二级台风，转二十四个圈也不转向”，阿谀奉承之状可掬。

主义的先验论。”接下来就全是“讨论了1972年的主要任务，提出1972年一定要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的群众运动，树雄心、立壮志，继续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苦干实干巧干，多快好省完成和超额完成1972年国民经济计划”“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政策”之类的必须解决的具体问题。

为调整政策，恢复经济最为热闹的，是这一年的全省计划工作会。1972年全国计划工作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从1971年年底一直开到次年2月12日，近整整3个月，足见何其重要。毛泽东需要借机言说其批林之正当性，周则欲借机抓紧解放地方官僚，恢复生产。以批判林彪路线破题开路，实则是要对文革时期的极端做法进行清算。云南省由主管经济工作的省革委副主任鲁瑞林带队赴京与会。现将笔者工作笔记中鲁瑞林关于该会的传达照录几段如下：

这次会议主要批判林彪一伙的反革命罪行、修正主义路线、“571”（指所谓林彪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对国民经济的破坏。讨论了计划。交流了经验。着重讨论了六个问题：一、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问题；二、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三、统一计划、全国一盘棋的问题；四、落实政策（特别是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老工人政策等）；五、体制下放；六、正确处理农、轻、重的关系问题。重点是第一个问题。

一月十日，先念、登奎、国锋、秋里同志开了一个小型会议，动员批林，指出批林要从路线上来批。提出了“他们的根本问题是，地主阶级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林彪代表的是地主资产阶级，是没落的阶级”还传达了主席的批判：如“顶峰”，主席就说不合乎辩证法；还有“活思想”。思想都是活的。无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都是活的，哪会有死思想呢？还有“立竿见影”，从物理现象上讲是可以的，解决思想问题，怎么“立竿见影”？此外，还有说他是“空头政治”，他才不空哩。他“实得很”。（毛）还讲到，关于“大军工主义”，是不是不这样提，有什么错误就批什么错误。有的提“唯意志论”，苏修也说我们“唯意志论”，搞不好容易混淆。还是按主席提的“唯心论的先验论”。

强调要大胆使用干部。干部、知识分子、老工人，都要大胆使用。现在有的是使用了，但是让他们去卖饭票。

会议期间，总理听取了汇报，作了多次重要指示。强调在计划安排中，要更加重视农业、轻工业的发展。安排好农轻重的关系；强调要加强企业管理，要缩短基建战线。

云南省的会议是紧接全国会议结束后10天，即2月22日召开的。从上述传达可以看出，在这次经济计划会议上，政治问题，即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批判，显然是讨论经济工作必要的“务虚”前提，其余的关键词都与此紧密相连。关键词尤以落实政策一条最为抢眼：落实干部政策、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落实老工人政策……这些人政策一旦落实，那些对地方事务一窍不通却偏偏喜欢由着性子瞎干的军人和造反起来的文革派自然就得靠边了。

根据全国会议披露的情况，军人擅权最遭众人诟病的是对经济工作无知，却偏偏爱瞎指挥。比如，全国会议对江西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副政委兼江西省军区第一政委程世清做了如下揭露：

程说六十条（笔者注：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这是“大跃进”破产后，毛泽东为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于1961年主持制定的一个文件）已经过时，大搞并队，砍自留地。程还说手工业、运输、工商业都是资本主义尾巴，统统打击，把这些人赶下去，把旧房拆了，盖新城。回来无房住，南昌到处搭棚子。拆宾馆砖头。毛主席说程不学马列，不懂政策，是暴徒……

在全国会议上被点名的还有贵州李再含，说他胡言：

三年不结账（笔者注：指不搞年度核算），钱也不会跑到外国去。

这些年头云南省军方掌权，农业上最遭众人诟病的莫过于劳民伤财的“围海造田”，这件馊事随事情的始作俑者谭甫仁被刺而了断，无从追究。工业上，惹起争议的首先当数昆明市委书记、14军军长梁中玉非常荒唐地提出的“三纲”口号：“政治上以阶级斗争为纲，工业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纲”——以粮为纲当然是指“围海造田”，“以钢为纲”则是在昆明城边上凭空搞起一个一无矿山，二无能源，全开无米之炊的“昆一钢”。省里饱受诟病的，则莫过于云南汽车厂（因“11.30”武斗事件而名声大噪的原云南汽车配件厂）每年搞1000辆“昆明”牌卡车。此事本来就是从江西“程胆大”

那儿学样而来，将生产配件的骨干厂转而生产整车，从专业角度讲，设备、技术、配套，甚至工装、模具等，都需相当精心的准备和提升，可为了急于向毛泽东表忠心，作政治秀，便顾不了那多了。“大胆将军”程世清干得，云南为何干不得？于是“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领导们让工人们手敲锤打，磕磕碰碰，硬是造出了性能和外观都让世人不敢恭维的“昆明牌”汽车。单说卡车外形，据该厂“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白手起家造汽车”的“先进事迹”介绍，外观设计把“老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困扰了许久，最后豁然开朗：毛主席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不是乘坐过敞篷吉普吗？于是，大卡车外形就照敞篷吉普设计，让边疆人民看见“昆明牌”就想起毛主席他老人家！工业设计的要求、实用功能、技术标准……统统没有了，政治上只要打得响亮就成。红河州工业基础较强，也生拉活扯造了69辆“红河”大卡车——这就惹得抱怨声浪鹊起，说云南这个几乎完全靠公路运输的边疆省，本来汽车配件供应就紧张，为作政治秀，偏偏停了配件生产，硬造1000辆整车，却让2万辆汽车因缺配件而“趴了窝”等等。

前面说到1971年，省级机关的4所“五七干校”和1个“公、检、法学习班”已有4000多名干部陆续“解放”出来到新单位工作，这些重新上岗的老干部眼看烂摊子，自然成了幸灾乐祸的看客，而各行各业大权在握的军代表，成了被人看笑话揭短的对象。

1972年春云南省计划工作会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幕的。那时候，开会的军代表一身绿军装，老干部则全部套上久违的深蓝咔叽中山装，吃饭时间，餐厅里绿一桌，蓝一桌，“绿”“蓝”两营壁垒分明，会议讨论，观点则针锋相对。

周兴属有地方工作经验的老干部，但文革几年的社会经历和工作关系，便被人划归了文革派，加之谭甫仁瞎干有他的账，因此立场便尴尬而微妙。皆因接手一把手帅印后，他一直老老实实纠偏，故而贯彻北京计划会议精神时便可理直气壮了。他唯一的麻烦是，云南汽车厂正是他抓的点，而且劲头特大。笔者后来下放汽车厂当工人8年，常听师傅们怀念每年年底加班装车如同打仗，半夜里周兴还亲自端着洗脸盆到车间来，把油炸鱼从盆中一条一条夹起来送师傅嘴里。关于这1000辆汽车的争论，在计划会掀起轩然大波。

会议在连云宾馆大会议厅举行。笔者参加以胡延观为首的会议秘书组，事前向周兴汇报了代表讨论的情况、特别是对造汽车的意见。周兴在主席位一坐下便脸青面黑，道一句：“今天我当学生。你们当先生。你们谁说？我听！”吓得全场静默无声，好容易有勇敢分子发言：是财贸厅长颜竹如，他说“这些年我们云南省的经济

工作，主要就是农、轻、重的关系没有摆正，有干扰……”熟料话才开头，立即便被周兴打了回去。下面是笔者现场原始记录：

周（兴）：你是不是要说汽车冲击了计划？谭政委在的时候你们不讲。现在才讲。我看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颜：我认为应当少造。目前汽车（因缺配件）完好率太低……

周：我正在找靶子。你们一说汽车，就是两万辆（趴窝），你们搞破坏！拆台！农轻重，难道造汽车不算支农？你们是要搞社会主义？还是搞小农经济？你们不调查研究，不发动群众。对你那个财贸系统的工作，我就不满意！

接下来便成周兴的独角戏了。什么“我辛辛苦苦搞了1000辆汽车，你们就想砍掉”“你们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你颜竹如主动跳出来，好嘛！我就找你辩论。我怕什么？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风大浪我都不怕，我怕个鸡巴！我们坐到黄河边去辩论，辩论一万年，一直辩到共产主义！”……行云流水一般骂了许久，直骂到“我嗓子不行了，这辈子演不成梅兰芳了”。这时，周兴从山东带来的原烟台地委书记、现昭通地委书记李文出来圆场，把问题引到180亿斤粮食的话题：即除了1000辆汽车，周兴最关心的又一主题，接着由计委副主任赵善卿、徐南华说化肥生产。这些都是周兴感兴趣的题目，气渐渐顺了，讨论也就归于正常。

按照官方文件的表述，这次会议“联系云南实际，研究制定了1972年全省国民经济计划，要求工农业产值达到60亿元，比上年增长11.5%。其中农业总产值24亿元，增长6.7%；工业总产值36亿元，增长15%。粮食130亿斤，烤烟100万担，钢26万吨，有色金属9.31万吨，煤1100万吨。为了保证计划的顺利完成，要切实加强企业管理，把产品质量摆到第一位。会议还强调要认真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和老工人政策。省委常委李德骏就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发了言，讲到至1971年底，全省原公社以上各级领导干部27696人，已站出来和解放的25381人，占91.6%。其中，已结合或分配了工作的22589人，占已解放数的89%；地（厅）级干部424人，已站出来和解放的341人，占80.4%，其中已结合或分配了工作的254人，占已解放数的74.5%。”^[1]这次大会应该是云南人的福音。

[1]《当代云南大事纪要》1972年卷。

2.3. 边疆民族问题

云南的基层干部和军人辛辛苦苦经营了十多年，好不容易把边疆搞出一片祥和安定局面，文革一来，林彪提一个“政治边防”，黄永胜一伙跟着起哄，云南的边疆工作一下子就一无是处，变成了“和平边防”“礼貌边防”“修正主义边防”。现在提“联系实际批林”，云南当局显然非常乐意就此下功夫纠偏。本来，云南经济总量与其他省市比实在少得可怜，北京关注云南的重点，始终是边疆的稳定和安全。

笔者查阅了1972年全年的工作笔记，参与边疆民族问题的田野调查和上层会议的记录几乎占了三分之二。足见周兴当局对此事非常重视。其时，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决定军队由副政委、儒将王砚泉负责此事；地方则由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梁文英挂帅，并从省民族委员会抽调青年才俊张宝三、王大昆^[1]与省委办公厅二处秘书组成具体工作班子负责日常事务。省委和昆明军区实行联署办公并于1971年3月23日向中央呈递报告，报告肯定解放以来云南边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民族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林彪一伙则全盘否定，“提出所谓‘建设政治边防’的错误方针和‘不要怕边防跑人’等形左实右的口号、政策，一刀砍掉了我省的两个民族支队和上万人的民族工作队，否认边疆的特点，取消党的民族政策”，其目的就是“妄图搞乱边疆，破坏无产阶级专政。”报告强调：“今后应从实际出发，既要注意边疆与内地、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共同性，又要注意边疆和少数民族的特殊性，继续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积极搞好边疆民族地区的革命和建设”。报告提出当前要着重抓好八个方面的工作：一、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要继续把“批林整风”当作头等大事来抓，特别是要联系云南民族工作实际，着重揭发批判林彪一伙破坏云南边疆建设、边防斗争和民族团结的罪行；二、坚决执行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民族聚居地区应当积极创造条件，使自治州、县机关中的本民族干部逐步增加，并担任重要领导职务。西双版纳、德宏、迪庆、怒江4个自治州，在党内仍由省委委托地区党委领导，行政上直属省革委会；三、进一步加强边疆对敌斗争。边疆地区的对敌斗争十分复杂，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注意政策策略，讲究方式方法；四、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各级党委要把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

[1] 文革后张提为云南省人大副主任、王提为云南省人大秘书长。

经济放在重要位置上，从实际出发，做出规划，采取措施，动员各方面的力量，争取在三五年内作出显著成效；五、积极发展文教卫生事业。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文教卫生工作，要注意民族特点，给予特殊照顾，要办好省民族学院，恢复和办好民族师范学校、民族卫生学校；六、加强边疆民族地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各级党委要认真抓好边疆民族地区基层党组织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积极发展新党员，力争一年内每个大队都建立起党支部；七、充分发挥生产建设兵团在建设边疆中的作用，生产建设兵团在建设方针上应当把建设自己与建设边疆统一起来，为整个边疆建设和边防斗争服务；八、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各级党委要把民族任务栏入自己的重要议事日程，定期研究、检查。为了加强对边疆民族工作的领导，省委成立边疆民族工作委员会，协助省委主管边疆工作和民族工作。同日，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向各地、市、州、县委、云南省军区、各军分区、县武装部党委、驻云南部队、生产建设兵团以上党委发出了与本《报告》内容大体相同的16号文件《关于加强少数民族工作的几点意见（草案）》（联发（1972）），要求各地试行，“在试行中，应进一步进行调查研究，有什么情况、经验、意见，望及时报告我们。”

这个16号文件，成了是年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协调各地方、各部门批判林彪、落实边疆民族工作的纲领性文件。笔者跟随梁文英三次下专州进行调查，所到之处，无人不道16号文件的好处，齐称及时、必要。

梁文英，山西运城人，1930年代就读太原师范时加入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中共得天下后，历任四川西昌地委书记兼专员、云南红河州委书记。1963年外派老挝桑怒做工作组组长，直到1970年才重返昆明，这就当了省委宣传部部长。他没有文革初期两派乱滇的经历，对云南派斗超然物外。笔者跟他到少数民族地区做田野调查，深感梁虽混迹官场多年，却依旧保持学生时代的单纯正直与血气方刚，以为由他来纠偏确属适宜。这种气质也为他一年后遭遇暗算埋下伏笔^[1]。

座谈会印象最深者，是为解放后两次假理想之名进行的荒唐行径。第一次是1958年“大跃进”及大办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第二次是搞“政治边防”。后者破坏性更大。从1966年起，政府不准过傣历年；停办了西双版纳报傣文版；德宏州出版傣文景颇文的

[1] 该事件的“批林批孔”一章介绍。

《团结报》社干脆取消；不仅民族特需商品：包头布、银饰等不生产、不供应，边境一线甚至不卖手电筒，怕人夜里照路越境外逃；不卖信封信纸，怕“里通外国”；民族地区农村学解放军搞“四好”“五好”评比，穿汉装成了优先条件；楚雄彝区百姓过年过节喜跳“左脚舞”，1971年春节昙花山5000多人自发聚会跳舞，马上被宣布为“阶级斗争新动向”“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甚至生产队开会，老百姓说了民族话，也被人指为说“黑话”，搞“地方民族主义”。糟糕的事情还有，回族清真寺统统关闭，甚至动员养猪，批斗会上，竟然强逼阿訇嘴衔猪尾巴。边疆地区同一民族跨境而居，国内搞斗争，当地百姓惹不起躲得起，于是纷纷外逃。

政治整肃导致了经济大滑坡，人们生活再度走向困顿。大姚县委书记普贵忠汇报说：生产规模体制“十年九变”，群众实际早已暗中分开单干，宣传队前去做工作，群众说：“我们散都散了，你们打八道箍都箍不起来。”；沧源佤族自治县1968年实现合作化，割“资本主义尾巴”，说自留地是私有制根源、“交一颗竹篷，破一份私心”、还要“交‘公字牛’”，全县交了19000多头，结果是“大寨活，慢慢磨”“嘴上油工分多”，1969年产粮2689万斤，1970年下降到1722万斤；勐腊县的情况是：“生产水平低，生活困难。全县苗族队1958年全部外迁，到1962年返回。1967年办公社，120户每人年收入35元、粮食212斤，最低的拉龙寨，13户，60人，每人32元。没办法，就搞“明集体，暗单干”；勐腊公社景粟大队8个生产队，3户瑶族、5户傣尼族，全山区只有15亩水田，其余刀耕火种。景粟生产队集体开荒100亩，私人开200亩。队长说：“我不想当干部，是宣传队叫干的，如果允许单干，明年请你来，我煮肉煮酒给你吃。”。群众说：“我们像鹿子、马鹿躲在山上怕见人，在山上还可以自由说瑶话。我们不欺负人，是你们汉族欺负我们。”

极权社会的操盘手们，总是像莽撞而无知的园丁，他们手握权力的锯斧，一旦发现枝条斜出便乱砍一气，等到闯了祸，这又来修修补补。其实，所有物种通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和繁衍，都会找到自己的生存方式：或高伸云霄，或巨叶婆娑，或枝蔓横溢。共同和谐地享受着阳光雨露。它们需要谁来干预？中国人叫得震天价响的所谓“落实政策”，不过是荒唐园丁们将社会生态破坏之后，不得已的修修补补，只是在前面加一个冠冕堂皇的词儿。

有省委和昆明军区的牵头，又有了广大军民的积极响应，各个部门一起动员，这些年被搞得乱糟糟的边疆民族问题终于一件件得到了解决。笔记载：5月8日，组织部门就民族干部问题进行了研究。7月8日，省计委汇报，说民族工作会后，已向国务院申请并落实

了1000万补助、150吨硅钢片、200吨铝锭，25辆大卡车，50辆东方红拖拉机，25辆油罐车（后又换成25辆解放牌卡车）。8月8日，商业局，提出恢复民族贸易公司，亏损统一由省财政安排，还特别提到少数民族装饰品生产，还提到德宏地区傣族妇女镶金牙^[1]的问题。

9月29日，中共云南省委向中共中央上报了《关于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复查阶级成分试点情况的报告》。报告称：从1971年8月开始，在云南边沿一线以傣族为主的瑞丽县、勐腊县，以佤族为主的沧源县，以傈僳族为主的福贡县，以哈尼族为主的金平县，进行了全面复查阶级成分的试点，到今年7月，除金平县外，试点工作都已先后结束，打算除了已试点的5个县外，还有24个县（镇）和部分公社，力争在1973年底基本搞完。同日，中共云南省委发出《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的几点意见》，继续向边疆民族地区倾斜。生产大队主要干部一般设3人，少数特别分散的山区和边沿一线的大队可设4人。内地县生产大队主要干部一律实行半脱产，生活待遇原则上实行固定补贴工分，加少量现金补贴，参加劳动参加分配的办法，边疆县生产大队的主要干部继续实行全脱产，行政级别一般为26至28级。大牲畜坚持集体所有。允许回族社员每户饲养1至2头菜牛，藏族社员每户饲养1至2头大牲畜，社员饲养的小毛驴仍归社员所有，集体所有大牲畜，可采取集体放牧，集体关养，或集体放牧，分户关养，或个人包养的办法。

文革期间，回民受冲击最大。大理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是滇西回族最为集中的聚居地，其中大仓公社居住尤为集中。10月4日，笔者陪同梁文英部长去当地调研，看见挪作他用的清真寺已全部腾出来，地板被农民信众用洗衣粉刷洗得干干净净，墙壁和窗户上的毛泽东语录全部清除尽净，换上了《古兰经》语录：“穆圣是万圣的领袖、人神的导师。”“穆圣是爱好和平的，穆圣是反对战争的”“穆圣是提倡劳动禁止剥削的。”“学，从摇篮到坟墓”……

但是，有一个麻烦是云南省委无法解决的：基督教问题。从19世纪末，西方传教士就陆续来到云南边疆地区，向滇西边境和滇中乌蒙山等地区尚处于人类童年期的景颇、傈僳族、苗族、彝族等民族传递西方文明，包括送医送药、创造文字、开展教育、宣传基督教义。景颇族朋生生产队，至今保留着100年前美国卫理公会为景

[1] 傣族风俗，将女性镶金牙作为美和富有的标志。

颇族创造文字的纪念碑。禄劝县撒营盘镇撒老坞山上，1904年由澳大利亚年轻人张尔昌（汉名）创建的“西南神学院”和他的墓园至今为当地彝民景仰之地。文革开始前的1965年，毛泽东对全国第14次公安会议作出重要批示：“天主教和反动会道门是帝国主义派到中国的两支反革命别动队”。^[1]于是，云南的基督教遂被彻底剿灭，西南神学院仅存的学生、禄劝县基督教牧师李某被逮捕，直到1978年始得放出。

基于这种背景，“批林”就“落实”不到这个问题，基督教民族地区反而继续遭受严酷打压。下面是一次汇报会笔记摘录：

10月6日，楚雄州汇报山区工作会议。

宗教问题，这几年泛滥，有两个原因：1.对原来的教牧人员实行统战教育，情况还好。文革批判刘少奇路线，打击了这些人，于是敌人又把他们拉过去；2.清队、一打三反打击了一大信教群众，逼、供、信，群众反感，公开宣布信教，“我不学文件，就要做礼拜”“你们说我们信上帝不好，但我们总不打人。”一些抓了人的家庭，大家还凑钱送给家属。

禄劝中平公社。14100人，苗、彝、汉、傈僳、傣五种民族。以彝、汉为主。整党期间发现德莫井大队宗教活动。说“党员不当可以，宗教不信不行”。“四清”运动对12个神职人员（其中5个是队干部）进行了批判，形成了对立情绪。文革中神职人员的家属子女起来批判“四清”积极分子。一直对立到现在。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都抬不起头。干部能力弱，阶级斗争不敢抓。

武定县苗族1880户，10633人，信教生产队110个，占70%；1880个正式教徒，其中（1968年以来）新发展975人；32个大队，72个生产队干部319人、党员12人、团员16人、教师10人任长老。

田心公社发富大队小石桥生产队。苗族7户，44人，3岁以上的全部入教。队长、会计、民兵排长都是宗教骨干。开会就唱赞美诗。7户斗了6户。搞逼、供、信。后来全部和宣传队对立。宣传队问生产队长：“信教还是信共产党，只能信一样”他说：“信宗教”。宣布抓起来，群众说：要

[1]该语录笔者在省委工作时多有听到传达，但因档案不开放，找不到准确原文。

抓把我们都抓起来。逮捕一批长老，又封一批新长老。宣传队走，大家起哄。

县上送像章、语录本、收音机，都被退了回来。

生产差，一年7、8个月得吃国家粮。他们找政府要吃的，干部说：“去找上帝吧！为什么没有粮就找我们了？”

批林批不起来，反说林彪是好人。

茶甸公社10个大队，有苗、彝、汉、傣。文革初期对宗教势力打击下，情况好一些，落实政策后又开始活动。有一文革初回乡的高中毕业生马相庭，25岁，在武定中学读书时就搞宗教活动，写信到在部队当兵的苗族同学，要其信教。回乡后继续宣传，发展教徒。特别是生活困难和文化落后的地方，用苗文进行活动。已判15年徒刑。马判后群众有所觉悟。通过批判，积极发展新党员，16个队，原来8个队有党员，现在有12个。

9个苗族队，3个是教牧人员和虔诚教徒掌权，领导生产又领导信教。

供销社工作人员陈开文20多岁，已信教两年，成了传教人员。公开在门口写标语：一条是生命之路，一条是灭亡之路，一条是宽广的路，一条是狭窄的路，一条下地狱，一条上天堂。人保组亲自前去解决问题，吓唬说，再搞就抓你走。群众说：来抓我吧。都争着接受考验。

和平、中村公社信仰基督教。中村搞大的活动（100人以上的）已经有多次。新封教牧人员10多个。两年发展教徒83人（总共1000多苗族教徒）。教牧人员20多岁的占一半。四所民办中学，有一所教师是传道员，有三所是虔诚教徒。上课教基督教，唱赞美诗。

说不能批林。得罪人要下地狱。今年虫灾严重，造谣说2000年末日审判。今年收庄稼，明年就收入了。不敢去种庄稼。信教好上天。

宗教活动嚣张。此地是撒普山总堂的一个分堂。每个队都有教会，有长老。晋城公社古柏大队大庆生产队，17户，99人。全部信教。牧师王志明被抓前又封了一个长老张有喜。王的三个儿子四处活动。王1953年作为宗教上层人员，到北京见了毛主席。

关于上述笔记中提到解放初上京晋见过毛泽东的王志明，必须多说几句。王志明，云南武定县高桥镇下长冲村人。苗族。1896年

出生，10岁那年，澳大利亚教士郭秀峰来此传教，后来王即行皈依，38岁成为当地土著苗族自己的牧师，还被选为撒普山苗族总堂会长，主持滇北六族总堂联合会。事情的变化是从1950年开始的。新的国家政权虽承诺公民享有信仰自由，但远山教民的联合会事实上均被解散，再后来，全中国的基督教活动都被禁止，教会转入地下。1969年，全体国人欢庆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那一年。某日，王正为一基督徒施洗，突然被捕。1973年执行枪决。行刑时为阻止他祷告，士兵用刺刀将其舌头绞碎，满嘴沥血。

30年后，泰晤士河畔闻名世界的千年古寺——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中译名“西敏寺”）将王志明作为“二十世纪十大圣徒”之一，在古寺西墙前立柱塑像纪念，让他和享誉世界的美国著名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等9位殉难者一道，永远接受全球朝觐者的景仰。

王志明殉难3年后的1976年，毛泽东去世，文革破产，中国天地翻覆，毛1965年的指示不再管用，云南少数民族崇信基督教地区的政策终得落实。笔者亲眼看见，山民们自己凑钱凑粮出工修教堂、自办宣传队，处处讲教义，村村寨寨，风起云涌。

2.4. 林彪的“钉子”与周兴的两难

在云南省委兢兢业业落实边疆民族政策之时，全国其他省市都在轰轰烈烈清查“与林彪牵连的人和事”。据黄力民《1971-1976年处置林彪事件述略》^[1]统计，1973年十大之前，清查定为“上贼船”者，一种说法是军级以上涉案者近千人，其他人员则以十万计，成都军区司令梁兴初、新疆军区司令龙书金、广州军区副司令邱国光、福州军区政委周赤萍、浙江省委第一书记南萍纷纷落马。“913事件”一年时间过去了，昆明军区还冷冷清清，一个“死党”也没揪出来。云南就老一套，从“清队”到清“五一六”，从“批陈整风”到“批林整风”，一联系实际就把“死老虎”：“叛徒”赵健民、张力雄、“内奸朱家璧”、HLF、LL这些“支炮”干将揪出来炒炒“冷饭”。

事实上，按当时的政治标准，云南并非没有林系人马。恰恰相反，对于云南这块以山西系为主的二野山林，林彪四野系权倾天下之际是一直不放心的，从而不断从北京和外地调人来昆明军区

[1] 网文，见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3006.html>

“掺沙子”。前面说到那位在“017案件”与周兴拧着来的蔡顺礼是一个，54军虽调来云南不到一年又开拔，但却留下了600多干部，其中韦统泰提了昆明军区副司令、蓝亦农提了昆明军区副政委、雷远高提了云南省军区政委等等。重新组建11军，54军留下的董占林提了军长。1969年底因与许世友搞不来、调来昆明军区代司令的王必成，虽非林系人马，但善察言观色，紧跟上司动作快，也于1971年林彪事发前夕的6月13日，正式任命为司令员。这些人不是最值得“联系”的对象吗？

1974年，云南省委办公厅二处正式编印了一个“供批判用”的材料摘编《林彪死党与蔡雷马董》，算是一个官方的可信资料了。从中可以看出，掺入昆明军区的这些外系人马跟林彪及黄永胜一伙是够紧密的。“批陈整风”毛拼命将火往林彪身上引，云南这些外来势力偏偏在大会小会反复歌颂“林副主席既能打仗，又能建军”“林副主席也是一个天才，是历史上罕见的一个伟人，是三大助手中最光辉的助手，可以和马恩列斯并列的导师和领袖。我们中国有了林副主席，什么样的战争都能应付。”自诩“我们是林副主席的嫡系部队，出将领，出人才，出中央委员。”^[1]重新组建的11军军长董占林说得更直白：“要把11军搞成林副主席指挥起来得心应手的部队。在11军只能讲11军的话，谁同11军不一条心就给我滚蛋”（昆明军区部队）打仗不行，作风不好，（战士）浑身发臭，头发长得像土匪。”^[2]

本土军方（以下简称本土方）和外来军方（以下简称外来方）的政治矛盾集中体现在对云南文革两派群众的认识上，具体还是所谓“划线站队”问题。外来方坚持认为“划线站队”问题太多，一直以派性严重为由向对方发难：“中央军委首长的指示，集中到一点，就是林副主席指出的云南没有走上九大轨道。这句话讲得高，全部概括了，这是云南问题的实质。大道理管小道理。一切都逃不脱这句话。”甚至矛头直指云南最高层：“云南派性的根子在军区党委，主要是周（兴）、鲁（瑞林）。（云南）资产阶级派性在思想上、组织上形成了体系。”“我们这里派性反不下去，请黄总长赶快派工作组来。”“云南的宗派要用原子弹来轰”^[3]等等。

王必成本非四野系，可来云南偏偏和外来方搅一起，对林彪心

[1] 雷远高1971年3月在批陈整风会议上的发言。见《林彪死党与蔡雷马董》。

[2] 董占林1970年5月的一次讲话。

[3] 雷远高批发的省军区批陈整风简报第26期。

腹黄永胜诸人更是亦步亦趋，称“中央军委首长的指示和批评，必须坚决拥护，坚决紧跟照办。紧跟就是胜利，慢跟就要掉队，不跟就要迷失方向。”对54军的人则吹捧有加：“好！好！好！54军来的占绝对优势，54军是个好部队，能打仗，作风好，希望你们坚持发扬，把11军建设好。”关于划线站队，他与54军派也完全保持一致：“云南的情况我原来不了解。这次中央交了底。搞派性排队，说我们云南派性还比较突出，中央知道，其他省也知道，说云南派性很严重，说我们思想作风上各个方面还没有走上‘九大’的轨道，希望大家要做大事来抓。”“云南省军队的问题是严重的。首先表现在他们个别领导同志的派性确实严重。”^[1]

昆明军区的本土方对这些“鸠占鹊巢”的言行早就心怀不满，这次“批林整风”谁不想乘机“联系实际”将他们狠狠收拾一番？问题是此等大事，昆明军区的第一政委周兴偏偏不表态。其原因，笔者盖以为有三：

其一，周兴为云南一把手，王必成为二把手。周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解释，说毛泽东给他打过招呼，要他和王搞好关系。故而不敢轻易动作，害怕乱了大局。某次去北京开会归来，聊及许世友曾问他：“王必成那小子到昆明为难你没有？告诉我，我收拾他！”周兴只淡淡一笑答：“我不与他一般见识”。

其二，文革初王必成与顶头上司许世友因工作问题翻脸，以至于许对其终身侧目。调昆明后想必变得聪明油滑，专爱抱上司大腿。笔者在“谭办”亲历足可证明此说：谭甫仁在世时，凡王要讲话，秘书尹升高拟好文稿，他从来不看，说：“去请甫（汉）秘书看看，他看了，我照念！”甫汉乃谭甫仁贴身大秘，谭离世后，王立即转而讨好周兴贴身大秘周永琪，甚至在省委常委会上当着众高官吹捧周秘同时蛮不讲理臭骂甫汉，骂得甫汉离开会场即大哭一场——此举曾引起省委秘书们公愤，有人甚至扬言“罢工”^[2]。

其三，最让周兴感觉两难的是，云南因“划线站队”造成的两派裂痕一直让他十分困扰，总想弥合而不可得，加之他本人有“八派干部”的身份，要解决这个问题总难免遭遇内部掣肘，而炮派人士一直告状不断，引得北京多次提醒周兴，要他抓紧两派解决。面对如此局面，周兴无非两种选择：或“联系实际”批林，收拾以“批

[1] 《林彪死党与蔡雷马董》。

[2] 1972年4月省委常委会讨论关于学习“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给中央的报告（由甫汉领衔拟稿，笔者参与撰写），稿未读完，甫汉即遭王破口大骂，甫离场后即大哭。

派性”（在云南，批派性系批八派的代名词）为旗帜的王必成及54军派系所代表的外来派。而这样一来，亟待解决的“划线站队”的后遗症势必再起新痛。或不“联系实际”，不揪几个“死党”，这样搞，对中央又无法交差。周兴面临两难，只能拖一天算一天。再说，他需要做的事情，如边疆问题、民族问题多着呢。

中央实在等不及了。9月初，中央政治局开会，对云南工作直接下达3条指示：

一、云南省、昆明军区批陈、批林有成绩，但是批林联系实际不够，对同林彪反党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没有抓紧弄清。所以，你们的批林落后了，现在抓还不迟。

二、你们在批林中有阻力，有干扰，排除干扰不力。你们自己不要去干扰。

三、要加强边防对敌斗争，要提高警惕，千万不可麻痹大意。

关于“与林彪有牵连的人”，中央直接点了名，共4个：蔡顺礼（昆明军区副政委）、雷远高（云南省军区政委）、马杰三（空军昆明指挥所政委）和董占林（陆军第11军军长）。上述4人“在十次路线斗争中都站在林彪反革命一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是“林彪反党集团安在云南的钉子”。其中蔡顺礼已由中央在北京进行隔离审查；雷远高、马杰三由云南方面进行专案审查；董占林的问题已报告中央，正在审查中。

如此重要的指示自然不敢怠慢，省委立即召集各地委书记进行传达——官吏对这次紧急传达会未做记载。笔者工作笔记记录，9月8日跟随梁文英下滇西调研，第一夜住楚雄，州委书记余活力前来看望，得知省委已通知余书记立即赴昆参加“地书会议”，内容不详。10月6日我们返回楚雄，余活力又来看望，方才告知蔡、雷、马、董4人出事。官吏记载的仅仅是：1972年12月11日，“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召开扩大会议，联系云南省和昆明军区实际，清查同林彪反党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会上周兴传达了中央政治局9月份的指示”，“会议对蔡、雷、马、董的‘错误’进行了揭发批判，会议一直开到1973年1月29日。”^[1]时间正好50天，俗称“50天会议”。

可以推断的，一是为此次会议的准备工作时间拖得很长，足以证明周兴为此很费周章；二是军方本土派的火力，显然多是直冲“蔡、马、雷、董”背后的王必成而来。会后，王必成立马多了一个政治绰号：“钉子头”。

[1]《当代云南大事纪要》1973年卷。

可以证明此推断的是，会议期间的1973年1月4日，纪登奎向周兴电话传达了经毛泽东批准的中央政治局对云南问题的四条指示：一、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最近关于开展批林整风运动“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的指示；二、云南这次会议，应当集中解决蔡顺礼、雷远高、马杰三、董占林的问题。揭发材料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加以核实。对这4个人，也应根据其问题的性质和坦白交代的态度，在政策上加以区别。要注意从政治、思想上展开批判，摆事实，讲道理，提高到会同志的路线斗争觉悟；三、对于受了林彪反党集团影响以及跟着蔡、雷、马、董在不同程度上犯了错误的同志，要遵照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四、王必成同志愿意做自我批评的态度是好的，他的问题宜在省委常委和军区党委常委内以整风的方式解决。^[1]政治局这四条指示，在扩大会议上做了传达——对4颗“钉子”和1颗“钉子头”的追杀，刚刚开始又明显降温了。

中央对周兴稳定云南局面的思路给予了充分理解，边疆需要整顿的事情实在太多，北京同意周兴按自己的思路干下去。

2.5. 新干部

从1971年“批陈整风”到1972年“批林整风”，云南这只被文革搞得严重失衡的破船颠簸前行，周兴的政治经验、行事作风和威望、资历，成了举足轻重的压舱石。接下来，随着官方社群组织工（会）、青（共青团）、妇（联）重新组建，新老干部陆续就位，社会秩序的恢复日益显现。

1973年5月4日，共青团云南省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昆明召开。省委第一书记周兴和第二书记王必成分别在开幕式和闭幕式讲话，共青团云南省第五届委员会金桂仙当选团省委书记，副书记分别为张翠芬（女）、章世祖、赵敦志（白族）、牛宪发、晚小惠（女、傣族）。回族小姑娘金桂仙因为两件事脱颖而出，一是在家乡号召回民养猪，二是在通海地震表现突出，与派性无关。副书记张翠芬原为玉溪刘总旗大队社员。张新婚初嫁，勤俭持家，每顿做饭，暗中都抓一把米私匿他处，时逢伟大领袖号召“备战备荒”，她日积月累为夫家藏得“战备粮”若干，先进事迹被《云南日报》来了个头

[1]《当代云南大事纪要》1972年卷。

条，于是提干升官，修成正果。排名第三的章世祖属于正宗派头，著名军工企业300号的老八，帅哥一个。其余几人或八或炮，皆籍籍无名，要以派性挑刺，可说没有多少缝隙可钻。大会在胜利堂召开，周兴全程参会。昆明10中一个名叫万莉的小女孩向大哥哥大姐姐献花献词，稚声嫩气，可爱之极；以长诗《刘殷农你在哪里？》享誉春城的话剧小生邓耀泽朗诵新作《青春似火》，依旧梯格长诗，赢得满堂喝彩。周兴感慨万端：“今天我也变年轻了！”

6月21日，省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接着召开。还是周兴、王必成分别致开幕词、闭幕词。选举产生的云南省总工会第四届委员会，由彭贵和为主任，副主任为郝振杰、徐学惠（女）、杨正华、刘志宏、沙惠珍（女）、赵学全。表面看来，主任彭贵和乃矿山马车夫，虽属老八，但贵为“九大”候补中委，资格无人可比。只是彭文化太低，扫盲班学员，实际管事的郝振杰乃因西南局撤销、刚从成都调来的老干部，与两派不染。其余有八（徐学惠）有炮（杨正华），这样的班子两派都能接受。

8月15日，云南省第三次妇女代表大会在昆明召开。周兴致开幕词、闭幕则由八炮双方均有争议同时又都可接受的老红军、省革委副主任刘明辉讲话。会上选出云南省第三届妇联，主任为包亚芳，副主任分别为高美琼（哈尼族）、李秀英、段宝珍、杨顺贤（白族），金琼英、关肃霜（满族京剧名旦）、刘琳。包亚芳系1965年由无锡分配来东川的中学教师，铁八；而昆纺女工段宝珍则为炮派代表，且贵为省革委副主任。二人足以平衡。

通观上述情况，可以认定：1.王必成还能稳稳当当地在云南舞台站位——这是大局，说明云南没有因为中央点名蔡、雷、马、董的事情引发震荡；2.被文革冲垮的各种机构逐渐恢复，两派群众组织的头面人物均得到稳妥安排；3.毛泽东想通过文革“吐故纳新”，培养接班人，上述新干部应当说基本符合要求。云南的工作没有因为林彪的“折腾”而停步。周兴用心良苦。

还应介绍两个比上述新人高一层次的新干部，他们与云南文革派斗虽毫无关系，但后来对云南的影响却不可忽视：一为七林旺丹，一为朱克家。

七林旺丹，云南迪庆东旺人，身材魁梧，典型藏族汉子。1957年初，康巴藏区上层叛乱，战火蔓延迪庆。县委派县长率领工作队进驻东旺，遭叛匪集结千人实施包围，切断电话线及水源。工作队遂派七林旺丹及另一藏人叫扎史翁博者乘夜突围送信。不料途中旺丹遭扎史翁博暗算枪击，子弹击中右手及腹部，肠子流出来。旺丹忍受剧痛顽强爬行，终得完成任务，被誉为“雪山雄鹰”。中央军

委授予“全国民兵英雄”称号。只是群山阻隔，此后旺丹一直于雪域深处默默无闻。

没承想文革闹腾，一个偶然原因让七林旺丹一举成名：表征文革伟大胜利的九大召开，临近中委选举了，周恩来亲临云南小组会商。周说云南推荐的人选中，一是缺少青年干部，二是缺少少数民族干部。云南是多民族省份，培养和提拔民族干部十分重要。众人当场推出几个均不合适，省军区司令黎锡福忽有灵感来袭，提出七林旺丹，并介绍民族（藏）、年龄（34岁）、所立功勋、职务（公社武装部长）等等。周总理闻之大喜，道：“我记得这个旺丹，在民兵英模大会上，我给他发过奖（一支半自动步枪）。选这个人好。”其时，旺丹连九大代表都不是，云南省“核办”立即派两部汽车昼夜兼程去迪庆雪乡将旺丹接到昆明，直奔巫家坝机场，中央派来专机已在跑道专候。于是，在九届候补中央委员的名单上，旺丹因“七”字姓氏笔画最少而名列榜首。1971年云南省委成立，他理所当然成了省委常委。

久居藏区，旺丹初来昆明，汉语结巴，文件更不能顺畅阅读，但学习十分刻苦。每次常委会凝神静听，不发表意见，也不随意扈从。尤其次年从中央党校学习回来，他不仅能用藏味普通话顺畅表达自己的意见，也不再依赖秘书读文件，藏民的倔强个性表现出来。1973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周总理来到人民大会堂西南厅参加座谈，突然问周兴为何撤销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和迪庆藏族自治州？周兴回答说，是谭甫仁主持云南工作时决定的，也没有听到有什么意见。周总理严肃道：七林旺丹同志就有意见！这件事就是他向中央反映的。周兴十分尴尬，转头问旺丹：‘怎么没听你讲过？’旺丹反问周兴：‘你们问过我吗？对这件事我一直有意见，省委不重视，我只能向中央反映。’事后周兴感慨说：旺丹同志将了我一军，搞得我好狼狈。但他是对的！”“1975年周总理来昆明，向周兴问及将来云南接班人选，周兴郑重推荐七林旺丹。周总理表示赞许，还表扬周兴能择人。”^[1]中央工作会议后3个月，中共中央正式通知：七林旺丹和刘明辉、李克忠、郭超一道，任命为省委副书记。

一个远山藏民，忽然间和老家伙平起平坐，不免遭某些老官员腹议。刘明辉，老红军，素因生活考究而在文革中挨了不少大字报。如今听说七林旺丹公然住进了一号大院24号别墅，于是大有意见。

[1] 胡延观：《总赖东君主》（未刊稿）。

24号人称“阎王殿”，系阎红彦来滇前专门定制赶修，可谓极尽豪华。阎死后长期闲置，先是供省“核办”办公之用，新省委成立后人去楼空，再度闲置。如今一下子调来众多省级新干部：彭贵和、七林旺丹、金桂仙、张翠芬、包亚芳，还有后来的朱克家，户口都在专县，好几个还是光棍单身，无房可住，便全塞进去分房安顿。这就惹了风波，某次省委常委上京开会，刘明辉私下找纪登奎告一状，说七林旺丹生活特殊化，“纪登奎十分重视，因此批评了旺丹，旺丹深感委屈，向纪说明了情况，并认为这是无中生有告黑状，纪登奎也感觉意外说：明辉同志怎么能这样说呢！并劝慰旺丹谨慎为要。”不料回昆后的常委会上，旺丹即当面质问刘明辉：为何歧视青年干部？为何向中央告黑状？为何你能一家住一栋几百平方米的小别墅，我也是省委副书记，住一间房子都不行，问得刘明辉十分狼狈。接着他还不依不饶地要求住刘老红军那样的小院。时任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的胡延观如此回忆：

这可为难了我。好不容易东挪西凑，把一栋待修的小院加紧整修一下，凑了一套带沙发的家具。后来我去看他，他和秘书（一个藏族小伙子）正在吃饭。他亲手给我打了一碗酥油茶。我四处看看，除了卧室，其余房间都空空然。旺丹笑对我说：我是在争口气！

朱克家聪明伶俐，为人谦和，典型江南好小伙。他出生于黄浦江边一个多子女的贫穷家庭。穷人的孩子早当家。1969年，19岁的他就带着那类家庭特有的勤勉和吃苦耐劳来到遥远西双版纳的边山野地。他很快学会了耕地、插秧一类农家基本功，还利用空余时间学会了木工，并在不长的时间里掌握了傣族的语言和文字，与当地老乡打成一片。勐腊县勐掌寨旁边的高山上有个叫莫登的傣尼族村寨。傣尼生产队长下山办事途经勐掌逗留，和这位来自上海大码头的汉族兄弟成了朋友。傣尼汉子告诉朱，说他们山上曾办有一所小学，可是请来几任教师都受不了山寨的寂寞与贫穷，一个接一个先后走了。山寨五六十个孩子都渴望读书呢！朱克家想了想，爽快地答应了傣尼朋友的要求，虽然那儿比勐掌苦得多。1970年12月，他正式去莫登山寨当了一名村小教师。

二十世纪初，英国、法国、美国、澳大利亚、比利时、意大利等国的许多小伙子带着厚厚的《圣经》和坚定的信念，远涉重洋，来到云南山区传播福音，热心热肠地为素不相识的山民服务。在遥远的边山持之以恒地服务他人，最需要传教士的信念和激情。对于

信仰时代长大的一代中国年轻人，这种信念和激情并不稀缺，朱只是他们中间更为坚韧者罢了。按照当时报刊的宣传口径，他是：“毛主席的话给了他信心与勇气：‘越是困难的地方越要去，这才是好同志。’”

朱克家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傣尼孩子面对汉文编写的教材和汉语教学如听天书，他得抓紧学习掌握傣尼语，还得尽快取得孩子家长们的信任。于是小朱带领当地山民青年，一起用手扶拖拉机带动碾米机，减轻劳动负担，回沪探亲，他还抓紧学理发、学裁剪、学缝纫、学修收音机、手电筒、闹钟，还有电工的各种操作技艺。再返莫登山寨，他简直成了全知全能的工匠，甚至和大家一起劈山引泉，修起了莫登山的第一座小水电站。如果事情到此为止，应该是一个正剧的结局。不幸的是，他被善弄权谋的猎人盯上了。

1972年，上海派出慰问团到云南慰问。朱的远山故事感动了来自家乡的成年慰问者，他们把朱的事迹整理成书面资料送回上海市委。题目是《山寨里最忙的青年》。这是一份客观的、并不带多少政治色彩的文字，问题是，这份资料很快被主管上海宣传舆论的大员徐景贤看到，并且立呈中央大员姚文元。姚一声令下，由上海市委导演，一帮御用文人迅速赶赴西双版纳，接下来的“舞蹈”随着政治指挥棒旋转，越来越热闹，也越来越变味了。署名朱克家本人的文稿《我深深爱上了边疆的一草一木》，配套的《农村也是大学》《贫下中农的好儿女》等通讯、报道，还有“山寨的第一人民教师”“第一个木匠”“第一个理发师”之类的溢美之文、夸张之词连篇累牍，频现报端，向人们的眼球轮番轰炸。

几十年后，已经被艰难世事折磨得圆熟而超然的朱克家对笔者说：“我的事不是人为编出来的，有些事是被拔高了，但要说我是个假典型我也不承认。我的好，最初都是寨子的老百姓说出来的，我整天和他们在一起，我的表现他们最清楚。那个时候先进典型都讲究‘高、大、全’，宣传时候为了政治需要就把我拔高了”。更没有想到的是事迹拔高后接下来的政治拔高。姚文元听说小朱同志还不是党员，当即晓喻上海当局：“这样的人不入党，要什么人才可以入党？”上海立即致电云南，要有关部门突击解决朱的“组织问题”。

电话层层下传，地、县、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党小组和党支部虽对小朱同志感觉不错，可是党章有规定，入党得本人先申请，还有，家庭成员、社会关系有无不良记录？有无亲戚被共产党杀、关、管？有无海外关系？……这些，都得照章办事，然后方能进行入党讨论程序。而电话到达当日，朱恰恰不在山寨，他因公去

了昆明，什么事都没法办——上峰却不管了这么多，他们只知道中央高官发了话，高官发话就是最后通牒，当晚必须明确答复。时间是1973年4月27日。

少数民族办事很执拗，尤其少数民族共产党员。可面对来自北京的死命令，公社党委最终让了步：书记代表公社党委表态，立即批准朱克家同志入党，党龄就从那一天算起，手续后补。有人统计过，从上海市委打电话算起，到朱克家“入党”止，前后11个电话，耗时总共9小时，创纪录了。不久北京开十大，他又成中央候补委员，再创纪录，并列席省委常委会议。朱克家和七林旺丹类似，压根儿不知道什么八派、炮派，只是他没有想到，他后来竟稀里糊涂成了八派“头目”且为“首恶”。

和他同样没有想到的是，因批林而收获累累的周兴，在十大之后，很快面临一场新的危机：一场叫“批林批孔”的新运动悄然开锣，云南形势再次乱了套。

第三章 “批林批孔”：“66乱局” 蹩脚的微缩版

3.1. “批林批孔”前的云南政局

林彪事件对风烛残年的毛泽东给予了致命的打击，历史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经过一年多对林彪集团的政治批判和组织清洗，毛不得不抓紧召开中共十大，对所谓“第十次路线斗争”的胜利做一肯定，然后继续将宝贝的文化大革命继续下去。

对于云南来说，周兴的执政当局需要解决的，依旧是调整政策，稳定局势，替谭甫仁“擦屁股”。十大会后，按程序“掀起了学习和宣传‘十大’文件的热潮”，层层召开会议传达部署、学习十大精神，在全省城乡开展大规模所谓“路线教育”。这些当然是些表面文章，周兴想要解决的，还是那个纠正所谓林彪分裂主义影响下“以人划线、层层站队”的错误，从根本上调整社会平衡，恢复稳定。

纠正“划线站队”这个题目，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曾多次对周兴进行问责。1972年7月，周恩来送别美国总统尼克松，从上海直飞昆明看望住昆明安宁温泉休养的越南总理范文同。周恩来和范文同谈话后接见周兴、王必成、陈康3人，即称：“云南有个‘划线站队’问题，你们早解决比晚解决好。”一年后开十大，周兴赴京，刚一见周恩来，周恩来兜头便问：“‘划线站队’纠正了没有？”

足见问题之严重了。周兴事后对人说：“周总理这一问，把我愣住了。”

原来告状者众。十大期间，政治局委员陈锡联便对周兴讲了：“云南来京上访的和来信申诉的，主要是告你们搞了‘划线站队’，在军地干部、群众中都压了一派。这是谭甫仁搞的，他已经死了，

你这次回去要解决，不然你们工作很被动。”周恩来亦强调：“开了‘十大’了，借这个东风，认真解决。”他要云南结合学习贯彻十大精神，认真纠正“划线站队”的错误。

周兴不敢怠慢。参加十大返昆后即两次召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市革委会主任黎韦来家，商谈在昆明市纠正“划线站队”的错误，要求他们率先作出样板。

黎韦，福建人，文革前任昆明市副市长。市长潘朔端乃内战起义的滇军将领，年事又高，实权自然归属主持市府工作的强人黎韦。偏巧市委书记赵增益亦性格强悍，二人多有不睦。文革开始，赵增益被打为昆明党内“头号顽固走资派”“变节分子”。1968年北京学习班时期，炮派曾计划将赵增益推荐进省革委，遭八派抵制而告吹。同僚黎韦倒向造反派阵营，虽早年留学日本，有“特嫌”之疑，但得八派荫庇，未曾遭罪，还以“革命干部”之身份当过“围海造田”的总指挥。1971年6月昆明市委恢复，他顺利当上了副书记。1973年8月，“三支两军”的军人陆续归建，党政领导班子由“军干群”三结合转变为“老中青”三结合。著名的“挺八”军长梁中玉撤离，黎韦正式就任了市委书记。官史详细记录了周兴十大归来对黎韦讲话的细节^[1]：

一、党的十大路线，是从彻底批判林彪分裂主义路线提出来的，“划线站队”是林彪路线的产物，纠正“划线站队”错误就是落实十大精神，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敢于纠正这一错误，才能证明我们不是口头革命派。

二、云南有林彪路线的影响，还比较严重。谭甫仁死了，杀他的凶手也死了，案子还没有查清，这是另一个问题了。谭本人也有问题，是“三军造反派”^[2]头头之一，林彪路线上的人。他来云南不久，就搞了“划线站队”，1968年8月成立省革委会，1969年1月召开省革委会常委会学习两报一刊社论，批“二月逆流”，他主持的大会，就把参加炮派的委员都整了，给全省带了一个坏头。各地、各单位很快都搞了，我那时也没意识到这是“划线站队”。周兴传达了周恩来、陈锡联的指示：搞“划线站队”使工作确实很被动，现在成了棘手问题，谭甫仁不死，他来说清楚好办。省里、军队里有不少同志不提或不承认云南有这个问题，中央了解情况，一再打招呼，我们也确实搞了的，不解决不行！

[1]《云南“文化大革命”运动大事纪实》页330。

[2]指谭甫仁文革初期在工程兵部任政委时持所谓“三军造反派”立场。

三、今天找你来，就是要请你在昆明市带个头，先走一步，取得经验，推动全省纠正“划线站队”的错误。我再三想过了，因为你比较超脱，结合得晚，当时你还靠边站，现在你在两派干部、群众中都能讲上话。围海造田，现在看是错了，那是省委决定搞的。但那工程还是很大的，委任你当总指挥，动员10多万人，两派群众都参加了，组织领导得好，当年造田，当年插秧，当年收益，这证明你在群众中有威信，群众能听你指挥。现在把纠正“划线站队”的任务交给你在昆明开个头。

黎韦听完周兴的上述谈话后表示：“我拥护纠正‘划线站队’的错误，我接受这个任务。但这是件大事，是不是请你在省委常委会上把周总理的指示和陈锡联打的招呼向大家传达，并讲明我的任务。否则，常委们不知道，我又是省委的一个常委，在昆明市搞这么大的事，一些同志还能不抓住我做文章，说我背着常委会呀、违反组织原则啦！”

周兴说：“就因为是大事，才找你谈这么多，我是省委第一书记，你是市委书记，又是省委常委，我亲自向你布置昆明市的任务，有什么不符合组织原则？至于省委常委的工作，我来做。你回去后研究具体做法，不要找人商量，拿出你个人意见，给两天时间再找你，听你谈。”

两天之后，周兴找黎韦问如何纠正“划线站队”错误的意见，黎韦汇报说：首先开市委常委会议，学习周总理的政治报告，联系实际批判林彪路线（批判“划线站队”错误），认识林彪搞分裂的阴谋及其在昆明市以及在全省的影响，贯彻十大路线，这样才能加强团结，争取在各条战线上取得更大的胜利；在学习过程中，我找5位市委副书记谈心，统一对纠正“划线站队”错误的认识，思想一致之后分头找市委常委做工作。再做两派头头的工作，然后通过派头去做本派群众的工作。常委学习会上，研究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层层发动。在市革委会上，把一部分持不同观点的常委因刑讯逼供写的“认罪”材料从本人档案袋中清退给本人或销毁，把常委会开成团结的会。在这基础上召开扩大到局、县、区、工厂和公社书记都来参加的干部会，主要阐述云南搞“划线站队”是错误的，是林彪分裂主义路线的产物，其责任在当时的省、市委领导，现在市委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来纠正这一错误。宣布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划线站队”被撤职的干部恢复他们的职务，被扣的工资一律补发；二是清退逼供写的材料。这是第一步走法。第二步，待省级机关也行动了，由省委发个纠正“划线站队”错误的文件，对受害者公开平反昭雪。要彻底纠正“划线站队”造成的严重后果，必然

涉及不少问题，要有若干政策规定才能解决。

周兴同意黎韦的意见，先在市里进行，下一步由他来考虑，省里的步子离不开市里先走一步的经验，可以互通情报随时研究。这时，黎韦提出要确定怎么讲的口径问题，黎的意见是：在他的“开场白”中，讲明周兴在京开会期间，周总理和陈锡联是怎样指示，怎样打招呼的及周兴要昆明市先走一步的意见。周兴说：周总理的指示、陈锡联同志打的招呼，这些话留给我周兴来讲，你在市里都替我讲了，我在省里还讲什么？你只说周兴同志责成你在这次学习十大路线时，根据中央的精神，要肃清林彪路线的影响，纠正“划线站队”的错误，要你负责在市里首先纠正这一错误。黎韦接着讲第二点意见：“我只能讲由市委负责纠正这一错误，并向受害者道歉，但不能讲由市委承担责任。”周兴打断黎的话说：“我没有要市委承担责任。”黎韦说：“不是要不要的问题，开起来，会追问谁搞了‘划线站队’，谁负主要责任。你说不要扯到谭甫仁同志，因为中央没有正式结论，那么‘划线站队’是怎么搞起来的，总不能是群众自发搞的吧？”周兴说：“可以笼统讲这一错误由当时的领导负责。”

纠正“划线站队”的错误首先在昆明市开个头的办法就这样定了。周兴问黎韦还有什么问题？黎韦说：“主要是打通（昆明）军区党委一班人的思想，他们中有人作梗，阻力就大了。”周兴说：“我是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那是我的事，你放心好了。你把昆明市的第一炮打好，别的你不用管。”^[1]

黎韦本是以派“划线”的受益者，他这样反复与周兴“议价”，皆因他和周兴同病相怜，担心自己的身份很可能会遭遇八派关系圈的掣肘和难堪，不能不左右思量。不管怎样，以中央首长督办为由，昆明纠正“划线站队”问题从1973年10月起，正式起步了。《昆明党史》在“昆明率先纠正‘划线站队’错误”一章中记载^[2]：

1974年1月7日至10日，昆明市委第八次全会、市革委第19次全会联合举行，部署全年工作任务。在这次会议上，市委书记黎韦以市委名义正式提出昆明市纠正“划线站队”错误的问题，并明确表示了市委的态度，指出“划线站队”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把斗争矛头指

[1]《云南“文化大革命”运动大事纪实》页331。

[2]昆明党史网（<http://kmds.km.gov.cn>）：《昆明党史》第七章第三节“从帮派篡权的新动乱到粉碎‘四人帮’的胜利”。

向一派群众，造成极大后遗症，破坏了全市干部和人民群众的亲密团结，必须坚决纠正。在此之前，市委常委已多次统一思想，并由主要领导干部在县区会议、干部会议和全委会议上阐述“划线站队”的错误及危害，表明市委的决心。对于市委提出纠正“划线站队”错误问题，总的反映很好。许多干部和群众代表说：“毛主席、党中央都表过态，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划线站队’的错误早该纠正了。”但也有少数人顾虑，纠正“划线站队”的错误，是否会影响“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甚至又引起混乱，追究个人责任。尽管有不同的意见，但会议上绝大多数人思想是统一的，赞成纠正“划线站队”的错误。

昆明抓点的同时，周兴本人也在从省里抓一些典型个案示范。北京召开十大，已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邓小平向周兴问起云南二故人下落：一为高治国，一为赵增益，说如无大问题，你们就抓紧把他们“解放”出来安排工作吧。周兴告邓，高治国已安排为省建委主任，只是赵属于市管干部，情况不太清楚。回昆后，周兴即刻交代省委办公厅副主任胡延观想办法找黎韦协商办理，黎韦借故推诿，说赵增益历史问题尚未查清，不便结论。后胡忽然查得赵在文革开始前的1966年4月已由省委组织部下过调令，任命为省建委主任，皆因文革骤起而未能履新，遂以省管干部为由，将审查材料从昆明市上提省委组织部并很快解决。称赵为“变节分子”，皆因当初赵曾被日本人抓获却连夜逃掉，而同时被抓的其他二人均已死亡，遂成无头案。

炮派“武斗之花”焦云立被省交通厅以“有人命”为由长期关押，对周兴要求一个月之内结案的要求一直死扛。周兴通过黄兆其做工作，终得放了出来。昆明冶炼厂党委书记、省革委委员董福生曾因冒着高温进入反射炉作技术改造而荣膺全国劳动模范称号，皆因派性不合，遂以地下党问题（通用罪名即“叛徒”）一直关押，经周兴直接过问，亦在一个月迅速解决。

凡涉及影响较大的人事问题，周兴都亲自解决。大的，如雪藏多年的民主人士（抗战后即秘密投奔了延安）的张冲将军，周兴某日一早便亲自登门传达总理指示，要张出山。张光着脚丫兴冲冲开门，连称云贵总督光临寒舍不胜荣幸之类言语，接着被安排为省革委委员。这位国民党将军、台儿庄传奇英雄第一次走进革委会会场，云南的草民委员们全体起立鼓掌致敬。张冲说了一句话让掌声再次响起：“别鼓掌了。老了老了。让我当委员，现在算是‘狗吃大粪——废物利用’”。

电影明星杨丽坤的姐姐告状无门，直接堵在省委大院门口拦截周兴小车，被周带回私宅叙谈问询近一小时。事后某次省委常委开会，众常委都拿此事开涮，说周政委，咱们找你汇报工作多艰难，老说忙。人家美女找你一谈就一个钟头。周兴一本正经说明：杨丽坤的问题总理专门给我打了招呼，要抓紧落实人家的政策。你们知道个屁！

这些虽为个案，足见周兴在人事问题上之用心良苦。

3.2. 戾风初起

当周兴正绞尽脑汁既稳定局面又要纠改前任留下的大堆问题，远在北京的毛泽东又有灵感来袭，开始想新主意折腾了。十大召开前，1973年7月4日，毛泽东与王洪文、张春桥谈话，说起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其后又多次提出要把批林彪、批孔子、儒家和推崇法家联系起来^[1]。十大之后，国务院科教组于9月8日至11日召开教育战线的批孔座谈会，中山大学反孔教授杨荣国在会上做了题为《儒法两家的斗争和孔子反动思想的影响》的报告，科教组负责人迟群危言耸听地提出，要把批孔作为贯彻十大精神，深入“批林整风”的一项大事来抓，称：“哪些地方不重视批孔，哪些地方就属于针插不进、水泼不进”。

党媒的任务本在于跟风传话，嗅此戾氛，焉能不吓了一跳。文革不是从批海瑞开始吗？不是也有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之说吗？8月11日《云南日报》诚惶诚恐，以二版整版篇幅转载《人民日报》杨荣国的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从来天意高难测，云南越是偏远，消息越是闭塞，越弄不清楚北京想要干什么，便越怕犯错误，便越要抓紧跟风凑火。出席上述座谈会的云南代表返昆，于9月20日至22日分别向省委宣传部、省级文教系统部门、高校领导及文、史、哲、政治等科系教师汇报和传达会议精神。10月13日，省委正式召开省级机关处级以上干部会，会议由第一书记周兴主持，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梁文英在到会讲话，要求机关干部关心和重视批孔问题——后来的事实证明，即便如主持此项工作的“秀才部长”梁文英，对此问题其实也是稀里糊涂，只不过害怕犯文革初批海瑞、批“三家村”时的低级错误，跟风的

[1] 转引《当代云南大事纪要》1973年卷。

行为艺术于是持续升级。

10月29日至30日，省委把声名鹊起的杨荣国请来昆明做批孔报告。报告会由第一书记周兴、第二书记王必成、书记陈康出席并主持，省市机关、驻昆部队、大专院校师生、中小学教师、解放军指战员等共36000千余人参会听讲，其规格和阵容可谓豪华至极。讲授毕，王必成还专门发表训示称：“批判孔子的反动思想，是‘批林整风’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上层建筑领域革命的重要方面，各级党委要严肃、认真地领导这场斗争，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特别是教育战线的同志，都要积极投入这场斗争，把‘批林整风’运动进一步引向深入。”^[1]

为何现在要批判一个死了两千年的古人？包括到处讲课的杨荣国，谁都没弄明白毛泽东的弦外之音。同时，文革的朝云暮雨确实又为中国加工出许多特别敏感的神经，见此阵势，这类神经定然又会嗅出中国有大事要发生了，并且为他们改变命运提供了又一个押注的良机。政治投机和赌场投注本质是一样的：要么一本万利，要么血本无归。在杨荣国的昆明万人报告会场之前，就有人提前下了注。

此人即郑某，中山大学历史系68届毕业，杨荣国的学生。大学分配来云南勐海0282部队（14军124团）锻炼，因系红军后代，再分配时便直接参军留在思茅军分区。10月中旬，郑某与云南大学两位工农兵学员一道撰写了大块文章《昔日孔子，今日林彪》投稿《云南日报》。报社编辑不知就里，将文稿清样直接送省委宣传部长梁文英审处。梁虽然贵为部长，只是满身书卷气，几十年本性难改，对毛泽东意图一无所知。梁从学者的角度对郑文逐句批阅，大标问号，批得密密麻麻，官史统计，梁共“打了10个问号，写了12段批语”^[2]。其意盖云：“文章只能以批林为主。把林彪和孔子划一个等号，起不了批林作用”“林彪是叛徒卖国贼，不能只把他和孔子对比，说他和孔子一样。不能只用孔子的‘兴灭国’来批他搞复辟的阴谋。把孔子的‘礼治’与林彪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对比，并没有批了他‘真正的社会主义’”。结论：该文不同意发表。

文稿被打回不到半月，郑某恩师杨荣国便来昆高调作“批林批孔”报告，郑某遂将《昔日孔子，今日林彪》送恩师审看，在文章

[1]《当代云南大事纪要》1973年卷。

[2]《云南“文化大革命”运动大事纪实》页294。

观点得到杨教授赞同之后，郑某遂将文稿再送《国防战士报》^[1]并想办法发表了，接着再次向梁部长叫板，要他同意《云南日报》发表。梁坚持说该文“修改都无法修改，别的报纸登了，我们不一定登。”稿子再度被压下，郑某一怒之下直接去信《解放军报》，并附上梁的亲笔批件。其时江青一伙正以批孔为题大闹京城天宫，《解放军报》得郑信如获至宝，马上将该份“揭发材料”加上《关于梁文英同志对批林批孔的错误言论》的标题，登于内部刊物《情况简报》，并于1974年2月4日报送江青。江青阅后，批请王洪文“酌处”；王又批示：“请转云南省委认真研究，检查处理。”

1974年2月11日，梁文英刚刚就任云南省“批林批孔”办公室主任，第二天省委即收到江、王批件。事情真是捅破天了！云南省委立即召开常委会议研究，认定“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梁文英为林彪、孔老二辩护的立场是十分鲜明的”“梁的批语，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压制‘批林批孔’斗争”“梁的‘批林批孔’是假，反对‘批林批孔’是真”“梁文英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省委责成梁在省委常委会上检查，并决定：一、在省级机关发动群众揭发批判梁文英压制“批林批孔”的严重政治错误；二、在《云南日报》发表一些评论和文章，不点名地批判梁文英压制“批林批孔”的错误言论；三、撤销梁文英原任省委“批林批孔”办公室主任的职务，由省委副书记七林旺丹兼任。2月18日，省委发出《关于梁文英同志压制“批林批孔”文章的严重错误的传达提纲》，省委主要负责人并于当日找来郑某领衔的3位文章作者，向他们道歉，对他们“批林批孔”的文章和反潮流的精神坚决支持。2月19日，云南省委、昆明军区党委和昆明市委专门在东风广场召开群众大会，大张旗鼓动员全民批孔。是日天气晴和，郑某被安排登台对“老梁头”做现场批判发言，可谓爆冷成功，风头尽出。梁文英颇多书生意气，加上文革动乱时身处异国老挝，超然云南派斗，由他来担任“批办”主任，本来最合适不过。没承想被年轻之徒一记横刀斩于马下。这情景，很容易让人联想起1966年云南的“四月提纲”事件，那一次，也是“学者型”的省委宣传部长高治国自作主张，被立斩于文革阵前。

接下来，省委只好换上连说汉语都不利索的七林旺丹接任“批办”主任。虽说旺丹对孔夫子一无所知，但局势混沌，本来谁都摸不透毛泽东想干什么，让一位藏族英雄民兵来干这活儿恰恰再合适不过了。

[1] 昆明军区机关报。

3.3. 大戏开锣

事情至此，大家多少已看出点端倪了。北京确实想照搬1966年的脚本：先弄一个古人来鞭尸，然后含沙射影，把真正要收拾的对象一步步引出来。1965年的古人是海瑞，最后扳倒的是刘少奇，这一回的古人是孔夫子，想扳倒的人谓谁？很快亦将揭晓。

1974年新年伊始，《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元旦献词》，宣布“在政治思想战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的，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等。既然是“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级别一定不会低。紧接下来，文革派的领军人物江青便带领中央办公厅机要员谢静宜，加上谢的老公、空军干部苏延勋，加上清华革委会副主任、8341部队宣传科长迟群一道以个人名义给海军、空军、南京部队、广州部队等领导机关到处送信、送材料，“放火烧荒”。她对3人宣布：“我这个人爱放炮。是个炮手，又造炮，又造炮弹，又有炮队，你们就是我的炮队。现在我把你们当炮弹放出去，去放炮！我给你们找地方去开座谈会，去放炮”。1月24日，江青等在北京召开在京部队单位“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次日，又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中直机关和国家机关大会动员“批林批孔”。他们操控的报刊和所谓“大批判写作组”开始狂轰滥炸。这些所谓“大批判组”，领衔的有北大、清华笔名为“梁效”（两校）者，有上海市委写作组笔名“罗思鼎”（螺丝钉）者，有中央党校笔名“唐晓文”（党校文）者，一边批“孔子”“儒家”，接着就“批宰相”，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一回的矛头是对准周恩来了——剧情果然是毛泽东故伎重演。毛泽东接着又拿软骨头文人郭沫若说事，翻出他几十年前的旧作《十批判书》，说该书尊孔反法，“国民党就尊孔反法，林彪也是啊！”继而借题发挥，不知怎么就扯到“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转弯抹角，板子最后果然打到周恩来的屁股上了。

脚本越来越清楚。1972年整顿中此消彼长的各派力量，这次又得重新洗牌了。毛以“批孔”为名，要对危难时分帮他修补政治篱笆的周恩来动手脚了，以确保文革派们日后能坐稳江山，以证明其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确实伟大而正确。

只是形势比人强。1974年的中国人，早已没有了1966年的宗教虔诚和浪漫诗意。文革8年，毛泽东为打倒政敌，早已把政治斗

争秘籍公开，让底层百姓窥破了官场游戏规则的肮脏和冷血，他们不再热血沸腾，不再看见领袖就流泪，不再听见“最高指示”就振臂欢呼。再说，这些年周恩来忍辱负重替毛泽东“擦屁股”，形势刚刚好转，毛又卸磨杀驴，按老百姓最朴素的处事原则，这实在太不厚道了。总之，对于乌烟瘴气的街头政治，大家实在厌烦透了，大家宁肯过平庸的日子，也不想混乱中感受虚幻的荣光。

巴望天下再乱的人不是没有。这些年，被艰难世事折磨得早难以忍受人多了去呢！上面要瞎胡闹，他们只求胆怯地期待能否乘机改变一下命运，或者干脆跟着起哄，乘机捞一把，甚至企望趁政治骚动重温乱局带来的快感，如果政治上能重新上位则更爽。

比如，1968年知青下乡前，毛一声令下“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再加上1969年10月林彪发布《关于加强备战，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生活在城市边缘的“贱民”和弱势群体曾被批量赶到边远山区。根据《昆明党史》的统计数字，1969年11月4日，市革委召开市属各级革委会干部会议，讨论贯彻执行省革委《关于立即疏散昆明市人口的紧急通知》《关于疏散下放昆明市人口和遣送“九种人”的通知》，按省革委规定的疏散下放对象为“闲散人员、盲流人口、农村户口人员、农村有家可归的干部、职工家属、已调往专县和‘五七’干校的干部和职工家属、私招乱雇人员、应走未走和倒流‘知青’、未经批准的外地在昆的办事处、列入搬迁下放计划的单位。”遣送对象为：“地、富、反、坏、右阶层中，属于敌我矛盾，未改造好的分子，实行群众专政、监督劳动者”“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按疏散下放人员对待”，此次执法行为一律采取强制措施，甚至逼死人命。其中尤以“九种人”为重点，采取查户口的办法，查到一户遣送一户，全昆明共疏散下放、遣送人口28574人。

这些人非老即少，去了乡下，别说要和当地土著农民在同一起跑线上挣工分找饭吃，很多人连去溪沟河边挑水煮饭都成了问题。无可奈何，他们只好偷偷逃回城里，投亲靠友，艰难度日。“批林批孔”乱局一开，昆明百货大楼的面前就出现了他们向政府请愿的大字报和大标语，最为著名的一张是《三年来没有吃过一顿饱饭》，大字报作者如此明目张胆地用活生生事实攻击社会主义中国的“大好形势”，让人瞠目，足见“逼急了的兔子也会咬人”。这些人后来干脆扶老携幼、三五成群进驻省委办公厅大院，没日没夜地静坐示威。此类抗议者多属老弱病残，被人蔑称为“叫花子兵团”。

又比如，为造昆明牌汽车，云南第二工业学校的校舍被改成了云南汽车厂附件厂。教工们无处上课教学，也趁机造起反来，把

七八张双台床搬到省委办公厅大厅里“静睡抗议”。

其时笔者每日在省委办公厅划卯，曾接待过一位名叫苏金泉的工厂技术员（苏后来成为柳州汽车厂总工程师），问罢运动形势后，他非常务实地告诉笔者，如果真再来一回文革，工厂不上班了，他就准备抓紧生第三胎，他前面两个都是女孩。

所有这些散兵游勇，对当局当然构不成实质性威胁，比如疏散人员，办公厅不过组织了几十个机关精壮汉子一轰，老头老太便即刻作了鸟兽散。二工校的老师也知识分子味十足，静睡数周无果，悄没声儿便自动撤走了。对当局真正构成杀伤力的，还是当年的造反领袖，他们对政治运动最敏感、文革造反练得一身是胆，最渴望通过乱局改变自己的命运，江青一伙在北京一吆喝，他们立即拉起杆子，重新干了起来。

3.4. 混战与闹剧

在云南，渴望趁混乱改变命运的，首先是“划线站队”中因“站错队”而失去一切且饱受凌辱和灾难的“赵氏小爬虫”们。从1969年初算起，他们被压制时间已整整5年，他们的反叛有一个现成的题目——弹压炮派的“首恶”之人谭政委正是林彪线上的红人，联系实际“批林批孔”，首先就必须“批谭”。1974年2月，以彝族犍小子方向东为首的老“炮众”率先贴出大字报，正式要求“批谭”、批“划线站队”，周兴接见他们，也痛快承认了“划线站队”是方向路线性的错误，谭甫仁负第一责任，他要负第二责任，周兴仅仅要求：“对谭的错误可以批，但要在批林批孔中联系云南实际批”。

继而李毅、方向东乘胜追击，开始串联在昆部分省、市革委会委员，联名写了《给省、市常委的一封信》，提出了对当前的形势和“批林批孔”运动的看法，认为谭甫仁在云南推行林彪一伙的“划线站队”，犯了严重的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谭甫仁究竟是什么人？必须审查清楚”“要落实政策，对被错整的干部群众应‘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李毅、方向东同来昆上访的人汇集一起，在全省范围内很快形成了山头，名曰“反潮流”。1974年4月，他们组织了90多人的告状团奔赴北京，要直接“向毛主席、中共中央汇报情况”。

作为“划线站队”的赢家，八派的头目们这些年一切通吃，对于周兴、黎韦所搞的羞羞答答的“反派性”本已暗怀不满，如今老炮人竟然趁机挑战，想要咸鱼翻身，他们当然不能容忍，他们也要

起来捍卫既得利益。八派也有现成题目——中央点名林彪集团安插在云南的“钉子”蔡、雷、马、董，他们不都是反派性（即否定“划线站队”）的主将先锋吗？“批林批孔”要联系云南实际，就必须深入批判蔡、雷、马、董，并追击他们的后台陈康，还有王必成这个“钉子头”。其次，这些年，很多地方，如滇西，尤其大理等地由原54军（后为董占林领军的11军）支左时通过反派性、革委会补台，让八派大权旁落；再加上“批林整风”以来落实干部政策，随着老干部归位而出现的新干部靠边。这些都需要追究。最现实、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昆明市从1月初，以市委名义提出的纠正“划线站队”错误的运动，被八派保出来的市委书记黎韦，公然开始对自己人动真格开刀。是可忍，孰不可忍？八派的领袖们需要立即打退炮派的进攻，维护自己的利益。

还有第三种人，他们属于八派，理论上属于胜利者。可惜文革闹腾半天，徒得虚名却得不到任何实惠。典型如省建工人杨树先，八派三号头头，省革委成立前夕曾组织“八工总”企图以“工人阶级是文革主力军”为由抢权，皆因时间紧迫未遂，仅当了省革委常委，具体则不过当了省建材公司革委会副主任，实在寒碜。“批林批孔”是大好时机，此时不抓紧抢权，更待何时？

至于靠偷袭成功而偶然上位的郑某^[1]，不代表任何民意。以至于人们对他嗤之以鼻，称其为投机钻营的“郑三发子”。

这样，云南“批林批孔”大乱局的三派力量，以“批林批孔”“反复辟，反倒退”“反潮流”等各色口号煽动，陆续公开拉起山头，以昆明为中心，与地、州、市一些“老造反”，还有部分省属部门、大中型企业中观点相同者串联，形成山头队伍并开打派仗。4月10日，北京发出中发[1974]12号文件《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问题的通知》，要求“‘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联。对已经成立的联络站、上访团、汇报团一类组织，各级党委应做好工作，劝他们回本单位参加批林批孔，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但经过文革政治斗争历练的造反派，自有对策。不让成立战斗队，不叫战斗队不就结了？该干什么照干什么。

文革初始，毛泽东号召“造反有理”，群众组织都喜欢叫造反团什么的，这次北京号召“反潮流”。以李毅、方向东为首的山头便就叫了“反潮流”，专县上昆参加“反潮流”队伍，就叫告状团。

[1] 郑某逆袭成功，迅速提拔为昆明军区批办副主任。

5月15日至20日，应国防部邀请，各国驻中国大使馆武官、副武官及其夫人到昆明、石林、玉溪等地参观访问。外宾莅临次日，正是文革的纲领性文件“516通知”发表8周年。“反潮流”焉能放过如此重大机会进行鼓动。15日，昆明“反潮流”及告状团深夜上街大贴大字报，还用油墨、油漆狂刷大标语——此行动正好与欢迎外国武官时间撞车。外交无小事。省委得知消息，夤夜召开紧急会议，一面急报中央，一面调出两连兵力对付，省“批办”副主任范振山亲自带队，派一连人把写标语者控制起来，另一连兵丁抓紧冲刷墙上和地上的油墨油漆，军、地冲突顿起。“反潮流”之一部与军人继续争执，一部则跑回搬兵。主管公安的省委常委武健继而迅疾赶来现场，亲自下令抓人，于是3抓1，一共捉了20来人解去接待站关押。逃脱的人立即回去动员炮众，对解放军实施反包围。总之，军队一抓人，文章就好做了。1967年“二月逆流”全国各地不是都搞过军队抓人杀人吗，结果造反派马上呈几何级数增长。被抓的“反潮流”战士马上在接待站宣布绝食，外面立即组织声援——此为“515事件”。下面的闹腾遂以此为题大干开来。

八派的战歌是“葵花向太阳，战士心向党”。黄兆其、刘殷农这个山头就取名了“齐向阳”。他们利用既有的权利优势和工作网络，发挥出比“反潮流”有效得多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他们首先制定了三个战役的工作计划：第一战役为打蔡、雷、马、董，通过揭批4只“死老虎”，顺藤摸瓜，直摸去王必成的头上。第二战役紧接打王必成，重点批判王必成拿着林彪的话作“尚方宝剑”到云南来搞复辟^[1]，定义王为“上了林彪贼船”的“钉子头”。第三战役再打老冤家陈康。称陈九次路线斗争中搞翻案，十次路线斗争中有牵连，是“批林批孔”阻力。至于舆论班子，黄兆其确想将原八二三的笔杆悉数重拉入伙，未能遂愿，实际上阵就涂晓雷一人。“齐向阳”按此步骤，从昆明到各专州市县，再次形成革委会成立以来大字报高潮。^[2]八派势力一贯占优的省建公司门口贴出一幅有名的对联，说明了他们的行动纲领和政治自信：

当年挥刀斩阎赵
而今跃马诛王陈

[1]1970年5月，王必成赴京开会回来，传达了林彪指示“云南还没有完全走上九大路线的轨道”，称云南军队的派性比地方还要大，军队派性又主要产生在军区党委常委和三大机关，从而提出反派性。

[2]参见《当代云南大事纪要》1974年卷。

大理州老八受54军反派性压制最深，故反弹最劲。官史载：

3月初，由帮派头头杨仁民等组织成立了“大理州工农兵‘批林批孔’打倒董占林控告团”。“控告团”的目的有二：一是打倒董占林，为所谓“受害者”平反，二是杨仁民带人到昆上访，大闹省委。3月15日，“控告团”开动宣传车离关，到昆后大闹省委，冲击办公厅，推倒大铁门，砸烂一层的部分玻璃窗，要挟省委领导周兴、陈康接见他们，强迫省委表态要在大理地区开展批判董占林，给“受害者”平反，还做了《座谈纪要》。在昆20多天，横冲直撞，于4月初回关后，又召开大型串联会，宣扬到昆“上访”成果，散发铅印《座谈纪要》，一时搞得下关地区满城风雨，影响极坏。^[1]

官史所谓“推倒大铁门”“砸烂玻璃窗”之说实为道听途说。那段时间笔者一直坚守办公厅上班，闹事者多矣，从未发生推铁门、砸玻璃之类暴状。印象最深的倒是3月25日，昆明罕降大雪，“控告团”在办公厅院内堆了4个跪姿雪人，胸前分别挂蔡、马、雷、董黑牌，过了好几天才融化。大理八派闹得最出格的是，任州革委副主任的群众代表季振华，3月下旬在昆明从14军军长梁中玉处看到省委3月8日给中央的一份密码电报，很快便捅给了“四二〇”一把手杨仁民，杨即将此密电打印100余份，并加按语写成大字报《从“三八电报”看云南省委的反动立场》广为张贴——将密码以此种形式外泄，实为保密机关一次巨大危机，省委急派副秘书长赶去下关追查销毁。一年后，杨仁民为此事被抓捕。关于该事件的持续发酵，后面章节还有记述。

根据文革破产后“揭批查”运动的判决书，我们还可以看到楚雄州的社会骚动：

1974年，被告刘光兴伙同黄兆其、刘殷农等人，上下配合，指使他人楚雄地区翻印、散发《陈康是云南右倾复辟势力的总代表》《陈康与林彪反党集团是一丘之貉》《王必成、陈康反动言论选编》等反动传单及材料，诬陷、煽动打倒云南省委书记、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昆明军

[1]《大理州“文化大革命”运动》页51。

区司令员王必成。同年三月，刘又与张××、王××联名写出《司令舞剑，何其毒也》的大字报，对王必成和楚雄军分区司令员陈仁才进行诬陷……刘光兴多次召开秘密会议，策划“要依靠老造反”揪所谓文化大革命前的走资派，文化大革命中的反对派，文化大革命后的复辟派。在刘的煽动指挥下，揪斗了楚雄州委党校党委书记（原楚雄地委副书记）任永、州委宣传部部长马荣春。刘还积极配合军内某些人，揪斗楚雄军分区司令员陈仁才。由于刘的煽动，出现了层层揪“三派人物”，斗“复辟势力”的局面，致使全州六百三十三名干部群众遭到揪斗、迫害。同时，刘光兴又背着党委指使李国梁等人秘密提出了一个二十余人的“提干”名单，把其中十八人安插到州属部分部、委、办、局的领导岗位。^[1]

还有文山州：

一九七四年四月，何立宽在省工农读书班期间，与杨志明、张协丰等人去找黄兆其密谈。何向黄诬告原州委书记岳永喜与“十次路线斗争有牵连，和蔡、马、雷、董有联系”“问题很大”。接着黄兆其讲了“运动主要是解决九次、十次路线斗争遗留下来的问题，联系云南和昆明军区的实际就是要解决王必成和蔡、马、雷、董的问题，要打倒陈康”。对此“何立宽是同意的”。同年四月，何布置上昆找刘玉净、童永昌回文山“发动群众，联系省、州实际，深揭猛批与蔡、马、雷、董有牵连的人和事”“集中批判岳永喜”“对岳永喜要打，打不倒（要）赶跑，赶不跑（要）搞臭”。并把黄兆其、刘殷农诬陷诽谤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等人的传单、材料交刘玉净带回文山传抄散发，煽动迫害省、州党政军领导人。^[2]

[1] 《历史的审判（续集）》页528。刘光兴为楚雄州八派一号领袖，捕前为楚雄州委副书记。1982年6月，以阴谋颠覆政府、反革命宣传等数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

[2] 同上，页539。何文革前系文山一中学生，文山八派一号领袖。捕前为文山州革委会副主任、中共文山州常委。1982年，以阴谋颠覆政府，反革命宣传等数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

最热闹的当然是省会。昆明市从年初市委第八次全会、市革委第19次全会正式开始“反派性，纠正划线站队错误”，直接伤害八派既得利益，理所当然成为“齐向阳”讨伐重点。主持反派性的市委书记黎韦虽为八派干部，此时当头便遭精准打击。文革后编写的官史记载的“四二三会议”^[1]事件有如下表述：

刘殷农等帮派头目，因痛恨市委书记黎韦积极着手纠正“划线站队”错误，密谋策划借“批林批孔”会议之机，将水搅浑，打倒黎韦，以达到阻挠纠正“划线站队”错误，趁势发动揪斗“复辟势力代表”的目的。会议开始不久，帮派骨干分子抢夺话筒，阻止各部门代表发言，控制了会场，刘殷农叫嚷：“要揭开市委的阶级斗争盖子。”攻击黎韦是“昆明市复辟回潮的总代表”。污蔑市委落实干部政策，恢复老干部的工作职务是“请隐士、举逸民”；进行机关体制调整，建立正常的工作秩序、工作制度是“复辟回潮”。诬陷黎韦与林彪反党集团有联系，是“上了林彪贼船的人”。接着帮派分子起哄，机关干部纷纷退出会场，顿时秩序大乱。会后，帮派在全市层层揪“复辟势力”，把落实了政策的老干部挂牌游街，赶出机关，称为“送还乡团”，各个山头还扣留、揪斗各级领导干部，使他们无法正常工作。市革委机关多次被各个山头进驻，他们殴打机关干部，扬言：“搞运动不乱不行，乱出了问题才好解决。”混进市委常委的刘殷农，还以山头的恶势力，要挟市委常委签名。^[2]

文中“叫嚷”“抢夺”“要挟”诸语所言虽无从证实与证伪，但八派贴在市政府门口那份著名的大字报至少说明他们对黎韦“反水”的深仇大恨，大字报的标题直接诅咒黎韦是“云雾山中老妖魔”^[3]。此文的作者是八派基层笔杆项兆斌。项在1969年八派全盛时期因编印《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一书，歌颂该派武斗英烈而声名鹊起。沉寂几年，再因“老妖魔”一文走红春城。

至于省委层面，则有涂晓雷等人执笔，以“齐向阳”化名撰写的《发扬革命造反精神，彻底揭开省委盖子》《把“云贵总督”王

[1] 指1974年4月23日昆明市级机关召开的“批林批孔”大会。

[2] 参见昆明党史网（<http://kmds.km.gov.cn>）：《昆明党史》第七章“‘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

[3] 《云雾山中老妖魔》是批林批孔中一张著名大字报。

必成及其同伙押上历史的审判台》《于无声处听惊雷》等文章，以大字报、传单等形式到处散发。文章称王必成和陈康是“林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残余势力”，王是“策应林贼反革命政变的前线总指挥”，陈是“云南右倾翻案复辟的总头子”。

与1966、67年的版本相比，上述活动有一新特点，两个山头各干各的，互不干扰，有点像文革初期，都对准走资派，批谭的批谭，批蔡马雷董的批蔡马雷董，只是干着干着就不行了，两山头再次武力相向——这放在下面再说。

处于“反潮流”和“齐向阳”两大山头之间的杨树先，充当第三种势力者，由于政治基因缺损不全，只能在夹缝中游移不定，进退无据。3月21日，杨树先、金彝旦^[1]等人以“云南工农兵反复辟大批判组”名义发表的《大批判提纲》很能说明他们的无奈与故作超然。提纲称：“划线站队”不是云南问题的要害。“这次斗争的主要目标，是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首先是“搞反攻倒算的走资派”，至于新干部，虽然提纲说了些“大多数是新生力量的代表，是‘批林批孔’的战友”，但更大的篇幅则是冷嘲热讽：“新上台的当权派与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相结合，大搞复辟，搞宗派、拉山头，找有势力的政治背景，大开后门，立党为私，是损公肥私的特权阶层，是复辟势力用糖弹所瓦解的人（对他们首要是教育，然后才是团结）”，还有“极少一部分人本身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投革命之机，当革命高潮到来时他们发誓要和群众在一起，要革命，他们被扶上权力的宝座之后，就毫不踟蹰地把群众浸入血泊里，还有极个别的，本身就已成了罪犯，根本不是什么新生力量的代表。这是一些应打击的对象。”提纲酸溜溜地警告众人：

挑起划线之争，势必导致两派群众的重新对立，派头们又成了当然的领袖，派头们又去谈判，最后互相求得妥协，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群众得到了什么呢？革委会成立以来的历史已深刻教育了群众，一群复辟势力的、立党为私、从吃饭到落实政策都要有人事关系，围绕着他们是一批奉承者、钻营利禄的政客、政治骗子、食客。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是多么憎恨他们。

[1] 金彝旦为煤管局八头。在八派领导层排第四。至此，八派一二（黄、刘）三四（杨、金）把手正式分裂。

无论是高呼“批谭、划线”，还是反击者的理论，都是权势者的需要。“有权势者的走卒总是用虚伪的吹嘘毒化着社会的舆论”。

《提纲》最后呼吁：

不要让社会上的一些错误舆论，把革命引入歧途，为机会主义者修砌升官的阶梯。历史的经验一定要吸取，革命群众毫无分裂的理由。

在两大山头间曲折蛇行，注定无所作为，事实上也确实一无所获。但仅就“提纲”而言，足见文革政治游戏大普及，即如杨树先一类工人，冠冕堂皇地玩弄肮脏的政治手段和政客语汇，已经到了多么老辣的境界。

与杨树先相比，炮派中的第三势力更缺乏孤注一掷的胆气，也注定更无作为：成辉、陈立新、李木昆、周继文、赵璋、范严生等45名当年风云人物，邀请新华社记者到场与会，搞了一个《部分老造反座谈纪要》，观点与杨树先大同小异。但大字报直到5月31日才在邮电大楼贴出。那一天，中央18号文件正式下达。宣布大字报可以上街了。文件自豪地宣布：

敢于让革命群众贴大字报，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巩固、我们国家兴旺的表现，我们应当有自信心，不要怕外国人看大字报。

3.5. 进退维谷的周兴

周兴一点儿也自信不起来。自接下云南这个烂摊子，从“批陈”到“批林”，从落实政策到稳定社会和“抓革命促生产”，周兴已费尽周章。特别是“反派性”、纠正“划线站队”的错误，更是殚精竭虑。作为八派推荐的干部，他这样做，本来就免不了对“自己人”造成伤害而多遇掣肘，甚至也难免因感情而偏见，使问题解决得不能尽如人意。但若假以时日，也许他是可以让云南局面逐渐向好的。如今派斗重开，“反潮流”把他和谭甫仁捆在一起批，“齐向阳”则对他“反派性、纠正划线站队错误”又不留情面，因其对王必成、陈康的容情而将他领衔的整个省委称作“毒蛇猛兽的巢穴”，要“彻

底揭开省委阶级斗争的盖子，揭不开就撬，撬不开就炸”，要把省委“沉没”“埋葬”。^[1]

周兴不能不乱了方寸。首先，他根本搞不懂北京到底要干什么；其次，两派气势汹汹的公开挑战，将他的计划彻底打破。现在他唯一可做的，就是左支右绌以维持平衡，台面上紧跟北京，走一步看一步。文革破产后，官史对此如此叙述：“周兴没有勇气纠正‘划线站队’的错误，而是和一些帮派势力相配合，转移了‘批林批孔’运动的大方向。云南‘批林批孔’变成了批‘反复辟、反倒退’、‘反潮流’、‘克己复礼’，痛击否定‘文化大革命’潮流的运动。”^[2]这种说法实在背离事实，也太不厚道。事实是，自“批林批孔”运动初开，对于贯彻北京的指示，周兴其实一直老老实实，未曾丝毫懈怠。

1月18日，中央一号文件下达，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1月31日，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便召开有3万多人参加的“批林批孔”群众大会。会上，由郭超传达中共中央有关“批林批孔”的指示精神，周兴做动员，并检查了前一段对运动领导不力和存在“走后门”等不正之风，号召机关和部队迅速掀起“批林批孔”运动的新高潮，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梁文英作“批林批孔”报告，提出各级党委要把“批林批孔”作为头等大事来抓，“敢”字当头，带头批。要密切联系实际，首先是联系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和罪行这个最大的实际。2月3日至11日，省委又用8天时间召开了地委书记会议进行学习并部署运动。

关于如何联系云南实际开展“批林批孔”，省委常委内部在会议上出现了尖锐对立。一种意见认为，谭甫仁积极推行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林批孔”必须联系批谭，批“划线站队”；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批林批孔”联系云南实际，只能批否定文化大革命和反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右倾思潮，“批谭”“批划线站队”就是干扰“批林批孔”，转移斗争大方向，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其时，周兴安排昆明市委书记黎韦正紧锣密鼓召开市委八次全会、市革委十九次全会“反派性”，纠正“划线站队”错误。

面对省委内部的观点对峙，周兴的表态中规中矩。他说，“批林批孔”联系现实问题，首先要联系林彪反党集团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其次，如对待文化大革命和新生事物、“走后门”不正之风、各条战线上的两条道路斗争、国内外阶级敌人

[1]《云南“文化大革命”运动大事纪实》页309。

[2]同上，页291。

的破坏活动，都可以联系。作为领导干部，还要联系自己，解决世界观。

会议通过的省委《关于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部署意见》更是漫天撒网，不知所云。《意见》称：深入“批林批孔”，要害是批不批。批判中要抓住重点，深批实质，联系实际，批出效果。要通过批判林彪宣扬的孔老二的“克己复礼”等反动观点，批判林彪搞复辟倒退的反革命罪行，并联系实际，批判那种否定文化大革命、反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右倾思潮，批判城乡资本主义倾向；要通过批判林彪鼓吹的孔老二的“天命观”“生而知之”的天才论和“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和唯物史观，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要通过批判林彪贩卖的孔老二的“中庸之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狠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发扬敢于反潮流的大无畏精神，反对折中调和，反对拿原则做交易；要通过批判林彪鼓吹的孔老二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学而优则仕”等剥削阶级思想，反对修正主义路线回潮，坚持走“五七”道路，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坚持干部参加劳动，坚持纠正“走后门”等不正之风，同旧的传统观念决裂。《意见》还提出：一、在全省各条战线深入地、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斗争，密切联系当前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继续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二、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工农兵是“批林批孔”的主力，要充分发挥他们的先锋和骨干作用；三、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批林批孔”一定要联系实际，批判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批判那种否定文化大革命、反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右倾思潮，批判城乡资本主义倾向；四、各级党委要积极加强对这场运动的领导，把“批林批孔”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五、以“批林批孔”为动力，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广大群众和干部在“批林批孔”中激发出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及时组织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中去。

会后，省委立即成立“批林批孔”办公室，由梁文英兼任办公室主任。并确定以云南纺织厂、昆明钢铁厂、宾川县、路南县、盈江县、云南大学等一校二厂三县作为全省“批林批孔”运动的试点单位，由省委领导亲自抓，实行以点带面的工作方法。组织近百名联络员收集面上的情况，及时向省委汇报，并组织巡回报告小组，宣传、交流经验。

没承想“批办”成立仅仅一天，2月12日，省委即收到江青、王洪文关于“郑三发子”告状的批件。梁文英应声落马，省委不得

不让虽不懂“孔老二”为谁，但让各方都感觉安全的民兵英雄七林旺丹顶上主任之位。

“批林批孔”运动显愈来愈猛之势。3月19日，省级机关召开狠批“克己复礼”，痛击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反动思潮大会，5200多名省级机关干部参加。省委副书记七林旺丹首次登台亮相并发表讲话称：当前要集中地批判林彪“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痛击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反动思潮，防止纠缠某些问题而冲淡“批林批孔”。所谓“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动思潮”有：攻击文化大革命“搞乱了”“搞糟了”，是“王明路线的重演”；反对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借口“批极左”，把矛头对准群众，对准文化大革命；为文化大革命中挖出来的林彪反党集团涂脂抹粉，鸣冤叫屈；公然为被打倒的刘少奇在云南的代理人翻案；歪曲、诬蔑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大好形势，说“今不如昔”；攻击和否定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卫生革命、“五七”干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新生事物；提出要对革命的新干部“从上到下一锅端”“赶回到起跑线上”等。认为这些都是当前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反动思潮的严重表现。说痛击这股右倾复辟思潮，坚持继续革命，反对复辟倒退；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重战斗任务。

在云南文革闹腾得你死我活之际，旺丹一直蛰居远山雪原，对两派纷争一无所知，他的批孔报告，不过由人捉刀，人云亦云罢了。这个新主任能做的，也就是跟随北京（当然也跟随周兴）的调子起舞。比如让《云南日报》不断发表文章批判“克己复礼”；还有，根据毛泽东关于“要出题考教授”的谈话，由省教育局对昆明地区6所高等院校的70多名教授、副教授进行文化考试，对知识分子进行羞辱^[1]。

周兴“顾左右而言他”的做法，随着“反潮流”和“齐向阳”两面夹击，终于难以为继。4月2日至10日，在省委常委和昆明军区党委常委召开的联席会上，周兴旧话重提，开始“帮助”第二书记、省革委第一副主任、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解决所谓“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的问题。^[2]同时，《云南日报》陆续刊登文章，不点名地对他进行批判，其中又集中批判王所宣扬的“云南还没有完全

[1]1973年12月30日，国务院科教组和北京市革委科教组根据毛泽东讲话精神，采取突然袭击方法对北京17所高校631名教授、副教授进行数理化考试，借此否定大学入学考试和其他考试的必要性。

[2]此精神系据1973年1月3日中央政治局对云南问题的4条指示所提。

走上九大路线的轨道”^[1]。省委机关也开始上阵。笔者所在的办公厅政策调研处亦参与混战，于4月24日编印出36页供批判用的“材料摘编”《林彪死党与蔡雷马董》，矛头直指“钉子头”王必成。省委写作小组亦用该题材著文，发表于5月7日的《云南日报》，不点名批判王对云南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和诬蔑，是要把云南拉向林彪的反革命复辟的轨道。

回想年初，周兴还在殚精竭虑地“反派性”纠偏，如今面对“反潮流”（上层是王必成、陈康）的步步紧逼，不得不马上调转枪口反击。这情况让人想起1959年的庐山会议，毛泽东本想对1958年的“大跃进”纠偏，皆因“彭大将军”发难，于是干脆大反右倾，大打“三面红旗”保卫战。这种“心理逆反”，对于政治强人，尤其领袖级的政治强人，几乎是一个规律性的现象。按社会心理学解释，这种因强烈自恋而生出的反抗心态往往出现于“客观环境要求与主体需要不相符合”之时。领袖人物自尊心总是过强，以至于强到非常脆弱的程度。一遇挑战，便有大受伤害之怨，于是便会本能地起而反抗，甚至失去理性，连自己已经认同的事物，他也反——只因这事物被挑战方认同。“反派性”本是年初周兴与黎韦细针绵密商量好的计划，如今“反潮流”一提，周兴便完全反了过来，不由自主地作狮子之吼。

笔者工作笔记记录：6月6日下午3点，周兴在省委办公厅接见李毅带领的15个“反潮流”成员，周兴发挥其一贯风格，毫不客气地将对方全部顶回去：“李毅，你说我手伸得长，我说你才伸得长，你想管公安、管专案，你有什么权力？杨继铭，杀人犯，为什么不能审查？陈岳是走私犯，为什么不可以抓？”“你骂我独立王国，我说你才是独立王国！你那个告状团才是独立王国！”“我是主任，你是副主任，你有什么权力要我什么时候见就什么时候见？你要我丢下全省工作不管吗？你这是以派压党！”

此时，还发生了一让周兴更无法忍受的事件：田维扬事件。这一回，周兴简直就豁出去，甚至直接和第一夫人江青干了起来^[2]。

田维扬，昆明军区副司令，湖北枣阳人，1927年参加鄂北起义投身中共。曾在林彪麾下东北野战军4纵任11师师长，建国后任贵州省军区司令员、昆明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授中将军衔。文革

[1] 这话是林彪1970年5月间针对云南派性问题严重讲的，王回来作了传达，并称云南军队的派性比地方还要大，军队派性又主要产生在军区党委常委和三大机关。

[2] 《怀念周兴》页48。

中观点属铁八，其支派之铁，可举一例说明：“划线站队”时，在二七八厂^[1]担任军代表、革委会主任王文广深感八派群众对炮派头领和群众打击太过残酷，遂前去军区找分管国防工业的田维扬副司令汇报278厂情况，汇报到工厂运动打击面过大时，他（田维扬）竟说：“那个厂是个黑窝子，有多少揪多少，大胆地搞！”^[2]

田维扬事件经过如下：

1974年夏天，云南派员到北京参加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会议期间，该与会者送回一封信，嘱大秘周永琪面交周兴。信中附有江青在天津文艺界一次讲话的打印记录稿。该讲话称：“林彪在云南有个不大不小的死党，他在贵州一次就送给林彪一百瓶茅台酒，此人至今没人动。”来信称：听说江青所指的云南这个林彪死党，就是昆明军区副司令员田维扬。

此事让急性子周兴一时大感困扰。周永琪的回忆道：

怎么办呢？周兴作为昆明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对江青这个讲话十分为难。相信吧，没有任何根据；不相信吧，江青又是个“特殊人物”。考虑再三，周兴便召开昆明军区党委常委紧急开会，认真研究了江青的讲话。常委们一致认为：江青说这位副司令员是林彪的死党没有确切根据。一是他在贵州时并没有送林彪一百瓶茅台酒的事情；二是他在四野时与林彪只是上下级关系。这种望风捕影的事，怎么能如此定性？周兴立即用昆明军区党委的名义并个人签名，向毛主席、周总理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了个加急电报。大意是说：江青同志某日在天津文艺界的一次讲话中说：“林彪在云南有个不大不小的死党，一次就送给林彪一百瓶茅台酒，至今未被揭露。”据说她指的是昆明军区一位副司令员。他现在上海养病。这么大的事，我们未接到中央正式通知，很不好办，请中央指示，以便遵照办理。

周兴以为这样处理是很正常的事，但万万没有想到，却引出一场大祸。

1974年10月，周兴去北京参加一次中央政治局召开

[1] 位于昆明西山脚下的278厂系预制铁路用混凝土桥梁的军工厂。

[2] 王文广：《八十年风雨录》页67。王系炮4师干部，文革后先后任14军宣传处长、云南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副主任、科研所副主任，1993年离休。

的高干会议。会上，江青大发雷霆，指着周兴说：“你这个周兴，搞情报搞到我头上来了。我在天津讲一个话，你马上就知道了。你肯定设了情报站！””

“你血口喷人！”周兴站起来反驳。

当时被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劝住了。

散会后，周兴回到京西宾馆已是凌晨一点多钟。我听完周兴讲吵架的事以后，问周兴过去是否和江青有仇？周说：“在延安，江青一直瞧不起保卫部门，说我们是搞特务工作的。我也瞧不起她，她不过是上海的戏子，交际花出身。”并再三嘱咐我：“不要对任何人讲，这个女人心狠手毒，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不久，中央召开十大军区司令员、政委会议。在一次西南大组会议上，江青抓住周兴迟到了几分钟，借题发挥，当着二十多个高级干部的面批评说：“呵！周兴同志你迟到了！坐下，坐下。你这个周兴，我劝你再不要搞派性了，要尽快回到党的立场上来！”这劈头盖脸的一击，打得周兴不知所措，连在场的人也感到莫名其妙。这次周兴用极大的耐力忍住了，没有和她吵。回到京西宾馆后，在日记上写了一句话：“生平最大的一次侮辱！”^[1]

周永琪回忆：“周兴同志在临终前，在北京医院病床上曾对我多次讲过：他参加革命五十多年，遗恨终生的事只有一件，就是1974年江青整他的事没有得到澄清。”

笔者以为，周兴为此事大动肝火，还有一暗因存焉：田维扬文革中系为铁八，昆明军区的基本盘。“齐向阳”批蔡马雷董、挖钉子头王必成、“反潮流”批谭甫仁一片混战，事情了犹未了，江青突然又宣布“老八队员”田维扬是林彪“不大不小的死党”，无异于给“反潮流”火上浇油，给本已够乱的云南政坛再添乱数。周兴焉能不勃然大怒？

3.6. 短命的喧嚣

5月31日，中央18号文件下达。文件称：允许群众贴大字报，

[1]《怀念周兴》页54。

允许外国人看大字报，这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1]。事实上，云南局面立即迅速恶化了。

“反潮流”首先贴出大字报，称“中央18号文件是对周兴的致命打击，是对‘515事件’的肯定”，齐向阳亦马上跟进，“打倒陈康！”的标语顷刻间满城覆盖。

是日，正逢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思来昆访问。上午去石林，昆明街面尚干净，下午返回便见大字报满城乱飞。欢迎晚会在国防剧院举行，由国防文工团演出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剧院门口4根大柱正好贴着4个大字：“打倒陈康”。外宾好奇地问翻译：“陈康？是陪同我们的陈康吗？把他打倒了，谁陪同我们？”那一晚，街头出现了许多外国记者，他们不想看舞剧。大街上的戏剧更热闹。

混乱急速升级，6月2日，李毅、方向东带领“反潮流”宣传车冲进省委办公厅，声称要抓“515”事件的刽子手周兴，进得大楼，在大厅内肆意涂鸦、吵闹、喧嚣不息。

20天前的5月11日，云南与四川交界处刚发生了7.1级地震，震中烈度9度。云南永善、大关、盐津、绥江四县和四川雷波县30多个区（乡）遭不同程度的破坏，造成1423人死亡，1600人受伤，损失牲畜2000多头，66000余间房屋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其中28000余间倒塌。极震区出现大量崩塌、滑坡，木杆河峡谷两侧尤甚。崩塌体使极震区的渠、耕地遭毁；海口、顺河两处巨大的滑坡堰塞体堵河成湖；手扒崖大崩塌使该居民点全村被埋，居民无一幸免。

6月2日，省委常委正在翠湖宾馆向中央慰问团汇报“抗震救灾”工作。“反潮流”宣传车得知信息，立即由省委办公厅移师翠湖宾馆，将汇报会场包围。与会常委有云，称5月15日晚上的事是由陈康同志主持的，情况陈康同志都知道。陈康听罢，冲冠一怒，拍桌子道：“胡说！是集体定的！”继而令朱刚^[2]出去做工作。朱刚提出要陈康一同去，陈康坚持不去，朱刚遂与省委副秘书长周永祺出去与李毅、方向东等谈判解围。朱刚为军人省委常委，八派观点，而周永琪乃周兴贴身大秘。“反潮流”如获大果，将二人围攻后直接胁迫揪至已被其占领的省委接待站控制。

此前，“反潮流”和“齐向阳”均按各自调子各吹各打，互不干涉，朱、周被抓事件成为导火线，两派终于彼此正式对垒开战。

[1] 这是笔者工作笔记对文件的摘抄（无法找到原文件），非原文，但内容基本不错。

[2] 朱刚，昆明空军指挥部副政委。省革委副主任、省委常委、八派观点。

6月3日起，昆明城满街都是“齐向阳”的大标语：《陈康唆使李毅、方向东绑架朱刚、周永祺同志罪责难逃》《省革委副主任陈康和李毅一伙互相勾结绝没有好下场》《李毅在“批林批孔”中为非作歹罪该万死》云云。作为云南省最高权力机构的机关干部们也不再淡定，署名“省委办公厅革命群众”的《严正声明》于6月4日高调发布。传单的题目怒指“陈康必须对李毅、方向东一伙冲击省委办公厅，绑架朱刚、周永祺同志的严重政治事件负责”。本不当不立立场、高居社会上端对两派实施安抚仲裁的领导机关发表如此《严正声明》，本身就很不靠谱，亦说明事情已经越来越不可收拾。

为避免闹事群众干扰，那段时间的常委会议都如“飞行集会”，四处转移。6月4日的常委会是在连云宾馆举行的，中午会议结束，头头脑脑一个个悄然离开。早守候在会议室旁的朱刚夫人、周永祺夫人杨某及三个记者立即上前将陈康堵住了。杨某，北京人，中学教师，乃周永琪随周兴在最高检工作期间认识并结婚的。杨系满族血统，娴静文雅，大有“格格”之风，是日救夫心切，缠着陈康要人，陈康装聋作哑答：“我不知道啊！本来，那天叫我去做工作，周永琪说，让朱刚同志去吧，这样他们两人就去了。”杨老师没词儿，陈康称有事要走，杨老师死活不放，陈康又施一计，说：“好吧，叫服务员开两间房。咱们都先休息休息。”等杨老师进屋里去，陈乘机溜了。

其时昭通地震余波未平，滇西又遭连日大雨，多县遭受水灾。6月6日早，楚雄州给省委办公厅来电告急，称昨日一夜，下了87mm的雨，城区进水一米多，3000多房屋进水。50多户倒塌……且雨还在狂下^[1]。周兴正在心烦，李毅偏偏又带领15名“反潮流”头目来办公厅围堵，遂有周兴将李毅全部顶回，大义凛然怒斥李“以派压党”的决绝之骂。

省委机关工作人员本多八佬，此时宣传部和组织部亦有40多人冲来办公厅要求接见，实为救驾兼添乱。他们见陈康正从二楼下来，立即揪住不放，要求接见。陈道可以，只是需预约时间。或问：“什么时候？”陈答：“星期六吧。”又问：“上午还是下午？”又答：“下午”。回话痛快，只好让他走了。可惜汽车发不动——原来火花塞已被人拔掉。陈只好换一辆车匆匆离开。

第二天，6月7日，个旧的“反潮流”告状团继续来省委办公厅楼口堵周兴。为首者据称为个旧三中教师王家林，云南大学物理

[1]上述情况和数据摘自笔者现场工作笔记。

系65届毕业生，彝族，性格与方向东颇为相似，多倔强而少理智。守候既久，见周兴迟迟不出现，王于是大呼：“立正！跪下！”

所有人“砰”地一下全跪下了。一跪便两个多小时，周兴要求他们起来再说，道：“你们不起来，我也跪下！”告状团表示：“你要跪就跪，与我们屁相干！”有人提示：“逼省委书记下跪，你们什么责任，应该知道的”。无奈之时，李毅出面劝慰，跪下的人只管大骂道：“滚开！谁同你说？不是你们头头右倾，我们不会受这么多苦！”又称：“我们继续跪下去！过去‘划线站队’，几天几夜都跪过了。这有什么了不起？”最后周兴让步，在办公厅接见了“跪众”。

又次日，“反潮流”和“齐向阳”正式发生大规模肢体冲突。是为“批林批孔”中唯一的群体武斗，史称“六八事件”。过程如下：

6月8日晚，市医药公司的“齐向阳”在正义路和庆云街交叉口贴大字报，将“反潮流”的大字报覆盖，双派发生争执，“反潮流”又将“齐向阳”的大字报撕了，并去接待站急调50余人前来助战，双方大打出手，“齐向阳”力量不敌、多人受伤。是时，正好昆一钢“齐向阳”宣传车赶到，“反潮流”趁怒将宣传车砸烂，然后冲进八派控制的近日百货大楼狂砸柜台……武斗大有迅速升级之势。

其时，昆明市第一商业局^[1]局长兼党委书记许少先正在上海联系调购汽车事宜，昆明事态骤然恶化至此，遂急电他回昆处理。

许少先，云南澄江人，从小聪明伶俐且调皮捣蛋，13岁即被地下党弄来昆明威远街77号作“地下交通员”，典型共产党红小鬼。共产党建政后，许先后担任过被服厂厂长、五金厂厂长，“大跃进”时期还当过钢铁厂厂长，生产出500多吨土钢……许性格豪放，行事大胆，人称“许大马棒”，文革造反起家，遂升任了一商局局长。正是全民生活物资奇缺时代，粮食、肉类、牛奶、白糖、蜂窝煤不必说，若干地方连灯泡、妇女卫生巾等都需要凭票凭证供应：一商局正是这些物资分配的总阀门，许局长的权力和影响力之大可想而知，加上他还是昆明市民兵指挥部副总指挥，手握枪杆子。这样的人造反起家，文革破产后自然被当局收监，判处死缓。

现年86岁的许先生如是回忆：

我从上海飞回来，立马到省委大院44号周兴家汇报两派斗殴情况，要求省委派人解决。周兴不表态，我就说

[1]一商业局负责主管国营商业企业。二商局负责集体企业。

他“和稀泥”。周夫人杨玉英在一旁说，现在老周也挺为难的，你们就别给他添麻烦了。周兴的儿子刘小京也在一旁劝。我就问：我们可不可以罢工？周兴说，你自己看宪法去，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示威游行、罢工……都可以。既然周兴不表态，我们于是决定罢工。

《昆明党史》记录：

1974年6月8日晚，昆明市第一商业局所属市药材公司“齐向阳”山头的造反组织，在近日楼闹市因张贴、覆盖对方大字报，与“反潮流”人员发生冲突，引起斗殴。刘殷农等借机扩大事态，歪曲事实真相，威逼市第一商业局核心小组向市委、省委、中央送“紧急报告”和“紧急电报”，夸大为有预谋的严重流血事件，要求严惩凶手。经市委派人调查，事件发生的经过和情节与“报告”的情况出入很大，故未作处理。刘殷农在常委会上威胁说：“如不严惩凶手，商业职工将采取罢市的手段。”逼迫市委表态。在不得已情况下，市委提出向省委写请示报告，（即“六九”报告）。由于报告内容仅是一方面反映的情况，不可能做到如实、公正，会后，市委另向省委作了电话汇报。但在报告打印过程中，帮派组织窃取了报告内容，用大字报捅向社会。并逼使商业局核心小组发出通知，组织所属各公司千余职工、汽车百余辆举行罢市游行，向省、市施加压力。在省委追查下，全市商店停业半日后恢复营业，在全省造成极坏影响。^[1]

此罢工罢市事件与笔者日记的记录大体一致：“经过次日准备，6月10日上午，‘齐向阳’便组织全市商业职工罢市，并开出78辆汽车上街游行，对‘反潮流’实施反击。下午，昆一钢再开出十余辆汽车加入游行，还到省委办公厅提出要求：要省委采取措施，解散告状团，否则，将在12日后采取革命行动，‘后果由省委负责。’”日记继续记录：

宣传车对准我们办公厅大楼吵。杨总支（笔者注：周

[1]《昆明党史》第七章第三节“从帮派篡权的新动乱到粉碎‘四人帮’的胜利”。

兴夫人杨玉英，时任省委办公厅机关党委书记）走进我们办公室，直是叹气：上当啦！上当啦！这些人，总不听指挥，闹什么？给省委帮倒忙呀，人家李毅、方向东就想你这样办呢！

是夜，省建再次发生群殴。起因是“反潮流”到省建贴大字报，要求改组公司“批林批孔办公室”，并动手推倒大批判专栏，双方发生冲突。“反潮流”有一人翻墙到隔壁逃出，隔壁正好是市委某机关，结果警卫把翻墙者抓了。“反潮流”于是调动人马来要人，用卡车冲倒大门。双方以砖头瓦片作武器，进行战斗，忽进忽退，一直打到四点，双方无伤亡，遂鸣金收兵。可怜观众被不长眼睛的石头打伤几个……

从运动开始到6月8日，武斗水平不过如此，小儿科罢了。足见本次运动何等不得人心。事虽如此，毕竟第一夫人带领全国搅屎，对百姓情绪的消极影响不能不大。即便不跟着山头草莽们到社会上打打杀杀，胡闹的政治活动对于正常生产的冲击也十分够呛，云南官方统计：“全省已建立了3.75万个理论小组，有27.5万多个成员”^[1]，还有各式各样的报告会、巡回宣讲、写文章批孔老二……这些，比老老实实待在车间干活确实轻松许多。滇南建水县孔庙因地处偏远而得以在“破四旧”中幸存，此时竟成了“香馍馍”，昆明人早听闻该孔庙规模仅次于曲阜，各工厂“理论组”和车间工人，遂纷纷公款前去“现场批孔”，旅游归来，只听一片赞美之声，效果好极了。

6月下旬，云南省委召集地、州、市委书记来昆召开座谈会总结5个月运动成果，部署下阶段计划。周兴的主旨演讲充分肯定运动“集中批判了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提高了广大群众和干部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提高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觉性，推动了理论队伍的建设。”“有力地促进工农业的发展，带来了经济战线的好形势。”此外则特别指出“进一步揭发批判了林彪反党集团在云南阴谋复辟的罪行，基本揭开了第十次路线斗争在云南的盖子。充分运用‘四大’武器，口诛笔伐集中揭发批判了林彪反党集团安在云南的钉子：蔡、马、雷、董参与林彪阴谋活动，妄图在云南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特别是揭发批判了王必成同志的严重问题，深刻批判了他散布的林贼诬蔑‘云南没有完全走上九大路线轨道’等反动言论，是这一段斗争的一个很

[1]《当代云南大事纪要》1974年卷。

大的胜利”“还揭发批判了某些领导同志，特别是省委内部个别负责同志否定文化大革命、压制和干扰破坏批孔运动错误言论和行动。”^[1]演讲中所谓“省委内部个别负责同志”，一听而知是指“反潮流”派的代理人陈康。

事情至此，曾经将调整平衡两派的关系、稳定云南局势为首要任务的周兴重新倒向了“齐向阳”。完全可以预估，如果事情照此发展，周兴本人几年来所下功夫将再次归零。会议消息一经传出，“反潮流”人员立即进驻会议所在地——连云宾馆，包围会场，使参加人员无法外出。

具有喜剧意味的是，云南经济形势并非周兴说的，五个月的运动“有力地促进工农业的发展，带来了经济战线的好形势。”恰恰相反，由于“批林批孔”造成的大反复，许多落实了政策、安排了工作的领导干部再次被打倒或靠边站，企业中初步恢复的规章制度和正常秩序被重新打乱，云南经济情况再度恶化。官方数据显示：1974年云南全年工农业总产值74.5亿元，比上年下降1.8%。其中钢铁下降18.5%；10种有色金属下降22.1%。社会商品零售总额28.1亿元，下降4.7%；财政收入下降4.7%^[2]。全国经济状态亦然。北京不能不着急了。

地、州、市委书记座谈会从23日开到30日结束，次日，中共中央便下达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通知》规定：不准揪斗干部，不准打人抓人，擅离职守的领导和其他人员必须返回工作岗位，对于有关劳动工资经济政策方面的问题，一律放到运动后期统筹解决；对于那些把打内战、停工停产的行为说成是“反潮流”“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错误言论，必须加以批驳。各级党委要认真检查一次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订出增产节约的有效措施。

政治高温陡然下降了。

如果说，4月10日中发12号文件要求“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是给那些乱世枭雄的第一道紧箍咒，那么，7月1日的《通知》成了他们第二道紧箍咒。他们想乘机改变命运的操作空间越来越小。周兴倔强性格，耿直得很可爱，而一旦失去理性，又会变得刚愎自用。这一回，北京的敕令给他当头一瓢凉水，使他没有再沿着已然逆反的道路滑下去。

[1] 同上。

[2] 同上。

7月5日，云南省委立即召开电话会议传达贯彻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精神，会议要求，各级党委要正确处理革命和生产的关系，一、二把手既要抓革命，又要抓生产，要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要坚守工作岗位，坚持原则，敢于领导，善于领导。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要和广大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团结在一起，坚持就地闹革命，严格遵守劳动纪律。接着，7月9日，又由云南省委、昆明市委和省、市总工会，妇联和共青团在东风体育馆联合召开有工人、贫下中农和财贸职工参加的“进一步掀起抓革命、促生产新高潮”的“誓师大会”。周兴、陈康、刘明辉、黎韦等出席大会。刘明辉在讲话中指出，今年是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关键性的一年，要求各级党委在抓好“批林批孔”的同时，认真检查一次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订出增产节约的有效措施，保证全面和超额完成今年国家计划。工矿、交通运输、财贸企业和人民公社的代表在会上发了言。大会提出，工交企业每一职工都要自觉维护和坚决服从党的领导。对党委在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应当进行批评，帮助其改正，但不能找借口摆脱、甚至削弱党的领导。笼统地讲“只要造领导的反就是反潮流”的说法是错误的。对那些大胆领导好运动，大胆抓生产的领导干部，要给予大力支持，对在工作中犯有错误的领导干部，也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热情地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广大干部、群众要坚持在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搞好批林批孔，不搞跨地区、跨行业的串联和“战斗队”“上访团”一类组织，坚决就地闹革命，业余闹革命，节约闹革命，坚守工作岗位和生产岗位，遵守劳动纪律。

9月，中央指示：“王必成的问题在中央解决了，不要再向他追问题，他也不再做检查了，要给他创造条件，支持他的工作”^[1]。据胡延观回忆，中央这个结论是在北京当面传达的。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有关人员集体晋京，住京西宾馆。中央首长前后接见两次，第一次只听汇报，不做表态，上呈毛泽东钦定，王必成表情颇紧张。几天后再会，传达了毛指示（大意）：听说王必成上了林彪贼船。上去了，下来就是了。实在下不来，就用吊车吊嘛！

王必成顿时大悦。回到宾馆就叫秘书去买哈密瓜请众官员大嚼

[1]1975年3月，中央领导人在北京接见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代表时，又再次重申：“王必成同志在十次路线斗争中的问题，毛主席、党中央已作了结论，不要再搞了”。1982年8月23日，中共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上报了《关于王必成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经中央批准，决定为王必成平反，恢复名誉。

以贺。到了10月，原本计划再乱一回的毛泽东已深感事情难以为继，于是发表了著名的最高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真可谓无可奈何，“运去英雄不自由”了。该指示是在10月11日发出的中央26号文件、即中央为召开四届人大发出《通知》中转述的。23日，云南省委抓紧召开地（州、市）委书记会议，学习贯彻毛的最新指示。周兴主持会议。副书记郭超就贯彻全国抓革命、促生产会议的精神发表讲话。王必成则以副书记身份于闭幕式上部署今后工作，称：当前集中抓好中央26号文件的传达贯彻，当前总的要求是“以安定为好”，而不是要乱，那种“以乱求安定”的说法是错误的，是违背毛主席战略部署的。王提出，首先，要继续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第二，要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一方面要抓好对第十次路线斗争的政策落实。对犯了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有的要作出结论，有的在适当范围内讲清楚就行了。对于根本不属于清查范围的人和事，要积极做好群众工作，不要无限上纲，不要再纠缠。另一方面，对省革委成立以来，大批判、“清队”“一打三反”、整党建党、深挖“五一六”等运动遗留下来的政策和问题，也要抓紧落实，要见诸行动，不要光说不做，久拖不决；第三，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以实际行动迎接四届人大的召开。一副息事宁人、皆大欢喜的满足和超然。

最为失落者自是各山头的草根英雄，辛辛苦苦忙活一年，浪费不少表情，如今只落得两手空空。极度失望的“反潮流”再次冲击了10月23日会场，将周兴和陈康围困了整整3天，直到中共新科副主席王洪文从北京发来“指示”才将人放回。这已是强弩之末，成了1966年天下大乱克隆版的最后绝响。

顺便补充的是，带领人员围攻大会的头领之一，是当年云南大学炮派的武斗队长N某。N某生得孔武魁伟，世代医家之后。文革破产，官僚集团重掌权柄握，再20余年，N终得荣升云南省副省长。

1975年1月13日，全国“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在周恩来治病期间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工作，坚定地、有步骤地进行全面整顿工作，为时一年的“批林批孔”运动宣告结束。此前的1974年末12月31日，中共中央向云南发出“通知”：最近一个时期，云南红河、沙甸、玉溪、文山地区双方发生武斗事件是错误的。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央决定通知下列人员于1975年1月3日前到北京开会：一、马伯华、郑全书、马少美等回民代表10人；二、红河州委书记冯治国、红河州革委政工组长曹占元、云南锡业公司党委书记张庆芳以及文山州、个旧市和建水、蒙自、

开远、通海、玉溪等县的负责人各一人；三、云南省革委副主任黄兆其，李毅，省革委常委杨树先、方向东、刘殷农；四、除周兴已在北京外，上述人员由云南省委陈康、刘明辉、王砚泉以及李长猛（省民边委副主任）、周韧（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带队来京。

1月27日，“圈禁”京城黄兆其，李毅，杨树先、方向东、刘殷农联名向中共中央和省委做了关于削平山头的报告，承认拉山头、搞串联是错误的，是违背中共中央规定的，并保证：一、无条件地撤销所有山头；二、停止一切跨行业、跨地区的串联活动，所有人员立即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三、停止一切互相攻击的大字报、大标语，撤销所有广播站；四、在各级党委的领导和统一部署下，搞好“批林批孔”，完成四届人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春节前，中央领导令他们回云南做“倒旗、脱钩、削山头”的工作，规定5天，于春节前完成。

1975年2月27日，省委发出《关于撤销省委批林批孔办公室的通知》，原“批办”所承担的工作，由省委有关部门分别承办。云南的“批林批孔”运动至此正式宣告结束。

真正的骚乱并没有结束。因“批林批孔”引爆的另一个矛盾，还会以更加暴烈的形式继续下去。与潮涨潮落的造反派相较，真正对云南当局构成杀伤力的，是云南的回民骚乱，这段旋律虽然在1974年的社会混乱中狂飙突起。但最初的音符并非起自“批林批孔”，休止符也没有落点于1974年，相反，狂乱的奏鸣在“批林批孔”结束之后的新年里持续拉高，以至当局最后不得不动用军队，甚至大炮、机枪、火箭筒、火焰喷射器加以解决。这段公案我们必须辟专章进行记述。

第四章 云南民族关系的血色之殇（上）

4.1. “回乱”溯源

1974年震动云南的回民骚乱，是从滇南沙甸村引爆的。沙甸位于红河自治州蒙自县，是云南最大的一个回族聚居村寨，1500多户，7000多人，为鸡街公社下属的一个生产大队，素以文化教育发达著称。根据沙甸历史资料统计，明清及民国时期，沙甸就出过“师爷”以上文人330多名。民国初年，沙甸人口不足3000，其3所清真寺和两所中、阿文并授的经学学堂，先后培养出300多名阿訇。1930年代，9名中国穆斯林青年赴埃及留学，沙甸便占5席。后来成为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的马坚便是其中之一。马坚先生翻译的汉语版《古兰经》在海内外享有极高声誉。^[1]

云南回族聚居较为集中者，有滇东北昭通地区鲁甸县、滇西大理州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和滇南红河州的个（旧）、开（远）蒙（自）地区。1856年大理曾发生过由杜文秀领导的著名回民起义，史称“滇西回乱”。杜文秀起义与震动国中的太平天国东西呼应，兵焰甚炽，曾一度兵临昆明城下，直到南京洪氏小朝廷被曾国藩剿灭，1872年，清廷才得以调兵入滇，将杜文秀部彻底荡平。史载，杜起义十余年间，汉回之间类乎种族灭绝的残杀，曾让滇西一带十室九空。民族仇恨在相当长的时间都难以消弭。共产党接掌云南之初，对少数民族采取细腻而温和的政策，对于融合云南

[1] 参看《沙甸回族史料》，中共红河州委宣传部1989年审定版。

各民族之间关系，甚得良效。尤其回族，考虑该族全民信奉伊斯兰教、风俗习惯和生活习惯的特殊之处，政府的政策更给予了特殊照顾，如将开斋节、古尔邦节和圣纪节定为回众法定节日。在生活用品紧缺，实行票证配额的情况下，昆明汉族食油配给每月每人仅4市两、回族则为7市两，牛羊肉的配给量也高于汉族；回族实行土葬，遗体需白布包裹，所需布票亦给予特供，每位死者3丈至3.6丈。等等。^[1]

可惜，自1950年代末一连串假理想之名实施的荒唐行径：“大跃进”、人民公社、大食堂让当政者与少数民族渐生疏离。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正式定义“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继而毛泽东再次强调：“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原来那一套行之有效的政策理所当然就被斥之为民族工作的“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而横遭挞伐。“当时的批判者断言，这条路线最本质、最主要的东西，就是否认阶级问题是民族问题的实质，否认我们国家中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存在是民族问题存在的根源，否认民族问题的解决是一个阶级问题、革命问题。以此为依据，给我们党的各项民族政策扣上‘反对阶级斗争’‘反对革命’等等莫须有的罪名”^[2]。“斗”声日急，伊斯兰文化渊源深厚的回族和云南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地一样，焉能逃此劫运？

1965年，作为文革预演的农村“四清”轰轰烈烈开展，沙甸自然成了需用“社会主义思想”加以彻底打理的“顽固堡垒”，并被红河州圈定为“运动试点单位”，派工作队开展拉网式的“社会主义教育”。沙甸“四清”运动的重要成果，就是3所清真寺被全部关闭，宗教礼拜活动亦被全部叫停。

“四清”刚过，文革接踵又至。破“四旧”是文革重要主题之一。存活于回族民间、已然融入生活方式的伊斯兰宗教文化理当归属“四旧”，又该再“横扫”一回。文革造反之初，沙甸确实兴起了两个“造反”组织：“毛泽东思想大无畏造反兵团”和“毛泽东思想红色造反队”，他们的政治宣言也和风魔内地的红卫兵同一范式，不仅要“保卫‘四清’运动的伟大成果”，继续占领“封建堡垒”清真寺，禁

[1] 马绍忠：《中国共产党的回族政策》，载《民族工作之路》页353-362，云南民族出版社，2009。

[2] 《人民日报》1980年7月15日，特约评论员：《评所谓“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

止群众礼拜，还“疯狂地烧起宗教经典和‘地富反坏右’家的书籍来。”^[1]

不同的是，1966年秋天的云南社会状态已和“四清”时候决然不同：天下大乱。各级地方政权在造反派的冲击之下七零八落。文革前曾经的政治高压陡然缓释，每个人都能以保卫毛泽东思想正统性的旗帜为掩护，表达完全不同的政治诉求。“四清”运动取缔伊斯兰文化风习而引发沙甸回民的憋屈愤懑，此刻终于得以彻底释放。激进造反派“大无畏兵团”和“红色造反派”坚持要封闭清真寺，“保卫四清运动的伟大成果”，更多回民则成立“造反派”来保卫清真寺，这个组织直接取名“民族政策捍卫兵团”。“捍卫兵团”的政治诉求理直气壮：关闭清真寺、禁止做礼拜是走资派“破坏共产党民族政策”的阴谋，必须彻底粉碎。沙甸人全是回族，98%的群众理所当然站到了“捍卫团”一边。他们痛批“大无畏兵团”和“红色造反派”的胡作非为，断然打开被“四清”工作队封闭的清真寺，正式进行礼拜。那年月，文化大革命在全中国闹闹嚷嚷，造反派都为争夺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正统名分而大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搞“一日生活毛泽东思想化”，偏居云南边陲的回民村落，他们的文革主题偏偏特立独行，高举着毛泽东旗帜进入清真寺去礼拜真主、诵读古兰经，行“五功”。用当事人马绍美的话说，沙甸“造反”与“捍卫”“革命”与“复辟”的勇士，主题就是“一场争夺清真寺的斗争”^[2]

沙甸地处滇南两座工业城市：个旧和开远之间。文革期间，“炮派”控制个旧，“八派”控制开远，沙甸遂成“八”“炮”两派争夺的战略前沿。就距离而言，个旧稍近而开远略远，沙甸村占绝对优势的“民族政策捍卫兵团”自然归属了“炮派”。于是，到1968年秋天“新生红色政权”省革委会成立，横扫云南的“划线站队”以合法的、杀气腾腾的霹雳手段将业已出现的社会撕裂推向极致。当是时也，滇南地区遭受打压的500多“老炮”纷纷逃来沙甸避难，于是沙甸便成了政治“马蜂窝”，被作为“精神异教”和“政治异教”而狂捅一气，其景之凄惨，本书卷三“谭甫仁时代”已有记录，兹不赘述。

政治高压下的文革“胜利”本来就很脆弱，待到1971年“913事件”突发，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广遭质疑。饱受凌辱的沙甸由此反弹。

[1] 马绍美：《沙甸事件概述》，载《沙甸回族史料》页46-57。

[2] 同上，页46-57。

1972年，从河南来了一个名叫马光普的“独行侠”，自称阿訇——在政府文件里，他的身份被定义为“伪军官”——他到云南四处“传教”，讲话稿被整理成油印小册子，通过邮局广为寄发。小册子题名《伊斯兰真理辩证法》。如此异端传播自然让当局震怒，于是下令全省收缴。收缴的印刷品曾多有送来省委办公厅者，笔者得以看过且记忆深刻。讲稿一问一答，很富煽动性，下面凭记忆略录片段^[1]：

问：为什么说真主存在？

答：机器没有工人开不会动；汽车没有司机驾驶不会走；我们现在学科学，已经知道地球是转动的。地球这么大，有谁能将它转得动呢？唯有真主。

问：请问真主在什么地方？

答：屋子里飞着一只苍蝇，如果你问它，屋子在什么地方？苍蝇该怎么回答？它可以说屋子在上也在下，在左也在右，在前也在后。对于苍蝇来说，屋子实在太大，可说是无所不在。同样，真主对于渺小的人类也是无比巨大，无所不在。

问：你见过真主吗？

答：没见过。

问，既然没见过，你怎么知道他存在？

答：秦始皇你见过吗？马克思你见过吗？没见过，但是他们都存在。

回民们在文革中遭遇的巨大凌辱，使他们本已归附共产党教化的心灵，又开始重返真主的怀抱。马光普的煽动在云南回民群体中掀起的思想风暴，成了后来愈演愈烈的回民骚动的舆论先声。接下来马光普带着两名沙甸信徒离滇继续外出传道，刚到西安即被公安人员抓获。马光普被押解回籍，两个沙甸人则被递解回昆——递解回昆的一名马伯华，一名郑全书，后来成了云南回民领袖，并在后来当局的军事进剿中殉教而死。

[1] 云南民族学校校长马绍忠回忆文稿《帮助沙甸人们走出困境》中亦提及此事：“一个叫马光普的人……是河南人，冒充阿訇，到云南来活动，散布所谓《伊斯兰辩证法》，这是一株大毒草。他为了论证真主是没有方位的，就把真主和漂浮的空中的一点微小灰尘相比。”见马绍忠：《民族工作之路》，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9。

沙甸的清真寺是1973年10月被做礼拜的回民打开的。红河州和蒙自县委旋即派出了由部队和地方干部组成的82人宣传队进驻沙甸，封锁道路，堵断通往清真寺的通道。回民坚持绕道进入，宣传队又用高音喇叭进行干扰，强称“打开清真寺就是否定文革”“你打开一万次，我就封闭一万零一次”^[1]

11月27日，云南省委专门召开常委会研究回民问题。笔者参加会议并作了记录，现将有关内容摘要如下：

传达中央统战部童小鹏意见：你们的电话昨天研究了，认为省委提出的四条意见很好。宗教需要做长期艰苦细致的工作。河南马光普已抓起来了。他在全国流窜了七八个省，我们已经同河南联系，把马的材料转来。这是阶级斗争的反映。

1、清真寺问题。北京有45个，文革后停止活动。现在只开了一个，供外国人使用。考虑巩固文革成果，一开先例就不好办了……北京打开（清真寺）是政治局同意的。对于已开的，不要强行封，不承认其合法性。新疆、甘肃也有（这种情况）。

2、自封的阿訇不承认。不能到处搞活动。要用群众的积极分子做好群众工作。

3、开斋节的供应和放假。原来规定的面、油、放假，北京文革中取缔了，今年要求给两斤白面、二两清油。北京不放假，对群众说服教育，特别是党员干部带头。全国都放假，抓革命促生产怎么办？

回族食堂要请单位解决，这不是宗教而是习惯问题。我们不做好工作，就给敌人造成可乘之机。要进行教育，提高群众觉悟，坏人就暴露了，就不会出乱子。对合理的要求要解决。如有人不愿意和汉人一起洗澡，要到清真寺洗澡池洗，北京已解决。清真寺北京开一个，是给外国人的。不要把当前活动合法化。仅作参考，请省委决定。

（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周韧发言：当前情况为什么严重？主要是阶级敌人捣乱。他提出了两点工作措施：一是做好民族工作，落实具体规定；二是要正确贯彻党的宗教

[1] 马黑：《父亲往事》万维读者网（readers.net2014\03\08）《天下论坛》。马黑系参加解决沙甸问题的云南省民族委员会副主任李长猛之子。

政策，提倡信教自由，也提倡不信教自由。在回族地区，不信教是没有自由的，因此要保护不信教的自由，要保护不信教者。信教，不是无边界的自由，不能妨碍生产，更不能搞违法活动。要认真执行“十禁止，六保证（第三次伊斯兰教会决定的）”^[1]：1.禁止清真寺和（此处未记清）……2.要做好信教群众的工作，首先要抓好党团员和基层干部的工作；3.揭露和打击披着宗教外衣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反动分子；4.把反动传单案作为大案要案来破……

昆明市委书记黎韦发言：昆明回族3万多。回族问题昆明市委多年未研究过。我们有大汉族主义，给敌人钻了空子。关于存在的问题，他提了几点：

1. 顺城街清真寺，人防工程（指挥部）住在那里，在里面养猪，吃猪肉。那儿是回族聚居街；
2. 猪牛羊肉混运；
3. 建大寨田带出的回族迁坟问题；
4. 回族食堂、回族职工补助问题。

周兴讲话火色最足，盖三点：

1. 可以到清真寺去唱对台戏；
2. 可以抓（闹事回民的）其他问题，如搞投机倒把，吹大烟；
3. 生活问题可以不管，但原则问题不能退让。（清真寺）封闭了的不开放。最好交给进步阿訇来控制。要从思想上、政治上保护进步的阿訇和回族群众，打击坏分子。做分化瓦解工作。

宗教问题要斗到共产主义。还夹杂着一个科学知识的普及教育问题。

十条、六条，其中要考虑文化大革命的新情况。

清真寺把门锁了。撬了再锁。锁了再撬，再锁。搞它几十万次。

要抓阶级斗争，讲阶级压迫。他们（指回民闹事者）的真理就是林彪、刘少奇……

[1]笔记对“第三次伊斯兰教会”“十禁止”“六保证”等没有记录。以下的一二条亦不清楚。

共产党执政经年，运动多多，早已总结出一套整肃反对派的成熟战法。如从内部收买“进步人士”以分化瓦解、如抓“其他问题”予以打击等等。只是遇到群体性的宗教问题，这些现成经验就显得有些笨拙了。我们很快会看到，面对云南回民的群体性的反抗，共产党官员的做法多么蛮横却毫无用处。笔者并不想对周兴一千官员过多指责，毛泽东发动文革，本质上不就想奠立他历史上“秦始皇加马克思”的地位吗？经过文革几年来疯狂的造神活动，所谓“毛泽东思想”已经构建了宗教三要件：一、“神学”理论；二、神祇的“异迹”；三、敬拜仪式。伏尔泰在回顾英格兰的宗教情形时曾如是说：“如果英格兰境内只准许一种宗教存在，政府很可能会变得专断独行；要是只有两种宗教，人们会互相残杀。如果宗派众多，他们全都快乐地生活而且相安无事。”^[1]当时的中国，既然只能准许“一种宗教存在”，必须要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自然容不得任何思想异端存在。一旦官方的精神力量失去权威，就必得采用世俗暴力对异教徒实施绞杀。“批林批孔”乱局中，云南回民的反抗和当局的暴力对抗势不可免了。

4.2. 政治矛盾和民族矛盾的二重复调

官方历史载：1974年4月16日，也即昆明的三大山头正为“反派性”和“划线站队”问题闹得不可开交之时，进驻沙甸的宣传队在批判“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大会上再次扬言：“‘批林批孔’要结合批清真寺”，并点了回民代表马绍美、马伯华、郑全书等4人的名^[2]。

1974年6月1日，笔者的日记记录了一段昆明的亲眼见闻：

我正看大字报，忽然从正义路方向响来一阵锣鼓声。人们马上全涌去了：原来，是一辆三轮车。车上几个年轻人敲着锣鼓家什。后面，两个人抬着一张纸，上面写道：“马××的释放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接着是三人一排。当中一人胸前戴着一朵大红花……

[1]转引自[美]威尔·杜蓝特：《世界文明史》伏尔泰时代卷，页101，华夏出版社，2010。

[2]《当代云南大事纪要》1974年卷。

由于两边的人拥挤得很厉害，他们的队伍行进得很慢……显得有些不知所措，很难看出狱中归来的英雄气概。

后面还有几十个人，又是两人一排，分别抬着纸，纸上写这标语，全是“对回民造反派的镇压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强烈要求释放回民造反派×××、×××、×××等等。

人云：他们都是蒙自沙甸的。他们要恢复清真寺，与政府发生了冲突。

日记前一日，正值中央18号文件下达，鼓动群众大字报上街。“齐向阳”“反潮流”“大批判”风潮再掀高潮，云南回民跟随呼啸而起，很快与这些“批林批孔”群体合流。其次，沙甸回民的惨祸除了因精神异教本身，还有“划线站队”中炮派的“政治异教”身份，这理所当然决定他们选择了与“反潮流”结为同盟。

方向东在化名“王福生”自撰自印的《方向东传奇故事》中，这样记录了他和沙甸回民的交集：

1874年方向东把沙甸回民的三个领袖马伯华、马绍美、郑全书从沙甸请到昆明华山东路53号方的家里来商量，怎样做才能把云南的“划线站队”告到党中央毛主席那里，让中央来为我们平反，才能纠正“划线站队”的错误，我们当了“反革命”，被压制五六年了！怎么才有出头之日？

方向东与马伯华、马绍美、郑全书商议后，共同决定：把沙甸回民在“划线站队”中受到的迫害和民族歧视，作为云南的一个典型整理出来，写成给党中央、毛主席的报告。“报告写了几个大问题：一是‘划线站队’中把大部分回民和头头打成‘滇南挺进纵队’，都抓出去戴高帽挂黑牌游田、游山、游街示众，进行了捆、绑、吊、打等法西斯酷刑，逼迫跪着走路三公里，用人的鼻子拱厕所墙，叫作‘猪拱长城拱不倒’，学猪爬等侮辱回民。二是在清真寺里杀猪吃猪肉，把猪骨头丢到饮用的水井里。三是不准回民进清真寺礼拜，破坏民族政策。”^[1]

经过文革历练的“草包司令”方向东在此表现了非凡的政治智慧：这一招果然见效。方的回忆录继续说：“报告寄送北京党中央后，

[1]王福生：《方向东传奇纪事》页59，自印本，2013。

当时的副主席王洪文做了批示，要求纠正上述错误！这个批示下来之后，全省回民就发动起来了”“沙甸、文山、建水、开远数千回民要赴京上访。云南省委派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负责做工作，王必成司令员没有办法。就请方向东帮忙到开远去做回民工作，方向东到开远做了三天工作，回民提出为‘划线站队’平反的条件，王必成答复不了，回民不答应。方向东之后只好空手回昆明。第四天沙甸回民和全省回民二千多人集结昆明，购买包下62次昆明到北京的全部火车票，要赴京告状，省委只好通知停开62次昆明到北京的火车。”^[1]

官史证实了上述说法^[2]：

5月10日在北京上访的马伯华，郑全书给周恩来、邓小平写信，反映宣传队不执行政策情况，希望中央责成云南省委撤走驻沙甸宣传队，落实民族宗教政策（同年8月27日省委向中央写的《关于沙甸地区违反民族政策的调查报告》中，肯定“马、郑二同志向中央反映的情况基本上是属实的”）。中央办公厅信访局将此信摘报政治局。

5月14日，王洪文批示：“云南这类事已经发生不少，我意见将此件转周兴同志亲自抓一下民族政策的落实问题，并把有关的情况报告中央”。包括邓小平在内的政治局部分成员圈阅后转至云南省委。

省委不敢怠慢，两次派工作组下去调查了解情况并如实做了汇报。8月8日，生性急躁的周兴亲自来沙甸村现场办公。其时，周兴已年届古稀且深染沉疴。封疆大吏亲莅边地旧村，开会咨询意见，此事本身注定让远地的村夫农妇们感动不已。后来担任云南省政协主席的刘树生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如此记录：“群众怀着感激之情，诚恳地说出心里话，也发了些牢骚，倾吐了苦情，集中提了4点要求：1.落实民族宗教政策，打开所有清真寺，允许做礼拜；2.纠正“划线站队”错误，解决“捅马蜂窝”的遗留问题；3.清理生产队工分、现金、粮食账目，撤换多占多拿的干部；4.把沙甸改为经济作物区，增加口粮供应，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刘

[1] 同上，页60。

[2] 《云南“文化大革命”运动大事纪实》页321。

先生非当事人^[1]，他的回忆仅仅因为文革破产后重归高位，故而有条件掌握一些官档记录而已。因此，在接下来的表述就显得有些武断而偏见了：“周兴同志对一二两个问题避而不谈。对三四两个问题大讲特讲，不仅表示支持而且要求迅速解决。群众盼望解决的问题没有解决，就是答应解决的问题也如肥皂泡沫一样迅即消散。可是，省委却向中央报告说，沙甸问题解决了。‘划线站队’错误和开放清真寺两个没有答复，已答复的也未完全落实解决，引起回民不满。”^[2]

现在已无法知晓周兴对“三四两个问题”是如何“大讲特讲”的。但是，我们至少知道，这两个问题确实也是很要命的。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说：“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又说：“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要求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3]世界上无论哪一种、以什么形式出现的宗教，从本质上讲，都是人类面对困境（物质的和精神的）等待拯救的渴望。要想解决宗教问题，从根本上讲，就必得把人民从困境中解脱出来，并获得一种现实的幸福，这种幸福应当包括精神的，更应当包括作为精神生活基础的物质环境。

中共红河州委党史办编辑的《迈向21世纪的红河》^[4]一书中这样定义：“红河州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民族自治州。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分布全州13个县市、113个乡镇（办事处）、占全州总乡镇的73.4%，宗教场所134所，伊斯兰84所，64200人”“宗教地区绝大多数是贫苦地区”。红河州水电队高级工程师张振钧先生向笔者介绍，文革前他在鸡街、沙甸一带从事农村水电排灌建设工作，与沙甸的回民交往密切（“沙甸事件”“三巨头”之一的马绍美，正是他们从乡下招聘来水电工地的临时工），常听回民私下发牢骚说“世道不公”，说“农民的儿子永远做农民。”“供销社来收我们的洋芋作价很低。偏不准我们自己拿去昆明卖”等抱怨之语。笔者与张先生讨论沙甸事件起因，他非常肯定地给出一个字结论：“穷”。

其实，和红河州其他落后农村相比，沙甸的经济情况本不算太差。这儿地处亚热带腹地，雨量丰沛，交通便利，非常适合蔬菜、

[1] 刘树生其时落实政策，被安排在大理任州委副书记，正被八二三搞得焦头烂额。

[2] 刘树生，页896-897。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页2，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 中共红河州委党史办编：《迈向21世纪的红河》页399，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甘蔗、花生及油菜等经济作物作为生长。紧邻的鸡街镇是著名的滇越铁路支线与公路交集处，离著名锡都个旧仅20多公里，这些，都为沙甸发展多种工业、副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历史上，沙甸回民擅长手工业、餐饮和商业贩运，群众生活相对富裕，文化亦相对比其他地区发达，可惜，好端端一个村子，文革前在“政治统帅一切”“农业学大寨”的权力指挥棒下左支右绌，每况愈下。当权者根本不顾沙甸人多地少（人均7分地）的短板，看不到适合多种经营的强项，强令“以粮为纲”，将沙甸由经济作物区改为粮食作物区，将高产的甘蔗田、蔬菜田改种水稻，又砍掉传统的手工业和副业，群众的生活日益困苦。1989年2月，经中共红河州委宣传部审定出版的《沙甸回族史》资料披露：1973年底，沙甸人均口粮280斤，集体分配的现金收入不到60元，最低时一个劳动日只有8分钱，许多群众不得不用野菜和树皮充饥。难怪当时沙甸的男人都以能进城务工为荣，而女孩子以嫁向工厂而被人艳羡。

更让正常人无法理喻的是，面对那样的经济困境，当时的领导偏偏将一切罪恶都归结为农村的“封、资、修复辟”，发誓要“割资本主义尾巴”。维护马列主义的正统高于一切，人类生存的正当欲望却被视为异端。“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论断一出，这就有了1964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只是，与精神和人格的尊严被严重伤害相比，物质的贫困已经退居次要。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指责周兴对“三四两个问题”“大讲特讲”。问题只是，对于前两项要求（特别第一个：打开所有清真寺，允许做礼拜），周兴无法接受也无能为力：因为这与他个人信念本身冲突。还有，在共产党极权专政之下，特别是文革疯魔全国之时，他根本不想、也不敢答应。西谚云：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事实一再说明，世俗权力一旦向精神领域越位，恺撒最终成不了上帝，反而可能变成撒旦。而那种自诩科学信仰所承诺的天堂，最后，前路只能是地狱。

不管怎么样，封疆大吏到边疆村落向村夫野老谦恭垂询，从“形象进度”看，应该有好效果。9月12日，也就是周兴到沙甸一个月零三天、省委向中央报告沙甸问题解决的一个月之后，以省委的名义发出通知，再次宣布“已经关闭和改作他用的清真寺，不得再打开做宗教活动的场所，已经强行打开的清真寺，要在做好工作的基础上，由群众自行关闭。”对此，广大回族群众强烈愤怒。遭遇同样命运的红河、文山、玉溪等地回民公开支持沙甸回民的正当要求，10月23日，在沙甸回民串联之下，1000多人到昆明游行，并两次爬上开往北京的火车欲告“御状”。回民上京行动遭劝

阻无果，问题并未解决，而相关州、县当局则继续采取错误做法激化矛盾，如：拘押回民代表马绍美（省委发现后被立即释放）；如：紧邻沙甸的鸡街于11月成立明显针对回民的“民兵指挥部”……沙甸回民毫无畏惧，也成立“沙甸回民民兵团指挥部”，马伯华任团长，马绍美、郑全书任政委，任务是“保卫回民、保卫清真寺、砸烂鸡街民兵指挥部”。个旧、开远、蒙自、建水等地严重武斗流血事件由兹重开^[1]。

事情的发展已经不像共产党强势政权处理异己分子（包括行动和言论均不听招呼者）一贯的杀伐决断，倒有点像老鼠与猫捉迷藏。文革岁月，只要毛泽东本人不发表明确的“最高指示”，任何一方都可以从毛语录中找到有利自己的理论武器，宣布自己具有权威的教义解释。“反毛泽东思想”“反党”“复辟”是一方的利剑，而“落实民族政策”，则成了另一方的盾牌。

史料继续载明：“1974年11月6日，红河州、个旧市、云锡公司领导组织数百名干部、职工在鸡街召开大会，“成立‘鸡街地区民兵联合指挥部’。当天晚上，指挥部以查户口为名，抓了鸡街火车站‘反潮流’人员”。接着，“11月10日，成立个旧地区民兵联合指挥部”^[2]，鸡街和沙甸距离不过一公里，政府这些举措，傻瓜也懂，是在炫耀武力，对沙甸造成大兵压境之势。

仇恨发展到这一步，威胁已经没有任何作用了。沙甸事件注定要在武装冲突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马黑的回忆录称：“沙甸也以原有的民兵武装为基础，并抢夺附近武装部的枪支，相应建立了民兵团以对抗。两边冲突不断，互有死伤。”“之后，从1974年12月中旬到月底短短半个月，就发生了多起抢夺枪支弹药的事件，且双方都有伤亡，并愈演愈烈，造成了极坏的影响。”^[3]

顶牛到这一步，必须得由更高层级的决策者来仲裁了。于是便有了前一章提到的1974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通知”，要马伯华、郑全书、马绍美等沙甸回族代表10人、红河州委书记冯治国、红河州革委政工组长曹占元、云锡公司党委书记张庆芳以及文山州、个旧市、建水、蒙自、开远、通海、玉溪等县负责人各1人^[4]等，

[1] 《云南当代大事纪要》1974年卷。

[2] 《中共个旧市党史大事记》第一卷，页276。

[3] 参看《沙甸事件的经过；起因及结果》于哥（yu×iaoyun52）的搜狐博客。

2009-09-14。http://yu×iaoyun52.blog.sohu.com/131801436.html

[4] 上述所涉各地均有不同规模的回民群体事件。

由陈康、刘明辉、王砚泉、李长猛、周韧^[1]带队，于1975年1月3日到北京开会。省委一把手周兴已先期到达北京候会。云南主要党政头目和一个小小村落的回民代表将在国家最高领导面前过招，中共执掌全国大权的历史上，这也算得是一大政治奇观了。为了减少干扰，云南两派群众组织大佬黄兆祺、刘殷农、杨树先、李毅、方向东5人也一同领令赴京参会，后又派往开滦煤矿、包头铁路局和大寨去“学工”“学农”，一去10多个月，回到昆明，军事进剿的炮火已火灭烟消，沙甸一片废墟。

[1] 陈康时任昆明军区副司令、省革委副主任、倾向炮派观点；刘明辉时任省委副书记、省革委副主任，无明确派别倾向；王砚泉时任昆明军区副政委、云南省边疆工作委员会主任；李长猛为该委员会副主任；周韧为省委统战部副部长。

第五章 “100天会议”和26号文件

5.1. “100天会议”前奏

旧时民间有“倒路鬼”一说，说是人走夜路，有时脚会不听使唤，走去走来，一直在原地打转。毛泽东护着他的文革宝贝儿本想一直前行，偏偏像是遇了“倒路鬼”。先是搞得天下大乱，捧出了林彪做接班人，没承想林彪夜逃，殒命北漠；只好回头绕一圈：落实政策、恢复秩序，安抚民心；社会稍有平稳，再捧一个王洪文，又来“批林、批孔、批周公”，这次虽为“天下小乱”，但很快政局失控，只好抓紧掉头，把早已打倒的“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邓小平请出来收拾局面。毛已病入膏肓，历史留给的时间不多，只能心怀侥幸，准备把江山社稷“托孤”给这小个子。1974年12月，毛泽东对来长沙汇报工作的周恩来、王洪文说了，要邓小平“做个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并对邓高度评价：“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政治比他（指王洪文）强，他没有邓小平强。”次年1月5日，中共中央即发出1号文件，正式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军队总参谋长。1月8日至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追认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副主席。2月2日，周恩来上书毛泽东《关于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问题的请示报告》道：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至此，邓实际总揽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实权，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全面整顿。为取得行动的合法性、慑服反对者，邓小平亮出毛泽东三项“最高指示”以为旗帜：一曰安定团结、二曰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三曰“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然后酣畅淋漓地收拾文革乱局，恢复社会秩序，发展经济，改善群众已够贫困的生活。

云南的文革同样遇了“倒路鬼”，也是先社会大乱，等到全国山河都快“一片红”，只剩下西藏、新疆、广西和云南了，北京这才让谭甫仁来个快刀斩乱麻，把“站错队”的一派群众强行摁垮，局面始得稳定。可惜此方药性太偏剂量太猛，搞得全滇处处遗矢，周兴“擦屁股”擦了几年稍有效果，“批林批孔”再出乱局，让云南的毛病落得个根，治更难了。正如1975年1月23日北京大员听取云南省委和部分代表汇报后所说“全国的问题差不多都解决了，就是云南了。”“主席批准了一个《通知》^[1]主要是针对浙江、云南两省说的”^[2]人都说云南文革慢半拍。这回不是慢，是积重难返。现在好了，有“邓大人”的一路砍杀，云南沉痾终于治愈有望。

1月6日，中央让召集来京的人正式开会汇报，贯彻落实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的“伟大战略部署”。步骤上分两步：第一步解决停止武斗、收缴武器、恢复社会秩序问题。第二步学习文件，掌握武器，提高思想，增强团结，解决云南的是非问题。汇报会责令云南省委主持。

所谓“停止武斗，收缴武器”，明显是冲着回民闹事说的。整个“批林批孔”八、炮两派和第三势力，最多只发生了一些肢体冲突，连棍棍棒棒一类冷兵器还来不及登场就偃旗息鼓。而回民闹事，当局和百姓都已刀枪出鞘，这得先行解决。1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发[1975]2号文件《通知》”称：“毛主席最近指示：‘凡有两派的地方，民兵不要搞进去’。但目前，浙江、云南的个别地区、单位，资产阶级派性严重，两派对立，把民兵组织搞了进去，坏人乘机挑动，分裂民兵，抢夺武器进行武斗，破坏革命生产秩序，危害人民生命安全”。《通知》作出三条规定：一、不论什么人以任何借口抢夺武器，利用民兵组织搞武斗，都是错误的，都是不容许的。二、凡因资产阶级派性严重，在思想上、组织上还没有联合好的地区和单位，一律不要成立“民兵指挥部”或“民兵团”之类的机构，一律不要给民兵发枪。三、应责成有关部门立即收缴被抢的武器、弹药，集中封存，妥善保管。23日，中央要员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吴桂贤接见云南赴京汇报会全体代表，责令云南“要无条件地、不折不扣地执行

[1] 指中共中央（1975）2号文件《关于禁止抢夺武器问题的通知》。

[2] 1975年1月23日，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吴桂贤接见云南赴京汇报会全体代表的讲话。

中央的通知”“武斗双方的武器都要收缴，指挥部、民兵团之类机构都要解散。什么喇叭、广播，什么‘齐向阳’‘大批判’‘反潮流’通通撤了，坚决撤掉。”24日，王洪文、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吴德、吴桂贤再次接见云南赴京全体代表，继续强调要不折不扣、坚决贯彻中央2号文件，缴枪、解散武斗组织。“不管是那一派的，打死人都要追查”“再发生武斗、抢枪的，要用军队围起来解决，煽动的头头要法办”。当然也强调了做好民族工作，要云南认真执行民族政策，防止和克服大汉族主义及地方民族主义，当天，在京云南省委常委们即刻定出贯彻执行中央《通知》的《决定》，措施凡六项：

- 一、认真学习和广泛宣传中央2号文件；
- 二、全部收缴武斗双方的武器、弹药和私造的匕首，解散武斗地区的“民兵指挥部”和“民兵团”之类的机构；
- 三、凡因资产阶级派性严重，在思想上、组织上没有联合好的地区和单位，已经成立的“民兵指挥部”停止活动；
- 四、所有擅自离开工作岗位、生产岗位的人员和集中起来搞武斗的人员，都应立即回到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跨地区、跨行业的串联活动必须立即停止，“上访团”“联络站”“广播站”一律取消；
- 五、各级领导干部要正确对待群众，有缺点错误要做认真的自我批评。但任何人不能以任何借口冲击党政军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抓打、揪斗干部和群众；
- 六、自中央2号文件传达之日起，如有再抢枪、搞武斗的，打死打伤人的，破坏交通运输的，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依法严惩。

《决定》后附有汇报会全体代表34人签名的、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报告，一致表示对中央2号文件坚决拥护，保证无条件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并成立“云南收缴枪枝执行小组”，由红河州革委会主任、军队代表冯治国任组长，蒙自军分区司令员李凤岗和沙甸回民代表马绍美任副组长，开远县委书记邓子俊、建水县委书记黄昌岐及回民代表两人任组员。熟悉云南地理的读者一看而知，收枪范围为滇南红河州，正是回乱集中之地。

曾经煊赫一时的云南山头大佬黄兆其、李毅、杨树先、方向东、刘殷农则已轻而易举被北京摁平。1月27日，5人联名向中共中央和中共云南省委呈送报告，承认错误，保证无条件地撤销所有山头；停止一切跨行业、跨地区的串联活动，所有人员立即回本单位抓革

命、促生产；停止一切互相攻击的大字报、大标语，撤销所有广播站，保证在各级党委的领导和统一部署下，搞好“批林批孔”，完成“四届人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

草根领袖就是草根领袖。当初兴高采烈涌进政治幼儿园，他们确曾以为自己力大无穷，确曾有过叱咤风云的表演赢得全社会喝彩。等到明白了在中国的政治场，他们不过是提线木偶、为人作嫁而已，其最大的希望就是能于演出之后分一杯羹，因此变得非常实际。他们懂得了权衡利弊，懂得了个人利益的成本计算和风险评估，面对北京的最后通牒，边地草莽们一个比一个恭顺，乖乖向中央做了保证，然后回昆明，召集会议，动员倒旗脱钩，削平山头，停止一切活动。

北京和云南的政治眼球集中到滇南回民身上。

5.2. 精选版“北京学习班”

五巨头乖乖地签完字，然后学大寨去了。回民问题的解决大体有了路线图，十位回民代表也按约定回滇南做工作去也。边疆暂时重归太平。云南问题和七年前一样，本质上还是“上层神仙”之战，要从根本上摆平云南局势，还是得把上层摆平。毛泽东所谓“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再次派上用场。于是照1968年的办法再来一回：七年前是把2000人弄到京城眼皮子底下“圈禁”，老老实实解决问题，解决不了不准走。这会没让草民头头搅和，会议就叫云南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只是地点搬来了北京。人员为省委常委17、昆明军区党委部分常委，以及省军区、11军、14军的主要负责人31个。时间从2月17日开始，到4月19日，正好100天，史称“100天会议”。

昆明就留下一个省委常委朱刚，办事机构则指令办公厅常务副主任胡延观留守配合。胡回忆，省委规定他们向北京“每日一报”。首先是回民动态：关于这个，下面有记；其次是越南边境的冲突：越南问题与本书无关，故不记。整个地方工作基本停摆^[1]。

[1] 所谓停摆，是说其间的工作都是些小事，如3月5日召开的各地、州、市委主管财贸工作负责人会议，讨论生猪生产、收购、上调和支援城市、工矿区市场的供应问题；如3月8日召开的理论工作会议，学习毛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会议；3月18日召开的四级农业科学实验网经验交流会；3月28日召开的全省工业学大庆经验交流会；4月5日召开的抓革命、促生产动员大会，传达中共中央于2月25日至3月8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邓小平的讲话，宣读中共中央3月5日下发的《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4月7-9日召开全省学朝农、创办一五七大学”汇报会等，职能部门便可办理。

会议由王洪文、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吴德、吴桂贤、苏振华具体主管。花3天时间学毛泽东最近的“重要指示”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重要文章”；花10至15天时间“敞思想、摆事实、揭矛盾、议是非”；再用10至15天时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自我批评为主；花10天左右时间讨论给中央的报告。上述中央大员做了3次训示，其意盖为：一、目前云南还存在着某些不安定、不团结的因素，革命和生产上不去，从领导上来说，根本的原因是省委在有些问题上的思想和政治路线不够端正，需认真加以解决；二、“以人划线，层层站队”是一个分裂群众、分裂军队、分裂党的口号。这个口号是林彪首先提出来的，毛主席早就作了批判。云南在一段时间内，也在干部和群众中搞了“划线站队”，要彻底纠正；三、云南存在严重的资产阶级派性，不克服派性，增强党性，就不可能落实安定、团结的方针；四、要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政策，特别是落实民族政策。会议围绕上述问题进行讨论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第一书记周兴于3月29日做检查。检查凡5点：

一、关于“划线站队”：一度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对一些所谓“站错队”的头头和群众搞了逼供信，后果是严重的，它分裂了已经实现革命大联合的两派革命群众，分裂了已经实现革命三结合的革委会，也分裂了军队；它助长了资产阶级派性，破坏了党的团结，涣散了工人阶级队伍。当时省革委的主要负责人（按：指谭甫仁）应当负主要责任，我作为省革委副主任，也应负重要责任。

二、关于资产阶级派性：云南资产阶级派性严重，长期克服不了，原因在领导，首先是我自己党性不强，资产阶级派性严重，在中央多次作了克服资产阶级派性的指示以后，去年的《云南工作》上，还刊登了两篇反对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和落实党的政策的严重错误文章，影响极坏。^[1]

三、关于落实党的政策：由于资产阶级派性和宗派主义影响，云南在落实政策特别是在组织路线和干部问题上，遗留问题不少，由于“划线站队”的错误没有得到纠正，

[1]《云南工作》是省委指导工作的内部刊物，由省委办公厅“刊物处”编辑。两篇文章是指《反派性是假，反革命是真——揭穿林彪一伙“以反派性为纲”的阴谋》和《林彪一伙落实的是什么政策？》此二文未查到。是时的刊物处处长系军代表马儒林，与笔者多有交道，观点“铁八”。

还有一些政策没有落实。

四、关于民族工作：我们工作中和执行政策上的缺点错误是严重的，有大汉族主义思想，没有注意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差别，指导一般化，工作“一刀切”，方法简单，致使党的民族政策没有得到认真贯彻落实。

五、关于省委领导同志的团结：着重检查了和陈康的团结，“我们之间的团结有问题，我应负主要责任。有的山头提出‘打陈’的口号，我虽然不赞成，但没有采取措施制止这种错误做法。”

常务副书记陈康于4月2日做检查。检查凡4点：

一、批谭甫仁问题。思想上认为谭是林彪线上的人，对他没有一分为二，在省委和军区党委会上，过分地强调了“批林批孔”要联系“批谭”、批“划线站队”，实际上把“批林批孔”“批谭”并列起来，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错误的。它迎合了一些人的需要，更加助长了社会上派性的发展，掩盖了主要矛盾，背离了斗争大方向，同样是路线问题。

二、派性问题：云南资产阶级派性严重，长期克服不了，关键在我们领导。由于我资产阶级派性严重，在“文化大革命”中支持了一派。对“划线站队”一派受压、长期没有纠正有气，有替一派申冤，也替我申冤的思想。

三、团结问题：和周兴团结没有搞好，不考虑大局，我要负主要责任。

四、工作问题：几年来对工作不安心。“批林批孔”以来，越来越感到云南问题复杂，许多原则性问题说不清，不好办，对工作失去信心，消极不负责任的态度比较突出，该参加的会不参加，该表态的事很少表态。^[1]

笔者以为，陈康检讨说他“对工作失去信心，消极不负责任的态度比较突出，该参加的会不参加，该表态的事很少表态”确非妄言，小举一例可知。某次全省大会，场面庄严，威仪棣棣，陈康代表省委上台讲话，讲毕补充道：“这个稿子是秘书写的，念

[1] 周兴和陈康的检讨内容见《当代云南大事纪要》1975年卷。

错了由我负责。”全场不禁愕然。

早在1968年在6月28日，省革委成立前夕，谭甫仁就传达过毛泽东关于“要周兴和陈康联合起来”的“圣喻”，训示道：“对主席的每一句话，都应该当作最高指示，都应该句句照办，字字照办，坚决照办，永远照办，理解的照办，暂时不理解的也要照办，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坚决执行，在执行中迅速地理解。我举两个例子，一个周兴，一个陈康，应该把这个问题提到对毛主席忠不忠的原则问题上来认识，是真忠于，还是假忠于，要这样来看这个问题，”如今事过七年，老问题还是老问题，端的是痼疾顽劣。不过这回的团结像是有点真了。首先，双方都已搞得筋疲力尽；其次，双方都搞明白了，不管咋斗下去，最后胳膊都拧不过北京的大腿，只有当乖乖宝贝才是唯一正途；最后，我们可以看到，这次会议，确实让二人都得到了他们想要不想要都必须接受的东西——双方的共识最终以书面文本《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向中央的报告》上报，再经毛泽东阅示，中共中央审查批准，于1975年5月29日正式颁发，这就是云南文革破产前夕著名的“云发[1975]26号文件”。

5.3. 关于26号文件

云发[1975]26号文件含三大部分：

一、会议情况。文件称，会议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还是安定团结为好、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一系列重要指示，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分清了云南的路线是非，总结了经验教训。周兴、陈康就领导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做了自我批评，大家表示欢迎。“会议期间，中央领导同志多次接见我们，作了指示，到会同志受到了教育，提高了思想，统一了认识。”

二、会议对若干问题统一了认识。问题共8个：

（一）关于云南形势。认为省革委成立以来，形势是好的，省委总是执行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但工作中还存在不少缺点错误，有的是严重的。看不到存在的严重问题，一听到批评就认为是否定大好形势，或只看到问题，不分主流与支流，甚至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都是形而上学，是片面的，错误的。

（二）关于云南的主要矛盾。会议认为，同全国一样，主要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反映在党内，即马克思主义路线与修

正主义路线的斗争。批林批孔运动中，有人把云南的主要矛盾说什么“领导和群众的矛盾”“新老干部的矛盾”“这一部分干部和那一部分干部的矛盾”等等，这些看法是错误的。

（三）关于纠正“划线站队”错误。会议认为，在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云南在处理两派革命群众组织问题上，曾一度搞了“划线站队”，犯了严重错误。这个错误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纠正，应由省委承担责任。对“划线站队”遗留下来的问题，应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按照党的政策有步骤地加以解决。采取回避的态度，不去认真纠正，是不对的；不顾大局，不讲团结，想趁纠正错误之机“翻烧饼”，同样是错误的。

（四）关于克服资产阶级派性问题。云南在党内、军内和群众中，有的人存在严重的资产阶级派性，省委少数同志也有资产阶级派性，有的还很严重。有的同志不敢正视云南严重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派性，正确的意见也听不进去，人家一反资产阶级派性就顶回去，这种态度是十分错误的。也有的同志，以自己的资产阶级派性反对别人的资产阶级派性，甚至以山头反对山头，这同样是十分错误的。

（五）关于落实党的政策问题，对于清队、一打三反、整党、清查五一六等政治运动中出现的問題，要按照“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原则，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真落实党的政策。要实事求是，坚持原则，错了就改，错多少改多少，对的要坚持，不能“一风吹”。

（六）关于注意防止两种偏向的问题。在如何对待纠正错误的问题上，要注意防止和克服两种偏向，一种是怕字当头，怕人家要求纠正错误和落实政策，人家一提，就说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成绩；另一种是口头上要求纠正错误，落实政策，实际上在那里拉山头，闹资产阶级派性，搞分裂，冲击党政机关，揪斗干部。

（七）关于谭甫仁的问题。对谭要一分为二。云南“划线站队”的严重错误，他应负主要责任，为了纠正“划线站队”的错误，联系到谭，把他的问题说清楚，是必要的。但提出“批谭”的口号，或者把批林批孔、批谭并列起来，就势必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偏离斗争的大方向，是不利于团结的。

（八）关于少数回民闹事问题。前一段发生的少数回民闹事。主要是由于我们在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上有缺点错误，被一小撮阶级敌人所利用，因此，必须认真纠正缺点错误，进一步落实党的民族政策。

三、今后工作意见共7条：

（一）认真学习好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它是

当前的头等大事，是搞好云南工作的总纲。

（二）进一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首先是各级党委，特别是省委，要把思想和政治路线搞正确，认真搞好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对少数问题较多的领导班子，要进行必要的调整和充实。对于领导班子中个别资产阶级派性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而又屡教不改的，坚决调离。对那种向党伸手要官的人，应予严肃批评，绝不能迁就。混进的坏人，要坚决清除出去。在处理群众之间的关系上，要强调向前看，顾大局，各自多作自我批评，不要纠缠历史旧账。要加强团结，反对分裂。

（三）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依靠贫下中农，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要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帮助他们坚持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

（四）加强各族人民的团结，认真落实党的民族政策，要对广大干部和群众加强民族政策的再教育，当前要着重克服大汉族主义，也要注意克服地方民族主义。

（五）加强对敌斗争，充分发动群众，坚决粉碎特务间谍活动。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打击腐蚀青少年犯罪的教唆犯。加强社会治安，巩固边防。

（六）加强军政、军民团结，搞好拥军爱民、拥政爱民活动。

（七）要有一股革命的劲头，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各级党委要动员全省各族人民掀起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高潮，力争全面超额完成今年国民经济计划。

如果用官史语言简单表述，传达贯彻26号文件，就是“以增强无产阶级党性、消除资产阶级派性为重点，联系实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1]。按照基层执行文件最为得力的大理州委书记刘树生的说法，贯彻26号文件，就是要强调“‘以人划线，层层站队’是一个分裂群众、分裂军队、分裂党的反动口号。这个口号是林彪死党提出来的。（是吴法宪最早提出，在空军里以他‘划线站队’，中央1974年20号文件已将其否定和纠正）”。

在云南文革辞典里，“派性”是八派的专属符号，而炮派的专属符号则是“右倾翻案”。26号文件的火力显然冲着八派喷射而来。陈康应该满意了。周兴也应该满意：自中共十大以来，反派性、平衡两派势力以求稳定一直就是他想要干的，皆因“批林批孔”烽烟突起，炮派闹事、八派添乱，他不得不横站以左右还击。或曰，周

[1]《云南“文化大革命”运动大事纪实》页346。

兴在文革中得过八派庇护，感情上他该重入八派“战壕”。可惜，对于政治人物来说，感情的权重是微不足道，真正的权重是政治成本的计算。等而上者，考虑其执政效果的关联权重，等而下者（此类人更多、更普遍）则只关心其在官场的进退和仕途风险。周兴与八派确有感情联系，但是，时过多年，已消耗得差不多了。纵观他的行为，可以善意地理解为，他更关注云南的稳定和平衡，故而有“反派性”之举。诚如马基雅维利所言，官员是不受他的人民所遵守的道德律约束的：

当他的行为违反道德律时，其行为的结果必定会宽恕他的（其目标结果将会证明他的手段是正当的），凡是善良的人绝不会去责骂那个为国家而努力奋斗的人，不管他的这一爱国行为是怎样表现出来的。为了保卫他的国家，即使他所使用的是欺诈、残忍和罪恶的手段，这种欺诈也是一种“光荣的欺诈”，这种罪恶也是一种“光荣的罪恶”^[1]

其实，即便对于初通政治的草根领袖也一样。昆明市委书记黎韦明明是八派捧出来的老官僚，皆因按周兴要求反了派性，马上被八派恶狠狠诅咒为“云雾山中老妖魔”“复辟势力的总代表”。

总之，这一回周兴和陈康都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至于草根大佬们高兴不高兴已无足轻重。尤其对于八派，明知这是一个灾难性的梦魇也毫无办法。还有，北京底牌全亮，周兴再不用害怕谁来掣肘，也用不着像上会那样，小心翼翼地与黎韦策划于密室，每个细节都担心百密一疏。这一回，周兴和陈康真的可以团结起来，放手大干了。刘殷农在他的回忆录表明了心中的无可奈何：

这次学工学农，历时十多月，说得冠冕堂皇一些，是协助中央解决沙甸问题，实践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说得实惠一些，倒不如说是公费旅游更为恰当。在北京时，浏览了长城，当了一回好汉，在内蒙又到黄河，心死了没有呢？没有死。经过我们五人的再次请求，我们五人终于回到了昆明，此时右倾翻案风刮得正烈，周兴同志已经病逝，贾启允已经主政云南，我们五人同时被下放到五个农村点，去农业学大寨。这次可不是像大寨一样一个月的期

[1] 转引自（美）威尔·杜蓝特：《世界文明史》页517，华夏出版社，2010。

限，思想虽然不通，但那些年的组织观念很强，虽然抛妻别子，我还是马上收拾行装，到了金沙江边的一个彝族村寨，代职大队党支部书记。

官方文件载明，刘殷农所去的彝族村寨是楚雄州武定县平地公社。其余几人所去何处不详。

5.4. 扫清道路

为确保这一政令有效推行，必须先行排除可能的阻力和干扰。

26号文件尚胎孕腹中，云南省委便于4月12日向中央呈送了《关于在北京举办云南学习班的请示报告》，照葫芦画瓢地提出：“为了有利于在云南落实毛主席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排除资产阶级派性干扰，拟将各派、各山头的主要人物集中在北京举办云南学习班，范围是：省、地（市）两级部分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各山头的主要人物，安定团结搞得不好的几个县的山头主要人物，约200人左右。学习班四月底或五月初开始，时间暂定一个半月”。《报告》建议：“对于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确实不宜于在原工作岗位工作的少数同志，采取省内外调动工作的组织措施”。中央批准了这一报告。

完全是1968年虹山口学习班的微缩版。只是时过境迁，如今的山头大王们为某种信念和山头利益舍命拼杀的勇气荡然无存，也无可以一呼百应的兵马。曾经热血沸腾的百姓早看透了冠冕堂皇口号背后的无耻交易，谁也不会再傻乎乎地跟着起哄。微缩版学习班5月初京城开班，也无风雨也无晴，6月中旬便匆匆收工。6月28日，五大巨头黄兆其、李毅、杨树先、方向东和刘殷农联名向中央和省委书记面报告表示：“完全拥护《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向中央的报告》并坚决贯彻执行之，承认‘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拉山头，打内仗，闹资产阶级派性，违背了党中央的指示，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犯了严重错误。’”北京于是安排五人由云南省委办公厅二处处长杨发樾带领，前去山西大寨大队、呼和浩特铁路局、开滦煤矿等地参观学习——用刘殷农回忆录的话说，实则公费旅游——“遛弯儿”回来，9月7日，农民副总理陈永贵在中南海接见，指示他们回云南后到农村抓好一个大队，走毛主席指引的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9月14日，五巨头分别向中央和省委书记交“学习小结”，进一步检查了在批林批孔中所犯的错误。返回云南，黄兆其，李毅、

方向东、刘殷农分别带职下放到农村一个大队劳动锻炼，杨树先则根据本人要求下放到工厂当工人。草根大佬全成了麻袋里的土豆，被上司扔到了墙角。

真正可能的强大阻力存匿于上层。为此，北京决定行壮士断臂之术。5月24日，中央发出《关于云南省委、昆明军区领导任免的通知》，除了任命刘明辉为云南省委书记，李文，黎韦任云南省委副书记；调刘志坚任昆明军区政治委员、军区党委书记，还将身份特别明确的标杆人物调离云南省和昆明军区另行分配工作：陈康去了兰州，1977年任了该军区副司令；田维扬赋闲，两年后病逝于昆明；梁中玉去了成都军区，先任副司令，后任顾问；吴效闵调济南军区；黎锡福调山东省军区，一年后病逝；担任云南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的昆明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李德骏调南京高级陆军学校；还有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观点铁八的张克，昆明军区副政委雷起云，政治部主任展明一千人等统统调离。省委常委王砚泉、左奎元、武健等亦免去地方职务回部队；云南省军区司令、“铁八”黎锡福刚走，6月20日，省军区政委、“铁炮”张力雄接着也去了江西，任省军区政委。辽宁省军区司令员张海棠和福建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高占杰补缺，分别任云南省军区司令和云南省军区政委。接着，又有刘志坚（为政治委员）罗坤山、陈发洪（任副司令）、朱英（任参谋长）、史景班（政治部主任）等陆续调入。昆明军区的成分终得彻底改观。

5月，根据中共中央[1975]32号文件精神，驻地方各单位的军代表陆续撤离归建。云南支左军人多为八观点，他们一走，这些年已经“解放”了的老干部顺势而上，而老干部普遍偏炮。云南从上到下的政治力量对比，悄然成翻盘之势。现在“反派性”可动真格了。

参加“100天会议”的省委大员们在返滇前的5月27日，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陈锡联、李先念、纪登奎等再次集体接见并再作训示。笔者无法查到讲话原文。但既然敢说敢干、行事大刀阔斧的邓小平在场，讲话火色一定威猛。官方记载的谈话要点如下^[1]：

一、云南省委常委3个多月的会议，形成了一份文件，政治局议过，回去要坚决按文件办；

二、不要支一派压一派，不管军队和地方，千万不要动不动就把内部分歧摆到社会上去；

[1]《当代云南大事纪要》1975年卷。

三、凡是搞资产阶级派性的都要认输，输得越彻底越好；

四、干部调动要处理好，从安定团结出发，从革命需要出发，都要坚持“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

五、新省委要抖起精神，和各种错误倾向斗，和资产阶级派性斗。

云南省委哪敢怠慢？5月29日，参会大员飞返昆明，当天下午即召开有省级机关副局长以上干部、昆明市委常委、市革委副主任和昆明军区在昆师以上干部共554人参加的会议，传达《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向中央的报告》（即同日颁发的云发[1975]26号文件）和中央关于干部调动、任免的决定。周兴、王必成、陈康、刘明辉分别讲话。“新政”紧锣密鼓拉开大幕。

6月3日（至14日）全省地（州、市）委书记会和军区师以上干部会议召开，正式传达26号文件。尚在会期，即“实体”会议开幕次日，省委马不停蹄又召开全省有线广播大会传达。周兴、王必成发表演说，这算得边陲旧地当时最现代化的传播手段了。官史载，是日有50多万人听会，真是一竿子插到了底。接着，6月6日，省委再发书面文件《关于传达贯彻省委26号文件的通知》，要各地、州、市、县立即有计划地向机关干部、厂矿企业和学校职工，强调“传达要快，声势要大，思想工作要细”。

14日会议结束，周兴做会议总结，强调：

一、要着重解决好各级领导干部对资产阶级派性的认识问题；

二、各级领导班子要“敢”字当头，敢于同资产阶级派性做坚决斗争，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只要检讨了，改了，就好。但是对于屡教不改的，要坚决采取组织措施，绝不宽容；

三、放手发动群众，批判和抵制资产阶级派性。要发动群众广泛开展“一学（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四批（批修正主义，批资本主义，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批资产阶级派性）、五大讲（讲路线、讲大局，讲党性，讲团结，讲纪律）”的群众运动；

四、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对于“文化大革命”以来一些搞错了的案件，要坚决平反；

五、鼓干劲、争上游，迅速把我省的国民经济搞上去。

除了第五条说生产，其余四条都是说“反派性”，纠正“划线站队”问题。

“一学、四批、五大讲”是学习贯彻26号文件的纲领性口号。所谓一“学”是为打头先锋，即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修正主义、批资本主义、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这乃毛泽东最为宝贝者、所谓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维护文革成果之“通灵宝玉”。毛自坐上金銮殿独揽大权之后，始终醉心于在中国实现军事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始终认定所谓按劳分配、货币交换、小生产都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温床，必须从根本上消灭之。

至于实际操作层面的地方官僚，他们才不关心“温床不温床”什么的。他们只需要有一个冠冕堂皇的幌子去震慑、报复那些羞辱、剥夺过他们的造反派。真正造成社会不公平的“温床”，简单说，其实就是权力，尤其极权国家，诚如林彪在“518讲话”中所言：“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革委会成立后的云南，各行各业的权柄基本上都被八派撸过去了，而且吃穿用打一条龙。在物资极端匮乏、老百姓连灯泡、火柴、卫生巾均需凭票凭证供应的年代，造反起家的草莽土官公然可以在物资流通领域游刃有余，批判这个“法权”自然最能调动群众的仇恨，于是，在贯彻26号文件中，专门强调了“一些单位被篡夺了领导权”“贪污、盗窃、私分紧俏商品等‘资产风’十分严重。”^[1]所谓紧俏商品，那年月系指单车（特别是永久17型、18型锰钢）、缝纫机及其他市场不公开供应的商品门类。比如：1973年秋，国家换发军装，老军装遂拨付地方处理。云南省级机关和昆明市级机关都有配额分下，但需付钱购买，近郊区、县则免费拨付。这些服装有陆军士兵服、干部服、呢子的、哗叽的；有海军服；空军服则为皮夹克，还带翻毛。西山区东风公社副主任杨寿坦承：东风公社由他去办理，于是近水楼台，自己私下先拿了海、陆、空各一套。贯彻26号文件，市当局以“派性严重”为由将杨寿拿下，其中私占军装这一罪行最吸眼球。前面提到的昆明市一商局长“许大马棒”被抓，在“紧俏商品”分配方面亦被罗织了多项罪名。

其实，只要是极权社会，官僚们一旦掌权，谁个不搞“资产阶级法权”？此弊病实非人之不肖也，体制之痼疾也。中国几千年所谓“千里来做官，为的是吃穿”“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此之谓也。毛泽东创建的政权，本质上亦为极权体制，却要想消灭所谓“资

[1]《昆明党史》第七章“‘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

产阶级法权”，无异于缘木求鱼。1973年刚刚“解放”出来的老干部刘树生被派组建云南维尼纶厂，就非常坦率地宣言“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他负责招工招干，自豪地表白在人员选择上自有“舍得一身剐”的精神。下面是他的回忆录摘要：

1974年上级给维尼纶厂一批招工指标，劳动工资科负责此事的同志（原《云南日报》职工）……悄悄来问我：“老刘同志，有个特殊情况向你汇报，我们报社总编李孟北你是知道的，他的儿子能不能招？”……孟北在云南无人不知，文革一开始，就挂上“三家村”黑店云南分店的招牌被声讨，他主持的“滇云漫谈”遭到口诛笔伐，现在还在管制劳动中。我在省边委工作时与孟北同志接触较多……我们成了好朋友。从自己的切身遭遇中我意识到他是受“文字狱”的冤枉，十分同情又爱莫能助，现在机会来了岂能放过！

于是我对这位同志说：“中央最近有一系列的指示，‘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反动血统论已受到批判，对走资派也有了给出路的政策，即使被打倒的也有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我不管什么李孟北，李孟南，不管什么叛徒、特务、走资派，都不能因父母的问题影响子女，封建社会的株连法要坚决抛弃，你从李孟北的儿子考察起，凡是符合条件的通通给我招来。”……一批被“打倒”正在受“管制”的老同志的孩子进了维尼纶厂，比较突出的有李孟北的儿子、黄平的女儿、军区王非的女儿等。根据他们的特长，有的进了篮球队，有的到了文艺宣传队，有的搞黑板报，一时间全厂文体活动搞得红红火火。……这些小青年积极性很高，好学上进，大多成了骨干。

接着，组织部又征求意见，说有一批“解脱”的干部问我敢不敢要。我自己是过来人，当然理解这些同志的处境，又有了名正言顺的口实，我怎能说“不”呢。……我一拍胸脯接收了一批。^[1]

贯彻26号文件明确冲着掌权多年的八派而来。“一学、四批、五大讲”果然法力无边，很快把云南文革的既得利益者们打得落花

[1] 刘树声：《脚步的回声》页806-807。

流水，诚如官史所记：“把学习、揭发、批判紧密结合起来，围歼和粉碎资产阶级派性，纠正了‘划线站队’的错误；揭开阶级斗争盖子，惩处了帮派恶势力，狠狠打击了奸淫妇女、贪污盗窃国家资财的刑事犯罪分子；认真贯彻了党的政策，团结干部和群众的大多数。”“反对资产阶级派性的活动，在全省轰轰烈烈展开。《云南日报》集中突出地宣传了省委26号文件精神，从各个角度论述了清除派性的必要性，有针对性地发表了《绝非小题大做》《驳派性人人有份论》《评所谓“见分晓”》等言论35篇，形成强大舆论力量，对揭露批判资产阶级派性，纠正“划线站队”错误，起了积极作用。”^[1]

5.5. 老干部的节日和八派的梦魇

时任大理州委副书记刘树生的回忆足以说明老干部们在贯彻26号文件时期的喜悦：

……大理州传达贯彻26号文件从6月中旬开始，州委分工由我分管此项工作。好心人曾经给我以忠告：下关的帮派势力盘根错节，能量很大，犹如装着几千吨TNT炸药的火药桶，一旦引爆，会像原子弹爆炸。叫我说话办事要谨慎，贯彻26号文件宜慢不宜快，先在小范围内传达，来个火力侦察探一下动静再说。我想上有毛主席、党中央的“尚方宝剑”红头文件，又有省委紧锣密鼓的会议和通知，怎么能慢慢来呢？传达、学习、贯彻中央文件精神必须雷厉风行，纠正“划线站队”是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的迫切要求，即使下关帮派势力摆下刀山火海，我也顾不得个人安危要去闯一闯。

会议在苍山饭店能容纳1000多人的礼堂举行。开大会那天水泄不通，后来的人只好挤在走道上站着。按原文宣读文件时鸦雀无声，1000多个脑袋聚精会神，两千多只眼睛盯着台上，每一只耳朵都想把每个字收进去，很少有人上厕所，更没有一个人中途退场。中央26号文件和他的命运紧密相连。有人欢欣鼓舞，有人愁眉不展，有人怒目圆睁。

[1]《当代云南大事纪要》1975年卷。

……结合大理的实际，我强调纠正“划线站队”的必要性、重要性、紧迫性，讲了资产阶级派性的10种表现。巨石击洱海，浪花起千重。

……听过传达和我的讲话，受害者奔走相告，如久旱逢甘霖，才有了欢声笑语，他们迫切要求迅速贯彻落实，掀掉压在头上多年的大石板；派性轻的人可疗治；派性严重者如通灵宝玉被砸，如命符被夺，如丧考妣，为维护和巩固既得权利，坚决反对，千方百计抵制破坏。

26号文件在全省吹响了纠正“划线站队”、反对“资产阶级派性”的号角，无异于在爬满蚂蚁的铁锅下烧了一把大火，又像捅了马蜂窝。^[1]

刘树生，河北孟村县人，回族。曾任渤海“回协”武工队队长。1950年参加中央民族访问团来滇访问后一直留边为官，最后官至第12届候补中委、云南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2014年去世曾留下华彩一笔：在贪官遍地的环境中，刘洁身自好，全部财产仅7万元，而且全部捐了党费。为此，有人曾呼吁应将其树为超越杨善洲^[2]的清官典型。有区办内刊《盘龙江文化》刊登了长篇传记，声称此刊将送往中南海。笔者由此第一次认识刘树生，对其两袖清风的高风亮节感佩有加。后来读他的回忆录，这种好感竟莫名其妙被冲淡了许多，一则他述及文革草根领袖时的表述太过偏见和情绪化，实不应为高级干部所为。另外，他在反派性中举出的“贤才”拉帮结伙，擅权贪腐，百姓怨声多多。

总之，贯彻省委26号文件，纠正“划线站队”错误，说穿了，就是一场政治利益之战，用刘树生的说法：“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下面继续照录他的回忆：

下关地区的各路诸侯纷纷跳出来，上下串联八方呼号，打出公开反抗的旗号。跳得最高、闹得最凶的“旗手”是窃取了大理州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大权的杨仁民。……他授意自己的“笔杆子”，以《从走资派到复辟派》为题，连篇累牍炮制出一批大字报，顽固坚持派性立场，恶毒攻

[1] 刘树生，页817。

[2] 原云南保山地委书记。2010年逝世后，被选入“感动中国十大人物”。2018年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称号，获评“不忘初心、奉献一生”的退休干部楷模。

击毛主席、党中央批准的26号文件，诬蔑从中央到地方坚持贯彻执行26号文件的干部是“从走资派到复辟派”。

杨仁民之流，号称响当当的“革命派”，实际上是一批地地道道的胡传魁式的“草头王”。断章取义地背几段革命导师的语录，实用主义地“活学活用”，像鲁迅说的拉大旗做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面对他的疯狂破坏，我们沉住气，一面层层宣传贯彻26号文件，把6月11日《云南日报》上发表的《消除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的社论和6月15日、25日的《批臭资产阶级派性》《坚决同资产阶级派性作斗争》以及《驳“派性人人有份论”》等评论文章作为学习材料组织学习，同时掌握和研究杨仁民之流的动向。

杨仁民原本学戏出身，因前景不佳而弃艺当了工人。演员本好表现，杨口舌利索且胆大妄为。文革春雷初动，一夜间便成了山大王。大理的造反派谈及杨仁民，不论威望、水平还是谋略，都说他远不如技术员出身的二把手季正华。时间已到1975年，局面大变，他完全不懂“勉从虎穴暂栖身”“人在矮檐下，不能不低头”的道理，偏偏要与重掌大权的官员硬碰硬，加之他本有案底：前一年“三八电报”泄密事件，现成便可构成入刑理由，结果可想而知了。

根据省委“一学、四批、五大讲”的基本精神，发动群众摆派性的表现，议派性的危害，挖派性的根源，立反派性的斗志，最大限度地团结95%以上的干部群众。同时采取断然措施，扫除拦路虎杨仁民。

杨仁民罪行累累，早该法办。但倚仗“划线站队”，成了下关地区“正确路线”的代表，又有省里帮派弟兄和军内个别人支持、包庇、纵容，使之长期逍遥法外，一直到贯彻26号文件才剥下了他闪光的外衣、炫目的光环。但鉴于当时的特殊情况，需要等待广大群众的觉悟，也希望他幡然醒悟。但他错估形势，公然跳出来较量……成为大理州贯彻26号文件的绊脚石、拦路虎。因此报经省委批准，职能部门依法将其逮捕。从此，使纠正“划线站队”走上了轨道。有人写了一首打油诗：“滇西首霸杨仁民，害党害国害百姓。逮捕归案快人心，苍山洱海得安宁。”

大理州因有“滇挺”问题结下的深仇大恨，故运动最是热闹。

作为云南首善之地的省会昆明，则因“反派性”自1973年始甫见成效即被“批林批孔”冲击，煮了一锅夹生饭。这次从头再来，当局更须加大火力。

昆明党史载，为“配合中央对省委、昆明军区领导班子作了重大调整，6月16日，省委对昆明市委领导班子进行调整。黎韦调任省委副书记。郭少川任第一书记，王仕超^[1]任书记，王捷三、肖持久、赵英（女）、张琅基、李书成任副书记。增补穆俊昌、王希三为常委。”需要说明的仅仅是，新增补的两位常委，均系炮派观点，且穆俊昌接管了公安这一可以抓人的要害部门。接任黎韦的郭少川原来虽系八派观点，有黎韦反水作样板，他的政治态度亦不能不让八派头目忧心忡忡——事实上，郭少川很快步黎上司后尘，贯彻文件，大反派性。难怪时任副市长的老干部何健借用扑克游戏术语，私下提醒一商局长许少先道：“‘小二’翻身最终还是斗不过‘中心5’的。”

“小二”自然指百姓，“翻身”指造反起了家，而“中心5”则喻指职业官僚。新组建的市委常委于是“深入学习省委26号文件，联系昆明实际，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分清是非，总结经验教训，少数常委陷入山头派性活动，作了认真检查。”6月21日，接着召开县委书记会议。参会人约400，历时10天，对“划线站队”以来，特别是“批林批孔”运动中发生的重要事件，如罢工罢市事件等进行讨论，澄清是非，接受教训，增强党性，消除派性。

接着就“纯洁组织”：“自上而下采取三项措施：一是把在资产阶级派性掩护下混进领导班子中的极少数坏人清除出去，罪行严重的依法处理；二是对派性严重，又屡教不改的领导干部，根据情节轻重有的调离学习，有的撤销职务；三是对于少数胆小怕事、畏派如虎的‘软班子’，在加强思想教育的同时，组织上作必要的调整和加强。在整顿班子基础上，全市开展揭露惩办派性掩护下的坏人坏事，教育挽救陷入派性的人，搞好安定团结，发展革命和生产大好形势的群众运动。鉴于昆明地区派性根深蒂固，出现派性掌权，‘以派代党’的严重情况，且几个山头都有党、政、军某些领导干部的支持。为此，对于担任领导职务，而派性又闹得很凶的派头头，果断采取调离领导岗位，举办学习班，进行教育；对阴谋篡党夺权

[1] 王仕超文革前夕从淄博市委书记位上以支援云南之名调任云南红河州委书记。文革开始不久即被山东造反派捉拿回山东批斗，两派派斗之后一直留鲁闲置休息。故对云南两派几无恩怨。同时从山东支援来滇的还有烟台地委书记李文（任文山州委书记），二人均因祸得福，文革中受罪最少。

的帮派分子，下放农村代职锻炼；对少数混入群众组织利用派性伤害群众、盗窃国家资财，触犯刑律的坏人，由司法部门依法治罪。”^[1]

财贸系统乃“派性干扰”重灾区。除贪污、盗窃、私分紧俏商品等“资产风”严重，加之结帮营私，且“批林批孔”时煽动罢市事件最难脱干系，于是市委决定“帮助整顿”局领导班子，首先将许少先、任维纪（一商局革委会主任，党委副书记）、李连生（一商局革委会副主任）三人抓捕，一锅端进班房，罪名为“新生产产阶级分子”。据说李连生还有物色交易一款，遂加“坏分子”一罪。^[2]西山区当年捅过炮派“马蜂窝”，属“资产阶级派性”掩护的重灾区，于是东风公社副主任杨寿、碧鸡公社副主任杨正安、沙朗公社副主任李宗富等人均一次性下课，后再入狱。“划线站队”被捅“马蜂窝”的富民县亦照此办理。余有问题者，一律集中在嵩明县小哨办“学习班”。昆明党史载：至12月，“经过‘学、批、讲’运动，纠正‘划线站队’错误，全市政治形势基本稳定，生产建设在整顿中逐步走上正轨。经市委常委讨论，对拉山头、闹派性的人员作出处理决定。对小哨学习班人员，除7人回原单位工作，2个派的头目到农村挂职锻炼外，其余22人到农村参加基本路线教育，任工作队员。”

所谓“一学、四批、五大讲”，说到底，无非两条，一是对搞派性（按：云南文革术语，即八派）的人进行思想批判和组织处理，包括调离、下放甚至抓捕；二是落实政策，纠正“划线站队”的错误（按：云南文革术语，就是安抚炮派）。第一条是实现第二条的保证，第二条则是执行第一条的结果。同时，第二条又反过来促进第一条的实现。这与自动控制系统的反馈环节十分相似：输出端取一部分正向信号反馈至输入端，输出信号于是继续增强，如是反复，就会发生“啸叫”现象，最后导致系统崩溃——专业术语称为正反馈。为了保证系统稳定运行，自动控制系统故只能用负信号反馈以确保良性循环。文革中的政治控制系统完全不一样，每搞一次运动就正反馈一次，让仇恨放大一次。云南1973年的“反派性”是对1969年“划线站队”的反弹，1974年的“批林批孔”是对1973年“反派性”的反弹，1975年的整顿是对1974年三派闹事的反弹。而1975年的整顿，又为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催生了更大仇恨。

[1]《昆明党史》第七章“‘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

[2]对许少先的抓捕尚未实施，即遇“批邓”“反击右倾翻案”，直到“揭批查”，才将其抓捕入狱。

以下简介各专州情况：

曲靖地区：“各级党委对被划为‘站错队’的干部、群众，特别是受到冲击的人员，做公开检讨、赔礼道歉。否定了‘划线站队’中所定4起‘反革命事件’、两起‘严重政治事件’以及‘滇东北游击军’等假案，并公开行文平反，给受害者恢复名誉。清理销毁了部分在‘划线站队’中形成的材料，其中有55名副局（处）长以上干部的1687份材料，由地委领导主持会议做了清退，6624份材料由组织销毁。对‘划线站队’中在派性掩护下，乘机进行阶级报复，毒打干部、群众的凶手，结合其他罪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其间，各县、各单位均先后召开大会，为‘划线站队’中受迫害的干部、群众恢复名誉，清退处理有关材料。全区共清退26318人的19.46万份材料，退还本人5.2万份，销毁14.26万份。”^[1]

昭通地区：“1975年，昭通地委初步依法处理、清洗了‘文革’期间犯有杀人罪行，在派性掩护下被多年包庇下来混入各级领导班子的犯罪分子，为部分被杀害的人员平反昭雪，起用了一批被错误处理的干部。”^[2]

普洱地区：“地委1975年11月26日在全地区广播大会上宣布：‘划线站队’时把（墨江县）‘6·28’事件定为‘反革命大屠杀’是错误的，县革委1969年发的《通告》一律无效。……县委抽调20多名干部，组成‘6·28’专案办公室，对‘6·28’事件进行调查落实。经过一段时间工作，对全县原立案审查的2662人，大部分进行了复查，对在‘6·28’事件中被打死、逼死的家属子女的抚恤费根据不同情况，分别给予落实，做了大量工作。”^[3]

保山地区：“7月18日，保山地、县委联合召开万人大会，各县也召开一定规模的群众大会，传达中央和省委的有关文件，7月下旬和8月上旬，全区机关、厂矿和农村普遍传达贯彻省委文件，对各级党委思想路线不端正和存在的资产阶级派性问题进行摆、查、挖；同时解决干部、群众因资产阶级派性影响而长期存在的隔阂，‘拆墙、填沟、解疙瘩’，个别派性严重的人，在群众中说清问题，取得谅解。8月14—18日，中共保山地委在召开县委书记会的同时，召开落实政策会议。会后，地、县分别成立落实政策办公室，平反‘划线站队’中形成的冤、假、错案，落实被错处人员的政策。经

[1] 摘自中共曲靖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曲靖地方史》。

[2] 摘自昭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昭通市志》。

[3] 摘自普洱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普洱历史》。

过清理，全区应平反的假案共43件，涉及29.98万人，其中被错整的复查的共7395人……清查‘五一六’运动中被错整的615人发了平反证；为怒江糖厂、地区木材公司的5个假案和1968年专直‘党代会’前错捕、错判的5名干部平反；宣布撤销地委‘划线站队’中形成的错误文件。中共保山地委专门发文强调指出：因专直‘党代会’和‘划线站队’强加给军队和地方干部、群众的各种政治帽子和诬蔑不实之词，一律推倒；受打击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1]

一般来说，这些年“划线站队”问题处理得好的，特别是“批林批孔”闹得不厉害的，贯彻26号文件就没有什么文章好做。比如《富宁县志》关于1975年和1976年的记录就一句话：“1975年夏秋，县委贯彻省委指示，发动群众揭发批判和着手纠正‘划线站队’错误，逐步形成安定团结局面。11月，中央发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派性复燃，动乱复起，大字报上街。1976年11月，中央粉碎‘四人帮’后，社会秩序稳定。”滇东北《镇雄县志》对此竟未着一字。

一切进展顺利。究其原因，其实最要命的，是芸芸众生对政治早已兴趣索然。1975年夏，26号文件贯彻热火朝天之时，笔者正好被放逐云南汽车厂当维修电工。该厂一则大，3000多人，二则当年为八派根据地，“11·30武斗”名震全滇，两派可谓血海深仇。但除了官员和对少数政治尚有爱好者，群众对不断翻新的政治游戏早已兴趣索然，包括笔者这样的宦场弃儿，对26号文件的贯彻都一无所知。唯一记得的就是厂里几个所谓“学理论”明星，如“修建科理论小组”“铸工清砂组学习小组”等偶尔会出几张学理论体会的文章发各车间念念，也不过虚应故事而已。那段时间供电、物料供应、运输从而车间生产均不正常，上班形同休息，女工搞“三线建设”（织毛衣、把劳保手套撤成线团织成儿童服装和勾织挑花饰品等），男工吹牛干私活，厂里的焦炭、木材、金属材料，凡家里用得着的，都或拿或偷——时有说法：“国外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反正共产党吃不垮”。大权在握的职业官僚们只用全力收拾几个已被边缘化的草寇，政治游戏于是很顺利。

9月23日，省委呈《关于贯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向中央的报告〉的情况报告》向北京表功，称三个多月来，云南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认真学习和贯彻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向中央的报告》，从城市到农村广泛开展了“一学、四批、五大讲”

[1] 摘自中共保山市委党史地方志工作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保山历史》。

的群众运动，对形形色色的“资产风”，特别是对资产阶级派性进行了批判，山头林立的混乱局面已经改变，党的领导和党的观念显著加强，经济形势越来越好。报告承认云南的资产阶级派性根深蒂固，1974年是一个大暴露，它的主要特点是：一部分处于掌权地位的领导干部拉山头、搞派性。社会上的几个山头，出头露面的往往是一些头头，而背后都有党、政、军的某些领导干部支持。报告称这段时期省委的主要做法是：一、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基本上做到家喻户晓；二、集中解决领导班子的认识问题……对于派性严重，经过教育不改的领导干部和派头头采取果断的组织措施，有的离职学习，有的停职检查，有的撤销职务，不使他们妨碍大局；三、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大量属于人民内部的问题，坚持采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来解决，但对于资产阶级派性掩护下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和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则毫不手软，坚决予以打击；四、认真落实党的政策，特别强调纠正“划线站队”错误、落实政策；五、采取有力措施，排除干扰。对于各种危害安定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及时进行揭露和批判。10月18日，省级机关党委召开经验交流会，介绍昆明市深入开展“一学、四批、五大讲”群众运动，围歼和粉碎资产阶级派性的经验。省委副书记黎韦在会上讲话，要求各单位领导放手发动群众，把学、揭、批紧密结合起来，彻底揭发和批判资产阶级派性的反动性和危害性，坚决粉碎山头派别活动，尽快改变“三慢”（消除资产阶级派性进展慢、纠正“划线站队”错误慢、落实政策慢）的状况。接下来，11月8日，省委成立省委落实政策办公室，各地、州、市、县以及大专院校、厂矿企业也相继成立“落办”，全省共抽调1万多干部专门从事此工作。11月25日，省委批转“省落办”《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非正常死亡人员处理意见（试行稿）》，强调：“对于在‘文革’期间和‘划线站队’专案审查中被杀死、打死、自杀等非正常死亡的人员，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实事求是地作出结论，分别情况，按照党的政策迅速处理，并做好家属、子女的工作。”

1975年的胜利，与其说是旧官僚借助北京权力对草根英雄的胜利，毋宁说是芸芸众生对文革政治集体冷漠的胜利，更准确地说，是几近走投无路的百姓对社会安定渴望的胜利。

5.6. 政治经济学

毛泽东的唯物主义强调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由经济决定的上层

建筑，同时他又强调所谓“精神变物质，物质便精神”。这些左右皆宜的说辞无非根据需要，正说反说，法无定法，宣传而已。对于极权社会而言，经济的行与不行，其实完全由政治决定，再具体说，由掌权者高兴不高兴决定。毛泽东让邓小平出来整顿，皆因深感文革大乱搞得经济快要崩盘，不得不如此。云南和全国一样，百姓对无休止的街头政治厌倦透顶，渴望恢复秩序、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于是便有了26号文件的出台和执行。其时，邓小平的全国整顿和云南的反派性彼此共振，很快让强度达到峰值。霹雳手段将所有政治干扰悉数摞下，恢复经济容易多了。

7月31日云南省委召开全省工交会议，文革以来，从来给人黏糊糊感觉、看不来出火色的副书记郭超讲话已然底气十足了。他要求工交战线各级党委下半年坚决按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和省委有关文件精神把革命问题解决好，把路线搞端正；采取果断措施，抓紧解决重点企业的领导班子问题；放手发动群众，大战第三季度的生产高潮。《云南日报》立即发表社论配合鼓动，要各级机构就“思想政治路线是不是端正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运动是不是真正开展起来了，群众是不是充分发动起来了，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是不是建立起来了，资产阶级派性是不是克服了，党的政策是不是真正落实了，对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是不是有力地打击了等这样一些根本问题，逐项认真对照检查，找出本单位执行路线和政策上存在的主要问题，切实加以解决。”社论再次指出：“资产阶级派性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公害，是安定团结的大敌，各级领导干部要敢字当头，坚持斗争哲学，寸土必争，寸步不让，把派性批深批透，批得它再也找不到市场”“坚决打击阶级敌人和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内外勾结，挖社会主义墙脚的活动”“对于软、散、懒的领导班子，对那些闹资产阶级派性的领导干部和派头头，要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坚持不改的，要采取果断措施，不要贻误大局”^[1]

云南的社会经济整顿尚有一华彩段，就是后来的著名改革派干将、时任铁道部部长的万里来滇。时间是6月，正是26号文件贯彻刚刚拉开大幕之时。17日，万里在昆明铁路局视察工作并发表演讲，其语一片杀气，对派性大张挞伐：

你们对资产阶级派性采取了什么态度？对跟无产阶级专政捣乱的人采取什么态度？等等，要对照自己进行

[1]《云南日报》1975年8月5日社论《为全面超额完成今年国家计划作出更大贡献》。

检查，谁检查不好也不行。要检查好，而且在实践中真正改了，才能成为团结的、战斗的、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班子。否则，就不是。如果不行，就要采取组织措施。在这个问题上寸土必争，寸步不让，想逃避是不行的，只有老老实实检查，老老实实承认，老老实实改正，改了就好。

20日，万里在昆明分局干部会议上再次宣布：

（资产阶级派性）在政治上是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的；在组织上是分裂党、分裂工人阶级队伍的，是搞宗派的；在作风上必然是玩弄资产阶级政客的手法，耍两面派的。资产阶级派性，是当前资产阶级向我们无产阶级进行侵袭、腐蚀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会议当场宣布改组昆明分局领导班子。

1975年，除了铁路运输，工业、农业、财贸等各方面的工作都进行了治理整顿。官史特别强调：“尤其是结合云南的实际情况，贯彻了省委26号文件精神，开展了‘一学、四批、五大讲’的群众运动，特别是批判了资产阶级派性，初步落实了党的政策，着手纠正‘划线站队’错误，积极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从而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全年完成国民生产总值54.3亿元，比上年增长4.9%；工农业总产值77.7亿元，增长4.6%；社会商品零售总额29.7亿元，增长5.4%。”^[1]

[1]《当代云南大事纪要》1975年卷。

第六章 云南民族关系的血色之殇（下）

6.1. 沙甸问题“政治解决已无可能”

在云南“反派性”高歌猛进之时，滇南“回乱”继续深陷危机。

1975年初，沙甸10个头目都调虎离山，去了北京，想必云南回民群龙无首，事情会好办些了。事实并非如此。头面人物远处京城，边地云南依旧摩擦不断，2月15日爆发的“香木桥事件”，是诸多摩擦中最大的一次。事情起于建水县馆驿大队回民，去香木桥双山村慰问被大队民兵揪去批斗的阿訇，回、汉民兵再次发生武装冲突，双方互有伤亡。死人再次点燃了一触即发的引信。回民抬着尸体直接到省委上访，要求惩办杀人凶手并抗议省委不执行中央收缴民兵枪支武器的文件精神，这次上访有红河州、文山州和玉溪地区等地回民，称为第二次大规模上访^[1]。其时，笔者照旧日日在办公厅画卯上班，目睹了这场仇恨的旋风。

当时上访回民都聚集于昆明顺城街一带，毗邻省委和昆明军区，游行队伍从省委办公厅门前的国防路上蜂拥而来，一律白衣白帽，铺天盖地，颇有山呼海啸之势。他们涌进省委大院如入无人之境，直接将棺材停放在大厅中央。其时，省委领导全体留京，日常工作由留守的唯一省委常委朱刚和办公厅副主任胡延观主持。胡回忆说，尸体共7具，因长途辗转运输，已开始发臭，回民不得不同意尽快

[1]《沙甸事件的经过；起因及结果》于哥（yu×iaoyun52）的搜狐博客。2009-09-14。 <http://yu×iaoyun52.blog.sohu.com/131801436.html>

处理再说，省委方同意给出丧葬补贴，如裹尸布和香油若干。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已无法继续坚持上班，遂秘密转入“地下”：带着工作文案去弥勒寺省委二号院继续点卯。

重新上台的铁腕人物邓小平已正式主持最高当局工作，还有以武装攻打“上柴联司”而得毛泽东青睐的政治新星王洪文。要员陈锡练、纪登奎、李先念、华国锋、苏振华、吴桂贤诸人，先后三次到会对留京的云南要员发表讲话，除纠正“以人划线，层层站队”问题外，就是指责云南当局在“民族工作问题上，工作中和执行政策上的缺点是严重的，有大汉族主义思想……致使党的民族政策没有得到认真贯彻执行。”云南省委认错不迭。6月12日，回到昆明的省委、省革委要员据此联合发文《关于解决沙甸问题的通知》，就“划线站队”、逼供信、“对回族风俗尊重不够、在宗教问题上，企图用强制的办法，说不服就压，压不服就抓，激化了矛盾”等多个问题进行了检讨^[1]。

同步进行的是北京会议期间的5月23日——其时，回族代表亦滞留北京——云南省委、省革委再次决定派出工作组，由解放军协同进驻沙甸，负责“落实中央关于安定团结的方针”“抓革命促生产”；如此传统打法让沙甸百姓自然想到1968年军队“捅马蜂窝”的历历惨祸，于是群聚村口阻拦，坚持非得滞留北京的回民代表回来再议。军队和工作队进不了村，只好转场鸡街糖厂等地待命。为加强政治攻势，当局还用飞机在沙甸上空散发“通告”，通告称，最近一个时期，沙甸一小撮人，煽动少数人抢夺和制造武器，挑起武斗，行凶杀人……继续对抗中央指示，变本加厉，为非作歹……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特派出工作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协助下进驻沙甸。不许任何人抵制工作队进村。

面对当局的恫吓，沙甸村民毫不示弱，他们把几千份“通告”收集起来，装进麻袋，由小伙子们簇拥着扛去工作组驻地——鸡街糖厂大门口，一把火烧了。^[2]

当局的忍耐终于到了极限。6月20日，云南省委正式向中央汇报，提出“军事包围，政治解决”的意见。同日，中央领导接见云南省委和红河州委负责人进行紧急磋商，接下来又接见马伯华等10人，王洪文宣布：“如果不让（工作组和解放军）进村，就打‘土围子’了”^[3]

[1]《云南“文化大革命”运动大事纪实》页324-325。

[2]马绍美：“沙甸事件概述”，见《沙甸回族史料》。

[3]《云南“文化大革命”运动大事纪实》页327。

6月2日，云南省委向中共中央作了《关于解决沙甸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称：“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我们于5月17日派出工作队和人民解放军进驻沙甸，传达省委常委向中央的报告，宣传政策，开展了群众工作。但是，沙甸的少数头头，受一小撮阶级敌人的操纵和利用，煽动蒙蔽一些人，对抗中央指示，阻挠工作队和解放军进村。针对以上情况，我们拟继续抓好以下工作：一、继续广泛深入地宣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和安定团结的方针，宣传党中央关于解决沙甸问题的方针政策，宣传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向中央的报告和省革委的通告、通知，使沙甸的广大群众真正了解中央的指示精神，粉碎一小撮阶级敌人的操纵破坏，积极协助工作队和解放军进村；二、参加闹事的人，包括少数头头在内，除了一小撮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幕后操纵指挥的坏人以外，只要听党的话，欢迎工作队和解放军进村，同坏人划清界限，将功补过，一律既往不咎；三、遵照中央（1975）二号文件规定，彻底收缴枪枝、弹药和一切武斗凶器，撤除武斗工事，解散武斗组织。外地到沙甸串联的一切人员，必须立即返回本单位。任何人不准擅自抓打、关押干部和群众，被非法关押的人必须立即放出来；四、认真纠正错误，落实党的政策，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五、遵照毛主席关于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迅速恢复沙甸的集体生产，安排好群众生活”。7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圈阅的《关于沙甸问题的批示》（中发（1975）15号文件），同意云南省委关于解决沙甸问题的请示报告。强调“派人民解放军和工作队进驻沙甸，开展工作，解决问题，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而沙甸的少数闹事头头，在一小撮阶级敌人的操纵和利用下，竟然蒙蔽和威逼部分群众，构筑武斗工事，埋设地雷，打伤解放军和工作队员，阻挠解放军和工作队进村，这是根本违背广大人民群众意愿的，是极端错误的。”要求“沙甸的广大回族群众，应当欢迎解放军和工作队进村，并积极协助他们，迅速做到以下各点：一、彻底收缴枪枝、弹药和一切武斗凶器；二、立即撤除一切武斗工事，解散一切武斗组织；三、不准非法抓打、关押干部和群众，被非法关押的要立即放出来；四、生产队、生产大队不准搞夺权；五、外面的基层干部要回村抓革命、促生产。干部中有问题的，要在党委领导下，按照党的政策处理；六、外地到沙甸串联的所有人员，必须立即返回本单位。”

几个月来，沙甸回民文武结合、虚与委蛇，不断触探当局的决心和底线，现在尘埃应该落定了。7月9日，赴京与会的回族代表马伯华等10人向中共中央、毛泽东写了保证书后，于7月13日从

北京回到沙甸，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沙甸问题的批示》。可惜，仇恨已经点燃，情绪已经失控，马伯华等人已无回天之力。据个旧“一二八派”头目胡长林介绍说，沙甸事件结束后，被抓捕的上京回民十代表之一的马灿良曾和他同囚于个旧宝丰隆监狱，马灿良告诉他，说当时马伯华知道事情已无转机，为了保住老人、小孩和妇女，在会上提出了向军队投降，不料马伯华的讲话竟遭村民激烈对抗，甚至咒骂他为“叛徒”。众人情绪太过激烈，以至于马伯华的哥哥马百善不得不出面解围，说他兄弟一片苦心，绝非贪生怕死之辈，如果大家决定要打，我兄弟肯定带领大家冲在最前头。^[1]

云南当局已经等不得了，7月22、24日连续向中央报告，说马伯华回去以后，抵制、对抗《关于沙甸问题的批示》，并积极进行武装准备，因此，沙甸问题“性质变了”“政治解决已无可能”，要求军事解决。北京批准了云南当局要求，决定动用国家暴力“打土围子”^[2]。这就有了下面这一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

6.2. 沙甸的军事进剿

关于进剿事件的记录，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写《云南“文化大革命”运动大事纪实》的表述如下：

云南省委向中共中央的报告提出，说沙甸问题“性质变了”，“政治解决已无可能”向中共中央提出军事解决的请示，经中共中央批准后，于7月29日凌晨开始调动部队，对沙甸进行军事包围，以后对大庄、新寨、田心、茂克、车白尼等回族群众聚居村也实行了军事包围，整个军事行动历时21天^[3]，至8月18日结束，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房屋大部分被毁的极其严重的后果。^[4]

[1] 胡长林系昆明工学院冶金系1963年毕业生，分配云南锡业公司工作。文革期间担任128造反派领袖。马灿良在沙甸事件后不久被处决。上述情况系胡长林出狱后向张振钧谈及。

[2] 《云南“文化大革命”运动大事纪实》页329。

[3] 笔者按：对沙甸的进剿只有一周。所谓21天，包括对沙甸附近的大庄、新寨、田心、茂克、车白尼等回族群众聚居村的军事行动。

[4] 《云南“文化大革命”运动大事纪实》页318。

中共个旧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写《中共个旧市党史大事记》2009年8月版，也做了类似记载：

由于“四人帮”的操纵，错误认为蒙自沙甸等地“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制造武装叛乱”，发生震惊全国的沙甸流血事件。经中央、中央军委同意，对蒙自沙甸、开远市大庄、新寨等回族村寨采取军事行动，造成沙甸许多群众伤亡，沙甸、新寨的大部分房屋被毁的严重后果，政治上的损失难以估量。^[1]

民间的表述从各个不同角度，为读者提供了更多细节。这些回忆文本，有事件亲历者、云南省委“沙甸工作组”成员周康的《骇人听闻的沙甸事件》^[2]，有云南省民委副主任、省委沙甸工作组副组长李长猛之子马黑的《父亲往事》^[3]，最早见于平面媒体的《解放军血洗沙甸》^[4]，其他，署名“126团的现场参战者”“朱长超”“联军来呀”等人的回忆文稿散见于不同网站的个人博客，内容大同小异。为表述简洁，下面直接采用当事人、沙甸回民领袖“三巨头”之一的马绍美的文章加以摘要^[5]：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九日凌晨三点：“四人帮”开始对沙甸回民武装镇庄。村边站岗的回民民兵。被把手脚捆起来，丢到粪池中溺死；沙甸父老被枪炮声惊醒，大清真寺的守卫者殉难；沙甸大清真寺被武装人员占领。

凌晨四点多，沙甸回民凭据地形熟，进行反攻。付出上百人殉教的巨大代价，夺回了大清真寺，始得到一点现代化武器装备。此时，西营（老沙甸西部村名称谓）已被武装人员占领，后山、马家井、林家巷、金鸡寨、川方寨的部分生产队场院及民房也被武装人员控制，于是，在这黎明前的黑暗里，街战、巷战、以住房为据点的攻守战在

[1]《中共个旧市党史大事记》第二卷，页280，2009。

[2]《炎黄春秋》2007年第7期。

[3]马黑：《父亲往事》万维读者网（readers.net2014\03\08）《天下论坛》。

[4]作者马萍，1993年发表于《探索》杂志，后被选入宋永毅主编的《文革大屠杀》（香港开放杂志出版，2002）

[5]三回民领袖排名第一和第二的马伯华、郑全书已在军事对抗中身亡。马绍美幸免于难，抓捕后被判死缓，1979年获释，后任沙甸公社党委书记。

残酷地进行着，在火箭筒的爆炸声、火光里，在枪炮的呼啸声中回民一片片倒下。沙甸人没有屈服；到天亮时，又收复了部分民房据点，收回几间自己的房屋，又付出几百条宝贵生命的代价。更为凄惨者，（是）没抵抗的回回们——有的被打死在堂屋中（回族会客室），有的被击毙于门旁，甚至有的被枪杀于床上……有的指望逃生，愿意当俘虏，被押出村去，在押送途中被枪击于路旁的光天化日之下。

群情震怒，凭借用无数生命换回的几支步枪、机枪、手榴弹，以及那些自制的土武器奋起抵抗。有多少本不想抵抗的人，最后也含酸忍泪拿起那点土炸药去寻同归于尽的对象……炮火愈来愈猛烈。中午，三所清真寺开始被炮击，哪里的房屋坚固哪里被炮击，哪里出现炊烟哪里被炮击，哪里有水井哪里就被火力封锁。无须说明，大家都清楚，这是沙甸穆斯林的灭顶之灾。于是，以安拉的考验、以乐园的恩典，以回回民族的气节相互安慰着、鼓励着、遗嘱着……此时，望生哪有生之路，望存哪有存之地？

二十九日入夜，炮火有所减弱。但只要哪里房屋透出光亮，随着炮弹就划破黑暗，呼啸着在哪里爆炸；于是惨痛的呻吟声、幼儿被惊吓的哭声、撕肝裂肺。黑夜，为何这般漫长！你要吞噬多少人的生命和鲜血啊！

三十日，进攻的武装人员放弃对老沙甸村内的部分控制点，缩小村外包围圈。占领制高点及有利地形，在无线电报话员的指挥下，对老沙甸村子进行更猛烈的轰击，火焰喷射器也用上了；老沙甸成了一片火海。金鸡寨、川方寨炮火稍逊。下午，老沙甸部分群众陆续撤到金鸡寨。入夜，马伯华带领部分群众也撤到金鸡寨。通过商议，决定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出村谋生。身体健康者可设法转移。

三十一日，通过反复劝说、二千余老弱妇幼、伤、残、病的回民群众在笔者的带领下集队出村，以求生存。出村的群众马上被分住几个小集中营办学习班，笔者等头头银铛入狱。入夜，突围转移未成，在川方寨发生遭遇战，伤亡惨重。马伯华脚被手榴弹炸伤，只好撤回金鸡寨。

八月一、二这两昼两夜中，金鸡寨、川方寨两村的房屋据点争夺战从未间断：一方是拥有现代化优良武器装备，一方仅凭精神；一方是训练有素的武装人员，一方是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怎样拼啊！在炮火硝烟迷漫中，在血洗之后，老沙甸与川方寨已没有抵抗力量了。

八月三日，金鸡寨已被进攻人员控制了一半左右，争夺、拼搏仍在进行。炮火依然未断。在被进攻人员控制的地段，残酷的“清剿”在继续，伤残的“回匪俘虏”被提着脚手，象丢死羊一样丢上汽车；运去“医治”，而有的干脆在现场补枪，来个“快性”。

八月四日，一百五十七名男女老幼回族群众举着双手、集队从金鸡寨南面出村，指望求生。当走到大田埂上的时候，几挺机枪一齐开火，一分钟之后，尸横遍野，血流成渠，随即验尸，未亡者进行补枪，现有五名幸存者以为铁证，其中三名是补枪也未补死的。下午六时许，炮火摧毁了金鸡寨南面几间仅存的小民房，马伯华等同志壮烈殉难；入夜，又进行了最后的“清剿”，战斗始告结束。^[1]

沙甸人的集体记忆被刻在了石头上：事件后新建的“沙甸事件舍西德纪念碑”^[2]载，死于军队枪炮的总人数共866人。死难者姓名准确镌刻在碑石之上。碑文“奉普慈特慈的真主之名”，宣布“‘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一场内乱。”碑文详细叙述了事件过程，与我们前边读到的表述盖无出入，碑文最后一句是：

真主说：“为主道而献身的人，你们不要说他们死了，其实他们活着，但你们不知道”。

各方对惨案过程的表述大体一致。中共建政以来，让当局如此蒙羞的血案，各方共识能做到如此程度，很难得了。

从1973年回民自发打开清真寺开始，周兴对此事一直盯得要紧，并发誓“清真寺把门锁了。撬了再锁。锁了再撬，再锁。搞它几十万次。”“宗教问题要斗到共产主义。”特别是“批林批孔”之后，事情越闹越大，周兴更是严防死守。据胡延观介绍，军事进剿沙甸之时，周的肝疾已病人膏肓，事后住院，腹水抽出10公斤！即使如此，双方鏖战正酣之时，他还是和王必成一道亲历前线指导。

文革期间，周兴曾不止一次向人说起共产党武装割据之初，他曾在瑞金参加打AB团，有些同志被五花大绑推进土坑、一枪崩掉

[1] 马绍美：“沙甸事件概述”。见《沙甸回族史料》页46-57。

[2] “舍西德”系阿拉伯文“殉教牺牲”之意。

之前，还高呼共产党万岁，言说间总不免唏嘘。如今，面对沙甸这个边地村寨被大炮和枪弹摧毁的一片废墟、面对1000多农民和“子弟兵”血肉模糊的死尸横陈，周兴的心情想必咋也光明不起来。只是现在，他已没有忏悔、甚至没时间感慨了。军事进剿结束，他很快被送往北京301医院救治。10月3日，治疗无效，黯然离世，时年70岁。10月8日，中央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其举行追悼会，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送了花圈，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等参加了追悼会，追悼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主持。致悼词的，正是新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主任贾启允。

周兴接舵的是一艘千疮百孔、严重失衡的破船，他一直想让它平稳前行却终不可得，最后，只能让死神替他将船舵交给了替他念悼词的贾启允。

卷五

贾启允时代：难以维持的“维持会”

（1975年10月5日—1977年1月）

第一章 匆促的序章

1.1. 临危受命

周兴弥留之际，邓小平曾去医院探视。僵卧病榻的周兴性急地央告邓，说自己回不去了，请中央尽快确定人选接替吧。邓说人选已定：贾启允。还说，论资历、论魄力，贾不如你，但他作风更细致些。

履职省委书记，贾启允已不是头一遭，上次接手的贵州也是一个著名的烂摊子。1964年，中共中央西南局派出大型工作组去贵州省进行“四清”，运动结论在当时颇为骇人听闻：“贵州已烂掉了”“贵州省委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性质的错误”“贵州城乡资本主义泛滥”“贵阳市是反革命的两面政权”甚至干脆被宣布为“小台湾”……省、市书记被一锅端。1965年4月，时任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的贾启允于是踏着这片“尸横遍野的官场废墟”登上了省委第一书记的宝座^[1]。

贾启允，山西闻喜人，1937年参加“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并加入中共，国共内战决胜时已升任中共晋绥分局第十一地委书记职。1949年底共产党凯歌高奏，34岁的贾启允便跟随后来四川民愤极大的“西南王”、时任南下支队政委的李井泉来到四川，任“川西粮仓”温江地委书记。新政权创建伊始，第一件事就是向农民征粮。国民党溃逃前，已经将是年的“公粮”搜刮过一次，如今重复征缴，

[1] 邓正新：《贵州风云》自印本。

百姓之苦可想而知。著名的所谓“川西土匪暴动”就发生在当时。对此，贾在回忆录中有极为简约的表述：共产党一到，“不是首先给人民群众一些什么东西，而是首先伸手向群众要粮食”……贾的无奈于此可见。

还有，1958年，因“大跃进”、人民公社（包括强行实施公共食堂化）造成的饥饿已横行蜀中，离川7年后、在国家统计局任职的贾启允被李井泉再次要回四川任省委书记处书记。贾的回忆录称：“广州会议后，省委书记李井泉同志带上我和书记处书记杜心源同志到内江一个公社去调查。调查中不是研究食堂解散后要解决什么问题……而是研究如何把食堂继续办下去。调查结果是四川省的农村食堂基本上是好的，少数不好的只要加以整顿就可以办好，并且向毛主席写了报告。从此开始引起了毛主席对李井泉同志的不满。”^[1]历史事实与此恰恰相反，李井泉极左政策的持续加码，不但没有引起毛对李的不满，反而帝心大悦，李井泉遂踏着川人的饿殍尸堆连上台阶^[2]。所谓所毛泽东不满，想必是贾启允自己的悯农之心在潜意识里引发出的怨尤罢了。

中国几千年极权专制体制，实权在握的一方诸侯最需要的是揣摩上意的小心翼翼和对下一言九鼎的凌人霸气，贾启允虽秉有前一要件，却因多几分书生气和尚未泯灭的悲悯之情，致使后一要件缺损。做一省级最高长官，此诚非所宜也。

果然，一把手的安稳日子才过了一年，文革风暴便从天而降。贵州“四清”震荡未消，在大乱竟然领跑大西南，成为最早的省级夺权新锐之一，被北京以《西南的春雷》赞誉之。贾启允则以当地“头号走资派”之罪下台，数年之间，只有挨斗的份儿。据贾启允自己统计，1967年到1969年两年间，“被批斗七百多次，十度弯腰一千五百余小时，平均一天斗一次，弯腰两小时。”^[3]贾曾当过3年国家统计局局长，据其职业习惯，应当认可这个数据的准确度。

这一回，贾启允来滇做封疆大吏，应该说正当其时。1975年，邓小平的全面整顿大显成效，而云南著名的“云发（1975）26号”文件将长期得势的帮派势力（具体说即八二三派）打得溃不成军。各级权力机构“老将归位，小兵回营”，社会恢复稳定，生产回归正常，只要有人来维持维持局面就行了。

[1] 东夫：《麦苗青菜花黄——四川大饥荒纪实》页391，香港，田园书屋，2008。

[2] 三年饥荒岁月，四川、河南和安徽成为饿死人最多的地区，而1960年中共中央西南局恢复，著名“左王”李井泉偏偏升任了第一书记。

[3] 东夫，页391。

赋闲多年，且有第一次省级书记失败记录的贾启允，心中惶然无底，9月21日，贾启允与命运、经历和自己差不多的廖志高、赵紫阳、江渭清^[1]一道去邓小平寓所讨教，说文革中我们被关多年，长期赋闲，只有过去的经验，成桃花源中人了，不知履职后该如何工作。如照原来那一套干，人家势必说你复辟。邓小平的整顿正顺风顺水，只管鼓动四人放胆大干，还道出一句后来惹出麻烦的名言：“人家说你复辟，就说明你们的工作做好了。”贾、廖、江、赵四人为谨慎计，将邓接见讲话分别记录，而后汇总修订为一成稿保存，然后各自怀揣锦囊，分头赴任去了。

周兴离世，云南大员王必成、刘明辉、李文、黎韦等高官组团赴京吊丧，中央既已确定新主，众人遂相率拜谒。云南省委办公厅副主任胡延观，文革前每年两次到成都参加西南地区经济协作会，晚上均有舞会之类娱乐活动，胡不喜热闹，总是呆屋里阅书练字，与同样不喜热闹、总躲屋里阅书练字的贾启允遂成故交。1975年9月，胡与周兴大秘周永祺奉省委之命，提前赴京料理周兴丧事，正好和贾启允同住京西宾馆，云南大员遂请胡先为联络以拜望新主，贾启允一见胡，顿时喜出望外，道：原来正发愁云南一个老熟人没有，有您就好了——足见履新云南前贾启允心情之忐忑。特别补充，贾履新云南，果然将胡视作心腹幕僚，事后贾的悲剧亦牵连胡，酿成胡的悲剧——此为后话。此处需要说明的仅仅是，贾启允来云南为官，贵为书记，公事公办可也，尤当摆出一副霸陵之气，可他偏偏像个怯生去的像个去外乡串门的乡巴佬，此性状，邓公小平实在是看走了眼。

北京正在召开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2]，七林旺丹及朱克家亦同时在京参会，亦专程前去拜会了新书记。学大寨会上，朱克家和邢燕子、柴春泽等12位名满天下的知青代表联名写了《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一封信》，表示“横下一条心，拼命干革命”，要带领所在社队于两三年之内建成大寨式的先进单位。邓小平在信上批示：“建议全文或摘要在报纸上发表，以鼓励下乡知识青年”。^[3]12人大出了一把风头。其时，朱已是十大候补委员、参加省委常委工作；“雪山雄鹰”、民兵英雄七林旺丹已为省委副书记。二人的拜望定然让贾启允信心大增。

[1] 一说无江渭清。此处从笔者朱克家（胡观观同时在场）回忆所说。

[2] 会议于1975年9月15日在大寨所在的山西昔阳开幕，后移至北京，会期至10月底。

[3] 顾洪章：《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页125，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

八派二号大佬刘殷农在回忆录中写过一件事：“贾启允在西南局是邓小平的老部下，他和我岳父党洪恩^[1]又是南下工作团的老战友、老搭档”因为这层关系，贾来昆之初，刘便急于见贾并向其灌输本派观点，“但那时官风很正，他一直回避见我。”其实这时候不是官风正与不正的问题，初来乍到，贾实不敢轻易沾惹这些胆大妄为的草民派头，于是咨询胡延观，胡道：“不妨听听吧，千万别发表意见就是了。”贾点头称是。

事实上，当时两派草民大佬都钻头觅缝要和贾拉关系，求他断论公道。如此政治位势：各派官员、各派群众均有求于他，对于上任新官，该形势何等主动，真可以纵横捭阖，大干一番了。

1.2. 短暂的快感

周兴追悼会的悼词由赴京办理丧事的工作人员起草、交云南省委讨论上报，并经中央最后修改定稿，贾启允不过念念而已，但悼词所言：“更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毫无疑问成了履新伊始的贾氏施政纲领。

首先，还是必须继续贯彻省委26号文件。10月18日，省级机关党委召开经验交流会，介绍昆明市“围歼和粉碎”资产阶级派性的经验。最先参与周兴“反派性”活动的省委副书记黎韦莅会演讲，要求各单位领导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揭发和批判资产阶级派性的反动性和危害性，坚决粉碎山头派别活动，尽快改变“三慢”（消除资产阶级派性进展慢，纠正“划线站队”错误慢，落实政策慢）的状况；27日，省委转发昆明市财贸系统开展“一学、四批、五大讲”群众运动初步经验的《报告》。自文革大乱以来，昆明市的中心商圈从来都是各路英雄表演和争夺的最佳舞台，省革委成立，八二三派大胜，市中心商圈自然牢牢控制在“八派人士”手中，1974年“批林批孔”，此地又让社会各山头来回拉锯，一时闹得满城风雨。省委转发的报告定义：“昆明市财贸系统资产阶级派性十分严重。派

[1] 党洪恩亦为山西“老革命”，和贾启允一同南下四川，贾被委任温江地委书记，而党则被委派达县任专员，后调云南红河州，因“生活作风问题”降职为云南冶金厅副局长。

性普遍侵蚀了领导班子，在资产阶级派性掩护下，坏人坏事和‘资产风’也很严重。”他们开展“一学、四批、五大讲”的经验主要有三条：一，放手发动群众，揭开阶级斗争盖子；二，认真贯彻党的政策，团结干部和群众的大多数；三，整顿领导班子，端正思想政治路线。^[1]两天后，《云南日报》发表社论跟进，称：

中央领导同志不久前指出，云南消除资产阶级派性进展慢，纠正“划线站队”错误进展慢，落实党的政策进展慢。中央领导同志最近又指出，必须坚决粉碎资产阶级派性……“三慢”的要害是“一慢”——消除资产阶级派性慢，这是问题的症结，关键还是在于领导的认识上不去。有的同志低估派性的顽固性，稍微斗了一下就认为“差不多了”。有的畏派如虎，胸无斗志，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问题还没有真正捅开，就生怕“搞过头了”。许多地方和单位对资产阶级派性并没有揭深揭透，仍有少数派性严重的人还在那里“静观待变”，有的至今态度嚣张，甚至有人还在继续进行非法地下串联，准备伺机反扑。

事实上，通过执行26号文件，“造反起家”的新干部早已该拿下的拿下，该下放的下放，被打得七零八落，不成体系。但社论仍然严督各级领导去掉“怕”字，克服“满”字，做到“敢”字当头，站在斗争前列，集中火力猛攻资产阶级派性，把它的“反动实质揭深批透”。社论危言耸听指出：

在资产阶级派旗之下，麇集一小撮坏人，他们以派性作掩护，或进行反动的政治活动，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违法乱纪，干尽了大挖社会主义墙脚，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勾当。一些在资产阶级派性泥坑里陷得很深和“资产风”严重的同志，往往不自觉地帮助坏人，甚至被坏人拉拢利用……无产阶级对于一小撮坏人利用派性负隅反抗的企图，只能是针锋相地，要充分发动群众，坚决揭露打击，把运动深入下去。^[2]

[1]《云南当代大事纪要》1975年卷。

[2]《云南日报》1975年10月29日社论《坚决粉碎资产阶级派性，狠狠打击资本主义势力》。

11月18日，中共云南省委召开省属机关落实政策经验交流大会。省级各部、委、办、局和昆明市级机关负责人以及省属在昆单位和部分机关干部2000多人参加了大会。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长岳肖峡传达省委对当前全省落实政策工作的指示，主题依旧是纠正“划线站队”错误。省委指示：第一、“划线站队”是林彪死党为了分裂群众、分裂军队、分裂党而提出来的反动口号，它妄图从根本上改变和否定党的基本路线。云南在林彪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一度搞了“划线站队”，严重影响了党内、军内和群众之间的团结，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这个错误应由省委领导来承担责任。各级领导要加快步伐，纠正“划线站队”错误，迅速把这项工作抓好；第二、要按照“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原则，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敌人，应该一个不漏地挖出来。对属于人民内部的问题，搞错了的要坚决纠正。要按照党的政策，迅速作出结论，不要久拖不决，不要认为这是“否定成绩”。要敢于坚持原则，敢于纠正错误；第三、当前要集中一段时间，抓好落实政策的工作。总之，“划线站队”的始作俑者谭甫仁早已作古，而胁从者周兴也黯然仙逝。贾启允来推动此事的解决正当其时。

当时，正好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搞农业是旧官僚们的强项。贾启允、刘明辉、李文、黎韦一千旧吏统统压上阵，会议高调宣布“要发扬革命战争年代那种拼命精神，拿出搞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那样的革命热情和劲头，积极投入农业学大寨运动”。之后，11月8日下达了《省委关于全党动员，苦战五年，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部署》，借此题目继续要求“认真整顿县委领导班子”“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批判懦夫懒汉世界观，批判骄傲自满，故步自封思想”还要求各地州“将县委领导成员集中到地州所在地，在地、州委直接帮助下进行整风。”“进行必要的组织调整，对资产阶级派性严重、屡教不改的人要坚决调离”。省、地、县都要抽调机关干部组成工作队下乡学大寨。

从11月25日起，贾启允亲自挂帅，省委、省革委、昆明军区、省军区负责人七林旺丹、李文、彭贵和、梁文英、张海棠、朱家璧、郭新、武健等全体出马，带领省级机关和军队工作队队员6000多人（其中局、师级干部83人，处、团级干部240人）分头出发，浩浩荡荡奔赴宜良、文山、西畴、马关，景谷、澜沧、勐海、祥云、宾川、巍山、弥渡、镇雄、中甸、泸水、宁蒗、姚安、瑞丽、保山、蒙自、耿马等16个地州市的23个县区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开展

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整顿好基层党组织和领导班子。加上地（州，市）和县级机关，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多达5万余人。^[1]工作队员中，包括不少在“反派性”运动中不听招呼、心有不满者，也借机弄到乡下干活去，省得在26号文件的贯彻中碍手碍脚。此时的贾书记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人和，此一大手笔，蔚为壮观。

贾启允的云南施政沿着邓小平的整顿路线和云发26号文件定下的调子乘胜挺进，治理效果犖然鲜明。其实，专制制度下为官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毛泽东为何口口声声赞美秦王朝？“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2]虽然有老百姓“人怨于下”但有“吏畏于上”，一切就好办了。在毛泽东建立和操控的制度之下，只要把官吏管好，让吏畏于上就可以了，即使百姓饿死几千万，亦能天下太平，没人胆敢造反。而文革之乱，本是毛自己的主意，其乱也，不过是把旧的官僚体系打乱了，而邓小平的功绩只不过将其重新理顺，说直白点，就是“复辟”，一旦回归旧秩序，于是一顺百顺。

贾启允想必很快找回了整整10年前初为郡王的感觉。这种感觉就是：只要高悬手中的尚方宝剑，则辖区之内，一呼百诺，无人反对或者不敢反对。这把尚方剑，是毛泽东——具体说，是邓小平授予的。

1.3. 毛泽东绝地反击

可惜，贾启允——广义地说，全体国人——完全没有想到，邓小平1975年的全面整顿已触犯了毛泽东的文革红线，毛暗中开始反击。

依旧是玩得稔熟的战法：用晦涩的政治隐喻作为掩护悄悄接近猎物，然后鼓动群狼一扑而上，将对方撕个粉碎。这一次的政治隐喻选择了中国家喻户晓的古典小说《水浒》，罪名是“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3]

毛以为晦涩的政治呓语可以再次把百姓搅得发昏，然后继续跟他指点的方向冲杀。可惜，经历文革政治的翻云覆雨，国人谁都谙

[1]1975年12月12日《云南日报》消息。

[2]（唐）柳宗元《封建论》。

[3]杨继绳：《天地翻覆》第二十六章：《从全面整顿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悉了此款密码。即便傻瓜，这一次也明白他是要借批宋江来收拾给满目疮痍的中国带来希望的邓小平了。毛泽东做得很神秘，生怕提前泄露天机。郭维明《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一文说：1975年9月中旬至10月中旬，在全国有3700县以上主要领导干部和各方面代表参加的会议上，江青“扯到评《水浒》，要印她的讲话，放评《水浒》的录音。华国锋向毛泽东汇报，毛说‘放屁，文不对题’‘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此时毛泽东已病入膏肓，吃饭、喝水都需要人喂。只能从喉咙内发出一些含糊不清、难以连贯、无人能懂的字句。这位已然走向神坛的病夫，现在剩下的，只有深陷病态的自恋和对权力最后的攫握。他沉迷于高高在上的云端，地上人间的真情现状早已模糊不清，只能凭着联络员侄儿和几位女工作人员的报告作出判断，并发出神喻。历史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到1975年11月底，他终于等不得了，11月26日、12月10日、14日，接二连三发出23号文件^[1]、24号文件^[2]和26号文件^[3]，急迫程度，不啻是宋代历史故事的“12道金牌”。云南省委哪敢怠慢？12月16至20日，立即召集直属机关负责人、大专院校党委书记、昆明市委负责人开会进行传达学习，20至27日，再开地、州、市委书记和分管文教的副书记会议进行传达学习。

事情起因是8月初和10月，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通过邓小平两次转信给毛泽东，告清华的实际掌权人迟群、谢静宜二人的状。毛顿然震怒，指信“动机不纯”“矛头是对着我的”，并认为，邓小平转了刘冰的信，就是偏袒、支持刘冰；11月中旬，清华大学在党委扩大会议和全校大会上批判了刘冰和当时的教育部长周荣鑫，说他们“否定教育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11月下旬，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指示，在北京召开了党政军负责同志参加的“打招呼会议”，宣读了毛泽东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讲话要点》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刘冰信件的上述讲话，并说：“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一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

[1]即《中共中央通知》：“中央最近在北京召开的一次打招呼会议讲话要点”。

[2]即《中共中央通知》意为中央决定将23号文件扩大传达范围。

[3]即《中央转发〈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辩论的情况报告〉》。

事情至此，一切都已揭晓。如果说，1966年毛泽东肇端以“批海瑞罢官”为名、以倒刘（少奇）为目的的天下大乱是乱局1.0版，1974年以“批孔老二（孔丘）”为名、以倒周（恩来）为目的的大乱为2.0版，那么，1976年以批宋江为名、以倒邓（小平）为目的的大乱，则是乱局3.0版。只是，这正好应验了中国那句成语：“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1.0版万民疯狂，气势如虹，2.0版则已广遭诟病，无果而终；到了3.0版，毛泽东的圣光索性被彻底剥离损毁。因为，恰恰是1975年邓小平的整顿给渴望平静日子的百姓带来一丝温暖的希望，那么，“批邓”就只能让草民大众对未来整个儿绝望了。“民可载舟，亦可覆舟”。历史的铁律再一次显示了它不可动摇的力量。

第二章 乱局3.0版

2.1. 周恩来之殇和吊诡的“五一八事件”

恰恰这个时候，中国发生了一件惊天悲事：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因病去世了。

噩耗传来，云南边疆整个儿垂泪悲戚。昆明市中心的广场是“九大”前夕“红太阳广场”修建未遂留下的一片巨大废墟，现在，正好成为各界群众表达心迹的悲哀场。众人佩黑纱、戴白花，纷纷自发汇集广场摆放花圈、挂写挽联并张贴诗词……偌大广场，但见大大小小花圈摆个无边无际，满满当当——天下苦文革久矣！与其说人们来此追悼，不如说是来对“当代秦始皇”抗议。其时笔者务工于云南汽车厂——就是因“11.30”大武斗闻名云南的国营大厂——各车间除了开追悼会，还纷纷自发制作花圈，步行七、八公里扛进城。笔者所在的机修车间花圈最大、最结实，骨架全用钢筋钢管焊接而成，极其沉重。大家轮换肩扛，簇拥送去东风广场，就一直滞留那儿，或沉默以感受悲氛，或私语以倾诉衷情，或什么也不做，就站在春寒料峭的花圈密林里等待长夜过去。我听见旁边一个工人大喊：“等吧等吧！反正过不了多久，还有人会死的！”大家都明白他说的“有人”指谁——恰如“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的远古诅咒。

遥远边陲的芸芸众生，对于忽悠自己长达10年的北京再次胡作非为，忍耐已经到达极限，周恩来的去世，渴望平静不可得，继而终于掀起了愤怒的风暴，有人甚至决心以死相搏。北京暴力镇压天安门悼念周恩来活动“四五运动”第三天，云南重机厂青年工人

方策，终于忍无可忍，于7日深夜，拿起笔墨在厂区大礼堂的宣传栏上断然写上“人们思念周总理”七个大字，又在另一宣传栏和附近电杆上写下“人民思念杨开慧”等几条标语——思念杨开慧，当然是曲折表达了对当今第一夫人江青的愤懑——他越写胆子越壮，索性豁出去，趁夜色正浓，又去到茨坝工业片区人流密集的汽车站，于茨坝饭店的墙壁上写下了“打倒林、张、江贼”六个的大字。方策时年30余，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生活拮据，决心书标语以明志，他已将家事进行安排，做好了被投入大牢的准备。

此事果然砰然轰动，立马被公安机关定为“重大反革命案件”，当日便派出大批公安人员“坐镇”重机厂，限令3天破案——只是3天过去了，案没有破，3个月过去了，案亦未破，半年过去了，案还是没有破，倒是大标语诅咒的“张（春桥）、江（青）贼”被打倒了。三年后的1979年1月10日，昆明市委批转重机厂为所谓“四七反标案”平反的请示报告，正式为方策师傅平反。^[1]

本来，方策就是工厂业余宣传员，到处都可找到他的笔迹，只要稍加比对，此案很容易就可以破解。可是，却因工友们对他多方保护，公安人员一直难以下手。群众公开质疑破案人员，道：“大标语说得对嘛！”“悼念周总理有什么罪”（小方）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他做事都是光明正大的”……老师傅叶大科，在家里专门备菜沽酒将不会喝酒的小方请去，借酒壮胆，将公安调查的情况告诉小方，要他只管放心，没人会出卖他。方策经济拮据，曾找工友傅金汉说明事件经过，说自己一旦被捕，请求帮忙照看家小，傅金汉师傅立即庄重答应……事实上，厂领导和公安机关内部亦有人不避嫌疑，对案件暗加包庇、拖延，让一场灾难终得悄然化解。

面对国家的共同的灾难，老官僚们的心情和选择，也和百姓保持一致。刘树声这样记录了他的悼念：

（我）忍不住悲痛之心，抑不住敬仰之情，约了州委办公室副主任孙树林同志，悄悄爬上州委大楼，把飘扬着的国旗降下一半，默哀了三分钟，在心底祝祷：“敬爱的总理安息吧，大理各族干部群众怀念您。今天鬼蜮还在横行，当人民心中的怒火冲天爆发时，再祭奠您的英灵。”^[2]

[1]《丙辰清明纪事》页15-17，人民日报出版社，1980。

[2]刘树生，页831。

也有另类事件发生。昆明市总工会一名叫王永昆的人领衔，共8人，在1976年5月18日凌晨2时，忽然将一张题为《关于打倒周总理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报告》的大字报贴上大街，并于3时左右分送省委和新华分社——注意：他们打倒的是“周总理”而不是“周恩来”，足见这几个勇者心中尚存胆怯——大字报顿时轰动春城，引发起广大市民强烈反感，8人迅速被当局抓捕。此事时称“五一八反革命事件”。

关于此案，几十年后尚有不同解释。中共云南党史研究室的记录是：

“云革群“的主要头目、昆明市工会委员王永昆想发动“打周”后，（云南帮派）便决定“先放个氢气球试探一下”，“王永昆要打，先叫他们去打；打对了我们再跟上；打错了，反革命让他们去当。我们的态度是一不反对，二（暂）不参加”。在他们的鼓动下，王永昆等通宵开会，紧张策划“打周”，从犹豫“不打第一枪、第二枪、第三枪，直至第五枪”，转而怕被别人“抢了头功”而下决心，“坐牢杀头无所谓，向周总理开炮”于是写了《关于打倒周总理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报告》的大字报^[1]。

同为官方史料的《当代云南大事纪要》则明确指认八派大佬黄兆其、刘殷农为罪魁祸首：

5月18日在帮派头目黄兆其、刘殷农的策划、支持和怂恿下，以王永昆为首的一小撮坏人，在昆明闹市区正义路一带，公开张贴“打倒周恩来”的反动大标语、大字报，制造了“五一八”反革命案件。黄、刘等人为了掩盖罪行，转移目标，嫁祸于人，向“四人帮”打报告，诬蔑省委和昆明军区领导人是这一案件的“黑后台”。^[2]

笔者经多方走访，如下情况更接近真实：王永昆，炮派骨干。王性格素多张扬，说话大口马牙，在乱局1.0和2.0版中未得出头，又不满于李毅和方向东诸炮头之“无能”，遂自立名为“云南革命

[1]《云南“文化大革命”运动大事纪实》页375。

[2]《当代云南大事纪要》1976年卷。

群众造反派”的非驴非马“临时组合”直接搭上3.0版的政治末班车。此前，他周旋寰转，已与云南政坛两大巨头：王必成（居间通过转业到电机厂任书记褚仲。褚原系王必成秘书）及黎韦搭上热线，单缺一轰动事件让公众将射灯迅速投到他的头上。“要致富，走险路”。王于是决心下一大赌注^[1]。其余签名者有：夏良途，昆明市制药厂革委会主任，炮派观点；黄梅仙，西坝玻璃厂工人，观点犹豫者（《胡延观判决书》有称，黄梅仙在审讯中还做过有利于八派的“伪证”^[2]）；张秀珍，昆明冶炼厂炮头，人称“双枪老太婆”；陈忠康，炮派观点，出狱后创办餐饮企业《过桥都》专卖米线而发达，此外还有张木寿、陶兴国与军内某人（姓名不详）。

为壮大势力，王永昆还拉拢八派干将徐宝兴（中建革委会副主任）和胡恒铿（昆钢龙山矿革委会副主任）入伙。徐、胡二人在乱局1.0版时早已成名，皆因在后来的权力分配中名至而实不惠，乱局2.0版（“批林批孔”）时遂倾向于杨树先的“大批判”第三势力，至今野心未收。而今乱局3.0既至，当然也想搭乘末班车再赌一把。王永昆和徐、胡二人因相同的政治取向和投机心理而结盟便成顺理成章事。1976年3月举行的地书会议期间，王、徐、胡便放出风声要组织人马到会来抓贾启允等人，吓得贾启允及省委秘书长李文赶忙安排人前去做安抚工作，包括让黎韦去给王永昆打招呼。只是如今王永昆扬言要打周恩来，这个赌注太大，徐、胡二人遂留了一手，暗中钩挂三方，不但将王借“打周”以暴取大名的企图告知了黄兆其、刘殷农，还到省委办公厅告了密。办公厅常务副主任胡延观回忆，此事办公厅很快向公安厅当局通报了，并安排警务人员专候，单等大字报出笼立马一网打尽。八人之中的陈忠康被捕后，立即指认徐、胡二人亦参与了策划，后二人亦被投入大牢。而黄兆其、刘殷农确实想疏通关系将昔日“战友”释放出来……总之，在当时极端敏感复杂时期，“五一八事件”确实为各派都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想象和操作空间。党史办编的《大事纪实》甚至言之凿凿：

阴谋败露后，帮派势力乱了阵脚，密谋对策，开脱

[1]王出狱后专事古董、字画、文玩之类的大买卖，经营这种商品也是需要赌博气质的。

[2]1982年4月29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胡延观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判决书》称“5月24日，胡延观同黄兆其一起将黄梅仙编造的伪证告诉给公安机关。”此处所谓伪证指王永昆与王必成等“有不寻常的关系”。王必成一贯力挺炮派。

罪责：一、要变被动为主动，变不利为有利；要制造舆论，该说的说透（即所谓对周总理是有感情的），不该说的不说（隐瞒策划支持王永昆反周总理的问题）。二、提出以是否在大字报上签名为界，不要牵扯其他人。三、揭发王永昆等人的策划过程及与王永昆有牵连的人和事，编造王必成、黎韦和新华分社记者石玉生的材料，找省委汇报，向《人民日报》记者反映。四、提供假情况，栽赃诬陷王必成和黎韦。五、以“五一八”事件发生在昆明为借口，要求转由昆明市公安局负责审理此案，以便刘殷农直接掌握审理权，保护同伙过关。这些帮派分子抢先制造舆论说“黎韦、王必成是王永昆的后台”，收集黎、王的“材料”。他们抛出《春城魔影——“五一八”事件的真相》的文章，继续陷害黎韦和王必成是“五一八”反革命事件的“后台”。粉碎“四人帮”后，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入开展，全案终于查清，真正的后台受到了应得的惩处。

至于谁是真正后台，实则语焉不详，为整个事件留下一地鸡毛。其实，谁策划已经不重要。文革大乱在中国的社会魔盒里释放和制造出数不清的狂热主义者、草莽英雄、暴民、野心家、阴谋家、权力癖和妄想症患者，发生任何蹊跷事都是可能的，胜利者最后要将他们描绘成任何角色都轻而易举。只是有一点毫无疑问：在1976年的特殊背景之下，“反周”不得人心。虽然这位“好总理”人已仙逝，骨灰已撒，但作为一面旗帜，他还在中国人的头顶高高飘扬，这面旗帜上写的正是：“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经过了近十年的社会痉挛和精神痉挛，庶民百姓已经恢复了理智，他们看懂了邓小平是周恩来的接棒人，看懂了毛泽东批宋江，是要把邓小平彻底打下去。愿意为毛泽东文革继续充当炮灰者，只是因一己之私的个人，或帮派。广大草根庶民是兴趣索然了。新的动乱和争斗，充其量只会是上层、相关利益人和集团之间的游戏——1976年的云南故事及贾启允的霉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

2.2. 变动不居的云南政治版图

事情回到1976年年初。

1月14日，在传达《人民日报》发表《大辩论带来大变化》一文，把“打招呼会议”精神捅到社会上。此后，在全国范围“批邓、反

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即乱局3.0版，顿时呼啸而起。

与乱局1.0版相比：1976年的版本的特点是：

第一，升温快。1966年真正将全社会发动起来造反的，是10月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其时，标志文革正式发动的十六条发布已过了两个月；等到跃跃欲试的百姓小心试水继而放胆大干，又有两个月功夫。这次不一样了，从批宋江开始到乱局启幕，就短短一个月。究其原因，参与者已不是原来的安分守己的庶民雏儿，而是已初尝权力禁果的枭雄。毛泽东17年专制制度下，草民的上升通道几乎完全闭锁。文革乱局所提供的通往权力的可能性和开放性曾让不安分的灵魂大得快慰，亦让社会表象变得相对公平，可惜，这种可能性和开放性不是通过选票，不是通过和平与公平竞争，而是通过斗争和厮杀，结果是平民和官僚之间只能结下血海深仇。1975年邓小平搞整顿，无非把曾经的秩序重新理顺，剥夺小兵既得利益，让老将归位，重新堵断上升通道。草民枭雄必得拼死一搏，用毛泽东反击邓小平、用1976年反击1975年，哪怕鱼死网破，玉石俱焚。

第二，官场通过这些年重新洗牌，各大佬的立场和彼此间的矛盾已经暗转。云南省委内部，周兴既走，贾启允懦弱，侥幸逃脱“批林”之灾的王必成遇难呈祥，军权在握，且与原人称八二三“高参”的黎韦“结盟”^[1]，取代陈康成为炮派的救星；原属周兴阵营的郭超也已反水；仅周兴从山东带来的李文^[2]、省委组织部长岳肖峡等（当然包括省级机关多个部门领导）还于感情上暗中偏八。至于新干部，已升任副书记的七林旺丹连住房问题也遭刘明辉等老干部挤兑，感情上自然非常愿意捍卫文革成果；马车夫出身十届候补中委、省委常委彭贵和，理所当然和旺丹惺惺相惜，可惜文化水平太低，只能凑个数；同为十届中央候补委员的朱克家就不一样了，年轻气盛，精力充沛，对北京的知遇之恩真心相报，1976年2月第二次打招呼会开始，朱就从西双版纳山寨调来省里参加常委工作；

[1] 据胡延观狱中的书面交代，省委秘书长李文告诉他，1975年制定26号文件的100天会议“把周兴整得很苦，不让周兴同外面联系，想叫周永祺帮助整理一下检讨稿都不行。整周兴主要是王必成和黎韦。二人勾得很深，黎韦帮王写讲话稿，当秘书。”李文还说“上了林彪贼船的成了正确路线，批判林彪的倒成了林彪路线，真想不通”。

[2] 原烟台地位书记。时任云南省委副书记兼秘书长。周兴从山东调云南时，曾带来两个地厅级干部，另一人为王世超，原淄博市委书记，到云南任红河州委书记。

此外，还有因节约“一把米”起家的省贫协主席张翠芬等，这些人虽无从政经验，对两派派斗亦无概念，但干劲大，对北京绝对忠诚，非常适合在3.0版故事担任冲锋队员。

第三，参与者的社会面非常窄。最广大的草民百姓对文革街头政治和社会的准无政府状态早已厌倦，他们看透了政治的无耻，对运动兴趣淡漠。事实上，在毛泽东治下忍辱负重的周恩来已经成为他们心中的温暖之火，而周的接棒人邓小平确实以1975年大刀阔斧的整顿让他们看到一线曙光，毛泽东的批邓运动，不能不遭遇几乎全社会的抵制。云南汽车厂“落实”政策、刚复职锻压车间的支部书记朱B富，试图在批邓中出一把风头以雪前耻，在群众大会上危言耸听地大批邓小平如何之可恶可怕，宣称：“矮子上台，将有千百万人头落地”，可惜工人群众全体沉默，唯一一个发声的，是还在生产岗位干活的四川大学分来的毕业生戴大彬，戴不冷不热上台怼朱道：“矮子上台，将有千百万猪头落地。”

猪肉是物质匮乏岁月的何等侈望！于是满场大笑，搞得朱无法下台。顺便补充，文革破产后，朱B富因系老中层干部，于是再次落实政策，当了厂“揭批查”运动办公室负责人，找借口将戴大彬投进了大牢——后遭到全厂工人一致怒怼（那时还允许写大字报），而朱抓人毫无证据，纯属公报私仇，只好从监狱将戴无罪放回。

第四，此次的演出双方，居守势的是这几年落实政策、特别是1975年“整顿”中官复原职的旧官僚，进攻方则是已经形成帮派的造反起家者。按照刘树生的表述：“帮派体系”是倚仗“划线站队”窃取一定权力的少部分人，为了保住和扩大既得利益，死心塌地追随“四人帮”，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行动上一脉相承，在“四人帮”羽翼下，成为“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在各地的实施者。既然帮派已形成体系，为首的无论精英还是恶魔，社会动员能力和效率总是很高的。

云南批邓锣鼓既响，1975年整顿中最为受伤的八派舆论首先一哄而上。曾写过轰动边地的《触目惊心的五月兵变》作者涂晓雷以“姚雨”“秦臻”等笔名，接连撰写《谁是刽子手》《云南问题宣言》《转嫁危机的新阴谋》等大字报在昆明街头贴出。大字报称云南贯彻省委[1975]26号文件“造成一种贯彻修正主义纲领的恐怖气氛”，是“对新生力量大砍大杀，对复辟势力大举大请”，而邓小平则是“资本主义的复辟狂”“扼杀新生力量的刽子手”“做法不亚于波旁王朝的复辟，袁世凯之称帝，保皇党之嚣张，还乡团之反复”；大字报点名省、市委和省属16个部、委、办、局的25名领导干部是“还乡团主要骨干”，有的还是“叛徒”“走资派”“现行反革命分子”等，

大字报号召“向邓小平为首的走资派发动毁灭性进攻！”“把走资派把持的党、政、军、财、文等大权夺回来！”宣布：“我们斗争的目标就是为了夺取这个政权和巩固这个政权”“省委是压在云南人民头上的土皇帝”“现在就必须解体”“要把省委坚决打倒”，要“牢固地建立一个‘文革’式的领导体制”。

笔者问过涂晓雷的挚友兼派友沈炳章，是否知道“姚雨”“秦臻”笔名来历。沈说他当时便问过涂，涂说：“姚雨”就是要在云南“摇”起满天“狂风暴雨”。笔者曾与涂共事多年，总的感觉，涂极端聪敏，除了喜欢出一点风头，似乎看不出太大政治野心，仅就外表说，小伙子长得小脸小嘴，还颇有几分“娘炮”之气，文革几年，他一路顺风，也没有受过什么委屈，最多就是1975年贯彻26号文件时被下放到云南电影机械厂当工人。他哪来这么多仇恨和复仇的气魄呢？笔者得知确切消息，此前，他已被省委内定为省文化局长，组织部门尚未下令便遇了26文件，于是南柯梦断——权力对人之诱惑何等巨大，此证足矣！

2.3. 地委书记会议与政治骚乱

2月25日，北京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召开第二次“打招呼会议”正式就批邓问题摊牌。贾启允、刘明辉、刘志坚、七林旺丹、朱克家等6人赴会。华国锋在会上讲话，要求各地回去后认真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和中共中央文件，在此基础上“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各级领导要站在运动的前列，特别是在右倾翻案风中受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影响犯有错误的一些同志，要带头揭发批判，在揭发批判过程中转好弯子”，并指出以这次打招呼为界，会议前的问题，由中共中央负责。会后还转不过来就不好了。官史记载：在云南小组会上，“四人帮”无理指责云南省委“在贯彻省委26号文件过程中，执行了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右倾翻案风刮得很厉害”。王洪文说：“反派性，实质上是打击新生力量，否定‘文化大革命’。资产阶级派性，一千年有，一万年有！”张春桥则说：“什么带职下放，是打击造反派的一根棍子，是你们耍的鬼把戏，”并质问，“为什么不让人家回来造反？”江青亦煽动七林旺丹，说“我在中央受压，你在云南受压。”

朱克家回忆：会议期间，王洪文来到云南小组会，说你们有人胆子大呀！比我这个副主席大。随便把中央候补委员就弄下去

了——前面已经介绍过，前一年农业学大寨会议，朱克家和邢燕子、柴春泽等十二名知青代表联名写了《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一封信》，发誓要带领所在社队在两三年之内建成大寨式的先进单位，会议一完，立即返回遥远的穷乡勐登寨参加劳动去了——朱克家说，回乡确实是他自己的决定，但中央副主席这样一说，他就被推上虎背，欲下不能了。他需要留在昆明，为毛泽东的事业献身一腔真诚，使他不能不热血沸腾地投入了伟大的“路线斗争”。这样，他注定就成了冤大头。在云南揭批查中，篡党夺权的帮派集团排序，对云南派性斗争一窍不通的他被冠以“四人帮亲信”之名，成了云南“反革命帮派第一号头领”——该“反革命帮派”的定语为“以朱、黄、刘为首”。

官吏如此记录：朱克家“回到云南，把‘四人帮’的讲话全部告诉黄兆其，并说中央首长要他帮助省委领导转好弯，他是向中央做了保证的。就这样，‘四人帮’以中央领导人的身份为云南定调子，指路子。他们和云南的帮派体系上下串通，狼狈为奸，在云南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造成了云南的大反复。”就事论事，此说确与事实大体相符。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年轻，忽然被中国最高层委以重任，他能不尽心尽力吗？几十年后，笔者多次在曲靖见到朱，这位升天坠地、被折腾得九死一生的上海知青，早已变得圆熟而超然。提起飞黄腾达的政治旧事，他只平静地说：“那时我对政治懂什么啊？完全不懂！从小受共产党教育，要听党的话。人家让我干什么，我只会傻乎乎地干。当时人家是党中央首长啊！我可不卖命干吗？说我爪牙，我就爪牙吧，我认账。但我没存心害人。”1976年，他22岁，太小了！而中国的政治场又太黑暗，他勤勤恳恳的工作激情和出类拔萃的聪明智慧，只能轻而易举地受骗上当，为人作嫁，甚至为虎作伥。

3月6日，中共云南省委召开地委书记会议正式开锣，会期22天，至28日闭幕。会议的主题是传达中共中央（1976）4号、5号文件，即3月3日发出的《关于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和转发华国锋在“打招呼会议”讲话的通知。省委常委决定扩大参会人员规模，除地、州、市一二把手，还邀请老、中、青干部参加，特别是1975年实施整顿、贯彻26号文件挨整的干部，参会人员扩大到638人。会议地点是弥勒寺省委二号大院会议大厅兼电影院。该院修建于1950年代，简陋、实用且宽大，四周全无关栏，谁都可进可出，大会遂成了一场政治庙会。尚未正式获得任命便被下放工厂劳动的“文化局长”涂晓雷也赶来大会发了言，一开头就背诵了唐人刘禹锡的七绝诗《再游玄都观》：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涂郎”和他的派友们显然陷入了毛泽东同样的病态自恋之中，必胜的豪气喷薄而出。

影响力比涂晓雷更大的“前度刘郎”，还有1975年被下放农村“学大寨”的两派大佬：黄兆其、刘殷农、李毅、方向东和杨树先。他们回到昆明便提出要阅看离昆几个月的相关文件以筹备政治“弹药”。李、方、杨还好办，按级别只能看省革委的文件，那都是些鸡毛蒜皮，要看就给看吧。麻烦的是黄兆其，按决定，他可是列席省委常委工作的党员干部呢，按此级别可看的文件许多是见不得人的，特别1975年，省委有领导人准备落实赵健民政策、甚至省委组织部还就阎红彦自杀问题也准备予以否定的简报，这都是非常要命的玩意儿。1968年8月经毛泽东亲自批准的关于成立云南省革委的批示，开宗明义就确认打倒刘少奇在云南的代理人阎红彦、赵健民是云南文革的伟大成果。如今要为二人翻案，铁定修正主义路线，铁定资本主义复辟嘛！此要求搞得胡延观十分为难，只好请示李文和周永琪，经层层批准，照办了。于是“胡让黄兆其到省委办公厅机要室看了不属于黄看的省委领导人同赵健民两次谈话的机密材料，并作了摘抄。”^[1]

有了这些弹药，黄兆其等确信以贾启允为首的云南省委1975年所犯的确乎不是一般错误，而是地地道道执行了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沈炳章^[2]回忆：

（会上）黄兆其对我说：贾启允的检查如果敷衍、不认真，你就上去讲话。果然，贾就一个劲儿承认他是工作错误，而不是跟邓小平。因为要把这些挂上邓小平才好办，于是我就上台去。事前我没稿子，上去便即兴发挥，说贾启允的检查不认真，他的错误是路线错误，而不是工作错误，我顺手指着坐在台下一堆老干部：刘明辉，高治国等，说他们不都是邓小平路线弄起来的吗？接着，八派名人金彝旦、包亚芳等亦纷纷上台，一些被整的、在家赋闲的中

[1]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内部通报第四期（1982年4月26日）》。

[2] 沈曾为“九大”代表、省电力局革委会副主任，1975年被免职下放基层工作。

层干部，如东川市委的张××、昆明铁路分局原党委书记谈子文^[1]、电力局党副书记杨文祥也上台起哄。黄兆其、刘殷农、徐宝兴一千人等便组织人在会场起哄，乱成一团，我看事情闹大，抓紧又说：反正新华社总有记者在，请他们把情况如实上报，我们的大会继续开。可是，会议咋还能开下去？参会代表纷纷作鸟兽散。

面对会议的混乱，贾启允束手无策，他想统一常委意见，而常委会上斗争更加激烈。1975年“反派性”（现在被定义为“右倾翻案风”）跳得最高的王必成，现在却宣布他不管地方事，拒绝出席常委会；刘明辉、黎韦一干老官僚则一个个装聋作哑，根本不承认利用“反派性”打击过青年干部，更没翻过文化大革命的案；贾启允同邓小平关系本深，腰杆硬不起，大家还反过来攻他，要他把履新前夕邓给他面授机宜的记录拿出来批判，贾拒不拿出；旺丹等几个新人倒是积极，尤其朱克家表现最抢眼，但是他们对云南文革派系争斗模糊不清，压根儿抓不到点子。常委会网越撒越大，漫无边际，却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贾启允草草休会而不可得，性急的朱克家干脆为此大发脾气。

省委机关内部也翻了天。1974年批林批孔时期，办公厅曾主动编写印发过共44页的“内部资料”实则公开资料《林彪死党与蔡雷马董》，将矛头直指“钉子王（必成）”，为人提供批判“炮弹”。这一回连这样的动静都没有，实在说不过去。主持日常工作的胡延观与贾启允私交不错，不愿给第一书记添乱，故而四面讨好和稀泥，于是副主任刘清选和胡文龙上门找他论理，说胡“不领导会议”认为他“是‘牧师’‘投降派’”。胡到秘书长李文家发牢骚，说他不好领导运动，请秘书长和副秘书长来领导，他道：“叫我们揭，要讲就要联到省委领导，怎么办？”李文劝慰说，他会找刘清选和胡文龙做工作，同时动员胡“大胆工作。有问题你们可以讲，他地位不同，不好讲。”胡延观于是被逼上“梁山”，在机关大会上放开了炮。七林旺丹等几个新干部调昆明工作，吃喝拉撒一干事宜均由胡延观安排，彼此私交甚好。胡要上台作批判发言，旺丹专门鼓励他“放开讲，时间不够可以延长”。文革破产后，胡在狱中交代：“（李文）这次谈话就为我们后来进攻省委定了调子，提供了主要材料。这样，我就根据这些基调和材料，在3月地书会议上的《简报》和四月下

[1] 谈是万里1975年来昆明第一个被撤职的党委书记。

旬的批判发言中，向省委发动进攻，主要矛头针对王司令员、黎韦、郭超几个人。”胡的工作职责本为上传下达、协调关系、信息最为丰富，他一上阵，这些来自上层的信息经由基层闹事者转发、翻印，其影响向昆明及各地、州迅速辐射并不断放大。

文山高中生何立宽，因“造反起家”担任了州革委副主任，中共文山州委常委，州农办副主任，地书会议期间“在刘殷农的带领下，于三月二14日下午冲击了省委常委会议。接着，何立宽又在黄、刘一伙拟写的、其目的在于改组省委，夺取省委领导权和“永远开除邓小平党籍给党中央的电报上签了名。”“何立宽还领受了黄兆其搞‘会内会外配合，给省委施加压力’的旨意，指使丁正中、童永昌等人，先后组织了二批共一百余人的‘告状团’，抢了州委的五辆汽车，挟持州委副书记罗运通赴昆，冲击省委地书会议和省委机关，围攻省委领导干部，再次破坏了省委和省委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1]；时年32岁的胡玉珍亦为“造反起家”，当了砚山县委常委、文山州委委员和云南省委候补委员，1976年4月6日亦策动组织“砚山赴昆告状团”“强行占用县革委小车二辆、县车队卡车一辆，以及县广播站、平远农场等单位的广播录音器材，带领五十余人窜到昆明，冲击省委机关。围斗省委副书记李文达七个多小时”……^[2]楚雄州的群众领袖、已担任中共楚雄州委副书记的刘光兴“策划指挥楚雄的同伙到昆明向省委施加压力，通过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的活动，刘光兴参加了省委召开的地书会议。会议期间，刘参与黄兆其，刘殷农冲击地书会议，围攻省委领导，并在黄兆其、刘殷农主谋拟定的“永远开除邓小平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改组省委，成立省委临时领导小组领导运动”等为主要内容的电报上签名，并参与黄兆其、刘殷农一伙强迫省委向中央发送电报。^[3]

火力最足的是大理州。刘树生回忆^[4]：

大理州的上访团由12个县（市）组成，团长由“乱世英雄”担任，成员中有既是造反起家又身居高位的“双料货”，有贯彻16号文件时挨了批评或者“刮下去”的，有见风使舵急速早“转弯”的，有明哲保身随风转的，也有些人是被裹挟来的。

[1] 见《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1982）刑判字第14号》。

[2] 引自砚山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82）法刑字第37号。

[3] 见《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1982）刑一字第007号》。

[4] 刘树生，页833-837。

大理州的小组讨论刚刚开始，上访团各路诸侯冲进会场，来势汹汹，气焰嚣张，或站或坐，或大吼大叫，嘻嘻哈哈，或摩拳擦掌严阵以待，犹如马蜂出窝，把会场闹得乌烟瘴气……按照常理，会议主持人的最佳选择，应该是责令他们“滚蛋”退出，但是没有；等而下之也应宣布散会，也没有；而是把我们这些与会者钉在座位上，等待着狂风暴雨的冲击。

州里上访团的“首席发言”开了腔：“这次我们不请自来，主要是为了帮助你们州委常委转好弯子，轻装上阵，领导全州各族人民迅速投入反击右倾翻案风。你们转了弯，我们就是一条战线上的战友，如果顽固坚持错误路线，抱住邓小平大腿不放，与人民为敌，绝没有好下场。你们去年批什么‘划线站队’，任何时候都有站队问题，应该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现在就是站队的关键时刻，何去何从，你们这些常委要尽快抉择！”

哪里还有什么共产党领导，哪里还有什么规矩王法，既非州委常委，也非列席代表，更不是上级领导，公然闯入省委召开会议的严肃会场，颐指气使，指手画脚，当起凌驾于州委之上的太上皇……“上访团”一位急先锋跳到我的面前，用手指着我的鼻梁：“刘树生，听说你是反对转弯子的，反对释放杨仁民，今天不妨把你的思想摆到桌面上：来理论理论，让它见见阳光。”

狐狸露出了尾巴，在此前的讨论会上我说过“我们刚刚走上革命路线轨道，不存在转弯问题”，也说过“逮捕杨仁民是省委批准的，证据确凿，我不同意释放”。这是在常委会上说的，除了在场的与会者只能是常委们知道，他们竟然“听说”了。听谁说的？再明白不过地说明常委中有他们的同谋者。

看着主持人不置可否、实为纵容的态度我不能不应对：“这是省里召开的党委扩大会，你们有什么意见，最好散会后再找我提”，这两句话是答复，也是提示主持会议的人：这伙人没有资格在会上胡闹。但是主持人是真听不懂，还是糊涂抑或是暗中支持上访者不得而知，竟像个泥菩萨。我只好充当挡箭牌：“你们要我们转弯子，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我可以告诉你们，从参加革命那天起，我就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请你们不要忘记，我们刚刚才纠正‘划线站队’的错误，至今还有许多遗留问

题没有解决，怎么又冒出一个站队问题？这不是与中央唱对台戏吗？不是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成果吗？”似乎“上访团”的头目比主持会议的人还“高明”，听出了我的弦外之音：“你不要拿常委开会来限制我们的革命行动，不准你压制群众！”……

“上访者”七嘴八舌，众“炮”齐放：“压制群众革命的是你，打击迫害造反派的是你！请隐士、举逸民的是你！”“跟着邓小平刮右倾翻案风的是你，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是你！大理州的还乡团长就是你！”

我成了众矢之的。其他人显得悠闲，抽烟的抽烟，喝水的喝水，同情支持我也怕引火烧身。我不甘心成为满身箭簇的刺猬，据理驳斥：“省委26号文件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贯彻落实省委这个文件难道不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

从此，我们这些拒绝“转弯”的“顽固分子”，遭到了无情的揪斗，不准吃饭，不准睡觉，连上厕所都有人跟在后面监视咒骂。我记得当时最难过的有曲靖地委的祁山同志，昭通地委的王文玉同志、楚雄州委的余活力同志、保山地委的段华民同志等。有一天中午开饭时，昆明的造反派们抬一张桌子摆在饭堂的门口，桌上铺一张白纸，叫进出饭堂的人都要表态签字，说：“三月地书会议开得不好，请中央派人来指导”等等，我在白纸上写了一句话，表示请中央派人来指导我赞成，并签上了名。

“上访团”批斗我，被裹挟上来的各县的书记、革委会主任之类的也来找我问这问那，使我无暇应对。别人也许是受不了批斗，希望早早解脱而违心地“转弯”。有的当了“过河卒”不能自拔。有个县的一位领导干部就被推上第一线，抓住我的胸脯要我签字同意释放杨仁民；各县来的人也跟着起哄：“打倒复辟派！”“打倒刘树生！”“打倒还乡团长！”

这是时过30多年刘树生的书面回忆，仅就表述语言，从中足以读出老官僚们内心对造反派有多么仇恨。文中所说“释放杨仁民”一事，当时对省委是否“转弯”确是一非常具体的硬指标。面对帮派势力的巨大压力，贾启允别无选择，地书会议闭幕第三天，3月31日，中共云南省委常委便作出释放“现行反革命”杨仁民的决定，4月2日又作出释放昆明铁路局8名在押犯的决定，接下来，全省各

地释放 1975 年抓捕的在押“囚犯”一时成风。据官史统计，全省先后释放的在押人员 120 多人。

“战友”获释成了造反派的节日。为了“热烈欢迎杨（仁民）副主任胜利归来！”下关地区的哥儿们还组织了一个万人大会，鞭炮声声，鼓乐喧天，满场一片“欢呼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胜利”的口号之声……刘树生记：“刚从监狱里出来的瘟神杨仁民换上一身新装，像凯旋的勇士一样，面对夹道欢迎的弟兄们频频挥手，趋炎者给他戴花，附势者给他披红，阿谀者放鞭炮，奉承者吹喇叭抬轿子……好不威风，好不得意。”其他地、州“打开监狱放左派”的情况也差不多。刘树声再记：“1976年4月1日，我这个‘还乡团长’被穷凶极恶的帮派爪牙抓上了汽车，由两名彪形大汉左右‘护卫’，据说是怕我‘跳车自杀’，失去‘路线斗争的活教材’，被押解着从昆明返回了下关。”

最热闹的节日当然在昆明。省委办公厅大院再次成了热热闹闹的政治集市，草民随进随出，如入无人之境。甚至动辄就对正在召开的省委常委实施包围。办公厅二处秘书、后曾任省委新书记安平生秘书的李文辉告诉笔者：

被围困的常委谁都不表态，不吭气，一个个都找借口开溜，最后只有脾气很好的贾启允一人困坐中间“支老桩”，反正他什么也不说，什么态都不表，只是听。^[1]

2.4. 北京的高压和贾启允的“投名状”

文革 1.0 版，毛泽东靠发动红卫兵啸乱继而搅动全体草民闹事，很快成就天下大乱之局，到 2.0 版“批林批孔”，庶民百姓对街头政治已经厌倦，所谓群众运动这一套已经不灵，只得靠江青派几个亲信到处送材料送信“放炮点火”“放火烧荒”；到了 1976 年乱局 3.0 版，更是只能照 2.0 版本路数发挥，向各地派遣身份奇特的记者、实则特务之类，以搜集情报、唆闹搅局。中国极权政治可谓周密极致矣，执政中枢竟不通过正常渠道施政，偏偏通过特务进行操控，像是干见不得人的勾当，真是中国政治的怪诞生态，亦可见最高当局已何等无奈与可悲。

[1] 2019 年 1 月笔者对李文辉访谈。

云南省委办公厅负责人胡延观在狱中交代他“积极向《人民日报》来云南搞特务活动的记者反映情况，并为他们进行特务活动提供方便”^[1]一段，说他共接待过三批记者，每批二人，均一男一女，来了就一直待着不走，直到10月初方被北京召回。第一批为魏亚玲和另一男（名字已忘）；第二批为傅世福、何加玉；第三批为郭剑锋、谢荣镇。胡知道这些人并非“记者”，而是另有身份，来滇前上峰亦向云南省委打过招呼，他们均有权参加省委常委。办公厅秘书李文辉回忆，这些记者要去哪儿，办公厅都得派人陪同前往。领导交代，说这些“中央来人”，机关干部都必须全力配合。被派者则生怕沾惹，躲犹不及，一旦被派，都找借口推诿。李说，某次记者要去昆钢，厅领导考虑李来自冶金系统，故要他陪同前往。李告诉笔者，说那天正好家里有事，遂侥幸溜了号，要不事后“揭、批、查”，他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北京记者一到就给贾启允来了个下马威。3月，正是地书会议“转弯子”热闹时，与会者纷纷要求追查贾启允来滇前邓小平的私人叮嘱，特别是那一句“你到云南工作，人家骂你搞复辟了，你的工作就搞好了”。上一年10月走马上任，贾启允确曾在首次厅、局长见面会上不无得意地介绍过邓公此嘱。其时全面整顿，邓声望如日中天，贾启允自知资浅历薄，云南无根基，自然需要请出尚方宝剑为之壮胆。如今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已成落水狗，此一金句已成一大罪言，贾书记如若油滑一点，完全可和当时多数老干部一样装聋作哑、装死躺下，可书生气偏偏让他走了一招臭棋：面对与会者强大压力，他公然选择了让步——在3月13日的召集人会议上，他发言题为《我的揭发、批判和初步检查》，把邓小平对他来滇工作的指示妄定为“修正主义”。贾启允本有记笔记的好习惯，邓小平此“复辟”金句就认认真真记在本子上。旁听会议的北京特务听闻有此一记，如获至宝，于是强逼贾启允交出笔记以呈堂报捷。

中共革命本质上和历史上陈胜、吴广、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一样，是一场打江山坐天下、改朝换代的农民造反，参与者必得根据江湖道上的规矩行事方能立足，比如对头领“忠”、对朋友“义”、为知遇者舍身效命、为弟兄两肋插刀等等。中国的政治江湖，背叛主子的“两姓家奴”从来遭人鄙夷，无法再混下去。如今邓被毛推

[1]“四人帮”垮台后，胡被刑拘。狱中曾写有数十万字交代与申辩。以下有关内容均摘抄自这些文稿。

出了辕门，按道上规矩，最终不管邓是死是活，贾都必得以死相殉——贾启允知道事情的严重性，无奈之际，曾私下咨询故交兼幕僚胡延观如何处置为妥？胡无奈答：事已至此，看来只能交了。总之，不管贾属被逼无奈或主动变节，此举显然是向反邓势力交出了“投名状”。

贾启允的发言和交出的“邓氏锦囊”一时轰动全国，成为各地“批邓”、打压领导“转弯”的“钢鞭材料”。这样的人，注定最终不可能再得到任何主子的看重。事实正是如此：不等邓小平重新出山，贾启允的政治生命已经彻底完结。官方定义：他的交代“客观上为批邓供了炮弹，使‘文革’尾声的云南省更加动荡，丧失了一个老同志应有的立场”。所以“四人帮”一下台贾启允于1977年2月也受牵连下台，其在‘文革’尾声的表现跟当时的外交部长乔冠华一样。”^[1]

贾启允既已犯了江湖道上规矩，自此黄兆其、刘殷农一伙造反好汉瞧不起他，连朱克家这样刚上路的政治新手也看他不起^[2]，遑论老家伙？简直就可以随便欺负他了。

5月29日，滇西龙陵、潞西一带突发强烈地震，震级分别为7.3和7.4级；极震区裂度9度，受灾面积1800多平方公里，死亡98人，重伤451人，轻伤1991人，倒塌和破坏房屋42万间。这一回，北京迅速派来“中央慰问团”前往灾区慰问，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任为团长、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姚连蔚任副团长，从北京直飞滇西最大军用机场祥云。省委通知大理州委书记刘树生前去迎接，正坐困愁城的刘树生是何等聪明人士，趁前往祥云机场接人之机，干脆玩了一场金蝉脱壳之计：

在祥云的一切工作安排妥当后……我就打电话到省委办公厅报告我的身体情况，要求请假到昆明治疗。请求他们在晚上11点以前给我一个答复，如果不回复，我就认为是批准我的请假了。（接了慰问团之后）我找到祥云县公安局局长颜绍学同志……安排了一位姓杨的驾驶员为我开着吉普车，在雨雾蒙蒙的夜幕中驶出祥云县城，飞驰在昆畹公路上……当天晚上3点多钟到达昆明。

[1] “红雨斋”博文《两度短命的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2009-02-19）。

[2] 1976年7月，省委改组方案，朱、黄、刘等都认为贾启允做一把手不妥。

刘的回忆录特别指出：“当时与我类似情况来昆明治病住院的老同志不少，办公厅的同志习以为常，我挂了‘号’，合理合法地‘流亡’昆明。”后来又住到老朋友云南民族学院马曜教授私人家里，晨昏相处，倾心交谈。事实上，“小病大养”“无病呻吟”已经成了老官僚们回避运动的最佳手段，贾启允毫无办法。

吴桂贤、姚连蔚来滇可谓“天”将灭贾。吴、姚去过灾区旋接返昆，向焦头烂额的贾启允施压。他们的来头比“记者”大得多：吴系国务院副总理、姚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二人皆系以工人之身出道的新干部，姚连蔚更是“造反起家”的主儿。1967年9月初一次武斗，西安两派在胡家庙、未央路等地厮杀，动用大量汽车、消防车、坦克和步枪、机枪等武器及电台。“工联”头头姚连蔚亲临一线指挥冲锋，一次武斗死100多人，伤290多人。官史称：“滇西地震慰问团领导”“亲自找贾启允谈话，令其交代检查，与邓小平划清界限；同时又与黄兆其和省委内的个别人密谋策划，对其实施‘上压下挤’‘内外夹攻’，强使贾在震庄宾馆关起门开了40天常委会议。集中批判贾启允和省委贯彻执行省委[1975]26号文件的问题，最后于7月25日形成并下发《中共云南省委常委会议纪要》（云发[1976]40号）。”^[1]本已身临悬崖、进退失据的贾启允，这一次被人向深渊猛推了一把。

云南已成了一潭浑水，谁都可以伸手下来摸鱼。吴、姚一走，中组部又来人了，共5个。据朱克家回忆，该小组以中组部核心小组成员、某军人带队，来后分别找省委常委及非常委一个个分别谈话，最后形成调整后的班子名单。朱回忆，班子变化盖有：除贾启允继续任第一书记，老红军刘明辉位子不动，将七林旺丹提为书记；副书记为郭超、黎韦、李文；新提宋丙寅、张翠芬为常委，朱克家补入常委，宋分管农业（中年干部，其余常委：组织部长岳肖峡，宣传部长梁文英、金桂仙（团委书记）、彭贵和（工会主席）不动。该方案中新干部旺丹地位上升，新增的宋丙寅为八派老干部、朱克家正式入常、八派新锐张翠芬新晋常委，显然让文革派势力大增，八派自然高兴，唯一还是贾启允，大家都觉得他能力不行。为此，与新干部交道密切的胡延观还多方做工作，外来干部嘛，要大家多多支持。

7月初，“四人帮”的亲信、文化部长于会泳也派工作组来昆明凑热闹，调查收集各地领导阻碍“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的材

[1]《云南“文化大革命”运动大事纪实》页377。

料。按照“四人帮”大写特写“与党内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旨意，在昆明海埂召开“全省创作会议”，鼓吹建立一支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创作队伍”“要努力塑造与党内资产阶级对着干、同走资派对着干的英雄形象”“要写走资派的本质特点，刻画走资派的欺骗性、残忍性、顽固性”“要把斗争锋芒指向那些决策人物、挂帅人物”“要从小舞台反映大舞台”，在这股风潮鼓动之下，七八月份云南已先后“创作”出两部“与走资派作斗争”的话剧《典型报告》与《搏斗》。在《典型报告》中，出现了省委书记“顾从熙（从西）”这样级别的“大走资派”；在《搏斗》中，更出现了中央部长级别的“走资派”石谦礼（“十千里”喻时任铁道部长“万里”之意）。

与阎红彦1966年陷入的困境相比，1976年的贾启允境遇显然要糟得多。阎虽然或真或假地承认自己大方向（即运动对象）错了，却依旧坚信自己路线（背靠的山头）没错，坚信毛泽东是相信自己的；再说，执政云南多年，手下至少已形成了一批死党；贾启允困境在于，他的靠山邓小平已经被毛泽东抛弃，本地又无马仔为之效命，更别说贴心马仔。他完全成了孤魂野鬼，连乱局1.0版时候维持会性质的“军管会”也没有了。交过“投名状”的贾启允无路可走，只能被在野的文革好汉们绑架，末路狂奔。

司马光把中国专制极权社会的治理伦理概括为三大要件：“礼”“分”“名”。“何谓礼？纪纲是也”，指社会的总伦理总秩序；“何谓分？君臣是也”，指君王和臣僚之间的关系；而“名”则指“公、侯、卿、大夫”即基层官僚守土之职责。只要把三个关系处理好，于是“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枝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枝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1]毛泽东高高在上，牢牢把控制权柄，可是，他亲自发动文革大乱近10年，全国纲纪早被摧毁殆尽；而云南，一把手公然向乱民就降，全局焉能安定？

2.5. 关于理论和理论讨论会

毛泽东一贯讲究理论的实用性，强调不仅用理论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用理论改造世界。这一套实用主义的手法在文革中被造反

[1]《资治通鉴》卷第一·周纪一。

派接过来为己所用，几近炉火纯青。为了占领政治制高点，对“理论”各取所需、断章取义、各做解释，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文革伊始，毛发表了一个“五七指示”，阐明他想要实现的乌托邦蓝图——学界认为此指示为解读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把钥匙^[1]。如今，乱局已快十年，该设想实施结果比1958年的同为乌托邦试验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结果糟糕得多。毛泽东必须再次从理论上阐明他的意图，彰显“继续革命理论”对马列主义的重大贡献——对照1966年文革发动之初的“五七指示”，1976年3月文革破产前发布的“4号文件”正好成为解读毛策动文革的又一把钥匙。亦成了造反者重要的理论武器。

在这个讲话中，他首先承认他建设的“这样一个国家（按，指保障了所谓“资产阶级法权”的政权），跟旧社会差不多”具体表现为：“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这哪儿像共产主义的样子？毛泽东由是接着阐明继续革命、发动文革之必要：

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

中国人“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病态神经是最容易被“反贫”“造反”这类概念打中。在这儿，毛泽东只不过将流行了几千年的“均贫富”换成了“反修防修”的时髦表达，这样既可调动年轻娃娃捍卫理想纯洁性的狂热，又可刺激更广泛的草民因现实利益而引发的仇恨：

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还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們要革命呢。

具体说到文革，毛故作超然地表示：

[1]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2。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

对于老官僚，毛轻飘飘地承认“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至于在他煽动之下杀得死去活来、血海深仇的草民，在他眼里更是些无足轻重的草芥：

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

让毛最头疼的，还是官僚集团对文革的抵触和反感。他非常清楚：他身后最可能对文革进行清算者，必为这帮“大人物”也。他必须趁自己还活着的时候抓紧追打：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最后是点睛之笔：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问题就出来了。按经典定义，共产党本身就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先锋队内部怎么又变出一个阶级、而且是“资产阶级”来了？这简直是对官僚们笃信了几十年的基本理论做了彻底颠覆。难怪当时不少老干部私下发牢骚：“说些什么玩意儿？颠三倒四，语法都不通！”

其实，早在1960年代，毛泽东策动中苏论战就已经有此念想了。那次论战的目的，当然是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在他身后“挖坟鞭尸”，正是在此过程中提到了“特权阶层”概念（暂时还没

有提“阶级”)^[1]。为了组织火力,1963年中共还翻译出版了吉拉斯《新阶级》^[2]一书,该书直截了当宣称共产党本身就已经构成了一个独占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的“新阶级”。对比上述观点,我们有理由推断,毛泽东显然借鉴了吉拉斯的若干观点,最后形成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论断。从下面介绍的1964年形成而暂时没公开发表的一段结论,甚至可以认为,毛泽东在某些方面,比吉拉斯走得更远,更绝对。1976年初,面对文革濒临破产的现实,他向民众宣布了“走资派还在走”的结论,到6月18日,离毛泽东龙驭宾天已不足3个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忙不迭印发了文革前的“社教”期间,“毛泽东关于官僚主义者阶级”的一个批示^[3]:

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又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又是“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又是要把“斗争对象,革命对象”“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一片杀气腾腾。这些理论已不是在调整党内关系,也不是在进行思想训诫,完全是号召草民向官僚大开杀戒。毛泽东没有时间了。当

[1]1964年7月14日发表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即提到:“广大的苏联工人、集体农民和知识分子,对于特权阶层的压迫和剥削是十分不满的”。

[2]吉拉斯(又译德热拉斯),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铁托的亲密战友和内定的继承人。曾任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副总统兼国民议会议长等多项要职,后被铁托为首的当权者镇压,投入监狱。其《新阶级》一书,1963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翻译出版(供内部参考);1981年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理论室以供内部参考之名再版。

[3]《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的七一社论《在斗争中建设党》对此批示进行了引用并加以阐释。

是时也，毛口齿含糊、语言断续，结结巴巴，但思路依旧清晰，正因为说话困难，这些“最高指示”反而最简洁、最直截了当，也更耸人听闻。

这套理论理所当然得到了这些年饱受压制的造反派头目的欢迎。特别云南，1975的年的“整顿”和贯彻26号文件整肃了一大批八派头目（也包括干部）；其次，这些乱世英雄早已谙悉政治实用主义的秘籍，于是他们见样学样，也要以讨论理论问题为突破口，抓紧对老官僚穷追猛打。5月4日至21日，以中共云南省委名义召开了一次理论讨论会，其目的盖源于此。

关于这次会议，官史记录如下：

（这次）理论讨论会议，学习和讨论所谓“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问题。会前，云南帮派头目朱克家、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秘密策划，“要把这次会议作为同走资派斗争的场所，”会议一开始，他们就以小组、大会发言和会内会外贴大字报等方式，指责会议是搞“纯学术讨论”，要求把会议变成“批邓”和“揭发省委的战场”，攻击省委执行了“反派性为纲。”“整顿为纲”“刮了右倾翻案风”，并点名要省委领导人到会检查，还把一大批刚刚出来工作的老干部诬蔑为“还乡团执政”，“复辟派掌权”，会议变成了帮派制造反革命舆论的论坛，“四人帮”在云南的亲信朱克家……称赞“这次理论讨论会开得好。”“我们学理论，就是要为现实斗争服务”说1975年起用一批老干部“造成了有些地方还乡团执政，复辟派掌权”，声称“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靠这些人领导是不行的”会后，有些地方召开了类似会议，它们大都为帮派势力所把持，用来揪斗所谓的“还乡团”“复辟派”。

贾启允既已交了“投名状”，名声委地，北京舆论一边倒支持文革派，这次会议确实只能让乱世英雄们来大闹天宫了。文革破产后，《云南日报》曾先后两次发表大块文章对此会进行清算。其中反复提到一位“‘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纲领的吹鼓手”“一个上蹿下跳，地位显要、神通广大的角色”“省委宣传部那个重要的帮派骨干分子。”云云，似乎这次会议成了这位名不见云南文革经传的无名鼠辈一手组织的。如：该人如何威逼、利诱“省委前主要负责人”（指贾启允）、如何煽动、编排朱克家、黄兆其、刘殷农，还有“省委办公厅那个摇鹅毛扇子的家伙”，还有“省委办公厅那个‘四人帮’

反革命政治纲领的吹鼓手”，还有“省农办那个帮派头面人物”等等。^[1]

这个被称为“吹鼓手”的人实名林敬荣。福建人。能说会道，写得一手好字、好文章，可谓才华横溢。文革前从部队转业到省人委作一般干部，经过文革多年折腾，修炼成一方豪杰。如今云南几近政治真空，该林于是横空出世，享受了一把乱世英雄的快感。情状与同期出现的王永昆以“五一八大字报”反周（恩来）有异曲同工之妙，相同的是，两者都想搭末班车快速发达，结果最后都被抓进了局子。不同的是，王动作尺度太大，直接突破体制以求轰动，而林完全在体制内施展拳脚，直到后来政局更替才被收审。“揭批查”运动中，《云南日报》不惜用两个头版、15000多字的篇幅对此公进行批判。^[2]诅咒林敬荣及其“上线”“旁系”，从“会前策划，酝酿阴谋”“贩卖黑纲领，大闹理论讨论会”“亲信赤膊上阵，明目张胆叫喊夺权”到“系统的反革命帮理”“疯狂的篡党夺权行动”“顽固的反动阶级立场”云云。

其实，如就理论说理论，《云报》大张挞伐，说林按照“‘四人帮’的所谓‘阶级关系新变动’论，狂热鼓吹‘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是走资派和造反派的矛盾’”“走资派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层人。”“‘上边’‘下边’，军内军外，各级党委，各条战线，真是到处都有，无所不在，早已形成了一个阶级”“已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最主要的敌人，当务之急就是‘要改变走资派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把文化大革命的体系固定下来”，等等，这些不正是中央4号文件所传递的“最新最高指示”吗？不正是“社教”期间，毛泽东关于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批示吗？不正是毛泽东发动文革最想实现的终极目的吗？何来悖逆之言？要说“罪错”，仅仅在于林敬荣一伙将该理论联系了云南实际，为分化瓦解所谓“党内资产阶级”——如批判文章所言——林敬荣诸人“挖空心思”想出一个“新观点”：把“走资派分为左、中、右”“犯了错误肯改悔的是走资派的‘左翼’，不肯改悔是为‘右翼’：这显然是为‘省委前主要负责人’量身定制的‘新策略’。原来，林同朱克

[1] “省委办公厅那个摇鹅毛扇子的家伙”“省委办公厅那个‘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纲领的吹鼓手”“省农办那个帮派头面人物”其实均系一人：办公厅主任胡延观。1976年4月省委即令调胡为省农办主任，但一直未到任。

[2] 一篇为“本报记者”关于会议的深度评述，题为《借理论讨论之名，行篡党夺权之实》（1978年2月16日）。另一篇为云南省委写作小组的署名文章《“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纲领的吹鼓手》（1978年2月2日）。

家，黄兆其，刘殷农等帮派头目，一直叫嚷‘云南省委是还乡团执政，复辟派掌权’，对那个省委前主要负责人，本来也是作为‘全盘接受和忠实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要坚决打倒的。但当这个主要负责人拼命按‘四人帮’的反革命旨意转弯，实行卖身投靠，同他们进行了肮脏的政治交易之后，这伙权迷心窍的帮棍们，便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抛出‘×××走向革命’等大、小字报，把省委前主要负责人封为‘走资派中表现好的左派’”。“宣传部那个重要帮派骨干这时成了那个主要负责人的座上宾，得到格外青睐，被捧为‘有水平，可以当个副部长’。那个帮派骨干就到处向人肉麻地宣传；‘×××这个人，肯转弯，表现还是好的’”“经过这段的观察，我越看越觉得这个同志不错”。

批判文章特别提到一句话：“朱克家不愧是推行‘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纲领的急先锋。他的这个毒汁四溅的讲话，虽然被前省委主要负责人吹捧为‘与毛主席关于社教的批示精神一致的’，帮兄弟们也扎实高兴了一阵子，但其实质是与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精神背道而驰的。”如今已无法查实此处贾启允所指是毛泽东的哪一句，如果指前述两报一刊“七一社论“披露的精神，那么，说明贾启允经过1976年的反复敲打，真心皈依了中央4号文件中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如果是别有所指，则说明文革晚期，贾的认知依旧停留在10多年前的“社教”阶段。果然“桃花源中人”。当然只能成为文革的殉葬品。

2.6. “40天会议”

理论讨论会结束后的第6天，5月27日，刚刚吃了安眠药的毛泽东忽然宣布要会见来华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及夫人。这次会见进行不足10分钟，是为毛泽东历次会见外宾最短的一次，也是说话最少的一次。苍老憔悴的毛泽东穿着宽松衣履，被工作人员支撑着勉强完成了这次电视亮相，此后不久，中国政府对外发布公告，宣布毛泽东主席年事已高，今后不再安排他会见外国贵宾。鉴于毛泽东的病情，中央又作出新决定：一般性中央文件不再送毛泽东批阅。重要文件经过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和汪东兴4人批准方可送交毛泽东批阅，以减少毛泽东的工作量^[1]。又

[1]《党史纵览》文章：《毛泽东晚年的外事活动》。

半月，6月15日，即发生了所谓毛泽东“交代后事”之举^[1]。关于这一段“临终遗言”虽有不同解释，但有一点毫无疑问：毛泽东沉疴之重以至于无法视事了。

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收到毛泽东病重的特级绝密电报，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传达并商量应对方略。为安全保密计，云南省委开会地点不在传统的会议地：连云宾馆而选在安保条件更好的震庄。会议纪律超常：所有常委一律不得请假，不得外出。1975年沙甸清剿事件后，为保护年轻常委金桂仙免遭回民报复，一直将她安排在省外躲避，这回也特地接她回昆参会。会议闭门进行。参会者朱克家回忆，会议一开始即由秘书长照念电文，参会者只能听，不得记录，并需用党籍保证不准泄密。会议从6月中旬直开到七月下旬，史称40天会议。仅传达毛泽东健康状况当然要不了四十天，关键是走投无路的贾启允现在确实需要一个题目，让这些离心离德、消极怠工的老江湖和文革新秀们坐下来，一道商量应时方略，将大家绑在一架战车上共克时艰。毛泽东病重实在是个再好不过的由头，领袖驾崩在即，国运生死攸关，谁个敢不从命？

7月25日，关门40天的会议落幕。中共云南省委发出了一个《中共云南省委常委会议纪要》，贯称“云发（1976）40号文件”。文件称：“去年夏季以来，省委积极执行了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刮了右倾翻案风，犯了路线错误，造成了严重后果。”这些后果主要表现在：

一、贯彻了“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路线，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歪曲了党的基本路线；二、歪曲甚至否定了云南的大好形势，渲染与夸大了那些支流方面的问题；三、以反派性为纲，打击了革命的新生力量；四、执行了邓小平“首先抓班子”“全面整顿”的组织措施和行动部署，破坏了老、中、青三结合；五、在落实政策中搞了“一风吹”，把一些不该否定的问题也否定了；六、中央几次打招呼，省委迟迟没有转好弯子。

文件指责省委常委中的一些老同僚：

[1] 即1977年3月22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所谈及的毛泽东“一生干了两件事”的临终遗言。对此遗言交代的时间后来有诸多说法，此不赘。

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总是以“革命功臣”、老造反自居，对日益深入的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不理解，不懂得如果自己不能代表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利益，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会在革命的伟大转变关头掉队，甚至变为革命的对象；对造反派看不顺眼，吹毛求疵，遇到机会还想打击报复。当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时，就有抵触，甚至反对。总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对群众的批判耿耿于怀，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总是不肯和工人、贫下中农划等号，不去自觉地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总是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有反感，想方设法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甚至凭借权势压人，严重脱离群众，站到了广大群众的对立面。

文件坚称：“我省整个运动的发展，进展缓慢，落后于全国，学得很不深，批得很不够，对错误的纠正还是刚刚开始。特别是由于省委弯子转得不好，对运动的领导很不得力，排除干扰不力，对搞得好的单位的经验也没有认真地总结推广，影响到运动的正常发展。为迅速改变这种状况，

要把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放在首位；二、集中火力批邓；三、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基础上，积极地稳妥地解决到右倾翻案风所带来的问题；四、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以实际行动反击右倾翻案风；五、切实加强各级党委对运动的领导。^[1]

文革已近十年，所有旧的、新的矛盾和仇恨都挤压、浓缩到了1976年，所有经过筛漏过滤，却未曾灰心死灭、甚至依旧雄心勃勃的野心家、冒险家、权力癖、政客、投机分子……也全部留给了1976年，贾启允哪能消受得了？40天会议，各怀心机的同僚终于一个也没能跑掉，都规规矩矩、硬着头皮就上述事宜表了态，被贾启允捆上了战车，他应该感到欣慰了。官史载，贾启允称：“按照

[1]《云南“文化大革命”运动大事纪实》对该文件嗤之以鼻，称之为“这是一个完全不顾事实、颠倒黑白、混淆是非、适应帮派需要的极端错误的文件。它是在朱、黄、刘帮派步步进逼，省委主要负责人节节退让，不顾省委常委的一些不同意见的情况下制订出来的”。1979年1月18日，新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安平生在全省县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鞭尸”，代表省委宣布撤销这一文件。

省委40号文件转弯，是不可逾越的一步”。朱克家的观点则代表了文革新秀们抗争胜利的喜悦：“省委40号文件，是我一字一句抠出来的。”

40号文件的顺利制定带给贾启允的，不过是一抹短暂的幻觉罢了。事实上，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对于全中国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他们关心的仅仅是死神接走这位领袖的准确时刻：造反方和官僚方你死我活的攻防战最后胜负揭晓，具体就定位于毛归天具体还剩多少日子？这实在是极权社会的通病：独裁者一人控制了全社会所有的资源和命运。秦始皇如此，希特勒如此，斯大林如此，在民主潮流浩荡奔流于全世界的二十世纪后半叶，毛泽东个人的生死竟然能达到如此境地，不能不说是世界历史的奇葩。1976年文革派和官僚集团与其说是在进行最后的生死拼搏，不如说是在与死神赛跑。

40天闭门会启幕前，省委秘书长李文和副秘书长周永琪商量，决定会议期间让胡延观留守机关以应付可能出现的麻烦。那年月没不透风的墙。李、周特别交代，关于毛泽东病重事，万一有群众前来问及，务必慎重处理。胡问，既然涉及特级机密，万一有人提及，该按何口径回答？李文支吾其词，只告诉他：你相机而行罢。总而言之，要向群众说明关键时刻必须顾全大局，保持稳定即可，说明非常时期，出任何问题性质都将很严重。

果然，震庄开会次日，涂晓雷就找上门来了，问是否毛主席病重了？胡反问：听谁说的？涂神秘笑答：军区已有消息传出啦。涂明确说是黄兆其吩咐前来相问。胡按领导交代口径，对消息不置可否，接着便顾左右而言他，无非特殊时期，千万以稳定大局为重，现在犯任何错误，性质都非常严重之类；接着，偏偏黄兆其又来了，胡依旧同样说辞；再一天，炮头方向东又找上门来，也听说毛主席病重，问可知此事，胡照例如此这般告诫一通。胡延观最担心刘殷农，既然黄兆其知道此信息，刘殷农肯定也已知道了。刘控制着昆明市，影响最大——几十年后，胡承认，他确实主动给刘通过一次电话，说目前关键时期，千万别胡来，犯下大错误云云——六年后法庭公审胡“竟然把毛主席病重的特级绝密电报提供给黄兆其、刘殷农，示意他们要‘注意斗争策略’，让帮派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成为判处胡有期徒刑13年的主要罪状。

40号文件对云南的帮派势力极大利好。胜负揭晓在即，他们必得以此为武器，在与死神赛跑中抓紧抢占权力高地。黄兆其、刘殷农及其哥儿们，先后在昆明百货大楼和西山华亭寺等处密谋策划，确定“把活动转入内部”，利用已取得的权力，抓紧“突击纳新”“突击提干”“调整充实领导班子”“补充新生力量”，实行所谓“提、补、

纳、调”方针，抓紧夺回省、地、市各级各部门和厂、矿党政领导权，他们还提出：“要通过斗争，把黄兆其斗进省委常委班子，刘殷农斗进市委书记班子”“上面有了样板，下面就照着干”，对于“未控制领导权”的单位，则采取‘继续乱’的方针，‘乱够乱透’‘胁迫党委就范’”1975年被下放或调动的一些新干部再度官复原职，而一些落实政策后担任领导职务的老家伙再次让位赋闲。

贾启允依旧什么都不能做，该闹的人继续闹，该装死的人继续装，整个云南已近瘫痪。到8月，昆明市的粮食只够一周，燃料只够3天了，事情如不解决，真要天下大乱了，贾启允只能央请部队派车帮忙去专县调粮调煤，甚至在省委机关破罐子破摔地放言，请大家都通过各自渠道向中央反映吧！请中央派人来帮助云南解决问题吧！干劲十足的朱克家听闻此情，立即自告奋勇宣布，我是中央候补委员，我有责任写信反映！该信通过办公厅正式渠道寄达北京。六年后对云南帮派大审判，法庭人民陪审员曾××就如下罪行质问：“胡延观将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新的动乱，造成云南党政机关瘫痪及工农业生产遭到破坏的有关材料，提供给林敬荣，嫁祸省委，由林通过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联络据点^[1]，转报姚文元及迟群，妄图改组云南省委。”胡在法庭厉声反问：“你曾××当时是办公厅秘书，朱克家写信报中央，林敬荣去北京这些事情你非常清楚，都是通过贾启允同意，以组织名义进行的，所有手续都有书面手续存档，你凭什么说是我个人罪行？”曾××期期艾艾，多次语塞。

与黄兆其、刘殷农“把活动转入内部（即进行组织机构上的抢权）”同时，舆论上的轰轰烈烈亦大有升温之势。8月18日，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10周年纪念日，昆明举行“云南省红卫兵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大会”，“新手上路”的朱克家参会。会议指导思想遵循10年前发布的文革纲领性文件16条精神，强调批判“云南省委内的走资派”，会议临时安排召开“批判会”，将省委的几位负责同志“请”来会上戏弄一番，算是重温了一回“1.0版本”的旧梦。

8月24日，省委召开有线广播大会，动员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批判1975年邓小平主持制定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和《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

[1]1976年八派人员的告状资料私自转呈北京高层，其实只有一个渠道，即清华大学一名唤吴伟煜的青年教师。据蒯大富介绍，吴原系清华《井冈山》报主编，笔力甚健，留校当了老师，后深得迟群诸人赏识，又主编工宣队主办的《清华大学报》，后来加入著名御用写作班子“梁效”。

若干问题》三个文件的批判；8月31日，中共云南省委再发《关于批判邓小平授意炮制的三株大毒草（指上述三个文件）的通知》，要求全社会深入批判之。

官史还有记载，说9月6日，云南的帮派势力炮制了“改组云南省委”的方案送交姚文元派到云南的“记者”，转交江青反革命集团。笔者向参加省委常委委员会工作的朱克家、金桂仙等人求证，均称除了中组部派人来搞过一“调整”方案外，黄、刘诸人是否另搞了什么方案，他们都不知道。黄、刘也不会告诉他们。

第三章 绝 响

3.1. 訇然日落

9月9日，毛泽东终于驾崩。

毛的死，对于官方乃至全社会，当然是天崩地裂的大事。吊丧期间，该取消的娱乐必须取消，该按通知布置灵堂的布置灵堂，该举行吊唁活动的进行吊唁……笔者其时在云南汽车厂机修车间当工人，印象最深是这次吊唁活动和半年多前周恩来去世存在明显反差，前一次是每个车间自发设灵吊唁，一个个伤心垂泪，一派民间哭丧气象。这一次不同，由厂部统一设灵堂，统一安排时间组织祭奠。轮到机修车间那天，我们依次排队去领袖像前鞠躬，接着鱼贯缓出，我竟没发现有何人哭泣，真的个例行公事。最为高潮者，是9月18日的全国追悼大会。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悼念仪式，各地同步举行。云南省和昆明市党政机关、昆明军区机关及各界代表25万人，在东风广场参会哀悼。大会由王必成主持，贾启允致悼词。各地、州、市、县也同步举行了数千人到数万人不等的追悼会，电视对天安门的实况全程转播。有此名目，许多单位趁机抓紧拨款购买当时稀缺昂贵、且需事前列入财务计划的彩电或黑白电视机。笔者所在的机修车间也买来一台，追悼大会当日正式启用，效果好极了。年轻师傅们全去了东风广场，年老的、带娃娃的（当时很多男工的孩子上不了幼儿园，均带娃娃上班，笔者亦为其中之一）便留车间看电视。是日，整个工厂全部停机，巨大的车间静悄悄，真正成了娃娃们撒欢的乐园，平时担心孩子撞了机器出事，今天全无此类担忧，大家十分放心。

几十年后，我认识了一位名叫纳标的基诺族年轻作家，读她的纪实文章《我的基诺爸爸和傣尼妈妈》，我才知道毛的死曾在边疆引起过那么巨大的震撼：当时纳标的父亲在西双版纳一所村小教书，那天带领学生全体跪在地坝上向毛像痛哭，一位美丽的女生悲恸欲绝，长跪不起，老师便一直陪她跪地同嚎并劝慰——后来，这位女生成了纳标的妈妈。

随后的日子，报纸开始连篇累牍地提醒众人“化悲痛为力量”，还要联系实际，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其实，当时谁都说不上悲痛不悲痛，总的感觉就是阶级斗争这根弦在心中紧绷了这多年，现在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一个威权人物的时代已经结束，大家都怀着侥幸之心等待新的命运。

谁也没想到变化来得这么快。10月6日，毛泽东死去不满一月，第一夫人江青和她的铁杆帮伙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俗称“四人帮”——便被一举擒获。按照官方说法，“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虽然事情是用宫廷政变的方式解决的，或者说以文革的方式结束了文革，但无论如何，老百姓对为时十年的大乱实在厌倦透顶，对“四人帮”，尤其那个不可一世的病态狂江青，更是讨厌至极。人称“举国上下一片欢腾，神州大地普天同庆”，诚如是也。

信息传到遥远的西南边疆，速度最快是铁路：61次“京昆特快”两昼夜一班，列车员在第一时间就把北京的动态带回来了。那一天，我家一口气就来了三起“铁路朋友”：第一位骑单车来急匆匆说完，第二位跟着又来，接着第三位……他们一说完便又骑车到别处向朋友报喜。这些信息一个比一个详细，细节一次比一次精彩，如抓捕江青时她如何在地上打滚撒泼，抓王洪文时他如何拒捕反抗，等等。这些细节的真实性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四个人”确实被抓了。接下来，我的许多分配在边疆工厂的同学，都兴冲冲赶来昆明打听新闻并沽酒欢庆，大家说：这一次，比解放后任何时候都人心大快。中国有希望了。毛泽东已死，现在大家可以放肆地把气撒在他老婆和亲信，也即人称“四人帮”的身上。大家就用各种方式庆贺他们的倒台，用各自方式对失败者进行羞辱。到处欢呼雀跃，昆明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

3.2. 遥远的回声

笔者在云南省委工作期间，与两派群众代表多有交道。我不止

一次听八派的委员自豪说道：“全国一直保持造反派掌权的，除了上海，只有云南。”1976年“批邓、反右倾翻案风”，为了守住，包括夺回1975年整顿期间被剥夺的权力，他们确实按照北京的调子疯狂起舞，进行了拼死一搏。现在，北京宫廷换人，云南的文革好汉们知道自己的末日到了。官史这样幸灾乐祸地记载了“‘四人帮’在云南培植的帮派体系”的惊恐万状：

10月12日，帮派头目黄兆其、刘殷农得到了“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他们攻击中共中央发生了“右派政变”，扬言要“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13日、16日两次召集同伙开会，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黄攻击党中央粉碎“四人帮”是“右派政变”“修正主义复辟”。会上决定“学蔡锷起义”搞“武装斗争”“上山打游击”，选择楚雄等地为叛乱基地。还研究了控制省建、煤机厂、海口三五六厂等单位的民兵和武器弹药，策划绑架军区和省委领导干部，占领广播电台，发布“告全国人民书”等。由于中共云南省委及时采取了措施，其阴谋活动未能得逞。^[1]

作为“上山打游击”佐证的，还有楚雄州法院的判决书：

10月18日，州委常委传达了中央关于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打招呼会议精神后，刘光兴继续在李国梁办公室与吴向忠、柯平，李国梁策划武装叛乱的行动计划，确定“上山时全州分东西两片，西片以楚雄为中心（包括楚雄、南华、牟定、禄丰），地点在哨区，由刘光兴和各县的头头负责；东片以武定、元谋为中心，地点在武定、元谋之间，由付永昭、王朝明负责。同时还决定分别向各县打招呼。”由于中央采取了有力措施和全州人民的斗争，刘光兴等人阴谋武装叛乱未能实现。^[2]

云南是蔡锷成功策动护国战争的发祥之地，用“蔡锷”“武装起义”“打游击”这几个概念说事，给文革的失败者定罪最是方便。

[1]《当代云南大事纪要》1976年卷。

[2]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刑字007号，见《历史的审判（续集）》页531。

官方确实多次提到帮派“推举”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鲁瑞林为蔡锷，故事情节有鼻子有眼睛，不仅对鲁公开点名批判，还立案审查——直到事情闹得太大，惊动了北京，后经中央直接派人调查，最后才发现是个纯“假案”^[1]，笔者在此事上继续引用官史记录就让人有点不放心了，兹暂且打住。

面对突如其来的天地翻覆，云南文革派人物的恐慌确是毫无疑问的。胡延观系在法庭上与审判官对抗最为坚决者，因此他的狱中笔记应有较高可信度，从中亦可看到面对猝不及防的灾难，他们真实的迷乱和恐慌。兹摘引如下：

12日中午，我向李原、周永祺汇报了涂晓雷来打听消息的情况，当晚，黄兆其又向我打听情况，我告诉他，中央有通知要记者回北京，我准备向记者了解。

13日下午，我同谢荣镇、郭剑锋见面。晚，我向黄兆其电话转达了谢荣镇向我说的话（谣传和暗示）。

14日晚饭后，黄兆其到我家打听中央的问题。黄首先问中央有无通知，我告诉他没有正式通知，看来中央是出了事。周永祺讲公安部的人向他告诉了情况。贾启允可能很快回来^[2]。看来中央问题已经处理了。

黄兆其讲：肯定是抓起来了，可到底是什么问题呢？我分析，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路线问题：江等坚持“批邓、反右倾翻案风”，而一些老同志不同意，斗争不可调和，华主席依靠一些老同志把江等解决了；二是江等不承认华主席接班人的地位，要夺权，华主席同一些老同志把他们解决了，很可能是后一种。反正又是一次大的路线斗争。江的地位不同……非不得已不会采取这样的措施。路线斗争很复杂，都是围绕接班人问题。

黄兆其讲：你看这件事是谁起主要作用呢？

我讲：当然是华主席决定的，应当是得到叶帅、李副主席这些老同志支持的。军队始终是掌握在叶帅这些老同志手里。“文化革命”再乱，军队始终是稳定的。

黄说：贾（启允）、（七林）旺丹能不能回来呢？

[1]此事在本书卷六有专述。

[2]10月7日到14日，中央政治局在京召开打招呼会议，向中央机关及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通报“粉碎四人帮”的情况。云南省委贾启允、七林旺丹参加会议。

我说：怎么不能回来呢？我们党中央解决这样的问题，从来都是解决了再找各地负责干部去打招呼，然后统一思想，不会未处理好，到会上吵的。

黄问：你估计会不会乱呢？像“文化大革命”那样，一些人支持，一些人反对，乱起来？像上海、辽宁那些地方乱起来？

我讲不会乱，也不允许乱。毛主席健在可以乱，现在不能乱。

黄说：这些人上来，把江等四人都抓起来了，会不会否定“文化大革命”，镇压造反派呢？

我说：怎么会否定“文化大革命”呢？文革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嘛！还有陈永贵、吴桂贤这些都是文革起来的新干部嘛。

黄说：话是这么讲，但主要是那四个人……陈、吴能起什么作用？那人（邓）是否还会上台呢？

我说：批邓是毛主席定的，那可能不会再上台吧，报上还要批邓嘛，不过新的斗争起来，批邓肯定不会继续了。

黄说：叶、李那些人文革受了冲击会满意？“二月逆流”叶把手都拍坏了，批邓又冲击了他们，他们会满意？不搞报复？不镇压造反派？所以有些造反派说，如果真的右派政变，邓再上台，那造反派不是坐监牢，就只有上山打游击了。

我说：你怎么想得那样严重，想到坐监牢，还想到打游击呢？

黄说：你的地位不同，你原来就是干部，是当权派。造反派可有体会，75年不是有人就想抓我们吗？不想到打游击，就等着坐监牢，我是准备好坐监牢的。又说，你的孩子都这么大了，我的孩子才那么大。

我听了后讲：不要乱讲什么打游击。我们党就是毛主席领导下打游击起家的，同共产党打游击，不是鸡蛋碰石头，天大的笑话，军队是掌握在叶帅这些老同志手里的。拿昆明军区来说，军队是掌握在王必成这些人手里的，谁要乱动不狠狠整你才怪。打游击，怎么能那样想呢？

黄说他是准备好坐牢的，旺丹、周永祺和你们这些人恐怕不会。那时候只有请你们帮助照顾了。不过，你以前就同造反派关系好，今年又在会上指名道姓攻过王（必成）、黎（韦）等人，人家能放过你吗？

我听后讲，不要想得那么多，现在究竟什么事都不清楚，这样大的事，特别是抓江青这样的事，中央是要有个道理，有个说法的，不仅向全党、全国人民讲清，也要向世界人民讲个究竟的。反正贾启允等快回来了，我是听中央的。如果中央说“批邓”反右风错了，那只好说错，反正又不是我们提的。要整就整吧，看能整到哪里去。反正给他们办事挨整，反对他们更是挨整。不要胡思乱想，现在关键是要弄清是什么问题。

黄说他们已叫沈炳章借探亲了解情况去了。我说还是听中央的，叫沈炳章回来，这个关键时刻不要到处乱跑，以后说不清楚。然后他走了。

15日晚，听贾启允传达。传达中，强调朱（克家）无事，华主席说是支持省委的，要他支持旺丹工作，旺丹也讲（中央）明确支持贾启允。我比较安心了。

事实上，印把子已经易手，手握大权者对失败者进行“秋后算账”只是时间问题。胡延观一生仕途顺风，连文革这样的大风浪都毫发无损，而且还混得不错，对于党内斗争的残酷无情实在太缺乏感受。重新上台的官僚们罗织的大网已垂天而至。胡延观等的一干乐天派心中的幻象，很快就被无情的现实击得粉碎。

10月18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中共中央通知》（中发[1976]16号）宣布“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进行反党篡权的阴谋活动，罪行极为严重”之后，20日、23日，云南省、昆明市、昆明军区立即两次举行群众大会，人数多达25万和50多万，全省1000多万军民收听了大会实况广播并举行集会游行，愤怒声讨“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

21日、27日、28日，省委常委会议学习中央16号文件，揭批“四人帮”的罪行，并认定云南是全国问题比较多的省份之一，宣布以中央16号文件为界，再搞打、砸、抢的，坚决镇压；对长期脱离工作岗位、不上班的要扣发工资。

12月1日，清查“四人帮”运动办公室成立。同日，宣布对省委常委彭贵和、金桂仙这两个可有可无的新手点名检查，说清问题。

12月8日，省委决定对黄兆其、刘殷农、朱克家、方向东等12人隔离审查，逮捕了王永昆等5人。

12月14日，省委召开省、市级机关及所属单位揭发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罪行大会。大会以省委礼堂为中心会场，设有100多个分

会场，有20多万人参加。贾启允在讲话中点名批判了朱克家、王永昆、黄兆其、刘殷农等人……

17日，省委决定组织人员对朱克家的“先进事迹”重新进行调查，查证结果上报中共中央，决心兜底将这个新手连根拔除；21日，省委决定对朱克家进行批判；11月29日，省委召开省直机关5000人大会揭批朱克家。

最后轮到贾启允了。新年伊始，1月18日至2月3日，中央政治局主持的解决云南问题会议在北京举行。2月4日，北京颁发中发（1977）的4号文件，北京对贾启允明确做出结论：

一九七五年，全省各级党组织领导广大干部、群众、认真学习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贯彻执行了四届人大的精神，贯彻执行了经毛主席、党中央批准的省委（1975）26号文件，得到了全省广大军民的热烈拥护……调动了群众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进一步密切了军政、军民的关系，加强了革命团结，推动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全省出现了安定团结，欣欣向荣的大好景象。由于当时省委主要负责人贾启允同志受“四人帮”反动思想的严重影响。违背中央（1976）四号、五号文件和中央（1975）21号文件的精神另搞一套，造成云南一次大反复，后来又搞了个省委（1976）40号文件，冲击了工业，冲击了农业，冲击了商业，冲击了交通运输，也冲击了部队，使全省更加混乱……去年一年省委领导所犯的错误，应由贾启允同志负主要责任，贾启允同志应当向华主席、党中央作出深刻检讨，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检查，我们欢迎他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1979年3月，贾启允调河北省石家庄地区任行署副专员。1983年4月任河北省政协副主席。2004年4月12日逝世，享年90岁。史载：贾的家乡山西闻喜县曾出过59个宰相（最杰出者为唐代名相裴度）、59个大将军、七品以上官员3000余人，至今被乡人自豪地誉为“宰相故里”。按古代吏制，身任“巡抚”的贾启允已贵为“二品大员”了，可惜文革前后的故事，偏偏让他给宦吏丛生的家乡留下了一段黑白莫辩、难以落笔的尴尬记忆。

卷六

后文革时代：无法告别的“继续革命”

（1976年10月— ）

第一章 权力依旧傲慢

1.1. 错失的和解良机

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定义了这场刚刚过去的灾难：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在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在我国，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以后，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但是革命的内容和方法已经同过去根本不同。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

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文革触发了全民矛盾的总爆发，将内斗的广泛性、荒诞性、残酷性推向极致：在独裁者及其一小撮近臣病态的专制之下，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贵贱，职不分流类，官不分大小，统统被塞进政治绞肉机中历尽共同的惨烈苦难和血肉牺牲。古语云：“否极泰来”。文革破产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全民和解、转型正义的绝佳时机。如果以此为契机，共同揭露真相，彻底摒弃斗争思维，用法制手段实现全民和解与转型正义，可以断言，中国历史必将由此向现代社会实现一次难得的大飞跃。

可惜，中国失去了这个绝佳机会。社会和解和转型正义需要一个基础：民主和法制，而中国没有。当时出现和解只能是既定体制、既定政治路线下的和解，只能是局部的、技术性的，甚至是政治功利性的和解。文革是用文革手段结束的，文革的罪恶注定也只会用文革的思维进行清算。

叔本华论说人类痛苦，曾羡慕于“动物比人类更有智慧，它们仅活于当下，它们所感受的苦乐只是局限于此刻的现实。也就是说，动物没有静思回想这一苦乐的‘浓缩器’”；所以，“动物不会把欢乐和痛苦积存起来，而人类借助回忆和预见却是这样做的。”^[1] 人类、特别是政治人物，恰恰缺少这个，他们最关心的，就是对曾经的敌人进行政治清算。胜利了的他们为了自身安全，对敌手的清算必然是斩尽杀绝，毫不手软。政治人物的“苦乐浓缩器”与一般人相较尤其发达。广大百姓虽然会对历史痛苦加以记忆，但新的、更为强烈的、对现实物质需求的追寻与诱惑，却很容易将这种记忆冲淡。利益集团则不一样，即使敌手已沦为了阶下囚，他们始终担心囚徒们有朝一日会起而报复，故必须置之死地而后快。云南文革最后的胜利者也不例外。对“帮派体系”的政治批判和组织清算必须彻彻底底地进行——只是，这些几乎已是相关利益者小圈子的游戏了。运动方式依旧是派工作组“发动群众”，宣传依旧需要轰轰烈烈，

[1] 叔本华：《论生存的痛苦和虚无》，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而老百姓不过虚应故事，私下各自寻找自己的命运去也——这一点，几乎是全国如此。

接下来还说云南。

1.2. 贾启允机会主义的终结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及一小撮喽啰在悄无声息的政变中全部被囚，正式标志天怒人怨的文革终于破产。北京一片欢腾。12日，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贾启允、省委副书记七林旺丹、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云南省军区司令员张海棠应召赴京参加中央政治局分批召开的“打招呼会议”，宣布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罪行。贾启允不敢怠慢，15日甫回昆明便连夜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传达中央精神。

接着马不停蹄地干活。16日，省委常委会议讨论社会动态及相应措施诸问题；17日省委分别召开省级各部、委、办、局领导干部会议和地、州、市委书记会议，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18日，省委常委会议听取地书会议情况汇报，对各地传达会议精神作具体部署；是日中央正式发文“中发[1976]16号”公布王、张、江、姚反党篡权阴谋活动，号召全国揭发批判之，贾启允立马召开大会，《云南日报》立马发表社论，接着又是群众大会……接着，政治重锤开始砸向具体人头。

朱克家是头号软柿子。1973年，他稀里糊涂当上全国知青典型，接着又当中共十大候补委员。数年之间，朱完全像个听话的“三好学生”，严格按领导吩咐行事，老老实实坚持“三三制”^[1]，等到批邓这段大戏开场，因为北京专有交代，他遂上昆明和八二三一伙厮混，被一帮“老油条”忽悠，让刚进入政治幼儿园便羽化飞升的他享受了一把陌生的快感，说了些热昏胡话，后来便又返回西双版纳密林里继续干农活、学大寨去了。几十年后，朱克家告诉笔者，当时省委通知他立即上昆开会，还派专机接他，他感到很意外。到了思茅，一熟人悄悄地告诉他，昆明大字报已点他名了，他这才知道世道已翻覆，“四人帮”被抓，省委要揪和“四人帮”有关系的人。朱克家一到昆明就此落网。接着，当局再抛两枚“软柿子”：省委常委

[1] 当时北京对新干部的要求，即：三分之一时间在原基层参加劳动；三分之一时间参加工作调研；三分之一时间参与领导工作。

彭贵和、金桂仙，前者为粗通文化的矿山马车夫，后者为20出头的农村小姑娘，当局宣布对其“点名检查，说清问题”——抛出这三枚“软柿”对于当局显然最安全，他们无帮无派，再咋批斗都不会有人来帮忙“喊冤”“劫法场”。

接下来开始收拾实质性人物——不过事情有点儿吊诡：

1976年12月，省委决定对黄兆其、刘殷农、朱克家、方向东、王永昆等12人来了个“无差别”扫荡，在14日召开的20万人批判大会（含分会场）上，贾启允发表演讲，称这些人“长期以来结帮成伙，自成体系，插手各地，同省委和各级党委分庭抗礼，对抗党委的一元化领导，干扰破坏安定团结，破坏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干扰和破坏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妄图篡党夺权。”批判演讲还联系1974年“批林批孔”，揭露“齐向阳”“反潮流”“大批判”等山头，借“批林批孔”抓“复辟势力”“还乡团”，整老干部的罪行。

云南人都知道“齐向阳”是八派山头，“反潮流”是炮派山头，王永昆则属企图自立门户的炮派小喽啰。贾启允有意将八派、炮派、第三势力“一锅烩”，足见其进退两难、用心良苦。当时，虽然北京还继续宣称要继承毛泽东遗志，还要把“批邓”运动进行到底，但谁都心知肚明，“批邓”运动流产、旧官僚全面复辟只是早晚的事。贾启允在批邓运动中是交过“投名状”的，跟八二三、跟朱克家这类新干部走得很近，（以至几十年后，朱克家一说到贾启允，还称二人关系很好），注定最后难逃干系。阅看1976年10月以后的官方记载，贾启允贯彻北京意图算得紧锣密鼓，几乎一天一个会，两三天一个动作，显然想要表示自己对新朝当局的恭顺；其次，也说明该员面对风云变幻的政局，实在无力应对，正如1976年对帮派的百般依顺一样，如今对东山再起的官僚集团也只能多方讨好，以至于在12月初省委发出的《关于贯彻中央“当前宣传要点”的意见》的“第三个战役”中，公然点名揭发批判“云南军内外帮派的黑后台鲁瑞林的罪行”：显然是屈服于以王必成为首的军方压力了^[1]。

总而言之，贾启允上述做派有感情上对造反派网开一面之意，也有向咄咄逼人的官僚集团输诚献忠之心——直到1977年新年到来，贾启允的机会主义才终得彻底了断，本人也终得从险恶官场彻底解脱。

[1] 本段上述引号内的内容，皆引自《云南“文化大革命运动”大事纪实》“结语”部分。

1月18日，中央政治局就解决云南问题召开专题会议。贾启允、郭超、七林旺丹、李文、黎韦、岳肖峡及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政委刘志坚、副司令员查玉升、刘春山，副政委王砚泉、云南省军区司令员张海棠、政委高占杰、11军军长陈家贵、政委张琦、14军军长黄德懋、政委刘炎田各路大员应召晋京。会议开至2月3日。会议对一年多来的重大是非问题，如贯彻省委26号文件、如省委40号文件的错对、如云南“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是按中央文件办，还是另搞一套？如“四人帮”是否插手云南搞阴谋活动诸问题给予定论。1月28日，陈锡联代表中央宣布：一、免去贾启允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昆明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和党委第一书记职务，另行分配工作；二、调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区革委会主任、广西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安平生任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和昆明军区第一政委、昆明军区党委第一书记。

安平生原系韦国清心腹。文革大乱，韦是全国29省、市、自治区一把手唯一“不倒翁”。1968年夏天，韦利用毛泽东求治心切，从政治、军事及民间动员上全力支持一派（“联指”），将另一派（四二二派）打成“国民党”“反革命”“土匪”“右派翻天”实施镇压和屠杀。史载，广西大屠杀始于1967年秋冬，到1968年8月达至顶峰，其屠杀规模之大（被杀者达十五万之众）、杀人手段之残忍（剖腹、挖肝、吃人肉等）在全国首屈一指，以血腥手段硬生生替毛泽东如期搞出一个“新生红色政权”。杀人太多，民怨难平，以至于文革结束8年之后，北京还不得不派出处理遗留问题小组到广西进行调查安抚（官史称“处遗”）^[1]。民间有将韦国清称成为“杀人魔王”者，实至名归也。安平生最得韦王赏识，1975年韦国清调出，安便正式接班“广西王”。由此可断，安平生得韦国清真传，整人定然轻车熟路。他一到云南，“揭批查”运动的落后状态很快便改观了。

1.3. 安平生、陈丕显治滇

安平生来滇一月后的1977年3月8日，省委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民边委、工交政治部、公安厅、省委党校，及工

[1] 参看网文吴若愚：《机密文件记录的广西文革大屠杀》、张雄飞：《广西文革期间杀了多少人》。

会、贫协、妇联、团省委干部500余人全部被端到昆明西山脚下的省委党校举办长达8个月的“省委学习班”，实施整肃。开班仪式上，与安同期来滇的新任省委书记陈丕显在演讲中明确指出：“云南只有一个帮派，就是与‘四人帮’挂钩的朱、黄、刘为头目的帮派体系^[1]。”

6月下旬，云南省委召开地州市委书记会议，7月7日发出的《会议纪要》再次定义：“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中，要增加批判林彪的分量，联系批判‘划线站队’。云南的‘划线站队’，就是林彪伙同‘四人帮’干的，云南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主要人物，几乎都是靠‘划线站队’起家的”^[2]。这儿已经能够看到广西当年整肃“四二二”的影子了。云南的揭批查运动，矛头明确对准的就是八二三。难怪云南人说起“揭批查”运动，都非常习惯地称之为新一轮“划线站队”，或者干脆：“政治翻烧饼”。

“省委学习班”学员汪首学，原系“八窝”昆明工学院学生、该院第一个造反组织“金棍子”战斗组组长，时为工交政治部普通干部。他如此记录了学习班的情况：

工业交通政治部的全部工作人员……编为第七党支部。“炮派”观点的原组织处处长李S光被任命为党支部书记兼“运动办”主任。

其中，岳肖峡在^[3]“未说清问题”被要求‘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未能实施前，岳便通过关系调到河南省任副省长去了；戈原被调回部队接受审查^[4]；黄兆其被隔离关押审查；李体润被免去一切职务，到学习班说清问题。……要求“说清问题”的除了我外，还有老干部、副主任李体润，办公室主任谢光泽，干部处长唐柱梁及庄保兴、温庆玩、严余甫和罗列星等八九个都是“八派”观点的人。

李体润无论怎样说，以李S光为首的“运动办”都认为是“避重就轻，未说清”。李体润为此急得吐血，还把

[1]《云南“文化大革命”运动大事纪实》页407。

[2]同上，页421。

[3]岳肖峡，云南省委常委、省委工交政治部主任。山东茌平县人、中共玉溪地委首任书记。1964年任云南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1975年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工交政治部主任、省委组织部部长。观点偏八。

[4]戈原，军代表，原昆明军区政治部文化部长。离世前撰有回忆录《十年文革》。

我叫到他的宿舍，让我看看他吐在痰盂缸里的血液。

我劝道：“李主任，你还是到医院住院治疗吧！你是老干部，16岁就参加革命，他们不会把你怎么样。好多老干部都是关键的时候躲进了医院，比如患‘26号文件病’的那些干部，别人也拿他无法。何况，你并没有干什么他们所说的‘篡党夺权’活动，和‘四人帮’也无任何组织联系。无非是工交部的几个人在你家里开了两次会，要求你出面、请省委书记郭超说清撤销省委工交政治部、设立计委‘政治办公室’的问题。我看，这连‘非组织活动’都算不上，因为你本来就是工交政治部领导，大家对撤销工交政治部有意见，找你说说也是正常的。”

李体润主任回答说：“打仗时常说‘轻伤不下火线’，我不会患‘运动病’，也不会主动提出去医院的。你想想，李S光他们会轻易放过我吗？要求住医院不是明摆着的自讨无趣吗？”

星期六休息回家，当汽车到达李家门口，李体润突然当着我的面，说出了那句粗话：“该死球朝上，不死当和尚。”一个从不说丑话的老干部，竟当众说出这样的粗话——对此我吃了一惊。

次日一早，李体润便在省委大院旁边的农民菜地里，开枪自杀了。一个在共产党官场厮混多年的老干部竟然在尚未受到体肤之苦便自就死地，学习班政治压力之凶险强大，可见一斑。李之死照例被定为“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学习班立即举行声讨会集体诅咒之：

他以叛党自杀的可耻行为对抗“揭批查”运动。他在遗书中说是“被逼”。“是说不清而造成的。”谁“逼”他了？怎样“逼”他的？我们专案组从未逼过他。他说身体不好，我们还准他吃病号饭是不是？“说不清”是他自己不说清……你们看看他写的遗书，简直是对运动的恶毒攻击！是对运动骨干分子的恶毒攻击！他以死来对抗英明领袖华主席领导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是自食其果，死有余辜……死了，也要彻底清算。我们要对李体润这种叛党行为进行严肃地批判！非把他批臭不可……^[1]

[1] 汪首学，页75。

云南揭批查运动中最著名的“一·二四”冤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包装出炉了。昆明军区副司令、云南省革委会副主任鲁瑞林乃滇省文革的著名实干家，最为炮派忌恨，尤因曾指挥军事解决“滇挺”一节，更蒙“鲁屠夫”恶名。早在1973年9月，鲁已奉调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和贵州省革委会主任，而今权力更迭了的昆明军区和云南省委仍然不想将其轻易放过。事有凑巧，1976年8月1日，鲁经北京批准，回昆治病疗养，一月后便遇领袖驾崩，接下来“四人帮”被囚，又有了八二三派“上山打游击”，并诚请鲁瑞林效仿当年护国将军蔡锷振臂一呼之类传言，框架一旦编好，故事注定引人入胜，情节和角色便具了极大的延展空间，比如：鲁为何不早不迟、偏偏要在伟大领袖去世前夕回滇？皆系“王洪文派回来”“张春桥谈了话”“密谋调动某军一个步兵团的兵力来昆明市，武力搞掉昆明军区司令员，夺取云南军队和地方的最高权力”“策应‘四人帮’余党在上海的反革命暴乱”，由鲁充当“蔡锷式的人物”，任“叛乱”总指挥，等等^[1]。官史《云南“文化大革命”运动大事纪实》干脆将鲁瑞林正式定义为“云南军内外帮派的黑后台”^[2]。

上峰一旦发话，昆明军区立即对八派观点军官进行审查，文革虽已破产，但通观此悬疑新案，依旧能让人重温我党传统的成熟战法，如“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如“先定案后找材料”，如“无限上纲”，如以“逼供信”制造串供、逼供、指供、诱供……只要能证明预设罪名，不管手段如何卑劣均合理合法。

事情从某军原机要处副处长身上突破，从1978年1月24日开始，该某先后交出16份所谓“四人帮”被粉碎前后，鲁瑞林、李亥生、黄兆其、刘殷农等十余人密谋策划“反革命武力夺权”“武装叛乱”的谈话以及开会的“原始记录”。审案人员以这些虚构的“原始”材料逼攻军内外其他审查对象，扩大“战果”，案情于是越发复杂离奇，涉案人越扩越多，14军原政委、时任贵州省军区政委的原增禄、上甘岭战役将领、昆明军区顾问崔建功、老红军、昆明军区副参谋长黄学义、被称为“左权家族好后代”的昆明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左奎元等均被关押逼供……昆明军区和云南省委除多次电报中央及军委、并派员专程赴京汇报“战果”，还以此为题展开了大规模的批判活动，报纸和广播电台连篇累牍地发表批判文章；在体

[1] 鲁瑞林，页235-244。

[2] 1977年12月2日，云南省委发出《关于贯彻中央“当前宣传要点”的意见》提出开展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罪行的群众运动，在全省范围内打好三个战役。第三个战役即揭发批判云南军内外帮派的黑后台鲁瑞林的罪行。

育馆召开了13万人的批判大会和一百多万人参加的广播批判大会，宣布鲁100余条“罪状”。1978年11月20日，省委、昆明军区党委举行有线广播大会，揭发批判鲁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推行“划线站队”，支持云南资产阶级帮派篡党夺权的严重问题。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张铨秀在会上讲话。

各专县也跟着捕风捉影，大量抓人。东川市委宣传干部、原昆明工学院学生刘光华记录了如下一段经历：

七六年十月中旬，东川市五七中学的校长杨毅之开车从昆明给东川二中拉了一车化学试剂，篷布盖得很严实，有人就趁“揭批查”之机向公安局报告杨那天是拉着一车枪支弹药。杨立即被公安局抓起来突审，杨始终没有承认……公安局猜测，能够从昆明拉枪到东川，只有我通过黄兆其才能办得到，于是就开始攻我了。

（提审人员）对我说：“给你提示一下，你组织人十月中旬从昆明拉了一车枪支弹药到东川，开车的驾驶员已经抓着了，拉枪的车也找到了。你必须交代清楚，这车枪是谁发给你的，从哪里拉的，拉枪到东川干什么，现在藏在什么地方，你组织了哪些人，搞武装叛乱的计划是什么？……接下来三天三夜狂轰滥炸，不给休息，不给饭吃，不给水喝，上厕所也押着。我始终一句话：“没有的事情”。专案组组长大概也熬不住了，又提示我：“你认识杨毅之吗？”我答：“认识”。他说：“杨毅之交代了，那车枪是你布置他拉来东川的，交给你了，你必须交代清楚枪藏在什么地方？”我仍坚称“没有这回事”。

后来揭发者一再撒谎，说那车枪被杨毅之拉到北部矿山的拖布卡地区、落雪地区、汤丹地区埋起来了。于是公安局就组织了四十多个公安干警和市武装部一些军人，动用大小汽车、摩托车十多辆，每天押着杨毅之到北部矿山去挖枪，时间长达近一个月，一样也没有挖着。后来汽车、摩托车翻在山沟里，公安人员摔伤了，汽车摩托车也摔坏了，公安局才想是否上当了？再抓揭发人审问，才猛醒受了揭发人报假案的骗。结果揭发人被公安人员打残废了。杨毅之被以“思想反动”，流放到昆明市大板桥园艺农场劳动教养三年。

云南戏份如此惊悚，北京也感觉有些蹊跷了。中央指定总政治

部副主任史进尉牵头，由中央组织部、公安部、总政治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兵分两路，同时在云南和北京两地展开调查，疑案很快穿帮。

史进尉曾任总政保卫部部长，本系情报专家。他很快从“原始记录”的笔记本发现破绽。所谓“原始记录”记载的是1976年8月至12月间发生的事情，但经内查外调和技术鉴定，笔记本却是1978年才生产出来，1978年出品的本子何能“原始记录”1976年之事？显然纯属伪造了。由此入手，问题逐一核实，最终水落石出，所谓“武力夺权”“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纯属子虚乌有。

与此同时，调查组在北京经提审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以及询问鲁瑞林在京做手术时住过的京西宾馆、301医院等处有关人员，证实鲁回昆养病确系中央批准，而在京期间确与“四人帮”无任何交接，更无交代“任务”之事。最后，中央联合调查组对“一·二四”案作出了结论：“查无实据，应予否定”。中央及军委于1979年10月批准了联合调查组《关于“一·二四案”调查终结报告》，要求“过去在‘一·二四’案问题上对鲁瑞林同志的批判以及报刊文章中的不实之词应予推倒，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还鲁瑞林以清白，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如果把鲁瑞林“一·二四”案放在文革前或文革中，实在算不上什么奇特，而出现在文革已经破产之后，这就获得了特别的典型意义和象征意义：中国的政治远远没有与文革告别：思路依旧，手段依旧，案件的解决同样也与文革一模一样，变的仅仅是整人与被整者的角色而已。云南新当局这些因重掌权柄于是头脑发胀的土佬儿，太过迷信手中的权力了，不料他们眼中的某些失意者，偏偏和具有更大权力的人保持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不幸撞车熄火：这也完全符合中共长期内斗的规律。

如果说鲁瑞林案是云南后文革路线持续延伸的极端之例，那么，再看看同一属性的政治路线在整个云南的延伸，就足以让人对社会和解的可能完全失望。以中心城市昆明为例：市委10个常委8个被整：市委书记郭少川（1936年老革命）被打成“昆明帮派体系”总后台，停职检查批斗；市委副书记张琅基（1936年老革命）、肖持久被打成“昆明帮派体系”“总后台”，隔离审查两年多；市委副书记李书成（1940年老革命）被逮捕关押两年多；市委常委史可监（1939年老革命）、著名起义将领、老市长潘朔端被审查。据不完全统计，市直机关单位，送进各种学习班检查、交代，被批斗的干部群众有12000多人，其中被批斗的2000多，被判刑的248人，开除党籍的244人，被逼死20余人，免职、撤职500多；市委机关250

名干部，八派观点110人，清查中受各种处理的亦110，占八派干部人数的100%；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老干部侯炳章，被打成“帮派骨干”，开除党籍，行政降级处理；市委宣传理论科科长王海泉，被打成“帮派骨干”，判刑5年；团市委办公室主任马首良：“帮派骨干”，判刑3年；市妇联副主任王云仙：“帮派骨干”，判刑3年；组织部副部长张师孔、李天元、工交部副主任焦万忠、市政府机关党委书记何秀卿、市计委副主任刘国忠、交通局长宋怀富、城建局长宋玉麟、市委党校副校长杨连升、李湘、市法院副院长师云龙、盘龙区委书记张有淦等人立案审查、批斗、直到退休。^[1] 专县情况大体类似。

高中级干部如此，低端干部就更难逃劫运。省革委会副主任（八二三派代表）、知名女英雄徐学惠，因保护国家财产双手早被匪徒砍掉，方得幸免于牢狱之灾，被定为“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骨干分子”，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分配一般工作^[2]；云南还有一著名特级开国女战斗英雄名涂勋者^[3]，涂因参加八派，且忝列文山州革委委员、县革委副主任，“揭批查”遂被定为西畴县帮派体系头目，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1999年建国五十周年庆典，全国妇联及中央电视台遍寻开国英雄，好不容易在文山州将涂勋找到，因其反革命犯之罪身不能自由，北京来人只得请示云南省委，时任省委书记的令狐安批示省高院提出解决办法，又因曾任“摧资兵团”玉溪地区负责人的前任省委书记普朝柱说过揭批查案件“只复议，不复查”。事情不了了之。

其余纯属草民百姓造反者的命运可想而知。

1.4. 官僚体系的重建

中共大陆建政后，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先后搞了50多次，每次制造出来的“反党集团”“右派”“右倾”等各种名目的敌对分子，

[1] 参见2002年2月6日“云南部分老红军、老八路”郑加平、郭新、李书成等20人联署的告状信《关于云南25年的冤案不能纠正的情况反映》。

[2] 1978年6月16日省委向中共中央作了《关于对朱克家、黄兆其、徐学惠的处理意见的请示》。

[3] 共产党开国之初，曾宣传过两位“花木蓝”式的女英雄，一为郭俊清，另一位即涂勋，1950年参加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战斗英雄大会，文革前，涂任西畴县人民银行副行长。

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已然积成社会难以承受之重，而文革作为规模最大的一次“造敌”运动，无疑成为其巅峰之作。云南概莫能外。要重建秩序，必须平反，实现有限范围的、局部的和解。

首先是赵健民。标志云南文革伟大胜利的“新生红色政权”：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中央批文明确定义是云南“全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英勇斗争的伟大成果。”^[1]这些被打倒的走资派，具体讲，就是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谭震林、李井泉……诸人“在云南的代理人阎红彦、赵健民之流”，因此，要清算云南文革，必须首先对云南文革反派主角阎红彦和赵健民进行平反。

1977年11月27日省委向中共中央上报《关于阎红彦同志问题的结论报告》。中共中央批准了省委的结论报告。批准将阎红彦的骨灰移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阎红彦愤本不大，死时造反派尚未分裂，两派对其均无怨尤，平反毫无难度。至于称他“叛党自杀”，皆因死前阎给其妻王腾波写了个条：“腾波，对不起，我是陈伯达、江青逼死的，你不要难过。”如今看来，阎对中央文革二大员陈、江以死抗争，简直是功绩卓著了。

赵健民涉入派斗甚深，属炮派著名“黑后台”，八派对其一直怨气难消，可有何办法呢？如今大权已转移到对方手上，只能眼睁睁看见人家恭恭敬敬把赵健民抬出来。1978年1月29日，省委批准省委组织部《关于对赵健民同志审查结论的意见的报告》；2月28日，省委向中央上报，请求撤回省委于1974年5月26日报送中央《关于赵健民历史问题的审查报告》，4月24日，中央批准云南省委报告。9月8日，省委下发经中共中央批准的《关于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政治假案平反结论》。1988年5月6日，中央组织部发出《关于赵健民同志平反的通报》。《通报》说，原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和“四人帮”集团诬陷为叛徒而受到残酷迫害，在此期间，赵健民始终坚持原则，坚持斗争，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德，彻底推倒曾强加于赵健民的一切不实之词，公开平反，恢复名誉。该《通报》还推翻了近20年前在山东挨整的旧案。可谓功德圆满了。嗣后，赵调离云南，安排去北京工作。

[1]《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中发（68）128号文（1968年8月10日）。

赵健民在云南遭受的牢狱之苦确实非常残酷。极权社会最需要循吏和佞臣，像赵健民这样有个性，不管意见正误，均敢于表达和担当的干部实属凤毛麟角。文革后旧吏复出，赵亦属少有敢于反思者。他最早响应干部退休制度，主动放弃升迁三机部部长的机会而甘当顾问，颇显高风亮节。1989年4月赵健民因公到贵阳，文革时的政治敌手黄兆其正在那儿的监狱服刑。不知出于何意，赵专门提出要与之约见。《康生与赵健民冤案》作者记录了这场会面：

晚上八时左右，赵健民与黄兆其在贵阳市宾馆相见。当黄兆其跟着公安厅一位工作人员走到会客室门口时，一眼认出了站在那里的赵健民，立即快步走上前去，拉着赵健民的手，以一种难以形容的音调说：“赵书记，您的身体好吗？”“好。您还好吗？”赵健民礼貌地问。“好。”黄兆其回答着，二人进入了会客室，直接谈起文革的情况……

会见结束时，黄兆其不无愧意地说：“我不知道‘划线站队’中死了那么多人。我害了您，害了云南人民，也害了我自己。”赵健民以浓厚的历史感，意味深长地说：“‘文革’，是全国人民的一场灾难，云南是重灾区。你、我都应该根据各自的情况，吸取教训。”这是文革中的一个被迫害者与一个迫害者的反思。^[1]

如需对上述文稿小做修改，笔者以为将最后一句改为“这是‘文革’中的两个害人者兼受害者的反思。”更为准确。

还有一个省级干部：刘林元。两派分裂之初刘便悄悄儿跑去远郊眠山饮弹自尽，事情之蹊跷怪异构成了云南文革史一桩类似福尔摩斯型的探案故事，虽说人已早死且并无太大政治影响，但也得把话说明白。1977年5月23日，省委组织部作出《关于刘林元同志政治历史问题的审查报告》。7月9日，“省委批准了省委组织部的审查结论，为刘林元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举行骨灰安放仪式，并高度评价了他的一生。”^[2]

云南的干部问题，首当其冲数“摧资兵团”和“云南省中上层干部联络站”，本书卷二曾对此有过介绍，文革纲领性文件《中

[1] 丁龙嘉、听雨：《康生与赵健民专案》页345。

[2] 《云南当代大事纪要》1977年卷。其实，除了群众舆论，谁也没有把刘林元打成反革命。说“平反”似有牵强。

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谈及运动目的,开宗明义就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云南10000多本该接受群众“炮打”“批判”的中上层干部公开抱团,扯旗放炮成立跨地区跨系统的全省性组织,站去炮派一边放手大干,实为全国文革一枝奇葩。“划线站队”那会儿炮派倒霉,这些人悉数跟着挨整,而今整肃“帮派体系(即八派体系)”,自然轮到“摧资兵团”咸鱼翻身。7月14日,省委正式发出通知,确认“摧资兵团”和“云南省中上层干部联络站”为“两个政治冤案”,4天后,省委公开召开大会,为其平反。考察1980年代之后的云南高层权力版图,有“苍山”(大理帮)、“红塔山”(玉溪帮)和“玉龙雪山”(丽江帮)“三座大山”一说,各帮主力不少出自文革“摧资兵团”,云南省委某届一把手,干脆就是兵团某地区分团的主要负责人。

官史载:落实政策和审干复查工作自1977年2月中共中央解决云南问题后正式启动。截至1978年4月,全省需要落实政策的共21.1万人,已落实了18.6万人,占84.2%。其中干部需要落实政策的5.7万人,已落实了4.8万人,占84.2%。还有一些重大冤案、错案正在调查落实。

赵健民平了反,“摧资兵团”平了反,“划线站队”时宣判属于炮派的案子跟着一风吹。著名的“滇西挺进纵队”案于1978年9月8日,经中共中央批准、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联合下发的《关于“滇西挺进纵队”政治假案平反的结论》而今就变成“假案”了。假者,子虚乌有之谓也。与此挂钩的“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确实子虚乌有,但工八团77人组队奔袭数百里,作为武装进攻方挑起历时12天、死亡183人^[1]的下关116特大武斗事件,怎么一块儿就变得子虚乌有了?“眼睛一眨,母鸡变鸭”。此处只能有一种解释:“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

同日,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召开有250万人参加的有线广播大会,为“滇西挺进纵队”“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两个政治假案平反,为受害者公开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省委第一书记安平生在会上宣布,到目前为止,全省12331起冤、假、错案绝大多数已经得到平反。

落实文革中被整干部的政策,历年来(包括文革前期)被整伤的也就搭顺风车,接二连三地都顺带否了:

[1]《大理州“文化大革命”运动》页13。

文革初期的“三家村云南分店”牵扯的李孟北、夏雨、周钟德案，否了；

所谓“四月提纲”案，省委对高治国、张更生、吴玉才的批判处理，否了；

上溯至文革前，“于（一川）、梁（浩）反党集团”案，亦正式宣布不存在；

再上溯到1958年的“反右补课”第二次整肃“云南的地方主义”，“郑（敦）、王（镜如）反党集团”^[1]，亦属于虚乌有，否了；继续前推，1954年批判郑伯克的“地方主义”，亦统统推倒。

所谓“郑、王反党集团”和郑伯克“地方主义”，一扯就扯到共产党打天下的陈年旧事了。中共接管云南之前，滇省本系地方军阀龙云、卢汉地盘，龙、卢二人与蒋介石中央素多龃龉，故对中共地下党有意放纵并利用之，以至抗战期间滇省有“民主堡垒”之美誉。中共地下党乘机坐大。抗战后成立的滇桂黔边区纵队（简称“边纵”），以知识青年为骨干，中共南下前夕已发展成五万余人的军事主力，县区民兵十万余，12块游击区，攻占91座县城，为配合解放军入滇功莫大焉。可中共一旦执掌政权，云南地下党与“边纵”成员立即成了重点审查对象，定性为“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122名省管干部“划右”。“代表人物”、省纪委书记郑伯克^[2]1954年遭主持滇政的谢富治整肃，党籍几被开除；1958年，坚持实事求是、不肯无中生有“揭发”的南下干部、省委组织部长王镜如，也被一起打为“郑、王反党集团首要分子”。文革来临，此戾风再掀高潮，历届地下党工委委员、边区委员、“边纵”地委、支队领导都定位“叛徒”“特嫌”，大批关押，不少迫害致死。此冤文革破产方得改正，当局复查地下党及“边纵”2.9万余人次，改正80%。^[3]

[1] 郑敦、王镜如其时分别任省委组织部部长和副部长，经查明郑敦、王镜如和其他所谓“集团成员”，没有不正常的政治关系。省委向中央的报告是错误的，应予坚决改正。凡是因该案而受牵连的其他人员，要实事求是地进行复查，搞错了的，也应纠正。

[2] 郑伯克（1909～2008），1935年入党，云南地下党省工委书记、“边纵”副政委。郑麾下的组织部长陈盛年，整肃后降为云南省轻工厅副厅长。文革破产后先后担任云南揭批查领导小组、“两案”审理、官方文革史编写等多项主要负责人，专事文革清理。

[3] 参见裴毅然：《前后“十六字方针”——白区地下党的宿命》（《二十一世纪》2014年8月号，和燕凌等编：《红岩儿女》（第三部·上）“云南地下党和‘边纵’冤案纪略”，页80～81，香港，真相出版社，2012。

根据北京的政策，55万名“右派”“改正”了（还有几个留下不“改正”，以证明该运动之错仅系“扩大化”），“土改”以来的“四类分子（地、富、反、坏）一律摘掉“帽子”，其子女不再遭株连而贬为“贱民”，打入另册……

唯一留下的是，文革中造反派之罪错绝不能赦免，而且必须加码严惩。

第二章 造反派的末日

2.1. 定点清除

八年前，云南“新生红色政权”成立，搞“划线站队”，将炮派整得死去活来，八年后搞“揭批查”，搞清理“三种人”，名称改了，做法基本照葫芦画瓢。两者不同之点在于：首先，整人者和被整者翻了个个儿，上次是八派整炮派，这次反过来。作为表现形式，炮派观点的群众已基本退出游戏，整肃主要是由炮派观点的官僚主持；其次，搞“划线站队”那会儿，“新生红色政权”已成立，也开始重建秩序，但全社会尚处理乱局之中，两派对立余烈犹存，故清理失败者的方式是为急风暴雨、群众专政也即暴民专政，整肃面之宽泛和整肃手段的残酷大为失控；这一次，失败者局面铁定，新政权完全可以用国家权力之名，实行老鹰抓小鸡的办法，一个个“定点清除”。打击面的大小和手段凶残与否，完全凭权力拥有者高兴与否。几何学定义，所谓“面”，系若干“点”的聚合。清除的点积累多了，也就成了全面扫荡。下面我们很快会看见这个。

本次清洗与上次相同之处则在于：依旧是一以贯之的文革思维：派性偏见、以政代法、以党代法，以人代法。手法依旧“逼供信”“无限上纲”“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先看数字：

“揭批查”之后有个“收官”之举：对揭批查出来的人进行组织处理和理论上的“法制”处理，史称“两案”（指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专案）审理。1981年10月3日，云南省委“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关于压缩“两案”判刑名单的报告》称，根据中央关

于“两案”判刑人员要严格控制，判刑面要小的精神，对我省原定判刑人员进行了认真审查，一致同意把我省“两案”判刑人员由22名定为6名，其余16名罪犯从“两案”内转入其他刑事犯罪案件判处。全省还有以其他刑事犯罪处理的案犯18人，共24人”^[1]当时云南人口2500万，此数确属“一小撮”。

还有一组数据是，1984年1月30日，省委“两案”办公室关于《全省“两案”结论处理进展情况》的统计，全省“两案”清查对象7569人，1983年1月全省结论处理平衡会议后，其中，拟定为不作结论的5204人（说错话、做错事5032人，记录在案的172人），占清查对象的68.7%；拟定给予结论处理的2365人，占31.3%，截至本月上旬，已经结论处理1054人，占应结论处理数的44.5%。核查“三种人”的工作，从1984年开始，到1993年结束。一是查清了文化大革命中全省发生的重大事件。经省核查领导小组组织协调有关单位查阅资料、调查研究，全省列出的1816件重大事件，到1986年底已全部查清，弄清了事件的主要责任者，形成了专题材料，为全省核查“三种人”的工作提供了重要线索。

官方数据确实非常温和，民间数据则严峻得多。2017年，曾担任省妇联主任的包亚芳为首14个州市88人^[2]给中央第十一巡视组工作组《关于云南揭批查制造大量冤假错案的情况报告》：称受到审判、批斗，办各种形式的“学习班”，共150多万人；判刑入狱的5万多人；判死刑2人。在整党“清理三种人”中，受到党纪、政纪、开除公职、劳动教养、无故清退回家等15万多人。在审查期间，刑讯逼供打死、逼死、逼疯1000多人^[3]。另一参考数据：2005年11月17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田波对八派集体上访人员说，云南揭批查被抓被关52100多，其中判死刑并执行者2人。此话说于文革结束后近30年，派性环境早已远逝，应该比较平静客观了。云南民间独立文革研究人士张振钧根据各地州市的数据进行搜集整理，则判断云南“揭批查”运动共判刑劳改5000多人，劳动教养约5000多人，受党纪、政纪、开除公职处分的约10万多人。

[1]《云南“文化大革命”运动大事纪实》页432。

[2]此由揭批查期间判刑后释放人员组成的维权团体坚持告状已30多年，积累了大量的申述材料。为首的刘树林（老干部）、刘殷农已经先后去世，包亚芳也已年逾古稀。此只采用其中一个文本的数据和资料。

[3]云南揭批查入狱后的释放人员经多年联络，开展上访活动，事实上形成了全省性的常态活动，提供的数据应有相当的可信度。

要彻底弄清上述数据，在官方档案不解密的今天几乎不可能，但对于足够多的个案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初步清楚发生在当时的耸人听闻的前尘旧事。云南“揭批查”，确实并非为揭露真相、然后通过对施恶者惩戒，让其忏悔（也让受害者对历史给予原谅与宽容），从而实现社会和解，当局偏偏继续假阶级斗争之名煽动并实施政治报复。云南天高地远，官员和造反派在文革十年结下的深仇大恨，远比理性、比法制、比所谓政策的力量强大得多。如果说，历史的书写者因官方档案不解密而无法进行准确的量化比对，那么，从业已搜集到的大量判决书——这些足以佐证以党代法、以人代法、以政代法而制造出来法律文书——大体可以对事件的性质做出判断。这些决定人生命运的重大法律文书，处处充满非法律的语言，其中两份尤为独特简短，干脆直接用党委文件代替法律文书。兹全文照抄如下：

中共东川市委文件
刑字（1979）185号

关于杨松年伤害案的处刑决定：

经中共东川市委常委会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一日研究认为：杨松年在“划线站队”期间，殴打干部、群众二十七人，其中二人致残；利用职权贪污公款九百六十元。应以伤害罪合并贪污论处。据此决定；对杨松年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中共东川市委员会（盖章）
1979年12月4日

普洱县的判决书更简洁，连文件的红头都省了。全文如下：

对反革命罪犯罗庭祖的处理意见

经县委常委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一日会议讨论决定：
对现行反革命犯罗庭祖依法判处有期徒刑陆年。

中共普洱县委员会（盖章）
1978年4月21日

东川市委宣传部副科长刘光华由市法院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1982年已服刑5年。同一法院又在本人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改判，撤销“现行反革命”罪，改为“扰乱社会秩序”罪，刑期由15年改为3年。刘出狱后去东川法院申诉，法院明确答复：“当初判你们的刑，是东川市委判的。你去找东川市委。我们法院只是盖了个章”。刘再找东川市委，市委当政者又答：“你找法院去，你的判决上盖的是法院的章，不是市委的章”。

甚至1980年1月30日，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硕大无朋的印章之“刑事判决书（80）刑二字第12号”关于云南省森林资源调查管理处职工艾文彬关于私藏枪支弹药案的判决结论部分^[1]，也赫然写着“按照党的政策，可从宽不以犯罪论处。”一类判词。最高法断案尚且如此，还有什么荒唐事不能在云南发生呢？

云南这些判决书有几个共同特点，一是非常简短，往往就一页32开纸，三、五百字，表述自是非常模糊，具有极大的解释空间；其次，几乎都有案犯“趁‘划线站队’之机”如何“实施犯罪”，一看而知案犯属文革的“八观点”；最后，这些“罪犯”虽以政治罪名“帮派分子”实施抓捕，但最后都以“刑事犯罪”进行判决。前述“88人报告”披露：师宗县“揭批查”运动办公室主任郭远猷，在动员大会说，对于师宗县帮派体系，“有罪行的抓罪行、没有罪行的抓错误，没有错误的抓态度，把他们统统抓起来”，全县一共抓了500多人。罗平县县委书记李文选，听看守所汇报说：“看守所关押的犯人太多了，关不下了，怎么办？”李文选说：“关不下就赶紧判嘛！判上5、6个，7、8个就可以了。其他的，随便安个什么罪名判了，往劳改队一送，就完事了。”书记一句话，罗平县判了117人。

下面内容摘抄自笔者搜集的百余份判决书的判词：

广南县农机公司职工陈景庄，1978年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10年徒刑。全文不足600字的判决书，罪行表述用了近500字，全部罪行计有“陈犯思想反动”“利用职权……将社会关系极其复杂、家庭有重大问题的人拉入党内”，积极参与“资产阶级帮派活动，传播反革命谣言，幻想反革命势力在中国复辟”、恶毒攻击26号文件“不是拆墙填沟解疙瘩，而是垒墙挖沟结疙瘩”“四人帮”被粉碎后，“妄图邀约他人结伙逃跑”。^[2]文中没有一个字对该陈“刑事犯罪”的表述。

[1] 艾文彬“私藏枪支弹药”案，云南原判决有期徒刑13年。

[2] 广南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广法（1978）刑判字第22号”。

同样为该县的“广法（1979）刑判字第43号判决书”仅300字，将在武斗互射中打死人的供销社职工胡瑞庭以刑事犯判处有期徒刑5年。“广法（1979）刑判字第77号”也是大半页纸，判定堂上农场教师何俊清“趁林彪、‘四人帮’大搞‘划线站队’之机，挟嫌报复打人”，判处有期徒刑3年；同样400余字的“广法（1978）刑判字第22号”判定县供销社职工、“现行反革命犯”蔡光贵“思想反动，敌视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在“划线站队”期间“无视国法，任意揪斗扭打刘容贞等人”判处有期徒刑9年……其他地州的判决书，情况都大体同样简单明了，无非利用“划线站队”如何如何，兹不赘述。

虽然无法确认具体准确的数据，当时监狱人满为患却是不争的事实。刘光华这样记录最初的监狱生涯：

云南省第二监狱，号称是国模范监狱。省二监集训队，是“揭批查”运动中成立的临时机构，因大量的“四人帮”帮派人物判刑后涌入，监狱一时难以安置，就先存放在这里。其任务是让犯人端正认罪服法态度，学习监规纪律和恢复体力。同时，当时昆明地区有大量被捕人员，虽未判刑，但社会上所有看守所、拘留所、派出所，甚至学校改为看守所都关不下的情况下，也先关在这里……专州县上只有判处十五年以上重罪的人，才有资格送这里的。

进二监大门，来接收我们的是监狱管教科科长张润生（山东人，文革中二监炮派人物）。看看我的判决书问：“你犯什么罪？”我答：“不犯什么，就是跟着毛主席搞了几年‘文化大革命’”。我被臭骂了一通。他又问姬修斌：“你犯什么罪？”姬答：“人家说我‘文化大革命’中打了人”。张又骂姬“胡扯”。就叫人把我们带进集训队。

在去集训队的半路，要经过一段工地，有三、四百人被背枪的军人押着在那里挖山平地。当我走到那里时，那些干活的人都停了下来在喊我的名字。我一看，惊呆了。这些人大多我都认识，都是昆明各大系统、各单位造反派的头头们。我和他们只能站在远处相互呼喊。他们高声问我：“你是咋判的？”我答：“现行反革命十五年。”他们叫了起来：“不要怕！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进入集训队，接收我们的是监狱杨教导员。他拿出两份表格要我们填。我说：“我不识字。”杨问：“不识字为什么判你现行反革命？”我说不知道：“我在老家是挖老板田的，”杨教导员叫来一个人帮我填表。这个人一进门

使我大吃一惊……来人叫田治可，昆明钢铁公司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被判刑十三年。1969年他曾担任工宣队队长，带领昆钢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昆明师范学院，后来他又同我一起出席云南省首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趁管教人员不在）他一把拉了我的手，问长问短……互相安慰起来。

快吃晚饭时，外出劳动的人也回来了。文革中老战友见面，亲切无比，互相拥抱，互相问候，大家开玩笑说：“发财不见面，背时大团圆。”“牛鬼蛇神”又大会师了。

在监狱这所共同的受难之所，八二三的文革囚徒继续强化着对荒唐政治的感受，以至于出狱几十年后，他们除了为基本的生存条件进行抗争，根本就没有可能对文革进行反思。同样，胜利了的官僚集团对待阶下囚的强暴，同时强化着双方的文革思维，下面是刘光华讲述的狱中故事：

省二监劳改人员有3600人左右，其中有一半是“帮派人员”。这些“帮派人员”是不认罪的，平时都自称是“毛主席分子”，流露出对毛主席的无限怀念，对邓、叶、华、汪的愤恨。1979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三周年忌日来临前，“帮派分子”中就开始议论，虽不能开纪念会，但一定要冲破阻力，表达对毛主席的思念之情。

九月九日那天一早，全监狱的“帮派人员”胸前都戴起了白花。白花大小、式样不统一，但都以戴上白花为荣。有的不会做白花，就把棉衣中的棉花揪下一坨，粘在胸前。事情很快引起监狱恐慌，狱内加强了警戒，警车、摩托车拉响警笛巡逻……一片白色恐怖。干警要“帮派分子”把花摘下来，得到的回答是“今天是要戴的，明天就摘下来”。干警追查“是谁指使的？”大家答：“是我们自觉自愿戴的”。干警说：“不准戴”。大家说：“怀念毛主席，是我们的权力。”下午，监狱召开全监狱劳改人员大会。监狱那个极端仇视“文化大革命”的夏副政委声嘶力竭地又叫、又拍桌子，大叫：“你们没有资格纪念毛主席，你们是犯人，是专政对象，你们只有资格老老实实接受改造……这件事监狱要调查，要把首要分子找出来，关他的禁闭，加他的刑！”然而他得到的只是“帮派人员”的唏嘘声。始终没有抓出一个主谋。

后来，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文进——即在著名的“七次全会”上听谭甫仁讲话“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随即便悄悄将屁股从炮派一方座位挪到八派代表方面那位初通文化的“老红军”——亲自来到省二监进行弹压。在全体劳改人员大会上，李同样拍桌子威慑：

你们说判你们的刑是党委判的，没有经过法院审理，没有法律程序，不合法，难道你们连法院是在党委领导下工作的这点常识都不知道吗？老子连盖章都忙不赢，哪有时间来审你们？你们不服气，说是判错了、判重了，老子告诉你们，该判你三年，老子非判你五年不可，你能怎么样？你们要申诉就申诉嘛，老子不理你，你又能怎么样？过去你们都是响当当的造反派，今天不也是响叮当（指镣铐声）嘛！

在专制体制下，法律永远只是掌权者手里一团可以随意揉搓的面团。

2.2. 作为“行为艺术”的“两案”审理

云南清理帮派的运动，不管思路 and 手段与历年来众人见识过的如何似曾相识，一脉相承，但表面活计还是得做一做。毕竟文革结束了，需要让人感觉一点新气象，需要来点儿法制流程了。事实上，北京方面饱受文革之苦的高层（如彭真）诸大佬确乎在实实在在推动法制建设，只是基层官僚想要报文革之仇依旧很容易，他们什么世面没见过？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他们熟门熟路。敌人已俯首就擒，他想咋办还不好办吗？对他们来说，所谓法制，不过就来点行为艺术，冠冕堂皇走走过场，既向上表明他们已经懂了规矩，对下也显示自己宅心仁厚，与当初“群众专政”大有不同。

“揭批查”差不多了，需要以法律为名将这些造反刺头儿打入牢狱，云南省委专门成立了“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对最后的处理方案进行反复权衡并对需要用来作为演员以实施“行为艺术”的人员最后定板。虽然监狱已人满为患，但审理领导小组于9月26日给中央的《关于压缩“两案”判刑名单的报告》却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两案”判刑人员要严格控制，判刑面要小的精神，对我省原定判刑人员进行了认真审查，一致同意把我省“两案”判刑人员由

22名定为6名，即黄兆其、刘殷农、涂晓雷、胡延观、刘光兴、何立宽，上报中共中央审查、平衡。^[1]

除刘光兴由楚雄审判，何立宽由文山审判，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黄兆其、刘殷农、胡延观、涂晓雷”的公审经过精心准备，终于在1982年4月18日由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槌，地点在抗战胜利纪念馆，此为民国时期为纪念抗战胜利而恭请建筑大师梁思成设计，歇山顶，飞檐斗拱，壮美而庄严，解放后改名人民解放胜利堂。案犯刘殷农在最后陈述曾有如下表述：二十多年前，我作为昆明少年儿童代表，曾在此欢迎解放军入滇，如今却在此接受人民的审判，真是人生一大讽刺。官方资料载，参加旁听审判的有1.7万多人次。在19次法庭调查和辩论中，宣读和出示各种证据351件，有14名主要证人和受害人出庭作证。4月29日，法庭对以上案犯进行了公开宣判，被告不服判决，先后上诉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省高院的终审裁定全部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与此同时，楚雄州和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也分别公开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同案犯”刘光兴和何立宽，判处刘光兴有期徒刑12年，判处何立宽有期徒刑14年。官史还称：全省还有以其他刑事犯罪处理的案犯18名，共24名，对他们的审判，推动了全省“两案”审理的进程。所谓其他18名，包括所传“八大金刚”中余下的安矩祥、沈炳章、金弈旦、杨树先等。

受审人员经过精心选择，审判地点和层级也经过精心安排。比如，省革委副主任、省委工交政治部副主任黄兆其，按照级别，初审无论如何应该在省高院进行，而交由昆明中院初审，被告只能上诉到云南高院，依旧归属云南当局发落，收“关门打狗”之效。任职云南省农办主任兼省委办公厅副主任胡延观的情况亦如此。如果由省高院初审，一上诉就到了国家高院，云南当局焉能随心所欲？此前曾有两例可鉴，一为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刘清选，文革期间任省委弥勒“五七干校”负责人，其间发生了省委党校副校长梁维舟受群众批斗突发心脏病猝死事件，刘校长负有领导责任，1979年“揭批查”被省高院初审判刑三年，刘上诉最高法，结果无罪释放；还有前述由省高院初审以私藏枪支弹药罪初审判刑13年的云南省森林资源调查管理处职工艾文彬，上诉最高法，亦于1980年被终审宣判无罪。当然，将大佬们全弄到昆明市审判，人气旺旺，宣传效果更佳。

[1]《云南“文化大革命”运动大事纪实》页432。

所谓“八大金刚”之一的沈炳章因级别稍低而未能押赴胜利堂参加“表演”，但也在一定范围进行所谓“公开审理”以资宣传。这些受审者如今多已作古，风烛残年的沈炳章出狱后曾于流离颠沛中自撰了多几种回忆录，其中《蒙难林家院》对于这款“行为艺术”有非常详细的记录，使我们得以看到其中的虚假与可笑。《蒙难》一书载，1982年7月19日（开庭前四天），上级为沈指定的两位律师曾孝纯（男）和李燕含（女）方才来拘押地听被告申辩。沈将他事前写好的关于学习《党内若干问题的决议》的体会“之一”“之二”交给他俩，并说他的申辩都在上面了，称他准备在法庭上以此作自我辩护。二律师一看，立即要他快收回，因为按此辩护，很可能在法庭上顶牛。律师和沈的谈话全程用录音机录下，这就发生了一个极具戏剧性的情节：

谈话快结束的最后一天。谈了一下后，那位男的律师去解手了……她（李燕含律师）很快将录音机关掉，十分诚恳地对我说：“我们是同龄人，都是‘文化大革命’的过来人。你把你的一生前前后后都写了，我很理解，也很同情，告诉你，我是流着眼泪看完你那‘之一’、‘之二’的，我看你写的那些都是真话，我是很相信你的。现在我已经将录音机关掉了，我想提请你注意，按照现在的情况，我觉得，你把‘之一’‘之二’上的一些申辩，如果要拿到开庭时去辩论的话，那么加你三年、五年是很容易的事。你现在身体很不好，你要争取活着出去。据我的估计，你可能只会判八年左右的刑。再过两年多就可以出去了，你是熬得出去的。如果再加上三~五年那么你身体就会更吃不消，还是先出去后再说。现在你要申辩起不了多少作用，也只能落得个不老实、态度不好的结果。为此，我建议你收回‘之一’‘之二’，在法庭上不要过多的申辩。老沈啊，留得‘青山’在啊……”她的诚恳态度，使我很感动，我的眼眶里已经充满眼泪，却不好意思在这位同龄的女人面前流出来，我憋住了。

她又赶紧地跟我讲：“估计他解手快回来了，我只能讲这些，但，不管在任何情况下你不能把我这些话给他们听……”

沈炳章非常明白这是在走过场，“党委、公安、检察、法院是一致的。绝对谁都不敢越雷池一步。”沈写到，“那个有良心的李律

师提醒以后，我觉得她讲得完全正确，去跟那些翻手是云覆手是雨的权贵们抗争，等于鸡蛋碰石头，不可能收到效果。我特别注意到她说的最后那句话：“老沈，要留得‘青山’在啊。”

由是，沈在公审中的表演与法庭非常配合。如法庭指控他犯“反革命诬陷罪”一节，出示了“专门给中央政治局几个人看的一份‘内部参考’复印件”，问沈是否有这回事？沈心里想的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省委委员，向中央派下来的新华社总社的记者反映省委有关问题后，由新华社总社记者写成内部简报交中央政治局委员看，怎么能算是反革命诬陷罪呢？我没有叫他们写简报啊！共产党员向自己的上级组织反映问题，哪怕是说错了，也不该算罪行啊？”沈说他终于憋住了，只说有此事，却一字不申辩。

又比如定沈“反革命宣传罪”。法庭出示了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日的《云南日报》，第二版发表了一篇沈纪念毛泽东畅游长江的文章。问被告有无此事？沈答：“有此事。”依旧不申辩。虽然心里想：“一个共产党员，一个云南省委委员，在云南省委的报纸上发表文章，怎么能算反革命宣传罪。再说邓小平当时是在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被群起而攻之的人，把我定成反革命，刊登这篇文章的《云南日报》，和批准发表这篇文章的云南省委宣传部，以及指定我写这篇文章的云南省委书记该定成什么罪？当时全国几千份报纸都在批‘邓’，该定成什么罪？——我始终想着女律师的提醒：说了也没有用。”

配合审判表演的当然不止沈炳章，黄兆其和刘殷农也采用了同样态度。相比之下，涂晓雷和胡延观则一直桀骜不驯。涂晓雷和沈炳章关押在囚禁要犯的林家院，二人囚室毗邻，可以通过前面一堵墙壁反射对话。涂晓雷得知自己已被“战友”出卖，非常气恼地对沈发牢骚，道“要整烂大家整烂。我豁出去了！”

如果说法庭上涂晓雷自始至终的强硬，是出于年轻气盛，那么，已近“知天命”之年、在官场厮混了大半辈子的胡延观，他在法庭公开顶牛，则完全是相信自己从17岁参加革命，对党国一直耿耿忠心，所作一切皆属工作职责所系，说他“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为目的”干这干那，则纯属胡扯，法庭起诉的罪状根本经不起对质。他拒绝了律师的劝告，拒绝出席法院在监狱的“彩排”：彩排的旁听者都是政法学校的实习生。他说，既然我是反面教员，我就希望在公开场合让更多人来了解我这个“反面教员”。他还坚持照他的级别和职务，初审必须由高院进行，否则拒绝出庭，监管人员威胁说，你不去，捆也要把你捆着去！交锋多次，监管人员最后下了“矮桩”，劝他道，你当了这多年领导，未必不知道这些都是党

委先定了，我们不过都是表演吗？你不去，光我们，这戏咋演啊？几十年后，胡说他记得清楚，他受审的时候心态特别好，明明知道不过一场“狼和小羊”的对话，无道理可讲，但他偏偏要公开出对方的洋相。起诉胡的罪状之一，是1976年2月黄兆其等大佬“学大寨”返昆，要求看他们下乡期间省委的文件，而“胡延观让黄兆其到省委办公厅机要室看了不属于黄看的省委领导人同赵健民两次谈话的机密材料，并作了摘抄”实属泄密大罪。此案由办公厅一处处长朱×出庭作证。朱，建水人，原名朱ZH孔，皆因当局“批孔”火炽，遂改用了新名。朱证人精干聪敏，翩翩滇南秀士，公堂之上坚称此事全系胡延观私自所为。不料胡记忆力胜朱一筹，辩称当时所有手续均有工作笔记记录，朱也参与其事，且办公厅工作记录本有编号，页码亦有编号，坚求法庭调阅证据。二次开庭，证据取来投影大屏显示，胡的辩称果然不虚，所有领导人批示、经办人（包括朱×）签字荦荦清晰，法官忙宣布此事翻过不谈了，胡却坚称朱×作伪证已构成诬陷罪，必须追责。胡不依不饶，朱×一脸难堪，法官亦一脸难堪。胡还坚持要求批准人李文到庭对质，法官称：李为省委秘书长，他们无权传唤。胡即反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何无权传唤？法庭一时哗然。

参观过庭审的人普遍的感觉是，黄、刘二人的法庭表现最为“配合”，因此判词里分别加了“供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有认罪悔罪表现。”（黄）“供认了自己的罪行，有一定的认罪、悔罪表现。”（刘）。话虽好听，结果却差不多。兹将判决结果摘录如下：

39岁的黄兆祺“犯了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对国家、对人民危害十分严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条、第90条、第98条、第92条、第93条、第102条、第138条、第52条、第64条之规定”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42岁的刘殷农“利用‘文化大革命’的内乱，积极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在云南犯下了大量的罪行。其行为已触犯我国刑律，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对国家、人民危害十分严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0条、第92条、第93条、第98条、第102条、第138条、第52条、第64条的规定，”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34岁的涂晓雷“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对国家、对人民危害严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条、第90条、第

98条、第92条、第93条、第102条、第138条、第52条、第64条之规定”，判处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48岁的胡延观“利用其担任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的职权，将其所掌管的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积极提供给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在云南的案犯，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云南省党政军领导人，情节十分恶劣，对国家和人民危害严重，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告陷害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0条、第92条、第98条、第102条、第138条、第52条、第64条的规定”，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行为艺术”落幕。

2.3. 诸神陨落

服刑期满出狱，云南文革的风云人物们重新落入人间，以不同方式继续属于自己的命运。

黄兆其是被押往外省服刑的。由于黄的劳动态度良好和技术方面的突出贡献，贵州第一监狱决定对黄减刑4年，于1990年提前出狱。国家已对个体经营松绑，凭黄兆其一身专业技术和对工作的敬业执着，不愁没有饭吃。朋友们给他出主意，说昆明市轻机厂生产的黄铃包装桶供不应求，包装桶生产工艺简单，生产设备亦不复杂，容易制作。黄正要准备着手，突然又改变了主意，说他要回老家去了——原来，黄获释回昆，社会各界人士：文革“战友”、老同学、老干部、新干部……纷纷前去探望，甚至他读研的导师、年逾八旬的老专家屈维德教授亦拄着拐杖前来看望，一时间社会论说纷纷，当局对此不能不严加防范了。最后——虽然幕后情况不明——总之，贵州省派来了两个狱警客客气气对黄做起工作来^[1]，说我们贵州一监欢迎你，希望你和你的家人一起去到我们那里去，为给你创造工作条件，已给你空出技术科长的位置。来人还表示欢迎黄的家属小孩一起搬去贵阳，搬迁事宜由贵州方面全部负责安排。两狱警在昆呆了近半年，天天去黄家嘘寒问暖。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啊！1991年7月，黄兆其终于同意让夫人王恩宝和小孩先行将家和户口

[1] 其时刘光华正在黄家，全程听了双方谈话。

迁往贵阳（王恩宝到贵州一监即被授予二级警督职称），黄继续在昆治疗肝病一段时间，而后彻底离开了此生的伤心之地。在贵州一监又工作6年，不意肝病复发，1997年3月悄然病逝于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时年56岁。

刘殷农的社会行动能力和经商头脑显然比书生气不改的黄兆其强得多，出狱后很快在当年审判他的胜利堂前花鸟市场租了一间4、5平方米的铁皮摊位专卖渔具，取名“太公渔具店”，自名“经理太公”。中国已经进入消费年代，加上众多朋友帮衬，加上对文革名人好奇者多有前来购买并一睹风采者，渔具生意一时风生水起；接着又开茶馆，地点选在市中心著名公园翠湖的绿荫古筑间，气象一时鼎盛。

营商有成，衣食无忧，刘却悄然歇业，全力投入了“揭批查”运动蒙冤者的维权行列。维权团体本由老干部、“红小鬼”、文革中曾任审干办负责人的李树林^[1]领衔，李病故后，全省维权事宜遂由刘殷农接棒。其间，他还得以完成了回忆录《一个幸存者的自白》。自印书出版后，刘曾赠笔者一册，还希望笔者帮忙联络境外出版。笔者对原稿的重要疏漏提出意见务请他加以补充，刘满口答应。不料时过三月，2015年2月18日（农历大年三十）脑腔突发溢血，倏然离世。

云南全省的“维权战友”正式成立了一个“治丧委员会”，至3月1日全省代表聚齐后，遂于昆明殡仪馆隆重举行追悼会，对刘表示“沉痛悼念”，就当局对“揭批查”冤案“不受理、不复查、不纠正”大加挞伐。悼词发誓“要化悲痛为力量，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百折不挠地去完成刘殷农等死难同志们的未竟事业，用新的胜利来告慰他们的英灵”。追悼会正面高悬两副对联：

跟中央继续革命一心向党 遭报复蒙冤入狱含恨九泉
文革风暴雨“刘毒”工农兵当家作主 特色社会搞“猫
论”玩阴谋冤魂遍地

涂晓雷被送滇黔边境的富源煤矿服刑，出狱是1991年秋，次年便逢“总设计师”邓小平南行深圳，演出“春天的故事”，中国经济大改革扬帆起航。无业人员涂晓雷从小生意做起，开小饭馆、当掮客、办公司……大大小小、各行各业，他都干。可惜屡战屡

[1] 李树林以所谓八派“八大金刚”之名被判刑。出狱后斗争意志极为顽强。

败。为拉关系做业务，他还得经常“工作晚餐”“工作麻将”伺候官员、客户、商家伙伴……烟呀酒的。当年的瘦小个儿很快吃横发胖，2004年某次麻将，打着打着他就软绵绵缩到了桌子底下，送医院抢救，医生说是脑出血：高危重症。

涂第一任妻子在他刚一刑拘就离了，第二任妻子是出狱后讨的，不知何因也在前些年离了。涂走红之际，曾动用关系把当知青的弟弟从贵州弄来云南省军区当了兵，哥哥脑出血送医院抢救时，弟弟已升任团职干事，算是在滇唯一亲人。医生向团职弟弟介绍了病情，说乃兄病重，术后抑或死亡，抑或偏瘫，征求亲属的最后意见：救？还是不救？团职军官思考片刻，回答：“不救了！”

已是全民拜金时代。人与人之间曾经的美好和温馨、亲情、友谊、彼此关怀……统统都打入了金钱冰水之中。涂弟并非道德模范，实事求是地讲：把一个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又无人照顾的“瘫子”放在家里，不是三天五天，而是经年累月，他受得了，他的家人受得了吗？“久病床前无孝子”，更何况一个倒霉透顶的哥哥。为避免兄长朋友干扰，弟弟迅速将生命垂危的哥哥转移去了一叫“大树营”的秘密地方。“八二三”的难兄难弟们筹了一笔治疗费前去医院探望，早已人去床空，辗转找到大树营，只见阴暗屋里躺着的，全是奄奄待毙、奇形怪状的濒危老者。涂死前的形状更属不堪。涂晓雷的哥儿们、“三镜”的另一“镜”张培智先生回忆：

我和刘殷农等人找到大树营，守护在他床前的是他初中同学、他的初恋情入。这位女士不但丢下她所开的饭馆从贵州赶来，还带来了儿子和未婚的儿媳。我们进去时，那位未婚儿媳正爬在床上为涂晓雷擦洗。她说：希望把涂转到医院，哪怕只有一线希望，但涂晓雷的弟弟已签过协议，只有他才能决定涂晓雷的去留。当时，刘殷农就给涂弟打了电话，涂弟的理由就是没有钱，更怕以后的医疗费是无底洞。无奈之下，刘殷农和我只有去找刘殷农的战友。其人是涂弟媳妇的领导，当然她进这个单位也是刘殷农介绍。领导出面，情况有了转机。19日涂晓雷被转往市人民医院，当天就进行了手术，抽出60-70cc血。手术后他当时就醒了过来，住进ICU病房后，情况有所好转，但不想，由于脑损伤导致胃大面积出血，24日去世。据医生讲，急病耽误太久，否则应该是有希望的^[1]。

[1] 此段内容采自张培智致笔者电邮。

胡延观的结果是最好的。他性格乐观、资格老、阅历丰富，对共产党治下的官场百态了然于心，漫长的牢狱之灾更让他将世间虚假和丑陋看透，于是更加通透豁达。还有，他有一个非常美满的家庭，妻贤女孝，出狱后家人坚决不要他外出参与显然不会有结果的维权活动，于是闭门读书练字，写一些回忆文稿，最多是远出钓鱼，在云南的云烟竹树间独得山林之乐。2019年胡老先生已年届八十五，身体依旧硬朗超常。他说他只想余生能多看一些精彩的历史活剧。

朱克家被定为云南“帮派”一号头目，绝对属于天字第一号冤枉喜剧。他原本在西双版纳遥远的深山老林当农民，因为干活不错，被北京（具体是主管文宣的姚文元）硬生生拔为全国知青典型，还塞进中国十大当了候补委员。这完全是权力的运作，与朱本人没半毛钱关系，与云南两派争斗也没半毛钱关系。几十年后，他记忆清楚，他与“四人帮”的直接接触就两次：一次是1974年赴京参加工农读书班，姚文元前来授课，课后曾同他在走廊上单独谈话半小时，内容共三点：一、你一定始终保持知青身份，不要离开农村；二、不要学上海同济大学的红卫兵领袖陈敢峰^[1]，出名了就翘尾巴；三、要谦虚谨慎。朱坚持认为，这些话虽系姚文元所说，但现在看来也没错啊，正因为印象深刻，1976年6月批邓最为凶猛之时，省委一把手贾启允找朱征求意见，计划将他提为省委宣传部第一副部长，他坚辞拒绝了。他与“四人帮”第二次交接是1976年2月中央“打招呼”会议，王洪文等来云南组作指示。参加人好几个呢：贾启允、王必成、刘明辉、刘志坚、七林旺丹、朱克家。他算得什么心腹？八派确实把他当过枪使，比如，昆明市的“转弯会”，刘殷农确实诚邀他前去介绍中央会议精神，他去了，也讲了话，但是刘殷农未经本人同意，马上将他的讲话印成传单四处散发，事后他发现对他的内容做了取舍——政治斗争如此险恶，已然成为公众人物的朱克家的命运，只能完全由社会，具体说，由胜利者的情绪来决定了。

除了立马对他实行隔离审查，云南省委还向中央做了《关于核实朱克家事迹的情况报告》，说朱克家是“四人帮”背着各级党委捧出来的典型，吹嘘他是西双版纳傣尼山寨“第一个教师、第一个木匠、第一个理发师、第一个裁缝”等，完全是虚假的——现在，这些说辞的真伪对朱克家本人其实一点都不重要了。胜利者为一泄

[1] 陈敢峰，同济大学学生，上海“红代会”负责人，曾任中共九大中央候补委员。后因“犯错误”下放上海第5钢铁厂当工人。文革后被捕服刑。

愤怒，1978年6月16日给中央报告决定对“‘四人帮’的亲信、现行反革命，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逮捕法办”。不知什么原因，1979年2月17日，对朱克家的最后处理，是“定为‘四人帮’的亲信，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劳动。”

他被解赴远离昆明的曲靖恩洪煤矿当井下掘进工。这对于朱克家实在算不得什么。他原来就是一个优秀的农民，而且是在一个最荒远、最贫穷、最苦累的僂尼山寨。煤矿之苦能比那儿糟到哪去呢？唯一的麻烦他眼睛近视，每天戴着眼镜井下作业极不方便。皆因他工作得十分认真，而且依旧用业务时间为大家做好事，在僂尼山寨，他是帮“贫下中农”理发、裁缝、做木活……到了煤矿，他就给“工人阶级”修收音机、电视机……师傅们亲切管他叫“朱委员”，没有谁欺负他，大家都为他的认真态度和公益精神所感动呢。后来，煤矿便把他调地面洗煤，再后来，矿山生活区建电视差转台得找个能人，矿部一致认为完成此事非朱克家莫属，于是他调到了矿工会。后来，煤炭销售困难，大家认为他人脉广、办法多，销售科又把他“抢”了去。恩洪煤矿在曲靖市中心建有一宾馆，年年亏损，又把朱克家这枚“香馍馍”抢去了，先是扭亏为盈，接下干脆由他“承包经营”……最后，甚至昆明也有企业也来“抢”人，甚至已把他夫人（中学外语老师）先调进了省会——无奈朱克家属于“省管干部”，组织部门害怕他来昆明捣乱，最后依旧把他卡在了曲靖。

1977年3月1日，云南省级党群系统曾以官方名义召开过一次大会专批朱克家“大搞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是日《云南日报》的报道用“心惊肉跳，狼狈不堪”八个字刻画他在挨斗时的神态：如果说，用这8个字表现一个稀里糊涂被捧上高位的小年轻，突然遭遇灾难时难免的惧怕和恐慌是完全正常的话，那么，几十年事过境迁，被人上天入地折腾得九死一生的朱，早已变得圆熟而超然，在曲靖，他朋友遍地，他非常喜欢对人说：“我家有双重长寿基因：父母长寿，祖父母长寿，我相信我也会长寿。我这人心态非常好”。

炮派观点的人都走了好运。但太有名气的头领却偏偏无法收获果实。因为当局需要他们做道具来表达自己的“公正”。炮派一号人物李毅，“揭批查”没被触动，到昆明市红会医院工作，1985年整党中，经省卫生厅党组批准，将李开除党籍。性格本内向的他，如今对文革旧事讳莫如深，从不表态。“草包司令”方向东永远精力充沛，1976年12月，还属贾启允主持批“四人帮”时候，方向东曾与黄兆其、刘殷农等12人同时接受“隔离审查”，不过很快便解脱了，后来还当了省邮电局副局长，只是性格使然，注定他不甘寂寞，就喜欢没完没了地折腾，只是如今换到经济领域了。

他先办了一个什么“信息公司”，接下来又办了一个“时代中学”，一时风生水起，后来学校卖了，赚了一笔钱；后来以“王福生”为笔名自撰了一本洋洋数十万言的《方向东传奇》。据云大同学沈亚莉告诉笔者，方在同学中实行有奖销售，称他正在寻找某显贵几十年前在国外某银行的某笔巨额存单。到时候存单兑现，凡购买他《传奇》签名本者，均可分得一笔可观的奖金。言之凿凿，不少同学都买了书。

炮派大佬沈参雄因指挥武斗而名震云南，“划线站队”时被捕入狱，后虽重获自由，但和李毅一样，名气太大了，胜利者将其作为文物摆设以显示对两派处理之公平公正更有价值，因此他亦没捞着半毛钱好处。文革破产后自谋生路。笔者转弯抹角找到他，企想向他了解当年“11·30”之战和滇西征路烽火，还有“当权派”们介入武斗的细节，不意沈已僵卧床榻，神色呆木，垂暮的生命之火奄奄待灭。不管笔者如何提示，他只会木木讷讷地说：“我就是总指挥！”说：“LL、HLF他们都称赞，说选你当总指挥，选对了！”其余故事巨细皆忘，让人不甚怅然。临别，笔者提议合影留念，沈又道出一句话，让人感觉他对自己人生高峰期可怜的豪雄记忆：“要不了多久我就死了。这张照片就值钱了！”…

第三章 最后的挽歌

3.1. 文革伴生物

法国文革学者潘鸣啸（Michel Bonnin）以中国知青问题为其研究方向。他认为：

文革是1969年4月份九大时毛泽东重新恢复政治体制而结束了。从这个狭义来看问题，1968年底上山下乡运动的大潮开端就是文革结束的起点，因为青年被解散，红卫兵组织不存在了，就没什么“革命”可讲了。但是，另一方面，1968年后的下乡运动是文革的直接后果，是毛泽东通过文革而创立的“教育革命”的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因为这个运动被当作文化大革命产生的“新生事物”，所以1978年前没有人敢公开对这一政策提出质疑。而且在70年代，这个运动也成了各个政治派别之间互相斗争的一个重要战场。^[1]

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作为文革的伴生物，同样随文革的破产而破产，只是破产时间延迟到批判所谓“两个凡是”，拨乱反正的1978年。而云南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以其自身独有的特点，它的消亡

[1] 潘鸣啸：《上山下乡运动再研究：引起争议的几个问题》（在“文革四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如文革迟到的挽歌，其情节之惨烈悲怆，必得单辟一章以作为全书结尾。

云南知青上山下乡，首先是人数多、来源地域广。自1968年12月24日首批上海知识青年1000多人到达云南，至1980年当局决定城镇知识青年不再上山下乡止，10余年间，在云南边疆农村共有上山下乡知识青年33.6万人，其中，北京、上海、四川来云南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共有10.6万人；^[1]

其次，不管知青来自何地，普遍都安排在远离内地的边域野山。云南本荒远，从内地到边境均有山河天堑和边防检查哨阻隔，私自返回几无可能。^[2]昆明三中初一同学施子杰、丘林和吴先明被安排边境线陇川县插队落户，无法忍受艰难生活与思乡之苦，于极端绝望之中相约徒步翻越高黎贡山，企图避开边检返回昆明。1969年9月12日出发，在原始森林中盘桓摸索整整10天工夫，丘林和吴先明被饥饿、寒冷和恐惧夺去生命。濒临死亡的施子杰幸得一名叫陈善朝的采药人发现并背到窝棚施救，捡回一条命。此传闻虽被当局严密封锁，但事关无数知青命运，口口相传，让昆明知青和家长谈之色变。^[3]此外，地域之偏远又使一部分安排在农场（当时成为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成了军人对男知青施暴、对女知青性侵的对象，其罪行之恶劣严重，以至引起了最高当局震怒。

第三，由于下乡地濒临国境线，仅一条小河相隔的国境对面，异国共产党的所谓“武装革命”正如火如荼，不少回城无望的知青遂成了缅共招兵的主要对象，规模之大，人数之多，让小小异国的袖珍革命一时盛况空前。可惜对中共革命邯郸学步的缅共偏偏不争气，内斗清洗、军事失败，还搞所谓“大缅族主义”……这些，使该国革命局势多年无进展，等到中国文革破产，政策转向，不再撒币，缅共的末日也就到了。这些知青出身的、前途渺茫的“国际主义战士”，最后只能沦为亚热带丛林的孤魂野鬼。

最后，文革期间成立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被当局定义为半军事化的组织，既不军亦不民，皆因沾一个“军”字，遂对年轻人产生了特殊的吸引力，引来了上海、成都、重庆、北京和昆明近12

[1]《云南“文化大革命”运动大事纪实》，页245。

[2]按当时的程序，需生产队至县人保组层层报批，领取《知青通行证》，方可通过怒江惠通桥、澜沧江的功果桥等关卡。

[3]赵德深：《当年震惊社会的昆明知青冻死饿死在高黎贡山事件——事件幸存者施子杰采访记》，见昆明一中、三中老三届同学回忆录《回眸50年》自印本，2018。赵为昆明三中学生。

万的半大娃娃——其实，不过就是将他们蒙来远山垦荒罢了，比之插队知青，他们食宿虽略有保障，生活却受着野地土官的军事管制。十六七岁的孩子，一待8年，普遍觉得受了骗上了当，加上思乡之情日蹙，在文革破产、全中国各行各业拨乱反正的大潮之中，率先引爆了轰轰烈烈、震惊全国的大回城运动，推动了全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最后解体。

必须指出的是，云南知青运动随着文革破产而消亡，但不是自动消亡的，也不是某位救世主所恩准，而是通过顽强的抗争，最终得以实现的。

3.2. 狂欢与苦役

昆明知青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从1969年春节前的1月31日开始。作为运动的先声，此前曾有北京知青“55人先锋队”于1968年2月先期下到西双版纳的“豪举”。先锋队的“领头大哥”叫李镇江，后来成了云南省革命委委员、团省委副书记。李，高中学生，略带红色血统，满脸络腮胡，壮而硕，一看而知为精明干练人。1966年北京红卫兵南下串联，李与几个同学到达西双版纳，被云南风光深深吸引住了，立志要在西双版纳安家落户，为祖国橡胶事业作贡献。1967年11月27日，他们获悉周恩来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火速赶到现场，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写下誓言，趁周恩来休息时递了上去，报告称：

我们……深切地了解到云南边疆非常有开发前途，尤其是四大工业原料之一：橡胶生产更需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去开发。我们向毛主席、向党、向人民、向革命前辈立下誓言：为加强国防、保卫祖国、打败帝国主义，为了给中国和全世界人民争气，我们自愿到云南边疆做一名普通的农垦战士，为祖国的橡胶事业贡献自己的毕生精力！等中央首长一声令下，我们就奔向战场！

事情就这样开始了。只是，后面的故事绝非“55人先锋队”这样浪漫。革委会成立了，毛泽东急需稳定新的政治管理体制，反正接下来的“革命”没娃娃们什么事了。红卫兵、造反派组织都已解散，学校停课多年积压下的数量巨大的、无法就业的“老三届”中学生继续留在城里纯属非安定因素，于是，1968年12月22日毛泽

东发出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一场轰轰烈烈而又无比悲壮的知青下乡活动就此拉开帷幕。

1969年1月下旬，云南著名的“划线站队”惨剧刚刚开始，在北京参加全国跨省区安置下乡青年协作会的云南代表从北京打回电话告警，称：我们云南的动作太慢了，建议省革委，把昆明的知识青年数万人在春节前组织送下去。新成立不久、正如陀螺一般疯狂旋转的省革委按此建议，要求昆明市立马加以落实。昆明市革委立马发出“紧急通知”，宣布：“66至68级高初中毕业生3万余人，从本月31日起分批送往保山专区插队落户，争取春节前完成任务”。

1969年春节是2月17日，把3万人送去边疆离过大年仅余半月时间。云南古俗敦厚深沉。“三十晚上大团圆，初一、初二拜大年”，但是，在文革严苛的政治任务面前，“团圆”“拜年”已经不再重要。各学校军代表像组织打仗一般对老师、学生及其家庭进行军事动员。1月28日，首批下乡知青启程，昆明市隆重举行大会欢送，全市各校师生及家长4万余人参会。省革委副主任周兴现场发表演说鼓动。2月9日，昆明市再组织声势浩大的壮行活动：全市32所中学、2000多名下乡知青乘坐近百辆带有挂斗的货车，排出近2公里长龙，先集中于小西门，继而沿东风西路转回市中心，沿三市街、金碧路、青年路再转到文革喧嚣的政治中心检阅台，重新向西，出南屏街、东风路一路向滇西边疆进发。路两旁送别人群牵衣顿足，广播车、喇叭声与人声交响，喧嚣呼喊之声直干云霄。

此后数日，昆明知青如开赴前线，日夜兼程。有的匆匆吃过年夜饭便告别了亲人，有的在路上过年，有的甚至准备到了目的地参加农民新春年节。官方统计，除了春节前的集中遣送，至是年5月底，全省共遣送完成13.9万昆明知识青年，加上北京和上海知识青年1.2万人，成果辉煌。

笔者其时刚到保山工作，每日里但见滇缅公路被牵成一线的卡车碾得尘土飞扬。卡车前头一律毛泽东画像，车厢上红旗漫卷，车厢两侧挂大红布标“八二三战士会革命，八二三战士会种田”，也没有挂红布标的，气势猥琐者，则定为炮派学生所乘坐了——总之，一派蔚然大观。

可惜，追随领袖的狂热很快便被残酷现实击碎。云南边疆本系少数民族聚居的贫穷之乡，农业生产水平低下，生活普遍困苦，绝非“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而是单靠工分难以填饱肚子的漫

长苦役。有统计数据对插队知青生活问题（主要为吃和住两方面）做了个横向对比：云南插队知青在生活 and 住房及生活自给水平，在全国均倒数第一。直到1973年，云南全省插队知青2.72万人，生活自给的才仅有5400人，占20%！

面对如此困境，于是很快出现了前述施子杰、丘林和吴先明绝望中徒步逃离回乡，被冻饿所困，死于高黎贡山的惨剧。还有谣传几名想回昆明又无通行证的知青，躲藏在空油罐车里试图混过怒江桥边检站而被闷死的故事，让企图返回家乡的知青闻之色变。

对于昆明知青（关于其他省市的知青，留待下面再说），当时逃避苦役和灾难最现实可行的路径，一是找关系招工参军，量更大的则是“病退”与“困退”。云南地处偏僻，经济落后，与发达省份相比，城镇人口本身少得多，知青招工就业的机会相对就多些。作为本地人，昆明知青可调动的社会资源和人脉关系丰富，于是纷纷往此窄路拥挤。不少昆明知青果然在两年左右便纷纷得以招回收城。

所谓“病退”是因下乡时未做过体检，于是按规定，下乡后只要持县以上医院病情证明者，便可办理“病退”。“困退”又称“家照”，系指家庭困难确需照顾，一是父母老、弱、病、残需要照顾；二是家庭经济负担沉重者。这两把尺子虽然诱人且弹性很大，但没有过硬关系者，要想过关亦难于登天。云南党史专家杨新旗如此记录他查阅档案时的感受：

一本本沉甸甸的申请表，每一份上都盖满了逐级上报的图章和签字。如一张“病退”申请表上要附有县以上医院检查诊断的详细材料和诊断意见、贫下中农讨论意见、县“再教育办”处理意见、专（州）级审批意见、动员地区安置办公室审批意见，要盖5个章。没有病想通过这种途径回家，那只有把自己弄“病”。有的人吞异物，让医生也弄不懂是什么病；有的有病不去看病或看了病开了药而不服药，拖延病情；有的乱服药，有人甚至采取自残的极端方式把自己弄残，或把手脚砍伤，或把自己的手指砍去。一张张回城的“船票”，颇费周折而且很残忍。有的知青靠自己和家庭的社会关系，托人送礼，有的打通医院环节，请医生开具假的病情证明书等等，昆明知青通过这种方式回城的最多。^[1]

[1] 杨新旗：《知青上山下乡在云南》页32，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13。

据1969年到1971年12月统计：到保山（含德宏自治州）插队22699人，用上述方式退回1482人，其中“病退”1279人，“困退”203人。1972年到1976年全省“病退”“困退”9878人，其中昆明7986人。昆明知青的成功战法让其他省市来滇知青慌了神，虽欲复制，却缺少本地人资源，成功者寥寥，只能另寻出路。故而当时有如此一说：“昆明知青（回城）靠大夫、四川知青靠丈夫，北京知青靠父母，上海知青靠受苦”。

3.3. 真相浮出水面

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毛泽东为揭露林彪的所谓“反革命罪行”，毛泽东决定发布林立果一伙炮制的所谓“571工程纪要”供国人批判，不料文件下达，效果适得其反。对于知青而言，“纪要”所说“知青下乡等于变相劳改”正好道出了知青和家长们的心里话。1972年12月20日，内外交困的福建下乡知青李良模的家长、莆田县小学教师李庆霖忍无可忍，终于斗胆上书毛泽东反映儿子的乡下苦状。1973年4月25日，毛竟然亲笔回信，还寄人民币300大元“聊补无米之炊”。此信虽则意表君上恤民的仁爱之心，却让知青及家长郁积既久的怒火忽然喷发。“李庆霖的名字全国家喻户晓。他的这封信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两千万知识青年的生存状况。”^[1]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知青饱受虐待的事件，随之浮出水面。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组建于1969年10月，由昆明军区、云南省军区和云南省革委会共同领导。接收安置城市知识青年是为兵团主要任务之一。据统计，上海来滇知青55874人中有46350人到兵团农场。还有成都知青16625人、重庆知青24257人、北京知青8385人。昆明知青不超过2万。

毛泽东致李庆霖信件发布后1月余的6月20日，国务院紧急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会议期间反映出大量知青遭受迫害的事件，云南兵团的情况尤为触目惊心，4师政治部统计，所辖18团31个单位有23个单位发生过捆绑吊打知青的事件，被捆绑吊打的知青达99人，许多人被多次吊打。捆绑吊打的手段有29种之多，例如，“吊半边猪”“猴子捞月”“背扁担”“跪劈柴加踩杆子”“老牛扳桩”，捆绑后用钢筋搅紧，吊在空中往墙上撞，还有烤

[1] 张玉钟：《我知道的李庆霖上书毛主席的一些情况》，《炎黄春秋》2009年第1期。

太阳、浇冷水等等。目击者反映，吊打时，有的头破血流，有的哭喊连天，有的放到地上已经气息奄奄……其情惨不忍睹。新华社云南分社记者采写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4师18团摧残迫害知识青年的情况》让周恩来大为震怒，当即批示：“此等法西斯行为，非立即处理不可！”

4师18团基本上都是重庆知青。“重庆崽儿”素以性格暴烈著称，在此山高皇帝远的蛮荒之地，自然皆成土官儿们眼中的刺头儿，必欲重典处置而后快。“捆绑吊打、管卡扣罚、纪律处分”成了压知青头上的“三块石头”，《知青上山下乡在云南》一书记录了如下几例：

一例：知青杨某刚从重庆探亲回来不久，因被诬为窝赃，被“学习班”轮番审问，逼他站了三天三夜，5天不让睡觉。杨屈打成招，承认“赃物”被装在塑料袋中用石头沉到河里。于是，他又被押去红河边，用绳子拴住双手，由两人在岸上拉着令他下河寻找，摸不到，上岸后又是一阵毒打。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跳河，往越南方向游去，又被截住，未待上岸，就被追上来的人一棒敲倒，拖了上来，被结结实实捆押到营部。5天后，杨揭瓦越墙从房顶是逃出，逃回重庆。

一例：一营知青王某偷杀了一条狗，被营部生产基地负责人抓去毒打后，令其身披狗皮、手提狗头到7个连游斗，关押半月，扣20天工资。

又一例：某知青在开大会时放了个响屁，连里竟下令当场把他捆绑起来批斗，理由是“污染了空气”。

女知青则多一层恐惧：人民日报社编印《情况汇编》特刊《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知识青年工作中存在的几个问题》中说：全兵团23个团中，据8个团的不完全统计，干部利用职权逼婚、诱婚、奸污女青年的案件达49起。这些案件多数未做严肃处理。一些师、团领导只当作一般男女关系，不做严肃处理，致使一些女青年很害怕，感到压力大，有的想自杀，有的倒流回城市。对强奸女知青的事，有干部说：“男男女女这么多，难免不发生问题。”把奸污迫害女知青看成是一般男女关系问题。有的人还倒打一耙，说是女方的“作风不好”“送货上门”，是“化成美女的毒蛇”“腐蚀干部”“拉干部下水”等。

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把中央领导的批示和《云南生产建设兵团4师18团摧残迫害知识青年的情况》等材料印发，并要求与会各组学习、讨论。与会者一致怒遣这些惨无人道的法西斯行为“惊心动魄”“令人发指”。7月8日，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等听取会议

汇报时发令：那些搞歪风邪气的强奸犯、杀人犯、坏分子等，要枪毙几个。对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坏人，要杀一儆百，杀一儆千。

云南省委、昆明军区党委接到中央领导人批示，及时作出《关于学习中央首长7月6日批示的检查报告》；8月11日，继而上报《关于调查处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4师18团等单位摧残迫害知识青年问题的报告》，报告称：“类似这种问题，不仅18团存在，在我省建设兵团的其他一些单位也程度不同地存在，有的甚至比18团还要严重。”“全兵团共发生捆绑吊打知识青年的1034起，受害知识青年1894人。”后又称：“据不完全统计，兵团组建3年来，发生捆绑吊打知识青年的达2613起，参与的干部1216人（其中，现役322人，地方干部894人），有2人被活活打死，18人被打伤致残。干部利用职权，奸污摧残女知青215人（其中，现役军人114人，地方干部101人），受害女知青240人；调戏、猥亵女知青的干部139人。”逮捕奸污犯18人，打人罪犯8人，行政看管、撤职查办和离职审查的39人。11月公判死刑3人，死缓2人，无期2人。4师222名干部犯捆绑吊打错误，203人多次公开检查，主动向受害者赔礼道歉；1师犯捆绑吊打的干部，90%以上做了检查和赔礼。11月28日，省革委、昆明军区在景洪县召开“坚决打击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犯罪分子宣判大会”，参加大会的有2.3万余人，14万余人收听实况广播，宣判“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张迪青、贾小山、张国亮等5名罪犯死刑，其中2犯缓期两年执行，2名罪犯无期徒刑，被判刑的干部有26人（现役军人13人），组织处理77人。

云南知青问题已如遍地积薪，只需要投去一粒火种，就会燃起熊熊烈火。全国知青会议后当局的这几次杀伐决断，不过聊治些表皮痛痒，问题的总爆发只是延期而已。

3.4. 自我救赎

最后点燃这堆干柴的，不是脾气暴烈的“重庆崽儿”，偏偏是温文尔雅却精明过人的上海知青。1978年底由他们掀起的“我要回家”大返城运动的成功，终于彻底终结了全中国让1700多万知识青年离乡背井、时间长达十多年的上山下乡运动。

上海知青发起这场运动的时间恰到好处：文革破产了，所有领域都开始“拨乱反正”。知青们认为将他们赶下农村就当属必须“拨乱反正”的大事。北京高层非常清楚事情之严重及尽快找出解决方案之必要。1978年，副总理李先念曾说：“上山下乡的老办法搞得‘四

个不满意’（指城市、农村、家长和知青本人都不满意），是‘公公背儿媳妇过河，出力不讨好’。”据说，知青回城风搅动前夕，北京已计划在坚持稳定大局的前提下，着眼于少下或不下，调整安置办法，逐步从根本上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还有，农村经济管理体制已经开始变化，有些地方的农民已经拒绝接收知青。地壳下沸腾多年的岩浆，终于在这个时候喷发了。

生产建设兵团（农场）之所以在知青颤动的地震带成为火山喷发口，是因为插队的知青生活和收入虽无保障，但所受制约相对少得多，只要有办法，“病退”“困退”，招工之类的路子总还有机可寻，而这些路子在半军事化管理的建设兵团则完全被堵得死死。回城无望的“兵团战士”编了一则顺口溜：“插队插队，越插越对；插场插场，越插越长；改变现状，只有上访。”，百般无奈之下，罢工、请愿的风潮在全国各地农场此起彼伏。

云南农场知青成了领头羊，还因为西双版纳涌现出了一个领军人物：丁惠民。

丁惠民，景洪农场十分场职工，上海知青。和所有知青一样，他们在文革骚乱中长大，心中早埋下了对社会戏剧性快感的渴望。只是丁惠民好冲动，更机敏，有一种近乎疯狂的激情，有胆识而执拗，且能言善辩……总之，所有煽动群体闹事的领袖所需要的素质，他都具备了。事实上，回城几十年，他一直以知青“维权代表”自居，成了一个永远不愿消停的“职业革命家”和殉道者，同时也成为当局严防死守的“维稳”对象，虽被多次拘押、劳教，依然九死而不悔。女儿丁一在某次父亲被抓之后，曾如此写下了她的眼中的“知青领袖”：

我爸爸整日就是一个忙忙碌碌、到处奔波的人。他的心里装的全部都是“知青”，没有想到还有一个家，还有老婆和女儿。

爸爸一生为之奉献的是“知青”，可是知青都是穷朋友，他们都处在弱势群体的位置上，身体好的可以赚钱养家糊口，身体不好的，往往连工作也找不到，没有工作的还要养家糊口，还要交纳养老金、社保金、医保金等等，每每遇到这种人来哭诉，爸爸还会拿出钱来慰问。妈妈生气就生气在这里：你自己都没有承担过家里的生活负担，还要去管别人，难道你是一个包打天下的英雄？可是爸爸老是说，我们家又没有负担，比人家的生活好多了，爸爸的比就是这样比的，他一直与和自己生活条件差的人比，

从来没有和那些家庭条件稍好一点的人家比。

不管我的爸爸是什么结局，不管他今后会判几年刑，我相信我爸爸是一个好人，他无罪！我爱我的爸爸！

知青战友们的印象则是：今天的丁惠民“依然活在那个时代。”“相信凭着自己的一己之力可以呼风唤雨”。他们劝告丁：“尽管你是当年的知青领袖，但现在已经不是我们的时代了，你要牵头这么做，就无异于陈胜、吴广，最终成功的一定是刘邦、项羽，而不是你。”^[1]

不管对丁怎么评价，中国知青史进入1978年，注定轮到丁惠民和他的战友们登台表演了。

是年10月18日，丁惠民给“邓副总理”写了一封《公开联名信》。信称：当知青已经是第8个年头了，“日长年久，逐渐形成回乡的想法”，“特别是近两年来，更加朝思暮想”“人心思归”成了一股无形的潮流。

信中反映当时知青的情况：有的“走到了犯罪的道路”；有的“追求享受，热衷于吃喝玩乐，产生偷盗、赌博、打架滋事的生活作风”；有的“对生活和前程失去信心、麻木不仁”，有的“草率早婚，把自己圈在小家庭内”；有的女知青“为了离开农场，纷纷到外面寻找对象，匆忙地结婚了事”，造成农场男多女少，引起男青年思想的极大波动；也有的知青擅自离开农场，一去不返，长期待在家中靠父母供应衣食，荒废了自己的青春年华；有的知青已经“走上领导岗位”，也“精神不振，干劲不大，也想回到自己的家乡”等。他代表农场知青“以最诚挚的心情”向邓副总理“恳切呼救”，帮助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

就在这当口，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发生的一桩偶然事件将知青的愤怒推向高潮：11月12日，上海知青瞿林仙^[2]临产，而分场卫生所所长陈某，却忙于参加酒宴，以至于婴孩落生，胎盘长留体内，产妇出血不止而无人施救。待“兵团战友”抬着剧痛不止的产妇沿山路从连队颠簸至分场，再渡过澜沧江往总场医院送时，死神已先赶到——产妇大出血，死于崎岖山道之上。

[1] 余杰：《渐渐消失的上山下乡》第四章：“终结·知青权益的殉道者”。

[2] 瞿林仙，上海市南汇县新场镇人，70届初中毕业生，于1971年插场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1师四团（即云南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一般文稿多将其姓名写为曲玲仙或徐玲仙。本书从瞿林仙的丈夫翁仕贤之说。翁的说法见施大光：《“徐玲先”被抬尸游行真相》一文。

人们于是继续抬着死者尸体前行去农场场部游行抗议，一路上知青陆续加入，并提出彻底改善知青待遇，放行病退、家照、商调回城等等要求。人们甚至决定把瞿林仙的尸体抬到西双版纳首府景洪游行。

怒火已然勃然而起。12月18日，丁惠民再给“邓副总理”写第二封信，称：知识青年深受上山下乡的运动之害。“这一切的根源在于‘四人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为了‘缩小三大差别’，但事实恰恰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还更进一步地扩大了、加剧了差别。贫下中农和当地群众对上山下乡‘起先是欢迎的，但后来就不那么欢迎了，甚至还闹起各种矛盾’”；经济上，“上山下乡也同样是得不偿失”，是“不按经济规则办事”；在接受再教育方面，“我们到边疆这几年中，实际上只不过干了各种笨重简单的体力劳动，思想上的教育很少”。第二封信还提出发展工业化解决就业问题、办事要讲经济规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等呼应当时全国各行各业都在关心的话题。接着，他还著文《我们的心声》，号召“每个正直的青年都应签上自己纯洁的名字”“滴水成海，心齐山移”，要造成声势，让邓副总理听见他们正当的呼声。丁惠民振臂一呼，顷刻应者云集，知青们奔走相告，连夜抄写张贴《给邓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和《我们的心声》，并签下自己的名字。西双版纳农场知青争取“回家”的抗争活动就此拉开大幕。

曾几何时，上海滩头漫天狂舞的大字报、大标语、骚乱和狂欢，为上海知青做了精神启蒙。只不过这一次不是为了模仿当年大人们虚无缥缈的理想疯魔，而是为自己的命运抗争。他们的目标很渺小却很实际，那就是回家。有勇敢者揭竿而起，有日思夜想的家乡在召唤，曾经被重庆、成都知青嘲笑胆小怕事的上海知青，顷刻间变得力大无穷。而所有这些，无不紧扣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的思路：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

丁惠民第二封信发出5天后，《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让人振聋发聩的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其主要观点竟与丁信的观点惊人相似，这为知青们争取返城的热潮火上加油，也为丁惠民赢得了巨大的敬意、信赖和支持，当月，就有6378名知青在信上签了名。

没有必要再起早贪黑去荒寂的野山服侍那些已然成林的橡胶树了，知青们的当务之急是写大字报、刷大标语、抗议、集会……表达急切的回乡之情。11月下旬，先是勐腊农场八分场、六分场，接着是橄榄坝八分场、二分场、三分场正式罢工。12月12日，以丁惠民为首，版纳8个农场的知青代表负责人召开会议，成立赴京

请愿指挥部，宣布总罢工。13日，版纳各农场20000多人罢工，占版纳农场知青总数5.3万人的40%，其中，橄榄坝知青罢工工人数达4000多人，占总人数的90%。

罢工次日，省委旋派工作组赴版纳各农场开展工作无果，知青认为此事地方政府作不了主，于是抄了农场干部的家、殴打农场干部……农场指挥系统瘫痪，知青控制了广播室、文印室、交通车、食堂……广阔山林，但有鼓动、宣传、签名、捐款，罢工、请愿之风蔓延急卷。此风从版纳迅速扩展到德宏、临沧各农场，临沧孟定农场的知青甚至开始绝食，要求国务院工作组现场解决问题，他们提出：“团结起来，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还我青春，还我户口！”他们成立了“知青请愿委员会”，起草了《告孟定农场全体知青书》，12月26日，知青们汇集孟定街，正式成立“请愿罢工委员会”，宣布罢工。

第一批请愿团是从景洪出发的。时间是12月16日，由43名知青代表组成，由团长黄玉海、副团长涂清亮、邹新德带队，4天后到达昆明，打出红旗布标——旗名：“西双版纳知青首批赴京请愿团”，标语：“我们要见华主席”。请愿队员携带着笔墨、纸张、油印机、照相机等宣传用品。沿途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发表演说，控诉受林彪、“四人帮”之害而被骗来云南，要求“拨乱反正”。请愿团途径墨江县，装有经费的袋子丢失，到昆明募捐不足，不得已强闯昆明站，强登开往北京的62次列车和开往贵州的302次列车，致使62次车迟迟不能发车。国务院急电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派负责人出面说服，如说服无果，可让知青派代表数名来京。省委副书记薛韬传达国务院指示，要求选派代表无果，知青代表39人再冲站台，与工作人员发生肢体冲突，知青代表受重伤一人，轻伤五六人，于是全体知青代表卧轨拦车，宣布绝食。

第一批代表正在昆明与行政当局硬磕死缠，留守版纳的丁惠民却率56人组成第二批上访团“暗度陈仓”，于12月18日悄然出发，27日顺利到达了京城。12月30日，农垦总局、国家劳动总局、国务院知青办、共青团中央的相关人士会见了请愿代表丁惠民一行28人，谈判顺利进展，由农垦总局起草复工通知和一封给知青的公开信。新年次日，上访团留京10人，其他人员分为两组，分别去上海和重庆，把先前派去那儿的成员接回云南。1979年1月8日，丁惠民代表上访知青从北京电告，罢工结束。

知青苦农久矣！而今逼上梁山，初获胜利，只能继续狂呼向前。云南省委除了向中央告急，别无他法。1979年1月12日、13日、23日先后发出《关于解决国营农场知青问题的请示报告》《关于贯

彻执行中央[1978]74号文件统筹解决云南国营农场知青及有关问题的通知》等3封特急电报，向中央建议：“根据对知青问题统筹解决方针，建议：除愿意留在农场的以外，不愿留的，可以随着国民经济情况的好转，逐步加以安排。1972年以前下去的知青，在近两年内由原籍省市采取招生、自然减员顶替、病退、困退和协商调动等措施，有计划有步骤地调出农场。”又称：国营农场知青闹事“仍平息不下来，每日仍有成批知青自动离开农场，农场领导实际已经瘫痪”。农林部副部长兼国家农垦总局局长、国务院知青办副主任赵凡，亲率调查组来到遥远的勐定农场。时间是1月10日下午4点。赵凡在回忆录《忆征程》中记录了知青罢工、绝食的现场情况：

当时那里已经聚集了許多人，据有关人士说，大约1500人。正要安排我讲话，忽然前面的一些青年跪下了，发出一片哭声，后面跟上来的人也都跪下了，我从来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面。待大家镇定了以后，我做了短暂的讲话：“我既是国家工作人员，也是知青的家长，我有四个孩子，三个在农村插队，一个在工厂做工。我能体会你们的处境和要求。我将负责地把你们的情况向党中央、国务院反映。你们首先要回到工作岗位上去，给领导以解决问题的时间。”

赵凡时年62岁，发表讲话时，他老泪纵横。知青们为他的真诚报以了雷鸣般的掌声。^[1]

接下来，国务院来人和云南省委常委，以及四川、上海派员共同研究多次，又把各农场党委书记等150多人集中在昆明开会，共商解决问题的办法，根据大家的意见，用云南省革委会的名义起草了一个解决问题的通知。这个通知就是《关于贯彻执行中央[1978]74号文件统筹解决云南国营农场知青及有关问题的通知》。该《通知》最重要的内容第一条：对于“实在不愿留下的”农场知青，由原籍省市分期分批：1.办理病退、困退；2.父母退职退休的，可由子女顶替；3.劳动力多余的，进行调工；4.从农场参军又复员到原单位的可调到父母所在地安置；5.上海郊区的农民（知青），按

[1] 赵凡先生真诚的态度和实实在在的工作，对解决知青矛盾起了有益的化解作用，被知青们感激地称为“恩公”，2003年，成都知青还决定为他建造功德碑，因赵本人婉拒作罢。2010年4月赵凡去世，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昆明等地知青们举办活动，均自发向老人家默哀。

上海市革委意见，回原籍当社员。

1月23日，国务院召开紧急会议商论处理云南农场知青“闹事”问题。余秋里主持会议，王震、陈慕华、谷牧、王任重、康世恩诸大员出席。会议同意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提出的6条意见和云南省委提出的“12条”建议。决定一出，如水坝之开闸，云南农场知青大规模离场返乡的潮流奔腾汹涌，无以阻挡。云南省农垦总局统计，从3月起至5月止，已有61515人返城，占农垦知识青年总数的94%，占职工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勐捧农场有13个队全部走光，东风农场4000亩投产林无人开割；西双版纳分局，生产队干部走了22%、机关干部走了38%、中小学教师走了71%、医护人员走了67.5%、驾驶员走了71%、割胶工走了78.6%，支付知青路费补助费2000余万元，农场职工总数下降了47.2%，农场各行业人才断档，土地荒芜，数年后才渡过难关。

3.5. 异域梦断^[1]

如果说，上海知青的抗争最终让上山下乡的荒唐戏剧尴尬落幕，那么，云南知青还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参加缅共人民军的群体。这些为数不少的知青最终走出文革阴影，却是一出无奈的悲剧。

中国文革狂热直扑东南亚，毗邻诸国政府无以为对，先后掀起排华浪潮，其中尤以缅甸奈温政府为甚。1967年，中缅正式断交。此前因革命受挫而败走中国、匿迹销声于四川、贵州的缅共骨干^[2]于是趁机回国拉杆子再战，在中缅边境孟古地区建立东北军区，放言二三年内解放缅甸全境。

云南知青大规模上山下乡，正好与缅共雄心勃勃的发展时段相重叠。昆明知青多安排到中缅边境的潞西（芒市）、瑞丽、畹町、陇川、盈江一线。边境线上随处可见“打倒奈温政府”“支持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之类的标语。面对象征“世界革命”的缅共军队的热闹红火，对比枯燥苦累的农耕日子，年轻知青焉能不动心？特别家庭出身“黑五类”贱民或父母有各种“历史问题”者，还有

[1] 本章参考书目、文目有：李齐翔：《殉梦》、王曦《红飞蛾》、石磊《守望金三角》、韦琪网文《缅共与中国知青》、凤凰网专稿《60年代中国知青为避斗争喋血金三角》（2010年12月29日）等。

[2] 这些骨干均以“归国华侨”身份安插在川、黔山区的“三线厂”当工人，不少已和当地女工结婚生子。

“站错队”、遭遇不公正待遇者，既然在国内已看不到出路，干吗不跨界而去，到“世界革命”的烽烟战火中寻找改变命运的机会？

距潞西县城近百公里的芒海有一条名叫孟古河的小溪，中缅天然界河，宽不过10米，脱鞋卷起裤腿便可涉水而过，故而这帮跨境从军的“国际主义战士”被人戏称为“裤脚兵”。据曾进入缅共高层的知青李书明回忆录载：从1969年到1970年间出境参加缅共人民军的中国知青，仅昆明就有3000余人，此外还有北京的、上海的、四川的、重庆的……总数达万人以上，最多一天曾创造接纳中国知青600人的纪录。缅共新兵营成了中国知青的天下，彼此互报校名姓名，立即亲如一家。缅共人民军不仅有“知青旅”，各营亦自有特色：303特务营老高三知青多，颇显书香子弟之风，被戏称“秀钉子营”^[1]；3031营以插队瑞丽的昆明知青为主，他们背倚瑞丽江，在自家门口打仗，戏称“门槛猴”；3032营大多为初一至初三的四川人，性格暴烈，特能喝酒，戏称“火枪营”；3033营的昆明知青常年钻山沟打游击，俨然“兵油子”，不修边幅，人称“痞子营”……此外还有一“娘子军连”，100多女知青，抬伤员、背机枪、扛弹药，端的个巾帼不让须眉。

中国知青的大量涌入让缅共迅速进入高潮期。中国知青手捧“红宝书”，依例“早请示、晚汇报”，在缅共发动的历次战役中冲锋在前，面对枪林弹雨毫不畏惧，牺牲时高呼“毛主席万岁”，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黄继光、王成般的英雄传奇。可叹者，缅共的战役发动草率，战斗组织乱无章法，1970年，缅共以主力部队发起南下战役，攻打缅第二大城市腊戍，竟中官兵埋伏，全军险遭覆灭，幸得番号为3035的知青营断后方得以突围，主力部队折损过半，数以千计新兵殒命，伤者不计其数。敌人随即发动大规模围剿，革命根据地一下子丧失了三分之二。死难知青忠骨无存，姓名渺然，侥幸保存下来的遗体，亦只能用军用塑料布胡乱包裹，掩埋于异国的荒烟蔓草中。

3033部队19岁的昆明知青王伟国之死与巍巍笔下《谁是最可爱的人》中的情节酷似：突击腊戍火车站的第一声巨响，就出自这个年轻的火箭筒手。按规程，火箭筒应匍匐地上方可发射，但王一看到目标便顿然兴奋，站立着近距离扣动扳机，一声巨响之后，内燃机车头机头被炸毁，四散的弹片疾飞而来，将小王的喉咙和颈动脉割断，血喷如注，当场殒命。还有被政府军包围、无路可逃者，

[1] “秀钉子”系昆明土话，酸文人之意。

均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其声画与中国革命战争片中的镜头如出一辙。

类似的“英雄”还有的昆明知青康国华，康父因系“大资本家”而被遣送乡下。不满19岁的康插队腾冲，深感前路渺茫，在乡下仅挣了几天工分便断然从军缅共。他希望在战场血火中改变“贱民”后代命运。没承想，舍身异域的虚妄悲剧正悄然等着他：1971年9月9日凌晨3时1刻，康在一次战斗中跳出战壕，向敌军痛快扫射，手中的机枪枪口正好被敌人枪榴弹击中并爆成碎片，康国华后来回忆：“一声巨响，我身体震了一下，满眼都是金星，我意识到糟了，连人带枪掉下来，没有了知觉。”他被送到昆明军区总医院疗伤，时任缅甸副主席的德钦巴登曾亲自去看望，称他为“缅共的保尔·柯察金”。康国华荣立一等战功，成为缅共东北军区的战斗英雄，后来还官至缅甸中央医院副政委、党委副书记。可是从此只能生活在黑暗中，一副墨镜始终替他掩盖着深陷的眼窝。

同样属于“狗崽子”的昆明21中知青王曦要幸运得多。1970年5月19日，他涉过孟古河，随身行李只有两本书《革命烈士诗抄》和艾芜的《南行记》。这一天是他20岁生日。第二天，又恰逢毛泽东著名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5·20声明”发表。他穿上了和解放军服装差异不大的绿军装，拿起了沉甸甸的M21半自动步枪，彻底告别饱受压抑的插队生活，成为一名“光荣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王曦在前线待了15年，经历大小战斗无数，幸运地一次次与死神擦肩而过。雷门伏击战，王曦这个从来没有打过炮的炮兵，凭借自己的勇敢，荣立二等功。一年后，他火线入党（缅共）并提干，这是在国内他做梦都不能想到的荣誉。南下战役惨败，他随部队一起转战到远离边界的萨尔温江以东，历任4045部队炮连战士、营部文书、连指导员、五旅政治处干事、五旅作战参谋、042部队政委、68师教导队主任、68师保卫处长等职务。

常春光“血统”要高贵得多。父亲曾在延安中央警卫团供职，随解放军南下云南，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后关进“五七干校”改造。插队边疆的常春光决定去缅甸投身国际主义的解放事业，用牺牲来证明自己革命血统的纯正。他主动要求加入最危险的特务营侦察连，和所有从小受电影《上甘岭》《英雄儿女》熏陶的知青一样，打仗时都如电影英雄一般将挺着的半个胸口露出战壕，可惜第一次战斗就让他发现电影和现实完全两样：一番对射之后，常挺起身子想看对方枪弹从哪里打来，老兵一把将他掀去树后卧倒：一阵重机枪响过，小常刚才探身的战壕已被敌方枪弹削出了一条深沟！某次

战斗，常头部被弹片击中，鲜血染红了双眼，他心里一横，抄起枪就跳出战壕要与敌人拼命，幸得4名战友将他死死拽住，用担架抬下了战场——他很快加入了缅甸共青团，接着加入了缅共。

李寒的父亲完全属于常春光父亲敌对的阵营。李的爷爷胡瑛是云南辛亥元老，父亲在滇军帐下任少校参谋，1949年虽参加了和平起义，而后还在云南文史馆当了新政权的“花瓶”参事。只是文革期照样没逃脱收监劳改的厄运。于是他带着同为知青的妹妹于1971年夏天一道加入了缅共人民军。南下战役失败后，1971年11月初，缅共人民军东渡萨尔温江，向滚弄发起攻击。李寒所在的人民军404一营九连与缅甸政府军王牌第99师遭遇，凌晨战斗打响。李寒回忆：“子弹从上面、下面射上来，因为我们是守在一个山顶，射上来的那个子弹从我们头上飞过去。什么都看不见。那个营部赶马的问我有手榴弹吗？我说有呀，他就说快往下扔！下面就是敌人。那一下我们打死了20多个敌人。”李寒正高兴着呢，对方炮弹忽然从天而降——政府军动用了重炮、飞机——双方顿时尸横遍野。李寒好友王羲所在的炮连也加入了这场战斗，王羲说：“炮响声很大，那么一响，兴奋感一上来，啥都忘了。是一种忘我状态，战场激情一下子就上来了”炮火过后，王羲赶到了硝烟弥漫的前沿阵地，但见战场一片狼藉，而被自己命中的目标尸积如山，王羲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

车矩（真名向廷发，昆明第五中学知青，苗族）和石磊（真名石安定，昆明一中高三知青，拉祜族，）都是民族上层人士的子女，身上奔流着山林民族剽悍的血液。车矩在文革中就是群众组织的小头头，有组织能力和经验，最后升至缅共上层，甚至卷入了上层的残酷内斗。其他跻身高位的知青还有：中部军区司令员李自如（保山一中高三知青）、北佧县后勤部长周大福（昆三中高三知青）、中部军区参谋长赵国安（临沧初中知青）、中部军区副参谋长赵文兴（沧源佤族知青）、东北军区炮营营长赵文光（沧源佤族知青）、68师政治部副主任张越强（沧源佤族知青）、502营政委李玉成（沧源佤族知青）、042营政委肖国荣（沧源佤族知青）……

毕竟这是一场毫无群众基础、强加于人的所谓“世界革命”，它只能是企图在沙滩建筑高楼的荒唐梦魇，失败从一开始就是缅共的宿命。初到缅甸的王曦很快发现，作为佛教国家，缅甸信仰佛教的民众奉忍受害，对人与人之间的互斗、杀戮非常反感。“（我们）本来是去解放处于水深火热的人类，但到了缅甸一看，人家都是小康生活，自给自足，有耕牛、房子和碾米机，不吃杂粮，既没有阶级更没有压迫和剥削。”王曦感受最深的是在山里游击，看到坝子

上很多人家富丽堂皇，地板铺地，进屋还要换拖鞋，“我都不好意思进去，他们和我们过着天上地下的生活，我们是穿着补丁裤子过来解放他们的，心里意识到着实可笑。” 缅共在“解放区”进行“打土豪、分田地”运动，结果是让民众深受困扰，“后来人都跑得差不多了，而解放区却一贫如洗……”所谓“解放区”的百姓对缅共十分冷淡，甚至厌恶。具有理论知识且又经历过文革磨难的中国知青，很快从生死遭遇中醒悟。在这儿是改变不了命运的，未来的日子还是得回到故国寻找。

第一波返国潮出现在南下战役惨败之后。缅共革命陷入低谷，一些“革命意志”不坚定者、“机会主义”者、动摇分子和逃兵大量出现，有的部队甚至成班成排的逃亡。虽然为了统一思想，坚定信念，坚决打击一切动摇和破坏革命力量的坏人，缅共总部决定发动一场大清洗运动，“纯洁革命队伍”“强化专政手段”以反对“投降主义”和“悲观主义”“坚决和毫不手软地消灭一切反动分子”，游击队总部还模仿中国成立了“红卫兵”，对内部实行“大清洗”运动。“大清洗”运动使许多人遭到灭顶之灾：逮捕、坐牢、处决……从前那种团结和睦的战斗气氛不见了，代之以人人过关的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肃清反革命分子……到后来人人自危，总部“红卫兵”只需一个小小的理由，甚至不需要理由也会把人抓起来秘密处决。大批知青遭到逮捕镇压，“红色恐怖”笼罩整个游击队根据地。只是中缅山水相连，往来太方便了，既然可以随意地跨境投军，跨境逃回也就不会太困难。

1971年底，国内的知青政策开始松动，招工、当兵、上“工农兵大学”、走后门回城之风悄然而起，云南知青看到了人生变革一缕新的曙光，滇缅路上，返城的老知青们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冲着异国小路上踽踽蛇行的王曦诸人高喊：“喂！替别人当炮灰的同胞们，赶快回头吧，我们有救了。”大批退伍的知青纷纷丢盔弃甲，争先恐后地逃回原来插队的地方等候招工。除了如王曦这类家庭背景太糟糕，或者立了功，还想在战争炼狱中实现人生价值者，均乱纷纷回头登岸。

接着，踏着文革破产的节奏，那些有“问题”的家长们悄然被落实政策，受难的孩子也等来了团圆的日子。1974年，常春光提出退伍申请，回到中国原先插队的生产队，年底，得父母庇佑，小常终被招到昆明植物研究所工作。他说，他认识的阵亡缅甸的昆明知青就超过100人，能活着回来确实幸运。李寒父母落实政策要晚得多，直到文革破产后第4年，1980年春天，父亲出狱后才得投信寻人，而后每周给李寒一封家书：父子俩已15年没有见面……李寒

断然告别遥远的荒林与血腥的战火，踏上回家之路。分别时，父亲英气尚在，重逢时已颓然老者，宁不唏嘘！

中国文革破产，缅甸的革命也随之破产。器聚丛林多年，守善奉忍的佛国民众没有谁跟他们揭竿而起，二至三年解放全缅甸的欺人之谈在亚热带丛林的“革命实践”碰得头破血流。最要命的是，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的中国需要收缩力量解决自己的问题了，曾经慷慨的援外政策戛然而止。对缅甸的物资援助中断了，中方军事顾问团陆续撤回。中国军事顾问撤离时分，知青哭声响彻孟古河畔，这些失去了中国国籍的知青从此成为无根弃儿。煊赫一时的缅甸只能退居金三角，走上“以毒养兵”的堕落之路。1987年，缅甸政府元首吴山友应邀访华，长期蜗居北京的缅甸中央第五任主席德钦巴登顶不得不回到缅甸丛林充当“丐帮帮主”，最后在1989年那一场著名的“4.17事变”中被部下抓捕，用藤椅捆成的担架抬着“礼送出境”。^[1]

精明干练的昆五中知青车矩竟然很快适应了全新的诡异局面，并且在鸦片贸易的血盆里成了精明的“抓钱手”。他已于1976年10月结婚，落户于缅甸一侧的阿佤山密林，缅甸领导机关给了他一个六旅的番号，二百到三百人马编制，要他独立扩大根据地。车矩知道，筹集经费成了他必须解决的首要任务，有此经济基础方能在金三角丛林与缅甸政府军及毒枭坤沙集团夺地为王。擅长理财的车矩经营毒品的巨大收益让军人同僚眼红，1990年1月初，已获420师师长名头的车矩从昆明返回佤邦首府邦康，一过勐阿口岸，即被佤邦中央警卫团团长尼东率部逮捕。同时逮捕的，还有到口岸接车矩的所有人。车矩的铁哥们石磊时任420师后勤处长，开着420师仅有的一部吉普到口岸迎接，车太破，路也太破，途中莫名其妙碾死“兄弟部队”一头猪，双方发生纠纷，石磊只好先去处理这起“交

[1] 缅甸沿着中国云南一侧从西向东分别摆布着4个较大的民族地方武装(简称“民地武”)：一为克钦(中国称景颇)邦、一为佤邦，一为掸(中国称“傣”)邦，中间还有一个由汉人领导的果敢独立军(果敢地区原属中国临沧，1960年中缅划界，连人带地盘划归缅甸)。1968年缅甸重拉杆子之后，因有中国慷慨援助，这些“民地武”遂纷纷投入缅甸共帐下要钱要枪。文革破产后，中共不再提供支援，而“民地武”本身羽毛已丰，且对缅甸的“宗派主义”暗中不满。果敢军率先宣布脱离缅甸，并于1989年4月17日联合佤邦军事领袖策动政变，将缅甸主席德钦巴登顶及其它中央领导人一举抓获。克钦帮和掸帮亦紧接独立，一起投靠缅甸政府实行“民族和解”。百余缅甸中央委员被“礼送出境”，终成孤家寡人，寄身于荒野丛林。缅甸主席德钦巴登顶则再次亡命中国，1997年12月24日病逝于北京。

通事故”——偶然的“交通事故”救了他一命。车矩被捕，佻邦立即成立专案组对其进行了审查，并抄了车的家，指车矩闹分裂，搞独立，不服从指挥，车自知凶多吉少，遂越狱并被再次抓回。等到石磊处理车祸毕，再赶去囚禁车矩的北佻监狱，此时得知，车矩已经死了。

康国华于1987年回昆明安置妻女，本打算再返回缅甸，孰料得还未及出发，缅共就发生了政变。他只好滞留家乡。已是全民拜金时代，谁也不再关心他的“英雄”故事，“国际主义战士”的身份亦无人再提及。如今，这位从异国归来的、曾在缅共级别最高的中国知青，只是一个享受低保、一无所有的盲人。

缅共面临彻底瓦解之前，中国已经开始正视这些缅共老兵的性质、身份和退伍回国问题，并且出台了相关的接纳、回归政策。这些老知青早过了而立之年，他们曾经错过了当初知青招工返城的机会，错过了大学的校门，错过了更多不该错过的人生机会，现在，他们不能再错过这稍纵即逝的机会了。听到中国政府相关的政策，王曦哭了，如同无人认领的孩子找到了亲娘，他抓紧办了手续，名正言顺地脱离缅共。1985年，在离别故土15年后，官至正营级的王曦抱着两岁的儿子来到了浊浪滔滔的缅甸楠侬江边，开始逃亡之旅，用一个月时间流浪到萨尔温江以西的九谷，又在中国边境畹町镇，花20元人民币买了一个假通行证，最终偷渡成功，抱着儿子登上了开往昆明的长途班车。遥想当年踌躇满志，青春热血，回来时却行囊空空，心中顿生苍凉。唯一的安慰是，近千名中国知青的无名荒冢留在缅北荒凉的崇山林莽，而他尚能活着回家。是年5月，根据政策，王曦重新拥有了中国国籍、户口和一份养家糊口的职业。35岁的王曦开始在父亲曾工作过的工厂从学徒干起。工友都叫他“老团长”。

标志缅共彻底垮台的1989年4月17日政变发生于中国文革破产后的第13个年头；又半年，12月25日，罗马尼亚共产党领袖齐奥塞斯库被造反群众枪决；又两年，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国家：苏联宣布解体，接下来整个东欧的共产主义体系土崩瓦解。

跋：亲历者的使命

敲完最后一行字。我确信我完成了一件有价值的工作。心内轻松却并不踏实。以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书写这段时代，我觉得自己的笔太笨拙，又太沉重。莽莽撞撞踏进历史研究这片神圣之域，仅仅因为是被这段荒诞岁月裹挟而入的亲历者，冥冥中命运使然，责任使然，于是硬着头皮动起手来。几年来夙兴夜寐地写，寝食不安地写，不经意间，终得留下了面前这个文本。

我本是工科大学毕业生，好像成绩还不错，应该成为一个优秀工程师的，所惜命运捉弄，文革爆发，偏偏让我去陌生的政治斗兽场经历九死一生。遭受人生初次打击之后发配云南边疆，莫名其妙又到当地最高权力机构当了一回秘书。这该是让人羡慕的职位，我却不感半点荣耀，恰恰相反，丑陋的政治争斗和晦明莫辩的国家图景，让我一直心怀惴惴。我为自己的生命将消磨于如斯乱世而困惑，所幸突围逃离之中似有顿悟，确信做一个时代的书记员，我是办得到的。不需要更多条件，有一支笔和一颗真诚的心，就够了。自此，这成了我一生的宿命。

岁月倏忽，已然垂暮之年的我终得兑现了承诺：为历史留下了不少回忆文字——用自己喜欢的话说，为时代的履历表填写过一行注脚。未受过专业历史学训练，要直接、全相、毫不避讳地书写历史，即直接填写庞杂繁复的时代履历表，而不是作注，实为一全新的挑战。

幸好，我有那么多同样经历过那段劫难的朋友，他们非常热心地为我提供了辗转存留下来的丰富资料：记录成文的和躲藏在脑子里的。一位经历了“下关116大武斗（滇挺事件）”的朋友，得知

我的计划后专约了访谈，他凄然而欣慰对我说，如果没遇见我，他就只能把这段不堪回首的经历带进坟墓的。我省委办公厅做秘书时，胡延观曾是我的领导，他年轻有为而才华横溢，皆因爱揽事，成了官场争斗的牺牲品，85岁的他除给我介绍了许多官场旧事，还把近十万字的狱中“交代”给了我。同样，早已年过八旬的沈炳章曾以知识分子代表的身份参加中共“九大”，他把文革后囹圄之灾和流亡期间的全部回忆录交我作为参考。朱克家是全国知青达人，十届中央候补委员，直接参与云南省省委常委工作的，他毫无保留地给我提供了上层活动的情况；还有不少朋友或借或赠给我动乱岁月幸存的小报和传单：他们都是当初响当当、今天穷得叮当响的风云人物：汪首学、汤克文、刘光华、许少先、沈参雄、杨寿……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还有一些体制内担任职务大小不等的朋友（恕我姑隐其名）。没有他们的帮助，这部书是不可能完成的。在此一并表示我真切的谢意。

许多知名文革研究专家的鼓励，是本书得以完成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启之老师自始至终是本书的推动者；何蜀先生从文革史家的角度，热心地为我提供了所需的所有帮助；石名岗先生甚至对草稿的若干细节都作了仔细订正；陈永迪是在军队大院长大的文革研究者，更从他最熟悉的领域为本书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资料；高级工程师张振钧先生曾是滇南地区最早的造反领袖，除了自撰的回忆文稿，还专程回旧地为本书搜集了许多重要资料；四川从事文革小报研究的王锐先生，把他花数十万巨资购得的、关于云南的旧藏全部复印给我……我不是一个人在工作。很多朋友都站在我的身后，让我倍觉幸运和给力。

我还常常想起司马迁、想起斯宾诺莎和顾准，他们“掰下肋骨做火把，燃烧自己，照亮道路”的精神让我不敢丝毫懈怠。我生怕中国亿万人用血泪、苦难甚至死亡铸就的集体记忆被遗忘；亦生怕上帝在某一天会忽然将我宠召而去，来日不多，我担心我的使命功亏一篑：以亲历者和见证人的身份为历史法庭的最终审判，留下一段可信的证词。为此，我必须努力。

本书的写作，于我也是一个学习过程。除了懂得写史必得有翔实的史考、准确的因果判别这些基本要件，教科书式书写的基本知识乃一无所知。我只能一边读书学习，一边抢救和打捞这些破碎的痛史，并仔细拼接，并恢复它们的温度，让其变得真实而鲜活，让生活、挣扎、抗争其中、遍体伤痕的人们站出来讲述，按中国传统史学的主流写法，从政治大事件的角度构建云南文革的历史全相，为读者讲述一个个生动的故事。我不否认，在记录史实的过程中，

有关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的知识也一股脑儿扑面而来。我不愿回避我的人文关怀、理性认知和价值判断。德国客观史学鼻祖蓝克提出“历史是一门不折不扣的科学”，为了达到“完全的客观”，必须“消灭自我”^[1]。我坦承我办不到。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主张：“罔（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更何况，我的这些认知和判断，本身就是一个历史亲历者灵魂熬煎和拷问的思想伤疤，我希望它们和所记录的史实一样，作为历史的证词，一起留给未来的孩子们。

法国大革命过去200多年，研究著述汗牛充栋，至今仍频现迭出；纳粹第三帝国过去70多年，苏联消亡20多年，研究成果累累。文革破产刚过40余年，在文革的故乡就已成为公开的禁区；随着亲历者渐渐老去的次第归天，许多真相将埋入岁月的泥土而消融无痕。对于几千年来最为重视书面历史的中国，抢救文革史料，记述浩劫原貌，已成为刻不容缓的时代主题。俄国大师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我所受的苦难”。我已别无长物，仅有刻骨铭心的记忆而已。如果再不做这项工作，我真配不上所受的苦难了。咬咬牙，记下来，留给未来的孩子们吧！但愿这个匆促抛出的砖瓦，能够引来宝石美玉。

2019年10月3日 于昆明蜗居

[1] 见蓝克《世界史》一书序言

下卷参考文献

党史方志:

- 云南省委办公厅二处编印:《林彪死党和蔡雷马董》1974年4月24日。
-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云南“文化大革命”运动大事纪实》内部资料,(云新出2005212号)。
-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云南历史1950—1978》(第二卷),昆明,云南日报报业集团,2019年。
- 云南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云南省志》卷43“中共云南省委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
- 当代云南大事纪要编委会编:《当代云南大事纪要》,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
- 中共昆明党史研究室“昆明党史网(<http://kmds.km.gov.cn>)”:《昆明党史》。
- 中共玉溪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玉溪历史》(第二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
- 中共大理州委党史研究室:《大理州“文化大革命”运动》,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2年。
- 中国个旧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个旧市党史大事记》,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
- 昭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昭通市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
- 中共曲靖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曲靖地方史(1950—1978)》,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
- 中国共产党文山州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历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

- 中共德宏州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德宏州历史第一卷》潞西，德宏民族出版社，2001年。
- 德宏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德宏州志》，潞西，德宏民族出版社，1994年。
- 盈江县史志办公室编：《中国共产党盈江历史（1949.12-1978.12）》，潞西，德宏民族出版社，2010年。
- 云南省陇川县志编纂委员会：《陇川县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
- 中共保山市委党史地方志工作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保山历史（1925-1978）》，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
- 中共红河州委党史征集研究室编：《中共红河县党史资料》第三辑（党史大事记1950—1994），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
- 中共红河州委党史办编辑的《迈向21世纪的红河》，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 中共思茅地区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思茅地区历史大事记》，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
- 普洱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普洱历史》，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9年
- 丘北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丘北县志》，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
- 西畴县志编纂委员会：《西畴县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
- 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县志编纂委员会：《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县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
- 中共澜沧党史研究室：《中共澜沧党史》，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3年。
- 河口瑶族自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河口县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
- 巧家县志编纂委员会：《巧家县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
- 周敦仁主编（丛书编委）：《老同志讲历史讲传统丛书》，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
- 刘兴育编著：《历史的见证》（云大文革史料选编），昆明，云南大学党史校史研究室，2007年。（云新出（2007）准印字080号）
- （作者注：云南全省共17个州、4市、129县（镇），作者查阅的相关党史、志书计40余种，上面所列是其中一部分。）

公开出版物：

-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 杨继继：《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6年。
- 《历史的审判（续集）》编辑组：《历史的审判（续集）》，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年。
- 杨玉英编：《怀念周兴》，北京，群众出版社，2000年。

- 赵健民:《赵健民文集》,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2年。
- 鲁瑞林:《西南三十年》,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8年。
- 丁龙嘉、听雨:《康生与“赵健民冤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年。
- 七林旺丹:《向着金太阳飞翔——七林旺丹回忆录》,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12年。
- 刘树生:《脚步的回声》,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1年。
- 杨新旗:《知青上山下乡在云南》,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13年。
- 赵凡:《忆征程》,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3年。
- 《丙辰清明纪事》(刘白羽作序),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1980年。
- 《老同志讲历史讲传统丛书》(第一卷),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2年。
- 汪首学:《犟牛红卫兵》, 香港, 名人出版社, 2015年。
- 沙甸回族史编写组:《沙甸回族史料》中共红河州委宣传部1989年审定版, 1989年。
- 马绍忠:《民族工作之路》,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9年。
- 周孜仁:《云南文革笔记》, 台北, 台湾秀威咨询有限公司, 2015年。
- 东夫:《麦苗青菜花黄——四川大饥荒纪实》, 香港, 田园书屋, 2008年。
- 黄荣华口述、何蜀整理:《我怎么成了“江青的干女儿”——原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委员、“八一五”派代表黄荣华自述》, 香港, 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2013年。
- 顾洪章:《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9年。
- 李齐翔:《梦殇——缅共游击战争中的中国知青》, 台湾出版单位不详, 2018年。
- 王曦:《红飞蛾》, 香港, 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2011年。
- 石磊:《守望金三角》, 香港, 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2012年。
- 密洛凡·德热拉斯:《新阶级》(供内部参考),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3年。

自印书与未刊稿(笔者存):

- 沈炳章:《蒙难林家院》, 自印书, 2008年。
- 张振钧:《文革时期的人民和他的领袖》, 自印书, 2014年。
- 刘殷农:《一个幸存者的自白》, 自印书, 2014年。
- 王福生:《方向东传奇纪事》, 方向东自印书, 2013年。
- 徐宗启:《往事回顾》, 自印书, 2015年。
- 黄肇炎:《三线遗梦》, 自印书, 2016年。
- 刘光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实践和官僚集团的反攻倒算》, 未刊稿, 2016年
- 江源:《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动乱之源》, 自印书, 2014年。
- 张奎林:《云南“文化大革命”回忆录》, 未刊稿(未完成), 2015年。
- 胡延观:《总赖东君主》(未刊稿), 时间不详。
- 杨忠义:《十年文革在牟定》, 自印书, 2017年。

云南文革史稿（下）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Yunnan Province (II)

聂文澜主编:《回眸文革——弥渡文革简史》，自印本，2017年

昆明一中、三中老三届编:《回眸50年》，自印书，2018年。

邓正新:《贵州风云》，自印本，2014年。

网文与光盘:

《昆明党史》，昆明党史网（<http://kmds.km.gov.cn>）

《沙甸事件的经过：起因及结果》，于哥的搜狐博客（2009-09-14）。

<http://yuxiaoyun52.blog.sohu.com/131801436.html>

（法）潘鸣啸（Michel Bonnin）:《上山下乡运动再研究：引起争议的几个问题》

（2006年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陈人康:《新中国“云南王”谭甫仁之死》。

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中央关于云南的文件和领导讲话部分）。

报刊:

《云南日报》（1968年——1992年）。

访谈口述:

蒯大富、朱克家、金桂仙、胡延观、刘殷农、段美素、周永琪、沈炳章、包亚芳、方向东、李文辉、沈参雄、杨凯、马苏红、张振钧、范严生、刘志宏、项兆斌、雷强、王詮、汪首学、马苏红、许少先、项兆斌、杨寿、何吉昌、沈参雄、李木昆、张振钧、王洪波、张培智、刘志宏、徐兴旺、汤克文、杨寿、何吉昌、陈昆生等。